刘少奇与毛泽东

珍藏本
国内首次出版

现代史上最神秘的情节：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全景式、真实描述两位重要人物抉幽揭谜的大型纪实文学。

李志绥 著



刘少奇与毛泽东

刘少奇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毛泽东的第一位接班人。然而一九六六年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其打倒并开除党籍，制造了中共历史上的“最大的冤案”。

毛、刘是怎样结成联盟，又是怎么样与他反目成仇？

本书是中外第一部记述毛泽东与刘少奇关系的巨著。作者通过毛、刘两人从“旗帜”与“旗手”的亲密关系到分裂的过程。

建国后的中共党史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农业社会主义与刘少奇为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斗争史”，对毛泽东为什么与怎样在建国后由正确蜕化为错误、毛泽东错误的性质等一系列当代中国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科学的客观评述；对毛泽东用什么手段与怎样打倒刘少奇，提供了最新的详尽资料；本书还提出了“改革开放是继承刘少奇正确路线”，刘少奇与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等重要内容观点。

本书资料丰富、详实，许多是在海外第一批露，作者立论新颖，见解独到，是不可多得的研究现代中国的作品。

本书是作者另两部著作《林彪与毛泽东》、《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姐妹篇。这三本书从政治和理论的高度，对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更具价值。

ISBN 5407-2404-7-5

9 785407 240471 >

ISBN 7-5407-2404-4/G · 817

定价：38.80 元

刘少奇与毛泽东

李志绥　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

责任编辑:蔡文辉
封面设计:向　阳

刘少奇与毛泽东
李志绥　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华山印务有限公司承印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17印张　插页4　字数:420千字
2005年10月第一版　　200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407-2404-7/G·817
定价:38.80元

版权所有,严禁盗印,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允许,
不准以任何形式使用本书的任何内容,违者必究。
(内部参阅,限量发行)

目　录

前言……(1)
第一篇　同乡兼战友
第一章　炭子冲与韶山冲……(4)
第二章　毛、刘——革命战友……(17)
一、刘少奇：中共最早的留苏学生
二、毛刘初会在长沙
三、刘少奇的崛起：安源大罢工
四、刘少奇：领导五卅运动
五、刘少奇第一次被捕
六、刘少奇第二次被捕
第三章　毛刘：同是王明路线受害人……(35)
一、王明上台　毛泽东受打击撤职
二、刘少奇被批判撤职
第四章　毛刘成为红、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50)
一、毛泽东：红区正确路线的代表
二、刘少奇出掌北方局与"六十一人自首出狱"事件
三、刘少奇：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
第五章　毛刘同仇敌忾斗王明……(62)
一、王明：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
二、王明与毛泽东分庭抗礼
三、毛泽东召刘少奇回延安参战

四、毛刘联手斗王明
五、刘少奇发表《论共产党的修养》
第二篇 “旗帜”与“旗手”
第一章 毛刘结成亲密战友……(82)
一、延安整风运动与刘少奇的冒起
二、为刘少奇牵肠挂肚 毛泽东罕有露真情
三、整风运动结果:毛刘共享权力
第二章 中共“七大”:“旗帜”与“旗手”……(101)
一、“个人崇拜”始于延安
二、中共“七大”:“旗帜”与“旗手”正式登台
第三章 毛刘“蜜月”……(107)
一、毛赴重庆密谈判 刘首次主政中央
二、刘少奇:“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
三、刘少奇及时指示林彪“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四、陕北分兵 毛刘各率一个“中央”
第三篇 分歧与矛盾
第一章 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与刘少奇的科学社会主义……(124)
一、毛泽东:“李自成”与“进京赶考”
二、刘代表毛秘密访苏
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四、“农业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
五、“农业社会主义”第一波:刘少奇天津之行
六、“农业社会主义”第二波:毛刘关于“富农党员”的争论
七、“农业社会主义”第三波:毛刘关于山西农业合作化的争论
八、毛泽东由科学社会主义蜕变成农业社会主义

九、毛泽东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十、建国后的毛刘思想路线比较
十一、毛泽东是中共最大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
第二章　毛刘斗争——高饶事件……(188)
一、高岗其人
二、饶漱石其人
三、毛泽东"左"倾　再批刘少奇
四、毛泽东批判"新税制"
五、改组政务院　毛泽东贬周捧高
六、高、饶向刘、周发难
七、毛泽东转弃高饶
八、"高饶事件"的背后
第三章　中共"八大":刘少奇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下的历史奇迹……(219)
一、毛泽东:"大家拥护'八大',不拥护我"
二、毛泽东:"八大"的中心思想是反右倾
三、"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步刘少奇后尘
四、一九五六年:"多事之秋"
五、毛泽东的"冒进"受压抑
六、刘少奇占上风:"八大路线"
七、墨汁未干　毛泽东推翻"八大"路线
八、反右运动:毛泽东制造"中国的匈牙利事件"
第四篇　对抗与分裂
第一章　"左"倾冒险主义大泛滥:"大跃进"……(250)
一、毛泽东发动"大跃进"
二、热昏的日子:农业"大跃进"
三、"超英赶美":工业"大跃进"
四、"人民公社":毛泽东"如获至宝"
五、刘少奇紧跟毛泽东"大跃进"

六、毛泽东不甘心让位　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
第二章　庐山会议:毛挟刘肃整彭德怀……(275)
一、"大跃进"紧急刹车
二、毛刘分歧
三、毛泽东的"钓鱼"与彭德怀的"为民鼓胡吹"
四、庐山上的刘少奇
五、毛泽东收起罗网
六、毛授意刘搞个人崇拜
第三章　"继续大跃进"与史无前例的大灾难……(297)
一、继续"大跃进"
二、三年的"大跃进"的代价
三、毛泽东的反思
四、刘少奇的反思——湖南调查
五、刘少奇:毛泽东不满意的接班人
第四章　毛刘分裂:"七千人会议"……(344)
一、国民经济继续恶化
二、"七千人会议":毛泽东"捂盖子"
三、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四、林彪:"毛主席是正确的"
五、毛泽东避重就轻漫谈"自由王国"
六、毛、刘结怨
第五章　对"大跃进""伤筋动骨"的纠正……(367)
一、刘少奇:对经济形势重要新认识
二、刘少奇:"伤筋动骨"的调整
三、突破毛泽东农业底线的"包产到户"
四、刘少奇千方百计对毛泽东的维护
第六章　毛泽东的反击:"阶级斗争天天讲"……(384)
一、一九六二年夏季的形势:两种前途的选择
二、北戴河会议:毛泽东的突然袭击

三、威力强大的凶器："阶级斗争"
四、刘少奇再次向毛泽东屈服
第七章　从貌合神离至分道扬镳……(404)
一、毛泽东的假想敌：刘少奇与修正主义
二、"四清运动"：毛刘联盟分裂
第八章　刘少奇风貌……(414)
一、融化在党组织
二、最重要的特征："勤奋"
三、遵守纪律的模范
四、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
五、"高举"是有原则的
六、拙于权术
七、廉洁与清贫
八、起居饮食
九、瑕疵："吃小亏占大便宜"
第五篇　"旗手"悲惨殒落
第一章　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452)
一、毛泽东的阴谋：批判《海瑞罢官》
二、乘虚而入　毛泽东"清君侧"
三、设陷阱　毛泽东隔岸观火
四、派工作组　刘少奇中计
五、毛泽东的"理想社会"："五·七指示"
六、毛抓住刘的痛脚："镇压学生"
第二章　毛泽东换接班人　刘少奇失势……(471)
一、不寻常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二、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刘少奇跌至第八
第三章　批判不断升级　刘少奇陷灭顶之灾……(477)
一、彻底打倒的讯号：批判资反路线

二、刘少奇第一次"自我检查"
三、"大批判"与刘少奇的第一次答辩
四、刘少奇的第二次答辩
五、匿名信与宋庆龄赠书
六、"智擒王光美"与刘少奇被揪斗
七、毛刘最后一次会面
第四章　罗织罪名……(500)
一、毛泽东的政治需要
二、欲加之罪:"招降纳叛"
三、刘少奇最后的答辩
四、致刘少奇死地的"叛徒、内奸、工贼"
第五章　刘少奇最后的苦难岁月……(511)
一、人身迫害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二、惨无人道的折磨
三、十二中全会: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
四、发配开封
五、"旗手"惨死在古都
《参考书目》……(533)

前 言

·李志绥·

一九八〇年前后，在为刘少奇平反的问题上，中共党内发生了巨大的分歧。邓小平说："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了毛泽东思想错了。"（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七四页）。这种毛刘之间"有你没我"、"水火不可相容"的状况，基本上反映了建国后中共党内斗争的概貌。

中共中央在平反时说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与刘少奇斗争并将其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制造了"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的毛泽东又是什么呢？毛刘斗争的实质是什么？毛泽东的错误是什么性质？这此一至今都还是一团雾。现在，在中国，毛泽东仍然是"神"，人们多方为他隐恶扬善，歌功颂德。仿佛浸透了中国人民血泪的三年"大跃进"和十年"文革"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人们何其健忘如此？

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抛弃了毛泽东的错误路线，而继承了刘少奇的正确路线。毛泽东是阻碍现代中国发展的桎梏。对毛泽东的错误批判得越彻底，改革开放的进程就越健康坚定。现在，对毛泽东的神化，是对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的一种反动，是对黑暗的毛泽东时代的眷恋。相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是与毛泽东错误路线的彻底决裂。

第一篇

同乡兼战友

第一章　炭子冲与韶山冲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乡炭子冲的一户姓刘的庄户人家里，一名男婴呱呱出世，父亲刘寿生给他起名刘绍选，字渭璜，这就是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在湖南，人们将丘陵环抱中的小块冲积平地叫做“冲”。刘少奇的炭子冲，与毛泽东的韶山冲，同属于衡山山脉，两个冲之间仅一岭之隔，相距不到三十公里。毛、刘两人堪称是同乡近邻。

有趣的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祖籍又同是江西省吉水县。

据清乾隆二年（公元一七三七年）修写的《韶山毛氏族谱》记载：元朝至正年间，陈友谅在江西起事，吉州龙城（今江西省吉水县）青年农民毛太华为了“避乱”，“由吉州城迁云南之澜沧卫，娶王氏，生子八，明洪武十三年（即公元一三八〇年）庚申，以军功官人楚省，惟长子清了四子清四两公，与之偕行，解组时居湘乡北门绯子桥。十余年后，清一、清四两公，居湘潭三十九都今之七都七甲韶山家焉。”毛泽东便是这个“毛太华”的后代传人。①

而据《宁乡南塘刘氏初修族谱》记载，刘少奇的祖籍原在江西省吉水县。明朝中叶始祖刘时显的儿子刘宝在湖南省益阳县做过知县，时显夫妇也跟随儿子一同来到益阳。刘宝离任后，父子为湘江楚地的秀丽山川所吸引，没有再回江西，而带着一家大小迁到宁乡县城南伪水和靳水之间的芳储乡芳田滩定居。后来，刘宝的儿子邦益的后代又沿靳水而下，迁居南塘炭子冲一带。到刘少奇兄弟出世时，已经是第十三代了。②

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韶山出生，比刘少奇大五岁的毛泽东，同是农家子弟出身，两人走过差不多相同的读书、追求革命的道路，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相遇，结成亲密的政治盟友。在历史与命运的安排下，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的旗帜，而刘少奇则成为高举这面旗帜的旗手。然而，在更加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旗帜”与“旗手”又分崩离析，亲密的战友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旗手”更被“旗帜”折磨而死，成为一共和国最大的冤案”。而现代中国和中国人民，也随着这两个人的起落、斗争，饱受了风雨和苦难。

刘少奇的先辈以“耕读”为家传祖训。康熙年间曾任宁乡县知事，后来又当了清廷都察院御史的陈嘉猷，在为《宁乡南塘刘氏初修族谱》作序时，曾就此事褒扬说：“南塘刘氏族虽不甚显，而族之人士俱极老成持重、耕读传家，汉书所谓孝弟力田、管子所谓秀民足赖者庶几近之，吾有以知其族之必大且昌也”。秉承这种“耕读”的祖训，刘氏家族知书识礼，子弟忠孝持重，到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虽仍躬耕田亩，但粗通文墨，思想开明。他对于盖房买地置家产不大热心，却十分重视子女读书接受教育。

虽然家境贫困，但刘寿生却咬紧牙根，让他的四个儿子都上私塾读书。如此热心于投资知识，在炭子冲的贫苦农民家庭中是极为罕见的。

刘少奇的母亲鲁氏，也是附近农家的子女。刘寿生夫妇共育有四子二女，刘少奇是他在中年时得到的最小的儿子，因他在叔伯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也是最小的一个，所以小时候族中人都叫他“九满”。

刘寿生身体瘦弱多病，但生性爽直、忠厚、谦和，躬亲劳动而又善于指挥；而鲁氏则干练、坚毅，任劳任怨，是家庭的主心骨，加上哥哥姐姐们的互相亲爱，勤勉努力，刘少奇自小生活在一个虽然是贫穷，但却是勤劳俭朴、和睦可亲的家庭环境中。刘少奇小时候长得瘦弱文静而聪明伶俐，又是家中的“满崽”，因此，得到父母亲和哥哥姐姐的锤爱，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受娇惯。从五、六岁开始，他就跟着哥哥到田边去看牛、割草，跟着姐姐到山上去拾柴、摘野菜，或者帮助

父亲和母亲到菜畦稻田里捉虫除草……。到了八、九岁以后，他便单独出门与邻家的孩子们一道从事各种野外劳动了。炭子冲的山山岭岭，靳江两岸的田垄溪边，到处都留下了他童年时快乐的足迹。③

与刘家相反，在毛泽东的家庭中，父亲毛顺生是真正的主宰。毛顺生身材高大、健壮。他读过几年私塾，可以记帐和写信。他勤劳刻苦，精明能干，善于经营，又种田，又经商，家境逐渐发达。到毛泽东幼年时，已是有田产二十多亩，年收稻谷八十担，还雇有长工的富裕人家。

毛顺生一心想发家致富，光大毛家，一生都在孜孜苦斗，并将这个愿望强加给毛泽东。他治家颇严，生活十分俭朴，吃苦耐劳，有时甚至达到吝啬刻薄的地步。毛顺生自己一生中不停地劳动，也严格地要求孩子们努力工作。毛顺生看不惯游手好闲，憎恶浪费和糟踏东西。他的脾气倔强、暴躁，严厉而专制，自私而苛刻，他从来不给孩子们零用钱，平日的饮食也很差。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性格善良、温厚，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毛泽东的相貌像母亲，但那高大的身材却像父亲。毛泽东尽管对母亲怀有深厚的感情，但文七妹那善良的性格并没有给他多大的影响，他的性格中更多的，是父亲那种严厉、倔强、专制的成份。

毛泽东自小喜欢读书，不喜欢劳动和经商。而毛顺生则一心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会种田、能经商、善于精打细算的接班人。尤其是作为长子的毛泽东，父亲更寄予厚望，能够继承家业，将毛家发扬光大。毛泽东与父亲的这种截然相反的人生观，是引起两父子发生矛盾冲突的根源。性格反逆、任性而倔强的毛泽东，经常与父亲争吵。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顾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的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毛泽东一生热衷于斗争，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

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便是自小与父亲斗争的积习。

刘少奇家是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哥哥姐姐，嫂子侄子等，比毛泽东家多得多，然而却没有分成党派，有的只是团结互助、紧张有序的劳动生活。农忙时刘少奇常去田间送茶水、饭粥，提秧苗，拾禾穗。到水田中去除草，是刘少奇能够做、也做得最多的一种农活。六月天里，站在水田中不停地弯腰扯草，一下田就一气干半天，这是需要耐心和毅力的。刘少奇和哥哥们站在一排，并不示弱。汗水从眉梢往下淌，禾叶、水草刺疼手脚，他都坚持着很少歇气，扯的又快又好，时常得到父亲和哥哥的赞扬。幼年时的刘少奇，就在这些平常的劳动中，很早就体会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滋味。

在刘少奇的童年生活中，六姐的关心和照顾，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六姐刘绍得比刘少奇大八岁，她勤劳善良、性情温顺。因为母亲家务担子繁重，父亲和哥哥出外劳动的多，七姐刘绍意年纪尚小，所以照顾弟弟的担子就常常落在六姐身上。六姐经常帮助他梳理发辫，洗刷和缝补衣服，直到刘少奇上学读书了，六姐还细心地照护他的生活。刘少奇也很尊敬六姐，六姐出嫁时，他高兴地去送亲。后来到保定求学和从苏联留学回来看望母亲、兄嫂时，他也到了六姐家里看望。一九六一年五月，刘少奇回到离别了将近四十年的家乡进行农村调查。他与夫人王光美一道从炭子冲步行十多里到赵家冲去看望了六姐，这时六姐已经年过七十，在农村公共食堂吃饭。刘少奇拉着六姐的手久久没有放开。他安慰六姐：“党和人民很快就会把困难克服过去的。”临别时，他给大姐留下的礼物是：水果糖二斤，饼乾二斤，猪油二斤，大米五斤，咸蛋九个。这一点物品，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虽然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但却表达了刘少奇对姐姐，对养育他的家乡亲人的一片深情。④

一九〇六年，八岁的刘少奇开始入拓木冲私塾读书，启蒙老师叫朱熙庭。由于家庭经济拮据，为了学费问题，刘少奇不得不每年都转换学堂。与叛逆、任性的毛泽东相反，刘少奇是个沉静文弱、行为端

正、品学兼优的少年。他穿着朴素整洁，一根长辫梳理得一丝不乱：有时候头戴六页小帽，身穿长袍马褂，一副斯文样子。他的小书篋里，除了装着笔墨纸砚和书本外，还有小刀、剪子等手工具，在家里或学校做完功课以后，他喜欢做小工艺。上课时，刘少奇专心听讲，下课后，他不喜欢追追赶赶，打打闹闹，而是独自做手工艺：雕刻、剪纸、做小玩具，或者邀几个同学下铜钱棋和算盘棋，因此，他的周围总是围着一堆小伙伴。

毛泽东在家里反逆父亲，在私塾里，则经常顶撞老师。

有一大，塾师邹春培要学生们站起来背书，毛泽东却不肯站起来，硬要坐下来背。他说："先生坐着，我也坐着，我声音大一点，你一样听得清楚。"

又有一次，邹老先生要到朋友家去吃生日酒，就吩咐学生们做功课，等他回来再背书。时令正交三伏，天气又闷又热，毛泽东出主意大家到水塘里洗澡、游泳。于是，学童们都走出课室，在水塘里嬉戏。正在这时，邹春培回来了，见到学生们如此胡闹，非常生气，便叫他们到孔夫子的牌位下面罚跪。众位学童都战战兢兢地跪下了，唯有毛泽东不肯下跪，还说：洗冷水澡是我带的头，你要打就打我。邹春培一听，越发火冒三丈，举起那根二指宽的竹蔑片，就要打下去。毛泽东急忙闪开，一溜烟便跑了。

毛泽东不敢回家，怕挨父亲的痛打。他想到湘潭县城去，可是又不知道方向，也没有出过远门。结果，他在山里乱跑了三大，终于被家里的人找了回来。原来他只是在韶山周围的山里兜了几个圈子，离他的家上屋场还不到八里路。⑥

三十四年后，毛泽东回忆起这次"课堂革命"时说："回家之后，令我惊喜的是状况有所改善，我父亲开始对我有些体贴，老师也较温和了一点。这是一次成功的斗争"。

这一年，毛泽东只是九岁。

类似毛泽东的这种“课堂革命”，就从未发生在刘少奇的身上。

朱老师家房前屋后有许多桔子树，一到秋天，枝头果实累累，着实诱人。孩子们哪个不淘气贪玩，禁不住手痒，摘几个尝尝，自是在所难免。然而刘少奇从不这样做。他自制力强，自尊自爱，从不乱来。对此朱老师甚是喜欢，有一次，特意摘了几个大桔子奖励他。刘少奇恭敬地接过桔子，并不独吃，而是与在场的同学一块分享，刚要入口，又来了一位同学，刘少奇便马上从自己留下的两瓣桔子中分了一瓣给那位同学。刘少奇的谦让，与毛泽东的好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与毛泽东一样，刘少奇自小喜欢读书。他不仅努力读课堂上的书，课余时间还自己去找书读，养成了手不释卷的习惯。刘少奇有位同学叫周祖三，家住在首子冲，与炭子冲一山之隔。其父周瑞仙，曾留学日本东京宏文师范，还是同盟会会员，喜欢购置新书刊，藏书不少。刘少奇便常向周家借阅书籍，并在读书手册上摘记。周家看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很乐意接待他在家里与周祖三一起看书学习。在滴水成冰的一个大冷天，看书入了迷的刘少奇，被炭火烤着了棉鞋，发散出焦糊的气味，却不知觉。周家因此风趣地叫他“小书柜”。“刘九书柜”的雅号便在刘氏族中传开。⑥

在刘少奇少年时期的求学生涯中，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十一岁时在洪家大屋私塾一年多的读书生活。

所谓洪家大屋，并非是一幢高大的房子，而是一户姓洪的大地主的宅院。这所宅子占地广房子多，墙高院深，颇有气势，在当地小有名气。洪家科举出身，几代做官，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为使幼子洪赓扬得到良好教育，洪家专门选聘了一位上过师范学院、拥有新知识的名叫杨毓群的先生，来家开设学堂，并招收功课好的邻家子弟一起上学。刘少奇和洪赓扬同龄，加上品学兼优，即被录取。

洪家大屋的教学环境和学习内容使刘少奇耳目一新。洪家是书香门第，又受西方文化影响，日常生活中接受了不少新思想新事物。洪家的女孩子都不裹脚，而且可以同男孩子一起读书，这在当地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举动。教的课程也和刘少奇前几年学的迥然不同，不是桔

燥无味的“子曰诗云”那一套，而是学国文、算术、自然地理常识等，还讲寓言、童话，学起来十分生动有趣。

洪家大屋还有不少藏书。这对刘少奇吸引力很大。在自己家里，父亲从不允许他看那些神话故事、传奇小说之类的杂书，在洪家可以随便阅读。刘少奇——有空就拉了洪赓扬一起到书房找书看，往往一坐半天，读得津津有味。⑦

一九〇七年，在父亲的安排下，十四岁的毛泽东被迫辍学，回家务农。

不能读书，已是一种痛苦；而田间无休无止的繁重的劳动，更令毛泽东感到深恶痛绝。毛泽东对家里的劳动，抱着雇佣的、应付的态度，时常扔下农活，躲起来看书。毛顺生便经常责备他“懒惰”，“懒而无用”，“不孝”。

针对父亲的这些指责，毛泽东也经常争辩、反驳：“长者应该比后辈多做些事，你年纪比我大两倍以上，应该多做些，等我到你那样大的年纪时，力气要比你大得多，做的事也就更多”。毛泽东还向父亲宣称：等他到了父亲这样年纪的时候，他会比父亲勤快得多。当父亲指责他“不孝”时。他更引经据典来反驳：古书上说，“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有“子孝”。毛顺生时常被驳得哑口无言，气不过之下、只好诉诸武力。

毛泽东与父亲间的争执，有时也会暴发成激烈的冲突。有一次，毛顺生在家里开酒席，款待生意场中的客人，叫毛泽东来陪客。然而讨厌繁文缛礼的毛泽东不愿奉陪这些客人。于是，父子两人便在客人面前大声争吵起来。毛顺生当着客人的面大骂毛泽东“懒而无用”，毛泽东便公然与父亲顶撞。毛顺生于是更加气愤，要动手打人。毛泽东见机不妙，便愤然出走。母亲文七妹急了，连忙出来劝架，要毛泽东回去。而暴躁的毛顺生也追了出来，一边骂，一边命他回去。毛泽东已经跑到南岸的池塘边，恫吓父亲说：如果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跳下池塘自杀。这样一来，毛顺生真的给吓住了。毛顺生不再追来，但坚持要毛泽东下跪，磕头认错。毛泽东又讨价还价，说：如果父亲不再

打他，他可以跪下一条腿。结果，在文七妹的讲和、劝解之下，父子便终于达成协议，毛泽东单腿跪下向父亲磕头认了错，而毛顺生也不再打他。毛泽东与父亲的一场冲突，在双方的又坚持又妥协中平息了。⑦

在回家务农期间，毛泽东利用一切机会，扔下农活抽空读书。每天晚上，在帮父亲记完往来帐目后，毛泽东便回到自己的卧室，点起一盏桐油灯，就着微弱的灯光，专心致志地读书，常常读到三更半夜。

毛泽东的这些行为，毛顺生当然不喜欢。他觉得儿子看那些闲书、邪书，不但浪费时间，耽误农活，又费精神又费油。于是，一发现儿子在看闲书，他便大发脾气，呵斥责骂。这时，母亲便出来打圆场，说："三伢子呀，你就听话，莫熬夜了，明天还要做工夫哩！"

然而，任性而倔强的毛泽东根本不听父母亲的劝告，他用一床老蓝布被单，把窗户遮得严严实实，不让漏出一点灯光，然后便沉迷在那些杂书、闲书中。

毛泽东后来说：自己"贪婪地阅读我能够找到的除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毛泽东的弟媳王淑兰也回忆说："凡是在韶山冲能够借到的书，他都借来读了。连和尚的经书也读"。为了借书，毛泽东时常翻过云盘山，到唐家坨外婆家去，向舅父和表兄们借书，来回几十里路。

在单调而辛苦的农田劳动中，读书成了毛泽东唯一的精神享受。书籍中的大千世界，成为他逃避现实的乐园。阅读丰富了毛泽东的精神世界，开阔了他的视野。书籍里展现的灿烂多彩的世界，令毛泽东无限向往，而现实就越发显得俗不可耐、苦不堪言。毛泽东与父亲给他安排的生活道路，距离越来越远了。

随着年纪增大，毛泽东的反叛也越来越强烈，与父亲的争吵也越来越频繁、剧烈了。他说："我越来越恨他"。父亲安排的命运，成为毛泽东走向广阔世界的束缚。

与毛泽东一样，刘少奇要走向外面的广阔社会，也必须冲破家庭的樊篱，摆脱传统的束缚。在这方面，刘少奇走过了与毛泽东近似的

道路。

刘少奇的少年时代，是在快乐，温馨中渡过的。

一九一〇年，父亲的肺痨病发作，家中虽然花了不少钱延医救治，但病势日见沉重，终于在六月二十五日去世。父亲的早逝，对刘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母亲天天以泪洗面，刘少奇安慰母亲，自己也悲痛不已。过度的悲痛与染上痢疾，令刘少奇大病了一场，刘少奇被迫休学。经过这一番波折，刘少奇一下子成长了许多。刘少奇病愈后，便向母亲要求而得到复学。当刘少奇离开炭子冲，到二姐家去寄读时，他感觉到，这是与欢乐的少年时代告别。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王朝覆灭，中华民国成立，不久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入北洋军阀袁世凯手中。这种种时代变迁的激浪，冲击着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刘少奇的二哥刘云庭在湖南新军当兵，参加了辛亥革命的起义。第二年，刘云庭回家探亲，向刘少奇介绍了辛亥革命的经过，还带回来一本介绍辛亥革命的书，年方十四岁的刘少奇听闻二哥的介绍和读了这本书后，兴奋不已。为了响应辛亥革命的成功，他当即要求姐姐为他剪去辫子，以示同封建主义决裂。

二哥带来的外界的讯息，令刘少奇对炭子冲以外的广阔世界向往不已。他再三向母亲要求离开本乡到外地上学，经过一番软磨硬泡，终于得偿所愿。一九一二年，刘少奇到西冲山芳储小学念书，一九一三年他又以优异成绩考上宁乡县的最高学府——玉潭学校。

一九一五年五月，窃国大盗袁世凯公然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玉潭学校的师生们奋起罢课游行，声讨袁世凯的卖国行径。刘少奇和几个同学胸前挂着“勿忘国耻”的标语牌，喊着口号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充满激情的学生们，行进在宁乡县的街道上，使这个平时宁静的江南小城充满了热烈的革命气氛。游行之后，刘少奇和同学们又在几处闹市街头向群众演说，还组成抵制日货的小组，将商店的日本商品检查封存。在这些活动中，刘少奇都是骨干分子。

投身这场讨袁斗争，使刘少奇第一次经受了革命的洗礼。为了表示保卫炎黄子孙、振兴中华民族的决心，他将自己的字“渭磺”改为“卫黄”。他在自己的书本、作业簿上，都用毛笔重新写上了刘卫黄这个新名字。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刘少奇用过许多化名和笔名，“刘卫黄”是他为革命而起的第一个新名字。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倒行逆施的袁世凯复辟帝制，做起了皇帝。消息传来，宁乡县城再次掀起了抗议的浪潮。刘少奇和同学们重新发动罢课、游行、演讲等活动，一直持续到袁世凯被迫宣取消帝制后才复课。⑧

一九〇七年，由父母作主，十四岁的毛泽东娶了二十岁的女子罗氏为妻。毛泽东后来说：“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

日耕夜读的生活并不能令毛泽东满足，于是他公然向父亲提出继续上学的要求。毛顺生当然不会答应。于是父子之间又爆发了新的剧烈的争吵。这一次，毛顺生气急败坏，而毛泽东也丝毫不让。经过旷时日久的僵持，加上妻子文七妹的劝说，毛顺生终于让步了，毛泽东得以继续读书，后来又离开韶山冲，到东山小学念书，并从那里转赴长沙求学。

辛亥革命对毛泽东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曾投笔从戎，参加革命新军。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半年以后，“孙逸仙和袁世凯达成了协议，预计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京政府解散了，我想革命已经结束，于是就退了伍，决定回去读我的书。”经过多方的选择，一九一三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直至一九一八年毕业。毛泽东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出外留学。因此，他始终只是个“小知识分子”。

一九一八年及一九一九年毛泽东先后二次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在那里毛泽东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一九一六年夏天，刘少奇以优异的成绩从玉潭学校毕业。十八岁的刘少奇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选择。在黑暗的旧中国，百业凋弊，民不聊生。刘少奇感到前路茫茫。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刘少奇只好继续求学。他持着玉潭学校老师梅冶成写给后来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何叔衡的介绍信，步行几十里，来到了省城长沙。经过一番周折，刘少奇进入设在长沙的宁乡驻省中学就读。

此期间，由于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刘少奇想投笔从戎，“精忠报国”。于是在一九一六年秋报考了湖南军阀谭延闿开办的陆军讲武堂。这所讲武堂由于找不到校舍，迟迟不能开学。刘少奇等到第二年的三月，才有机会踏入讲武堂的课室；可是半年以后，护法战争爆发，讲武堂在战火中变成一堆废墟，刘少奇的从戎报国成了梦想。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时代在呼喊，祖国在召唤，热血青年刘少奇再也坐不住了，他放下了身边的一切，匆匆北上，奔赴五四运动的中心——北京。

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令刘少奇耳目一新。刘少奇决定在北京读大学。然而一打听，学费贵得吓人，家庭根本负担不起。刘少奇四处奔走，多方设法，但在北京读大学的愿望，始终不能如愿以偿。刘少奇还想参加法国勤工俭学，但同是因为旅费没有着落而作罢。

一九一九年八月，山东发生军阀马良镇压爱国群众的事件，使已接近尾声的学生运动再度高涨起来。八月下旬，北京、天津学生几千人包围总统府、国会，举行示威游行。反动警察将学生强行驱赶到天安门前，打伤学生一百多人，逮捕了天津学生代表马骏等人。为了营救马骏等代表，天津几百名学生在天安门、总统府连续几天露宿请愿。刘少奇闻讯连忙赶去现场，加入了请愿队伍。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于八月三十日释放了马骏等人。斗争的胜利使刘少奇真切地感受到五四运动力量的伟大，更加坚定了追求革命的决心。

凑巧的是，一九一九年八月下旬周恩来也从天津赶来北京，在天安门等地参加了这场营救马骏的斗争。不过，当时他和刘少奇互相都

不认识。

在北京上不了大学，生活又无着落，刘少奇备受煎熬。后来，刘少奇辗转来到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希望过一段时间后有机会去法国。

育德中学在辛亥革命时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河北一带秘密集会的场所，学校的许多师生都参加五四运动。毛泽东、蔡和森曾先后来这里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李富春、李维汉从留法预备班第二期毕业后刚刚离校。

九月间，刘少奇进入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第三期学习。这里采用半工半读，半天读书，半天劳动。学习内容包括法文、机械学和木工、钳工、锻工、翻砂等技术。学校里革命气氛浓厚。校长王国光和教师刘仙洲等，对新思想很支持。《新青年》、《东方》等进步刊物在这里公开陈列，广为流传。校刊上还常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情况，评论国内外大事。这一切，对刘少奇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青年时在保定育德中学上过一年半工半读，有一个技师、两个技术工人教我们。作坊就是三个小房子，一个五马力的发动机，三部车床。我们一班六十个人，上午上四小时课，下午做四小时工，书也读了，身体也很好，还能赚钱。现在清华大学的刘仙洲副校长，那个时候教我们机械学。一年的半工半读，我们就学了打铁、翻砂、钳工、车床工、模样，五样都学了，还学了一门法文，准备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后来我没去。⑨

刘少奇“没去”法国的原因，还是因为费用没有着落。为了筹措留学费用，刘少奇只好由北京返回长沙。正当刘少奇在长沙四处奔走，努力张罗的时候，忽然传来法国政府停止接受中国留学生，刘少奇长时间苦心筹划的留学计划彻底落空了。

刘少奇自从一九一六年背井离乡外出找寻出路以来，从长沙到北京到保定，又从北京回到长沙，匆匆之间四个年头过去了。其间刘少奇备尽艰辛，尝到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尽管出路仍无着落，但刘少奇的眼界开阔了，革命的意识更浓厚了，而人生的意志也锻炼得更加坚

强了。

正当“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刘少奇从《大公报》上得知长沙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提倡留俄勤工俭学的消息：“赴俄学习旅费花费较少，到俄国后，俄国政府可以优待，不致凌辱，因此，赴俄比赴法容易。”

原来，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是毛泽东于第二次赴北京期间，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与何叔衡等湖南革命人士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发起组织的。稍后，他们又开始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刘少奇和毛泽东此时尽管都在长沙，而且在从事同样的革命活动，但他们还互不相识。刘少奇在北京期间已知道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事迹，早已对俄国神往，现在听到可以赴俄留学。刘少奇毫不犹豫地决定报名参加。他通过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帮助办理赴俄勤工俭学手续。与刘少奇前后报名的还有任弼时、萧劲光、周兆秋、胡立廉等湖南青年，而任、萧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任弼时更与刘少奇一起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刘少奇一行需要先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在此之前，他抽空回了一次炭子冲，看望母亲和哥哥，并说服他们为他筹措了一笔费用。一九二〇年初冬的一天，刘少奇与几名同学登上了赴上海的轮船，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

①⑤⑦：引自王以平《走出韶山冲》。

②：引自黄祖琳《刘少奇青少年时代》第二页。

③④⑦⑧：引自黄睁《刘少奇一生》。

⑥：见朱元石《伟人之初·刘少奇》。

⑨：《刘少奇选集》下卷，三二四页。

第二章　毛、刘——革命战友

一、刘少奇：中共最早的留苏学员

一九二一年四月，刘少奇与十几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上海黄埔江登上了一艘开往海参威的货轮，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赴俄旅程。

货轮先到日本长崎，住了一星期左右，继续乘船往海参威。海参崴到处冰天雪地。因为从上海出发时天已暖和、谁也没带棉衣，他们冻得吃不消，住在中国街的一家旅馆里。不敢出外。

当时海参崴还被日本占领着，伯力由苏俄红军控制，伊曼河成为外界线，这边白色地段，那边红色区域，互相严密防范。刘少奇一行刚小心翼翼进入海参崴，就被北洋军阀政府驻海参崴的总领事馆所注意。他们把刘少奇等误作孙中山派往苏俄去的人，借故抓了刘少奇等几个去审问。

刀枪手两边站立，杀气腾腾。审问的人问刘少奇是什么地方人，干什么的，要到什么地方去，……口气十分严厉。

刘少奇虽然初临这种场面，但能沉着应付。不管审问者怎样吹胡子瞪眼，刘少奇不慌不忙，不紧不慢，故意带着浓重的湖南话音，一一回答。他说自己是湖南人，因家乡遭灾，出来谋口饭吃，做手艺。

审问的人又问会什么手艺。

刘少奇连说带比，说木工、铁工活都拿得起。

审问者以逼视的眼光把刘少奇上下打量了一会儿，将信将疑，要

手下人察看刘少奇的手。还好，刘少奇在留法预备班工厂实习时留下的老茧没有完全蜕掉。再问别的，刘少奇的一口湖南话真难听懂。审问者再没有耐心，把刘少奇等放了。

刘少奇一行根据原来的安排，迅速与第三国际驻海参崴的代表——海参崴大学的教授伊凡诺夫接上头，伊要他们马上去伯力，以防在这里再发生不测，并给了他们每人一个用俄文打印的秘密通行证。伊叮嘱，千万妥为保存，不遇红军不暴露。被敌人发现要掉脑袋，丢失了就无法入境。伊安排他们登上了往伯力的列车。①

备受内战摧残的俄罗斯，满目疮痍。刘少奇乘坐的列车是装货的闷罐车，没有煤，烧的是木柴，路轨多遭破坏，走走停停。一路上饥寒交迫，历尽艰辛，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莫斯科时已是初夏的六月。刘少奇后来曾多次回忆这次艰险的历程。一九六〇年他访问苏联时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说："为了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一九二一年春，我和其他几十个青年团员，第一次来到你们的国家。我们从上海到海参崴，经过赤塔到莫斯科。那时候，海参崴还被日本军队占领着，远东共和国也还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从海参崴到莫斯科走了三个月，火车时开时停。当时火车是烧木柴的，有时候还要乘客从山里去搬运木柴，火车才能继续行走。当时你们国家处在革命后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看到了并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我们当即有部份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但是我们另一部份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却因此而更加坚定了。"②

刘少奇等人到达莫斯科时，适逢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大礼堂举行，刘少奇等人成了大会的编外人员，帮助做些会务工作，因此大会举行时，他们可以进去旁听。

克里姆林宫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坐着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列宁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作为这次大会的名誉主席，他向大会作了关于革命策略的报告。刘少奇第一次参加这样隆重的世界性大会，能够真实地看到了共产主义革命那波澜壮阔的斗争场景，而且能够一睹列宁这位久已闻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风采，刘少奇

心情之兴奋，真是笔墨难以形容。

以记者身份参加大会的瞿秋白，曾在他写的《赤都心史》中作了生动的记载："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安德莱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

大会闭幕后，刘少奇等人被分配到一九二一年五月建立起来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所学校是共产国际创办的，目的是为中国、日本、朝鲜等远东国家培养革命骨干力量，名誉校长是斯大林。

东方大学首批中国学生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四十多人。他们住到特维尔斯卡姬大街十五号东方大学的集体宿舍，在学校的食堂就餐。

东方大学开设的课程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联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工会运动等。教材粗糙，学习资料以及工具书都不够，加上刘少奇等人只在上海补习了几个月的俄语，而东方大学的教师几乎全是俄国人，听说写都十分困难。后来，瞿秋白来到东方大学任翻译，并讲授一部分课程，才稍微减轻学员们的学习困难。

这时，苏联正处于国内战争时期，经济十分困难，粮食供应严重不足，生活用品极为匮乏。刘少奇等人在东方大学的这一段学习生活是非常艰苦的。萧劲光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这些外国学生享受红军的待遇……红军的待遇每天也只有一块像两个手掌合起来那么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早上切下一块面包，中午就不敢切了，否则晚上就没有吃的了。中午吃饭时有一个汤，是

海草、土豆煮的，有时放一点咸鱼。开饭时一人一勺，一勺下去有什么算什么，基本上是清汤，有时碰到一点稠的、算是很幸运了。那时真是饿得难受。我们的课堂在四层楼上，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本来上个四楼算不了什么，可是那个时候上四层真困难啊，一步一步地慢慢往上挪，中间还得休息几次，一次是上不到顶的。有时肚子饿得实在不是味道，就躺在铺上等饭吃，越等越饿……晚上睡觉时，一个挨着一个，大家挤在一起取暖，只盖一件军大衣和毯子。③

东方大学学员中有少数人受不了这种艰苦生活，情绪消沉，提出退学。但刘少奇等大部份人始终意志坚定，精神乐观，把困难环境作为锻炼自己的机会。在一九二二年新年晚会上，一向深沉文静、从没有演过戏的刘少奇，还和萧劲光等一起上台，为大家表演了一出反映中国军阀镇压中国工人罢工的话剧。

二、毛刘初会在长沙

一九二二年春天，刘少奇奉调回国，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是年夏天，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接见了刘少奇，派他到湖南工作，并让刘少奇将刚刚闭幕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带给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

湘区执行委员会，即是中共在湖南的领导机构，是一九二二年五月成立的，书记正是毛泽东。毛泽东还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当时在湖南的共产党人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郭亮、夏明翰、李六如等人。

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设在长沙市小吴门外的清水塘二十二号。那里有绿油油的菜地和一口清澈的池塘。毛泽东与夫人杨开慧也居住在这栋普通的青砖小平房里。

刘少奇对毛泽东的大名早有所闻，知道他是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中的一位，就在清水塘这所平房里，刘少奇与毛泽东第一次会见。

这是一次平凡的会晤，历史并没有给这次会晤留下任何珍贵的镜头。然而这却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中国革命的旗帜与高擎这面旗帜的旗手，经过曲折的道路，终于走到一起来了。

三十年后的一九五二年，刘少奇在全国解放后第一次回长沙时，曾和夫人王光美一起专门去寻访同毛泽东初次会见的清水塘二十二号，可是由于年久变迁，他们竟没有找到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刘少奇与毛泽东接上联系后，告假回宁乡看望了母亲和亲人，之后，便匆匆赶回长沙，投入领导长沙土木工会和粤汉铁路长沙段工人罢工的斗争。

九月九日，粤汉铁路长沙段二千四百名工人全线罢工，成立了工人俱乐部联合会，高举“争自由、争人格、争人权”的旗帜，向路局提出六条经济要求。为此，刘少奇四处奔走，忙得不可开交。在岳阳，郭亮率领工人卧轨拦车，粤汉铁路顿时全线瘫痪。

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刘少奇接到刚从萍乡赶回来的毛泽东的通知，要他放下长沙的工作，立即赶去安源路矿，领导那里即将爆发的更大规模的罢工运动。

三、刘少奇的崛起：安源大罢工

安源路矿，是安源煤矿和株（洲）萍（乡）铁路的全称，位于湘赣两省交界处的江西萍乡境内，拥有矿工一万二千多人，铁路工人一千多人，是当时中国南部最大的产业之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中共湘区委从一开始就把它作为开展党的工作及工人运动的重点。一九二一年冬，毛泽东第一次去安源考察，随后派李立三前往开展工作。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安源正式成立了工人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一九二二年九月，在粤汉铁路、汉阳铁厂工人罢工的影响下，安源工人为了争取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和经济利益，与路矿当局形成对峙，一场大工潮如箭在弦，一触即发。为了加强安源路矿的领导力量，毛泽东决定将刘少奇从岳汉铁路罢工的火线调往安源，协助李立

三全面开展工作。

九月十一日，刘少奇到达安源，同李立三会合。

原来，就在刘少奇到达安源的前一天，路矿当局串通萍乡县事和新近调防来的赣西镇守使，威逼工人俱乐部自行解散。工人们极为愤慨，针锋相对地提出要路矿当局承认工人俱乐部、每月发给俱乐部津贴二百元、发清工人欠饷等三项要求，限九月十二日中午答复，否则"迫不得已当为最后之对付"。双方已成剑拔弩张之势。

在掌握情况之后，李立三、刘少奇召开紧急会议，进行最后的决策。九月十二日晚，紧急会议在一位老工人家里秘密举行。一开始会上出现不同意见，有的提出最近当局新调来军队，增加了武装，弄不好会遭镇压。但李立三、刘少奇多数党员意见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会议最后决定：成立罢工指挥部，李立三任罢工总指挥，秘密策应；刘少奇任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长住俱乐部应付一切。

为什么要李立三"秘密策应"呢？这是有缘由的。李立三从一九二一年冬起就在安源活动，反动派早已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扬言要杀他。为预防不测，大家一致要李立三在罢工期间躲起来。而刘少奇刚来安源，敌人还不熟悉他，因此决定由刘少奇公开出面，长住在工人俱乐部坐阵指挥。

九月十四日凌晨，笼罩在夜幕中的静悄悄的安源路矿，忽然响起了一阵响亮的汽笛声，紧接着，周围工厂的电笛也高声长鸣，安源路矿一万三千多工人的大罢工开始了！偌大个路矿一下子完全停止运作。

工人俱乐部发表了《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还提出十七项要求条件，主要内容是：俱乐部改为工会，路矿两局承认工会代表工人向路矿两局交涉之权；今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得工会之同意；从前积欠工人的存饷，一律发给，罢工期间工钱照发！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增加一角等。

工人俱乐部将上述条件用公函递送路矿两局，并提出："如协商，请即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

罢工斗争一开始就进行得坚决而有秩序。工人们听从统一指挥，

一律各归住房。监察队员手持俱乐部旗帜，佩戴红袖章，拿着铁棍等武器，在街市及工厂附近巡逻，维持秩序。各处墙壁贴满俱乐部布告，有“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及“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语。

路矿当局施展种种阴谋诡计，企图破坏和镇压罢工。先是工头出面，以亲朋好友关系，出高价诱惑、收买一些工人开工。这一阴谋被监察队制止，未能得逞。之后，他们又悬赏六百块大洋，密遣暗探刺杀李立三。工人们严加护卫，使敌人无法下手。于是，路矿当局一面请赣西镇守使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设立戒严司令部，任命旅长李鸿程为戒严司令，妄图实行武力镇压；一面又请商会出面调停，欲使罢工自动停止。

九月十四日下午，商会代表谢岚肪和地方绅士陈盛芳来到工人俱乐部，表示愿为调停人，促请双方协商解决罢工风潮。刘少奇出面接待，提出以十七条要求为基础进行协商。

当晚，谢、陈带来路矿当局的回话：“路矿两局对于工人所要求各条，皆可承认；但现时做不到，请先邀工人开工，再慢慢磋商条件。”刘少奇当即严正指出：“工人所希望的在于解决目前生活问题，若路矿两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话，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

路矿当局对工人的罢工又恨又怕，罢工的第三天，路矿当局派人来请俱乐部代表到戒严司令部谈判，刘少奇毅然前往。工人们担心刘少奇受到迫害，说：“他们不安好心，你不能去！”“这是人虎穴，他们会害你！”

刘少奇回答：“不要紧，我为大家办事，就是死了也光荣！”

戒严司令部设在路矿办公楼内，台阶两边，架着机关枪，楼梯口、走廊里，都有士兵站岗，戒备森严，杀气腾腾。

戒严司令李鸿程先是假装客气地询问罢工过程，然后追问：“你们俱乐部为什么要鼓动工人作乱？”刘少奇毫不畏惧，反问道：“你们究竟是谈判，还是审问？是要解决问题，还是要把问题越搞越大？”

李鸿程以命令的口气说：“请工人先上工，路局每日先开火车两

次。”

刘少奇断然回答说：“这不能答应。不从磋商条件入手，无解决的希望。”

李鸿程立刻现出本来面目，威逼说：“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你这个代表先行正法！”

刘少奇毫不畏惧，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如不能达到万余工人的要求，虽把我斫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

戒严司令吼叫起来说：“我对万余工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儿！”

刘少奇愤然说道：“那就请你下令制裁去！”

这时候，外面喧声如雷。数千工人把司令部包围了，提出请代表出来，有事请司令和矿长到俱乐部商量。刘少奇出外向大家解释说：“工友们！现在正在谈判，请大家耐心等一等。”然后进戒严司令部继续谈判。

最后，李鸿程以调和的口气说：“请代表下午再来这里商量”。

刘少奇当即厉声说：“若不磋商条件，即可以不来；至说用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请你们把我斫碎罢！”说时怒不可遏。刘少奇在谈判中临危不惧，宁死不屈，表现了他的胆识与才干。也表现了他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工人们称赞刘少奇“浑身都是胆，真是我们工人的好领袖”。当年安源工人集体创作的歌谣《劳工记》中有这样几句：

少奇同志好胆量，我往矿局去一趟。
代表全体众工人，见机而作把事行。
明知山中出猛虎，岂肯贪生又怕死。
偏偏要向虎山行，贪生怕死枉为人。
少奇下了坚决心，特到安源办工运。
任他把我为甚难，不畏汤火与刀山。⑤

九月十七日，发电厂抽水机和打风机房因燃料用完而有停机的危险。一旦停机，所有矿井都将报废。路矿当局迫于工人群众的威势，不得不软了下来，答应继续与工人代表“从事磋商条件”的谈判。

九月十八日，路矿当局全权代表与工人俱乐部代表在达成的十三项协议上签字。路矿当局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答应了发清拖欠的工资、罢工期间工资照发、少量提高工资等要求。至此，历时五天的大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

当天，安源路矿工人发表《上工宣言》。宣言说：

“罢工胜利了！气也出来了！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宣告上工。”

“我们这次罢工的‘秩序、齐心、勇敢’，要算是我们神圣精神的表现。各界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说工人无知识呵！”

“我们这次罢工，是安源工人出头的第一日，是冲破安源黑幕的第一日，我们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权利去奋斗！”

九月十八日下午，一万多工人涌到大操场，举行罢工胜利庆祝大会。李立三在宣布胜利成果后发表演说，接着，刘少奇讲话，他说：“工友们，这次罢工，我们胜利了，这是大家团结一致，斗争坚决的结果。但是，这次胜利，仅仅是个开始。我们要继续团结，共同战斗下去，争取更大的胜利。”全场掌声雷动。工人们执帽欢呼：“劳工万岁！”“罢工胜利万岁！”口号声和爆竹声汇成一片。

会后，由李立三、刘少奇为前导，工人群众举行大游行。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刘少奇说：“这一次大罢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刘少奇领导安源工人大罢工的胜利，不仅对当时湖南工人运动有很大的鼓舞，而且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罢工胜利后，刘少奇乘胜追击，扩展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整顿内部，健全俱乐部组织机构，设立党校、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在全路矿开办了七所工人学校，五个工人读书处，一个工人图书馆，二个消费合作社，还盖了一幢工人俱乐部大楼。在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后，中国工人运动走向低潮的大形势下，刘少奇领导下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却得到蓬勃的发展，被当时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誉为“硕果仅存”，“是全国工会中组织最好的工会”。

安源罢工显示了刘少奇在组织工作和对敌斗争方面的才干。刘少奇的声望日隆，成为全国知名的工运领袖。一九二四年年底，中共中央将刘少奇调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这时，刘少奇还不到二十七岁。

就在这年的四月，刘少奇与共产党员何葆贞结婚。这是他的第二任夫人。

四、刘少奇：领导五卅运动

一九三九年五月，刘少奇在延安工人学校演讲，题目是《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他说：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日本资本家镇压上海工人罢工，枪杀了上海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引起五卅运动。

那时，我们用一切方法去动员群众，拿被打伤者的血衣及被打死的工人照片，到学校去做鼓动工作，结果各学校，工厂都决定，五月卅日这一天动员群众上街，召集群众开会，号召上海市各界起来援助工人。学生的一支宣传队走到南京路，英国巡捕施行逮捕，结果大家包围巡捕房，巡捕房下令开枪，打死了许多中国人。当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要求工人罢工自由，要为顾正红伸冤，反对交易所等。这便是南京路的五卅惨案。⑥

五月三十日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全市罢工、罢课、罢市，一致反击帝国主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亲自领导运动外，又先后紧急抽调李立三、刘少奇、刘华等人加强第一线领导。六月一日，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

当时刘少奇在青岛领导四方机车厂的大罢工。接到通知赶到上海时，已是六月初，全市大罢工已开始。刘少奇被任命为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相当于秘书长，负责总工会的日常工作。当时，以总工会为首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已经成立，李立三以总工会代表的身份参加联合会的领导，总工会的工作便落在刘少奇的肩上。

七月六日，全总上海办事处正式成立，由刘少奇负总责，领导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工会工作。

上海总工会成立的当天，就发表了宣言及告全体工友书，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并宣布全市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反帝风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刘少奇曾经生动地描述上海“三罢”斗争的情景：

此时，上海工厂无人作工，商店罢市，轮渡不通，车马断绝，交通为之阻塞。此时的上海，真的入于荒凉恐怖之境况。同时上海学生也一律罢课，即各教会学校也都加入。那时我们到上海马路上一看，只见满街贴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图画。处处都有游行的、演讲的、募捐的、演戏的，闹个不休，每个人都忙着反帝国主义的工作。

正当反帝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六月十九日，上海总商会宣布，将于六月二十六日单独提前开市。当天晚上，刘少奇主持召开上海总工会代表大会，讨论对付上海总商会开市的态度和办法。大会议决：不管商界开市与否，工界决不依赖，要坚持罢工到底。并发出通告，号召工人坚持罢工。“不得总工会命令，不得（达）完满目的，则头可断，工不可上！”⑦

六月末商界开市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开始集中力量镇压

工人运动。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时许，一批工贼、流氓手持刀枪、铁棒等凶器，冲入上海总工会，捣毁办公室，当场打伤职员八人，并图谋抓捕李立三和刘少奇。他们四处寻找，但没有找到。

原来，刘少奇早有警觉，迅速把文件、帐册收拾好，便离开总工会，去向中央报告了。李立三也在工人的掩护下，从房顶上出去报警了。

从八月初开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人先后开市，学生因放暑假纷纷离校，工人只能孤军奋战。为了保存力量，巩固既有成果，上海总工会决定改变策略，以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有领导有组织地复工。⑧

九月十八日，奉系军阀封闭上海总工会，并下令通缉刘少奇。面对敌人的镇压、迫害，刘少奇毫不畏惧，依然紧张工作，遂因工作繁重，积劳成疾，患了肺病。十一月间，病情加重，刘少奇不得不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在一九六八年炮制的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中，说刘少奇在五卅运动后“畏惧斗争”，“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

事实上，由于刘少奇当时已是上海名人，他的离沪返湘养病，上海报纸亦有报道。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出版的《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发表了题为《刘少奇的奋斗》的报道：

“本会总务科正主任刘少奇在本会未被封以前，早就患重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自本会被封后，因工作过劳，病势更重。而刘少奇不仅不因病辞工，更日夜不休息片刻，检阅各种稿件，亲往工人群（众）家中接洽各项事件。昨日刘君与某工友云，如果真正为工友奋斗，替工人谋利益的人，并不在平日工人组织公开的时候，看他的工作如何？而在最紧急的时候，看他努力不

努力为断，而某工友异常钦佩刘君备斗的精神。”

另有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上海英国（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英文报纸）刊登的一份情报说：

“昨晚六时约七名罢工鼓动者，包括刘华（当时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引者注）在闸北谭于湾三德里三十一弄三十二号碰头。刘华说：原总工会成员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很积极，现在病的很重。已经和他的家眷回湖南去了。”⑨

这些记载证明，江青一伙捏造的，纯是陷害刘少奇的谎言。

五、刘少奇第一次被捕

刘少奇回长沙后，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被军阀赵恒惕逮捕。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全国各地各界团体纷纷通电救援。这样的通电，有时一天多达四十多份。全总致电赵恒惕说：刘少奇“历年尽瘁爱国运动，为工人群众所爱戴”，在五卅运动中，他“更废寝忘餐从事奔走，号召国人为救国运动，以全力为罢工工人后盾，爱国热诚，举国同钦。”电报谴责赵恒惕，要求即速释放刘少奇。

经多方营救，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获释出狱，但被赵恒惕驱逐出湖南省。

二月十九日，刘少奇抵达广州，受到省港工人和各工会团体的热烈欢迎。这时，为响应上海人民反帝斗争而发起的省港大罢工仍在继续。三月三日下午，中华全国总工会举行欢迎刘少奇大会，到会群众有一千五百多人。全总宣传部主任邓中夏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介绍了刘少奇为工人阶级英勇奋斗的历史，称赞刘少奇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最奋发最勇敢的一位战士”。接着，刘少奇讲话，对工友及各界的欢迎表示感谢。他着重讲了领导工人运动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刘

少奇讲话后，全场掌声雷动，高呼口号："中华全国总工会万岁！""省港罢工胜利万岁！"⑩

在这期间，因全总委员长林伟民身患重病，由刘少奇代理全总委员长职务。他和邓中夏、苏兆征等共同担负起领导省港大罢工的责任。

六、刘少奇第二次被捕

一九二九年六月四日，中共中央任命刘少奇为满洲省委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满洲省委曾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干部被捕，中共的地下工作几乎陷于停顿。加上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的白色统治，满洲的革命斗争处于最艰难的时期。

刘少奇到达奉天（即沈阳）后，首先致力于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建设坚强的省委领导班子。八月二十日，他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制订工作计划，明确了常委的分工，建立相应的组织措施和斗争策略。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到八月底，满洲的中共组织基本恢复，共有十九个支部，一八二名党员。不久党支部又发展到三十八个。

在党组织基本恢复的基础上，刘少奇和省委其他领导人分头到奉天、哈尔滨、大连、抚顺等地发动和组织群众，重点是开展工人运动。刘少奇选择了奉天纱厂（今沈阳纺织厂）作为工作重点。这是一个有三千多工人的大厂。工人受到厂方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劳动时间达十二小时，而工资每日只有几角钱；工头又随便打骂工人，厂卫队也对工人进行严密的监管，工人吃、住都在工厂内，不能自由出入工厂。工人群众中积聚着强烈的不满情绪。

当时。刘少奇照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孟坚（即温用潜）和省委组织干事杨一辰负责联系奉天纱厂地下党组织的工作。

由于刘少奇此次被捕事关一桩"共和国最大冤案"，现将有关详情转录如下：

八月中旬的一天，孟坚、杨一辰和全总代表张昆弟去奉天纱厂，

与党支部书记常宝玉和工人党员崔凤煮、老范等秘密开会，研究发动工人开展“要现洋（银元），不要奉票”的斗争问题。他们研究后提出工人们不能等着饿死，如果厂方不答应，就在八月二十七日开支的那天举行罢工。

孟坚向刘少奇汇报了商定的斗争方案。孟坚后来在回忆中说：

“一提到罢工，少奇同志一连向我提出了好多个问题，如厂里情况怎么样？工人情绪如何？罢工的条件是什么？发动罢工的方法、步骤是什么？……少奇同志问得非常详细，对罢工时可能出现的各种大小问题他都问到了。对少奇同志提出的问题，有的我说不清楚，有的连想也没想到过。少奇同志细心地听完我的回答，在屋里来回踱着步，沉思了很长时间，最后，和蔼地问我，‘你过去搞过罢工没有？’我回答说：‘没有。’他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说：‘那么好吧，下一次纱厂支部开会，我同你一道去参加。’我一听，高兴得连连点点头说：‘太好了，太好了。’”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天气闷热。下午六时许，孟坚陪同刘少奇按约定的时间来到奉天纱厂门外。这时，离工人下班时间还差一刻钟左右，他们就呆在附近的小树林里，等候常宝玉出来接头谈话。

不一会儿，“呜呜——呜”地响过了汽笛声，可是工厂大门仍然紧闭着，不见一个工人出来，只有几个厂警在厂门外转来转去。刘少奇感到奇怪，警惕地问孟坚：“平时也是这样吗？”孟坚摇摇头，说：“不是这样。”约模过了一刻钟，刘少奇迅速站起来，果断地说，“可能出了什么事，我们不能等了。”当他们正要走开时，厂门突然打开，一队厂警自内冲出，朝他们停留的地方跑步奔来。刘少奇沉着地说了一声：“分头走开！”但躲避已经来不及了。“抓住他！”厂警边跑边喊。刘少奇和孟坚就这样被捕了。

他们被押进工厂，关在警卫班。这时，孟坚发现，常宝玉已被关在这里。原来，由于崔凤翕向厂方密告工人酝酿罢工，常宝玉于前两天在厂内召集群众会时就被当场拘押了。

晚饭后，刘少奇等被押到厂卫队队部，厂方开始了对他们的审讯。

主审是厂方一工人管理员孔令铎。他先把常宝玉叫上来，然后审问孟坚。接着，孔令铎审问刘少奇，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成秉真。"刘少奇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不慌不忙地回答。成秉真确有其人，是刘少奇的表哥，刘少奇对他的经历很熟悉，所以审问时应对自如。这是刘少奇早已想好的应变对策。

"你是从哪里来的？"主审官追问道。刘少奇说："我是从武汉来的。因为在武汉生活不下去，听说奉天日子好过，就投奔这里来找一个同事，想请他帮忙介绍个工作。可是刚到奉天，人生地不熟，同事还没有找到，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正上愁呢！"孔令铎继续问刘少奇关于闹工潮的事。刘少奇若无其事地答道："我根本不晓得。"问认识不认识常宝玉，刘少奇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敌人押上常宝玉来跟刘少奇当面对质。常宝玉看了半天后说："不认识这个人。"因为刘少奇刚到奉天不久，在被捕之前常宝玉还没有见过他的面。在审讯中，任凭敌人怎样折腾，刘少奇始终守口如瓶，坚不吐实。

第二天，厂警把刘少奇等押送到奉天警察局商埠地三分局，关在临时看守所。三分局根据奉天纱厂指按刘少奇等煽动工潮的公文，又对他们进行了审讯。刘少奇在审讯中申辩说，我是因为失业没有出路才来到奉天的，没想到在奉天大白天就无辜被人抓来，真不知道这是哪家的王法。警官过审问边看厂方的审讯记录，先援口供完全一样。审讯毫无结果。

隔了一天，刘少奇和孟坚、常宝玉一同被解送到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看守所。刘少奇被关入一间牢房，孟坚和常宝玉挤在对面的一间牢房中。有一天放风的时候，刘少奇凑到孟坚身边，悄悄地说："既然把我们解到地方法院，看来案情并不十分重要，关键问题是那个工人（指常宝玉），你要向那个工人做工作！说明大家都是为了做好事。如今奉天纱厂把我们送进监狱，但他们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如果他能翻供，否认有人组织工潮，我们的案子就会比较容易解决。"孟坚经过耐心的工作，终于说服了常宝玉。他表示同意在过堂时，全部否认在纱厂审讯时的口供。

一个多星期后，法庭开庭审讯。法官审问孟坚之后，问刘少奇："你同奉天纱厂的工潮案有关，你为甚么要煽动工潮？"刘少奇还是十分沉着地回答法官提出问题："我是个外地来找工作的人，什么煽动工潮，我根本不晓得。"法官问："那怎么把你抓来了？"刘少奇一听这话，知道敌人没有抓到什么把柄，便作出冤枉的样子说："那天，我路过纱厂门口，见吵吵嚷嚷的很热闹，就去看了看，谁知正赶上纱厂卫队抓人，就把我抓来了。我也莫名其妙！"最后被审问的是常宝玉。他说："先前的口供是他们动刑逼我说的。我不那样说，他们就打我，我只好照着他们的要求！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常宝玉全部否认了在纱厂审讯时招认的口供，并表示根本不认识刘少奇和孟坚。

没过几天，奉天高等法院对刘少奇、孟坚作出判决："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在此之前，刘少奇被捕的情况及经过，已由满洲省委于八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日和三十一日先后向中共中央做报告。九月一日，中央指示满洲省委"须用全力去营救"。奉天高等法院做出取保释放的判决后，经过省委多方努力，刘少奇于九月中旬跨出了监狱的大门，继续领导满洲省委工作。

三十年后，江青一伙在一九六八年的所谓《审查报告》中，伪造事实，把"叛徒"的帽子强加在刘少奇头上。报告说刘少奇在奉天纱厂被捕后，"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省委领导成员和所属党组织，并互向统治阶级"积极出谋献策"，因而被释放。他们还进一步诬陷说，由于刘少奇提供了情报，致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事实上，刘少奇的被捕，并未使党组织遭到破坏和牵连其他同志被捕被杀。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满洲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少、孟（即刘少奇、孟坚——引者注）被捕事在工作上虽然有很大的打击，但在同志倾向方面，没有多大的影响。"当时在满洲省委组织部工作的杨一展写材料证明说："刘少奇被捕后，省委机关没遭到破坏。省委机关一直还在原来的地方。"当时任满洲团委组织部长的王鹤寿也

写材料证明："刘少奇同志与孟用潜（孟坚）同志被捕后，他们两人知道的党省委与团省委的机关地址及他们知道的一些同志的住址，多数并未迁移，……没有一处遭到破坏，没有任何一位同志受到牵连而被捕。"

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中硬按的刘少奇被捕后投敌叛变的问题，纯粹是毛泽东与江青一伙为置刘少奇于死地而捏造的。

---

①：见朱元石《伟人之初·刘少奇》

②：刘少奇在莫斯科苏中友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七日。

③：见《萧劲光回忆录》，第二八一二九页。

④⑤⑦⑧⑨⑩：转引自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

⑥：见《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二八九一二九〇页。

第三章　毛刘：同是王明路线受害人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中共党内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它们是：

由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的瞿秋白“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由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由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其中，以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共党内统治的时间最长，达四年之久，因而危害也最大。中共在红区（即革命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而在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地区）损失达百分之百。

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与之进行斗争因而受到打击和迫害的，在红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在白区则以刘少奇为代表。

毛泽东是个十分看重路线、派系的人。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结束王明路线在中共的统治以后，毛泽东重返中共权力核心。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清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毛泽东、刘少奇便成了红区与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治联盟，便是在这个政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一、王明上台毛泽东受打击撤职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召开的。会议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和米夫拟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的名单。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掌握了中共的领导权。这次会议在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是“右倾”的纲领下，接受了王明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王明在会议上所作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发言中指出：立三路线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断言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中贫农反帝反封反资本主义的、带有社会主义革命成份的民主革命；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白区工作上，要最大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防御和合法斗争的可能。王明的观点成为了中共的行动的根本方针。会议打着反“调和路线”的旗号，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实现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组织上“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夺权企图，排斥了何孟雄等一批中共的优秀干部，并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王明上台后，为了在苏区（即革命根据地）贯彻执行六届四中全会路线，中共中央派出了“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由于该团成员有三人，即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所以又称之为“三人团”。“三人团”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上旬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于四月十七日入驻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所在地江西省宁都县青塘墟。

任弼时是湖南省淮阴人，一九〇四年生，是刘少奇留苏时在东方大学的同学。刘少奇提前于一九二二年回国，任弼时却在一九二四年秋天在东方大学毕业后才回国，先后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长，一九二七年春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五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到达中央苏区后，被任命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由于任弼时是留苏出身，因此获得米夫和王明的信任，被视为王明路线的代表而被派到中央苏区来。

当时中央苏区的党的最高领导人，即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是项英。虽然项英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是作为贯彻六届三中全会决议的代表来到中央苏区的。而王明和六届四中全会是反对六届三中全会的，因此项英便首当其冲，成为第一个受排斥的对象。“三人团”到达中央苏区不久于一九三一年五月改组苏区中央局，撤去了项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将这两个头衔都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自从一九二二年担任中共湘区委书记以来，在中共党内起伏浮沉，大起大落。他从事过党务、工运、农运、宣传等方面的工作，但在每一种岗位上部不能深入地坚持下去，浅尝即止，没有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他文不如恽代英、肖楚女、蔡和森等人，武不如周恩来、刘伯承和朱德——毛泽东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被中共临时中央任命为特派员，被派往湖南领导秋收起义。由于他执行了攻打长沙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又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因此秋收起义惨败。为了躲避国民党兵的追击，毛泽东不得不率领残兵败卒上井冈山。由于兵力薄弱，又不谙军事指挥，更因为思想上的保守右倾，在井岗山的半年中，毛泽东没有什么作为。是朱德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上井岗山，组成“朱毛红军”（即红四军）带来了新的活力，使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得到发展。又是由于朱德的坚持与斗争，才迫使毛泽东放弃固守狭小的井岗山，来到广阔的赣南、闽西，从而创建了举世瞩目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三人团”来到之前。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是中央苏区红军的最高领导人。现在，“三人团”任命毛泽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使毛泽东成为中央

苏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

一九三一年八月三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中央苏区党组织问题的决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顾作霖、邓发、朱德组成苏区中央局，毛泽东为代理书记。这个决议说明王明一伙至此对毛泽东还是信任的，重用的。其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在一九二九年刚由井岗山来到江西，为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所迷惑，曾提出“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与王明提出的“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同出一脉，只不过王明要争取的不仅是一省，而是“数省”，比毛泽东更“左”而已。毛泽东的“左”倾口号受到王明的赏识，被认为是“自己人”，因此受到王明一伙的信任和重用。

然而好景不长。上述的决议发出还不到一个月，于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存在严重的错误，还在执行立三主义的调和路线，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富农路线”。指出：“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例如你们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于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而不实行变换富农肥田给他坏田种的办法”。“红军直到现在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小团体的观念，这在红军已在进行大规模战争与担负着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

这明显地是在批评毛泽东。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看法起了一百八十度的根本变化。

根据中共中央八月三十日的来信，中央“三人团”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完全同意”中共中央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批评，指责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实行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富农路线”，犯了“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责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狭隘的经验论”，不去建立真正的工农红军，红军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要

求“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大会还改选了苏区中央局，撤销了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改选项英为代理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这是王明路线对毛泽东排斥打击的开始。

毛泽东虽然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但他仍是总前委书记，仍是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人。然而在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四次围剿的方略等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央“三人团”又发生严重的冲突。

一九三二年初，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占领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为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这一指示，中央“三人团”命令红一方面军攻打赣州，准备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迁到这里，以实现中央的决议。“三人团”还主张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赣江流域各中心城市。毛泽东在会上反对“三人团”的这些主张，指出攻打城墙坚固、地势又不利的赣州是错误的，主张红军主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赣东北方向发展。但苏区中央局否决了毛泽东的决议，决定由彭德怀担任总指挥攻打赣州，而毛泽东则到东华山上养病。

赣州，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它三面环水，城高墙固，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原来估计赣州守敌只有八千人，可实际上城内守敌总共一万八千人，超过原来预计的一倍以上。而担任攻城的红三军团却只有一万四千人。敌军以优势兵力据险防御，红军不仅在数量上是劣势，装备技术又比较差，自然就难以取胜了。

二月三日，红军拉开了攻打赣州的序幕。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以红三军团为主力的攻城部队，从会昌、安远、信丰等地直逼赣州城郊。

二月四日，红军部队占领了赣州城东门外的天竺山和小南门外的白云山制高点，并在城外构筑工事，挖掘坑道，建立火力据点，兵临赣州城下。

二月十三日战斗打响，红军第一次攻城。开始，架云梯上不去；接着，用棺材装上炸药引爆，炸塌东门月城的城门洞后，红军一拥而

进，却被敌人密集火力阻击，未能攻入城内。

二月十七日，红军第二次攻城。当南门月城施行爆破后，不料城墙向外倒塌，埋伏在城墙下的红二师二百多名突击队员全部牺牲了！待重新组织力量时已失去战机，攻城未能奏效。

二月二十三日，红军第三次攻城。爆破后红军一度攻占东门城楼，这时适逢敌旅长马昆巡逻至此，亲自死力督战，组织反扑。红军与敌激战四小时，终因弹药补给不上而撤退。

三月一日，中革军委将总部移驻赣州城郊，直接指挥红军攻城。并发出火线《告红军战士书》，指令“下最大决心，进行持久战争，拿下赣州！”

于是，三月四日，红军发起第四次攻城。这次，东门、西门、南门同时组织爆破。但西门、南门因坑道积水，无法引爆。红军即在东门城下坑道内安装了三个大型棺炸药，引爆后炸开东门城墙二十多米，压死敌军二百余名。红军趁着硝烟弥漫，向城内发起猛烈冲锋。但由于攻城前有两个叛徒进城向马昆告密，敌人获得情报后，一天之内构筑了新的防御工事。当红军攻入城内时，敌人凭借新的防御工事，组织强大火力网负隅顽抗。双方激战近四个小时，红军强攻不克，不得不撤出战斗。

这时，红军屯兵城下一月有余，四次攻城，均未奏效，而敌大批援军已至。形成对红军内外夹攻的势态。在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中革军委始下决心，于三月七日撤围赣州，退至赣县江口一带休整集结。

至此，红军历时一个月零三天的攻赣战役以失败告终。

三月初的一个清晨，一匹快马冒着蒙蒙细雨，向着东华山急匆匆奔驰而来。来人正是项英。与毛泽东握手寒喧后，项英气喘吁吁地将一封电文交给毛泽东。电文写道：“我军攻赣至今，苦战一月不胜，三军团反被敌人援军包围。请润之暂停休养，赴前线决策。”

正是“军情急如火”。毛泽东当即中止休假下山。

毛泽东在江口与周恩来（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由上海来到

中央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朱德、彭德怀等人会合后，率领红一、五军团人闽东征，一举打下名城漳州，筹资百万，战果辉煌，影响巨大，还缴获了两架飞机。一时间毛泽东威震闽南，名扬中国。

这时在上海临时中央坐镇的是博古。原来王明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行声等六人组成，指定博古负总责。

博古这时只有二十五岁。这位相貌俊秀、身材修长，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温文尔雅的青年，原名叫秦邦宪，江苏无锡人，一九二五年十八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〇年五月回国，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书记，一九三一年九月王明离去前获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总责”。

博古与毛泽东素未谋面，更谈不上了解。然而在王明的影响下，对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却久有所闻。年轻气盛的博古，上台伊始便要大干一场，“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便是他的杰作。博古的“主动出击”、“进攻路线”受到毛泽东的“透敌深入”的策略的干扰，要贯彻执行王明路线，就要搬开这块绊脚石。

一九三二年四月的一天，邓颖超在上海装束停当，准备启程前往江西瑞金与周恩来会合，临走前到中共临时中央办事处，向博古告辞。博古神情严肃地对邓颖超说：

“你到苏区后，请转告伍豪（即周恩来）同志，要抓紧开展反“右”倾斗争，同时一定要设法让毛泽东多管政府的事，少让他过问军队的行动。这两点都是中央的意见。”①

邓颖超经秘密交通线到达闽西苏区，于五月一日在长汀见到周恩来，向他转告了博古的意见。

同年的四月二十五日，张闻天在第三十七期和第三十八期合刊的《红旗周报》上，发表一篇题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的长文，指责毛泽东犯了“浓

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的错误，“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地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作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

五月二十日，中共临时中央又致电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领导召开的苏区党大会（即“赣南会议”）提出批评，说党大会“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出”；批评周恩来对毛泽东的错误纠正不力。

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批评不得不提高调子。

五月三十日，周恩来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实话》中发表题为《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的文章，严厉批评去年十一月初苏区党大会前后犯了“最大的右倾错误”。说“在去年三次战争中所认为最好的战略战术（如诱敌深入），在今年积极向外发展到白区去出击敌人时便不能完全适用了”。

六月二十七日，周恩来主持通过了《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苏区党大会前后工作的检阅及中央苏区党的目前中心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进一步认为毛泽东领导召开的苏区党大会，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②

这时，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开始。尽管有了以上的批评，但周恩来仍希望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军总政委，留在前线协助指挥作战。于是与朱德（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主稼祥（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及毛泽东联名给留在瑞金的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和任弼时等人发了一份电报：

“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③

“中央局代表”即是周恩来。经周恩来的反复解释，任、项等人同意了上述提议。八月八日，中革军委发出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通令》。

毛泽东是个独裁擅权的人，在掌握权力上是“要么不干，要么完全按照我的意见办”，其间甚少折衷妥协与委屈求全。上任后的毛泽东所坚持的“诱敌深入、待机而战”的方针，再次与上海的临时中央发生矛盾冲突。任弼时、项英等人根据上海中央的意见，指示红军要“出击”、“进攻”。在战略策略方面，前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分歧。为了消除这些分歧，苏区中央局便决定在宁都小源村召开全体会议。“全体”，即是全体中央局成员，他们是：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共八人。前、后方的阵垒分明，四比四，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列席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首先由周恩来总结二月攻赣以来中央局八个月的工作。周恩来说：

攻打赣州和发起南雄、宜乐战役，依据当时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赣州本来是可以攻克的，惟因对敌必坚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所以没有坚决布置，解决增援敌人，轻敌麻痹，攻城部队在技术上也有缺点，所以久攻不克。东路军入闽，原为“临时任务”，后来改为发起漳州战役，虽然获得了重大的胜利，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但来往费时两个多月，延缓了北上攻打抚州、南昌任务的实现。南雄水口战役中，对敌迅速增援估计不足；特别是战斗结束后，部队分散在信丰、三南筹款，发动群众，这个错误是严重的。④

这是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

毛泽东自然不会“妥协”，他据理力争，说：事实上，过去七个月的军事行动，从总的战略方向上来说，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使与会者一片哗然，从而招来了任弼时等人的更多责难。

会议的高潮在于决定毛泽东的去留。周恩来提出两个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无论是那种方案，主旨都是要毛泽东留在前线，这是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一片至诚善意。如果会议就周恩来提出的两种方案表决，无论通过那种方案，毛泽东都可以留在前线。

然而惯于专权而又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毛泽东，不但没有很好地配合周恩来的提议，反而意气用事，说了一番负气的话：

"要说的意见，在会上我都说了。有些事，现在也说不清楚，还是那句话：将来让事实来证明，让历史作结论吧！至于指挥战争，既然我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对恩来同志提出的后一种办法，我也不能同意！"毛泽东还掀了掀身上穿的毛衣说："我近来身体不好，需要休息。既然我留在前方会给各位带来不便，那我还是请病假到后方治病去吧！"

毛泽东的话说得这么绝，已经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周恩来只好主持表决，通过了由他提出的第一个方案，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⑤

当宁都会议正在举行时，临时中央政治局也在上海开会，讨论中央苏区的问题。会上，张闻天提出调毛泽东回后方做政府工作。这个决定很快地通知了瑞金。毛泽东于是被撤去红军总政委一职，改由周恩来担任。

宁都会议使毛泽东再一次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这对于中共的革命事业来说，无疑地是个巨大损失，其后果也是严重的。中共党史在提到这段历史时，都将宁都会议视为王明"左"倾路线对毛泽东的打击和排斥。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在仔细检讨之下，也不难

发现，毛泽东那惯于专权的性格和意气用事的作法，是使事情进一步恶化的因素。周恩来在会上的两种方案的提议，是对抗王明路线的一种策略，其用心之良苦，毛泽东不会不了解。如果换了别人，以革命大局为重，在当时的情况下，便肯定不会再说些有碍于实现周恩来策略的话语。但毛泽东却不是这样。由于他那种只能领导指挥别人，而不能接受别人的领导指挥，“要么让我说了算，要么我不干”的思想作风，使得他在政治斗争中不够冷静沉着，不能够从革命大局着想，而过多地从自己的感受、个人的得失出发，缺乏理智，意气用事。毛泽东所说的“既然我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对恩来同志提出的后一种办法，我也不能同意!”就集中地反映了他的上述个性与思想。

毛泽东采取这种方式的抗争，是不是以革命大局为重以及是否一个革命家之所为，颇有商榷之地。对革命事业从个人得失出发，采取意气用事，在毛泽东已不是第一次。一九二九年，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等人在党的领导，红四军的政治、军事方针等问题上发生尖锐的矛盾与斗争。那时候，毛泽东在党内也是处于少数地位。在五月召开的湖雷前委会议上，当讨论要不要成立军委时，毛泽东的“意气用事”便出现了，他说：

要成立军委是与前委分权，前委、军委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领导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前委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⑥

陈毅劝毛泽东不要辞职，但毛泽东执意不听。陈毅只好代理前委书记。在随后的中共红四军“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前委书记选举中落选。尽管他还担任红四军政委和前委委员的职务，但他再次提出离开红四军，赴苏联留学或去养病。由于赴苏留学需时安排，红四军便批准毛泽东离队去休养。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党员以无条件服从党组织的分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最高宗旨，从没有挑肥拣瘦、自动辞职的。像毛泽东

这种合己意就干，不合就辞职的党员，实属绝无仅有。毛泽东自幼养成执拗、反逆的个性，在家里反逆父亲，在学校反逆老师，参加革命后，则反道上级，反逆中央。对上面的指示、命令，往往采取“取其所需”的态度，对已有利者就执行；对己不利者则不执行；合己意者就执行，不合者就不执行。为此毛泽东与朱德、陈毅之间，与地方省委及中共中央之间，均发生过不少的争执。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名组织性、纪律性很强的模范党员。毛泽东主政中共后，这种作风便逐步发展为专横独断，到五十年代更发展为独裁、无法无天，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制造了无数的劫难。

毛泽东离开红军后不久，一九三三年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机构由上海迁至江西瑞金。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为止，毛泽东都没有能够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

二、刘少奇被批判撤职

与毛泽东一样，刘少奇也没有参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且也在缺席情况下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职工部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由于赴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刘少奇至一九三一年秋天才回到上海就职。

当时，以博古为总负责的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推行王明的

“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不承认革命处于低潮的事实，强调城市工人斗争“已经带有很浓厚的进攻性与政治性”，要求白区“尽量用全力来准备各个企业的总罢工”。

刘少奇上任后，很快就发现工会工作中存在着明显的“左”倾冒险主义，深知它的危害性极大。根据自己长期从事实际斗争的经验，十月五日，刘少奇给临时中央写了题为《关于工运的意见》的信。

刘少奇在这封信中着重分析了当时工人斗争的形势。他认为，随

着经济危机在全国的深入，工人阶级的斗争在各地不断爆发，但总的来说，低潮的形势并没有改变，工人斗争还属于防御的性质。这主要表现在：

中外资本家和国民党反动派联合一致向工人阶级继续进攻的情况很严重。他们借口“国难”来降低工资，延长工时，加重工人的工作负荷，开除和裁减工人，欠发工资，关厂停业。同时，他们采用禁止罢工，解散和改组工会，强迫调解与仲裁，完全剥夺工人集合、结社的自由，逮捕工人领袖，开除工人活跃分子，厂警搜查和武装镇压等方式破坏工人运动。

工人斗争次数减少，规模缩小，多是反对资本家减少工资、增加工时、取消待遇、解雇工人和反对国民党当局封闭工会的防御性斗争。这些斗争大部分都是自发的，散漫的，缺乏组织性，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工会来作领导，以致许多斗争都在国民党黄色工会的武力压迫和欺骗手段之下被控制起来。还有一些经济斗争是完全在黄色工会领导下进行的。

工人斗争大多数是失败的或无结果的，取得完全胜利的只占少数。

革命工会数量大幅度减少，工人组织程度较低。据一九三〇年六月统计，白区赤色工会会员有四九八二一人，到一九三一年底，会员仅有二四八人。在全国估计有三百万产工人，其中与中共领导的工会组织有联系的大约有三千人。⑦

根据以上事实，刘少奇指出，那种认为中国工人斗争“绝不是防御的，而是反攻的与进攻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但是临时中央很快否定了刘少奇的意见，并且对他作了一个“总的批评”，认为他“站在工会系统上，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并派卢福坦两次同他谈话，要他对是否接受中央批评的问题即表示态度。刘少奇“恐言语的传达或有出人”，遂于十月十日再次给中央写了《关于工运问题》的信，重申上自己的观点。他说：我回来后，的确是提

出了许多工作上政治上的意见，这完全是站在积极参加党的工作的观点上提出来的；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被采纳，都在党的组织；但中央对我的这些意见，并没有个别地具体地指出有何错误，错误在什么地方？要如何才是不错误？就对我下了一个总的批评，要我接受，这就使我不能明了我的错误之所在！党组织批评同志，目的是使同志了解错误，纠正错误；现在中央并没有个别指出我的错误之所在，我就不能明了我这些意见的错误，我就无法纠正错误，无法接受中央的批评。最后，他请求中央再派人同他谈话，具体地指出他的错误之所在。

但是，当时的“左”倾领导人却把刘少奇的主张斥之为“十足的机会主义”，对他进行了批判斗争。

一九三二年三月，王明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在莫斯科加以补充后再版。他在“再版书后”的后记中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为“罗章龙路线的残余”，说在白区工作中出现了“以一部分工会工作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右倾”。

一九三二年二月开始，临时中央多次开会批评刘少奇的“右倾”错误。三月十四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工会工作问题。会议列举了刘少奇的所谓八大“错误”：对形势估计不足，在经济恐慌中不能组织工厂的罢工取得胜利；拒绝参加反帝运动，对黄色工会投降；有合法倾向；充满工团主义的领导等。会议认为刘少奇的“错误是”贯的，“不能再继续领导工作”，决定撤销他的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

三月二十五日，临时中央发表《中央为职工运动致同志的一封信》，指责“全总党团与中央职工部的领导”已陷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从对于目前革命情绪悲观失望的估计出发，走到对于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走到向黄色工会领袖的屈服与投降”，“一直走到纯粹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因此，临时中央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溃”这种“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这之后，临时中央认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还是非常

的不充分”，于是又在党的刊物上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公开批判刘少奇。四月二十五日，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就再次批评刘少奇“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不久，刘少奇被调离中央职工部和全总，降职到上海市工会联合会任党团书记。

---

①②③：引自舒龙、凌步机《岁岁重阳》，第二五七——二五九页。

④⑤：同上，二六四、二六九——二七〇页。

⑥：同上，第十一十一页；

⑦：见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八八一九〇，一〇——一〇二页；

第四章　毛刘成为红、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

一、毛泽东：红区正确路线的代表

毛泽东的厄运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五年。

由于博古一伙实行王明"左"倾路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在国民党一百万大军的围攻之下，中共中央决定放弃江西苏区，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实行战略大转移，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途上，博古、李德仍然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在国民党的围堵、追击下，红军损失惨重。过了湘江之后，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至二万多人。而且伤病累累，士气低落。蒋介石扬言要叫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

毛泽东由于患病，是躺在担架上随队长征的。王稼祥则由于腹部受伤，也躺在担架上。局势严重，引起他们的极大的忧虑。在行军途中，毛泽东与王稼祥交换想法，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之后，毛泽东又秘密串联张闻天，也取得了他的支持。毛泽东决定找机会结束博古、李德的领导。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打下贵州的遵义。在休整期间，中共中央举行会议。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先后发言，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提出了全面的批评与清算。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由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出任最高三人领导，张闻天负总责。至此，毛泽东恢复了在中共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就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遵义会议。

张闻天是"开明君主",周恩来又不是担纲的帅才,中共的大权实际落在毛泽东的手里,大小政令多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后才能定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率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摆脱了国民党重重追击,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

毛泽东在政治斗争中的过人之处,其中的一点是他懂得必须从根基上彻底摧毁对手,并且做起来绝不手软,坚韧顽强。在陕北站稳脚跟后,毛泽东便开始清算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后来更进而清算自建党以来的历次路线的错误,包括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也就是说,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中共历届的领导人,都不是正确的,不是犯了"右"倾(陈独秀)就是犯了"左"倾(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唯有遵义会议后确立的现领导,也就是毛泽东,才是正确的。

为了证明这一思想,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工作,发表了许多的文章、讲话,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高度。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度,对历史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尤其是王明路线,进行深刻的批判,指出了它们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同时总结中国革命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阐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意见和理论。"毛泽东思想"便是由此发端的。

毛泽东自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后,便领导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因此,他主要是从红色根据地,革命战争等方面来总结经验,批判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些方面的错误,并论述了自己在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军队建设、党的领导、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等方面的理论。

毛泽东提倡的这股总结历史经验的风气,一时间在中共党内形成了主流。其结果,一方面是彻底摧毁了王明、博古等党内的反对势力,另一方面则树立起了自己的威望。可谓一箭双雕。时至四十年代,不但王明、博古等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俯首贴耳,连与王明路线曾经沾边的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周恩来等人,也被毛泽东批评得服服贴贴。

在这么多的错误的失败者的衬托下,毛泽东就显得更加高大了。于是,毛泽东便自然而然地成为红区正确路线的代表。

二、刘少奇出掌北方局与"六十一人自首出狱"事件

刘少奇在被撤销中央职工部部长的职务后，于一九三二年冬奉派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这时候毛泽东已被投闲置散，不是养病便是到农村查田、做调查研究。毛、刘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对毛泽东领导的查田运动，刘少奇曾发表了不少好的意见，予以支持。

刘少奇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先后担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共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央筹粮委员会主任等职。也参加了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全力支持毛泽东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对此，毛泽东曾回忆说："在遵义会议上，他（指刘少奇）表现还是不错的。在那个时候是很宝贵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如何清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白区工作上的影响，尽快恢复中共在白区的组织活动，成为当务之急。毛泽东将这项重要的任务委托给刘少奇，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

一九三六年初，北方名城天津还是春寒料峭。在天津日租界的兴安路，有一家门面气派的大饭店，叫北洋饭店。一天上午，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客人，手中拿着一张卷着的报纸，在饭店一个高级包间的房门上轻轻敲了几下。开门迎客的是一位身材高瘦，穿着绸袍的富商和他的妻子。两人经过一番暗语问答，那位富商把客人让进了房间。这位富商，就是刚到天津的刘少奇，化名为胡服。来客是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刘少奇顺利地与天津市的中共地下组织接上头，随即听取王林的工作汇报。而跟在刘少奇身边的那位女人，名叫谢飞，原在江西苏维埃政府国家保卫局工作，参加过长征，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后与刘少奇结婚。

此后，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林枫，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以及柯庆施、李大章等，也先后与刘少奇见面。不久，刘少奇由北洋饭店迁往黑龙江路隆泰里十九号，那是一家叫"惠兴德成衣铺"，刘少奇便租住在楼上。

一年后刘少奇迁居北京。刘少奇不负重托，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北方局的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信河北省委说：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主要的表现在：政治领导的加强，纠正了过去河北党中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努力扩大抗日战线，不仅企图建立华北各界救国联合而且能顾及全国，在学生、军队、农民等群众中，均有较好成绩。……这些转变，是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①

刘少奇在北方局做的一件大事，是营救六十一名中共党员干部出狱。

土地革命时期，由于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中共在白区的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一大批从事工人运动、地下工作的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入狱。随着华北抗日斗争形势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来组织和领导华北地区的斗争。鉴于当时干部缺乏，人手不足，刘少奇曾说："一切工作，一切转变，都依靠我们的干部，因此干部问题是党内的中心问题"。

当时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共产党人有六十多人。他们是中共顺直省委书记殷鉴和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周仲英、周启敦、刘亚雄、胡锡奎、刘锡五、孔祥祯、张友清等。

一九三六年四月，北方局提议，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共产党员履行国民党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将这个提议报告中共中央，并得到批准。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夫人刘英在回忆这件事的处理经过时说：

"那是一九三六年春天，少奇同志报告，说有一批干部（六十一人）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的普通手续就可以释放。当时华北抗日形势迅速展开，急需干部，而狱中同志要得到中央同意，看到领导同志签字的文件，才愿出狱。少奇同志请中央立即决定。事情来得很急（因为如果日本人侵占平津后就

不能办了），又是如此重大，闻天当即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决定予以批准。"②

刘英说的"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

下面是有关此事详细经过的记述：

一九三六年六月，刘少奇将中共中央批准的要这批同志履行手续出狱的决定交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去贯彻实施。柯庆施找到徐冰，要他把这个决定的精神传达给狱中党支部。

柯庆施对徐冰说："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关押着我们一批党员同志，他们是一批经过考验、政治上坚定、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干部，现在急需让他们出来为党工作。"

徐冰说："我对狱中的党员一个也不认识，联系有困难。"

柯庆施想了想，说："在你那里工作的，有个孔祥祯，他在那里坐过牢，同他们熟悉，可以叫他写信到狱中去。"接着柯庆施郑重地对徐冰说："这是中央指示叫这样办的。"

那时候，徐冰以北平中国大学教授的公开职业为掩护，专门从事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孔祥祯在徐冰的单线领导下从事地下活动，每半个月到他家接一次头。

孔祥祯是一九二〇年从苏联回国的同志。回国后，先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后任中共唐山市委军委书记。一九三一年，他到河北省委军委汇报工作时不幸被捕，被关入草岚子监狱；入狱后，曾任秘密党务书记。一九三一年十二只，因病保外就医。其间，经组织安排，由地下党员、北平榆林会馆馆长出面作保获释出狱。孔祥祯出狱后，以家庭教师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一九三六年七月的一天，孔祥祯到北平东城徐冰家接头，接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任务。孔祥祯后来（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回忆他接受任务的经过时说：

"那是七月里的一天，气候燥热，阳光灼人，孔祥祯照例到徐冰家去

找'三爷',他一见就披着孔祥祯的胳膊,匆匆忙忙地走进内屋。

"徐冰突如其来地说:'现在抗日形势甚好,党需要一批干部、但是干部很少,没有办法。听说你过去呆过的草岚子监狱里还有几十个党员,你有没有办法让他们出来?"

"孔祥祯听后先是震惊,后感到毫无可能,回答说:'这怎么行呢?刑期不满,敌人怎么能放他们出来呢?何况刑期满了,不登《反共启事》,照样出不来呀!除了一条,登《反共启事》,声明从此不再做政治活动,那也得有人保咧!'

"徐冰好像心里有数地笑笑,对孔讲:"我已经接到上级指示,说中央有决定,可以让他们用自首方式和登报启事的办法出来,你可以不可以把中央对他们的这个指示送去呢?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完成。'

"孔祥祯说:'虽然我在狱中任过支部书记,对他们熟悉,但已几年和他们没有联系了,他们怎么会相信我呢?我知道这些同志在狱中立场是坚定的,你说用自首登报方式出来,他们能干吗?再说。这对他们是个极其严重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上级确实负责才行。'

"徐冰马上接上说:'这的确是中央的指示,不然我怎么敢跟你说呢!你要知道,这就是假自首,中央一定会在政治上负责的。'

"孔祥祯的疑虑,在徐冰的解释下,渐渐地消去了。他说:'既然像你说的这么绝对可靠,那我可以去做。不过,我和他们长期没有联系。又怎么能把信送去呢?同时,狱内的党组织有无变化,我也不知道。'

"徐冰在屋内踱了几步,仔细考虑了一下,说:'你先去想想办法再说吧。'"③

孔祥祯接受任务后,连日苦思苦想,寻找联系线索。说来凑巧,有一天,他在大街上遇见也是因病保释出狱的魏文伯(当时名叫万曲非),就便问道:"我有一些东西想送到狱中,不知你有认识的人没有?"魏回答说。"我有个族侄,叫魏茂林,化名叫王伯平,他和狱中看守人员有关系,可以帮忙。"孔忙问:'他可靠吗?能不能往里边送信呢?"魏说:"他是同情分子,非常可靠,可以帮助送书报、送信。"

孔祥祯马上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徐冰，徐冰心中大悦，当即口述北方局的指示，让孔祥祯记录，并以他的名义写好信，交给魏茂林转送狱中。信的大意是：目前抗日运动普遍高涨，许多工作都要人去做，我与家内（意指党组织）联系上了，家里让我营救你们，如果平津陷于日本人之手，再办就困难了。信的意思十分含蓄。

信送出去约半个多月，狱中还没有回音。孔祥祯十分着急。他去找魏茂林询问，得到的是肯定的回答：这封信没有失落，已送到狱中了。

原来，狱中党支部负责人殷鉴、薄一波和刘澜涛接到信后，有点怀疑，认为中央和北方局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担心这是敌人设置的圈套；况且，孔祥祯出狱三年多了，他的政治表现如何，也不清楚。因而他们看信后未予置理，也没有向狱中的党员传达。

孔祥祯将狱中没有回音的情况报告了徐冰。经过一番分析，徐冰说：既然送信的人可靠，信也没有失落，那么，干脆把中央的指示送去好了，并告诉他们，这是党的决定，要坚决执行。于是，孔祥祯按照徐冰所言写了第二封信，让魏茂林转送狱中。

据孔祥祯回忆，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告诉狱中的同志：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并且考虑到你们都经过长期斗争的考验，党认为，为了争取你们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这样做是符合党的最大利益的；你们过去坚持不在敌人的《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做得完全正确；但是，你们那时的斗争，还是小圈子、小范围内的斗争，现在要求你们出来在广阔的范围内作斗争。信中还说：这是特定的条件下所做的决定；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一律不视为自首叛变分子，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到信后，仍然拒不执行，那你们就要犯严重的错误。

狱中党支部接到这封信后，经过认真讨论，认为的确是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便分头向党员传达，并组织执行。

一九三六年八月底，第一批九人出狱，薄一波、周仲英、董天知等出狱后，很快和孔祥祯取得了联系。当时，狱中同志的警惕性很高，为慎重

起见，要求第一批出狱的同志立刻对上述信件的内容加以证实。如果确是中央和北方局的决定，即送一只烧鸡给狱中同志为号；要是情况相反，就不要送。果然，薄一波等出狱后不几天，即派人给狱中送去了一只烧鸡，打消了一些同志的疑虑。从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起，到一九三七年三月，依照党中央和北方局的决定，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同志分作九批先后履行有关手续出了监狱大门。④

在这"六十一人"中，有党的组织关系、并且按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出狱的是五十七人，除高梦九出狱后下落不明，刘克让成了托派，扶平回家后投靠了国民党外，其余五十四人，都很快与中共组织接上了关系，被分配到急需的战斗岗位上。如薄一波、杨献珍、周仲英、董天知、韩钧等被派去山西，做阎锡山的上层统战工作，张友清去太原任中共山西省工委书记，马辉之分配到河北省委，李楚离担任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党团书记，刘澜涛先去绥东，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安子文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等。这批干部分赴华北各地，重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加强了中共在白区党的领导力量。

薄一波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一九四三年三月我去延安，……毛主席找我谈话，我向毛主席谈了一九三六年履行手续出狱的经过，毛主席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⑤

一九四五年，这批党员中的薄一波等十三人，当选为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任弼时作审查结论时说："这批同志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登《反共启事》一类的东西出狱，是北方局提出并经党中央同意批准的。所以，完全不影响他们的代表资格。"七大会议期间，鉴于有的人不甚了解这十三名代表当年出狱的经过，刘少奇曾在他的办公室对李富春、彭真、康生等人说："这件事，是中央让他们办的。"⑥

三、刘少奇: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

从工作中,刘少奇了解到由于受王明及历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中共在白区的工作存在的问题极多,急需来一个彻底的转变。于是,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四日,刘少奇连续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等四封长信。在这些信中,他提出了一个长期以来人们不敢正视的问题:中共过去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是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刘少奇列举了这种错误在四个问题上的具体表现:

(一)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问题。在秘密工作中,常有地用"怕死"、"害怕"等说法去批评同志,提倡冒险,否认合法;混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把能够合法公开进行的工作也拿到秘密机关来做。十年来由于在这个问题的错误,使群众工作和党组织受到无法计算的损失。

(二)关于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在革命的准备时期,发动群众斗争的目的,是聚积力量,准备将来的进攻与决斗。但过去白区群众斗争常常为纪念节或为直接拥护红军而罢工游行,机械要将每一个斗争提到最高阶段!常常提出过高的要求,把政治要求加在群众的经济要求上,忽视经济斗争。这就使斗争经常失败,力量的聚积也就不可能。

(三)关于宣传鼓动工作问题。白区宣传工作中的虚浮、夸大、形式、刻板,至今还未纠正过来。常使宣传口号与行动分别不清,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分别不清,把漫骂当战斗。

(四)关于党内斗争问题。过去在党内思想斗争中夸大右倾机会主义,忽视反对"左"倾,甚至以思想斗争为推动工作的唯一方法,不采用教育与说服的方法。在斗争中带了浓厚的宗派主义成分和成见。

刘少奇认为:这些错误就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传统。四中全会后在基本上没有纠正,还继续着,在某几点上还有发展。这些错误在党内影响最久、最深,给党的损害也最大。"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转变白区工作的问题。白区工作一方面需要策略的转变,另一方面还有十年

来的传统要转变。这个转变最艰苦。过去遗留下来的恶果，我们都得吃下去。但这个转变还在开始，甚至有些地方还未开始。"⑦

中共中央对刘少奇的信十分重视，准备召开中共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从北平被召回延安。

中共白区代表会议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在延安城内由原基督教堂改成的中央大礼堂开幕。主持会议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受中共中央委托，刘少奇准备了向会议所做的报告，题目是《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

刘少奇于五月十六日首先向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报告。报告共分了三个部分：(一)关于白区工作的一般估计；(二)对北方工作的估计；(三)报告的提纲。在第一部分中，他历数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所犯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指出白区方面成绩不多的原因在于存在着左倾关门主义、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传统。"直到现在没有着重批评白区工作的错误，白区工作的转变，一定要承认这一错误"。但是，会议主持人张闻天对刘少奇的报告极为不满，当场宣布：详细的讨论以后再召集会议，在白区代表会上第一部分暂不报告。这次政治局会议对刘少奇的报告没有展开讨论。

五月十七日上午，刘少奇向白区代表会议作了题为《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只讲了第三部分的提纲。

五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二十六日，大会对刘少奇的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关于对过去白区工作的估计问题；(二)白区工作转变的两重性问题；(三)白区工作的策略方针问题。会上先后有二十四人发言，多数人都对刘少奇的报告提出批评，有的批评十分尖锐；只有少数人不赞成对刘少奇的报告全盘否定，不同意某些过激的批评。

六月一日至四日，张闻天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了白区工作的方针路线问题。会议首先由张闻天提出准备提交白区党代会的报告，以取代刘少奇五月十七日向会议所做的那个报告。张闻天报告第一部分"十年中党的方针政策路线问题"，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报告和刘少

奇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日《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而发的。张闻天批评刘少奇的报告和给中央的信都是错误的，认为过去中央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并取得很大成绩。在讨论中，多数人发言都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报告，并对刘少奇提出许多批评。

毛泽东密切地注视着会议的进展情况。当会议上出现对刘少奇不利的一面倒的情况时，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于六月三日作了长篇发言，即日后整理成文的《群众工作问题》（该文现存中央档案馆）。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共讲了七个问题：（一）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二）这个问题在今天提出是因为什么；（三）少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四）少奇的错误；（五）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六）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七）几个问题合法非法问题，少奇过去的问题，今后对付这类问题的态度。

毛泽东的讲话中最重要的论断有二：一是对刘少奇的极高评价，二是对刘少奇的论点作强有力的支持。

毛泽东说：少奇同志对于群众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他在实际上作中，在党内生活中，在华北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他一生的工作，很少失败。今天我们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少奇写给中央的几封信上，在他具体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时，他也基本上是对的，是勃勃有生气的，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泽东的这个评价，不仅对当时召开的会议有重大影响，而且对于以后中共的历史发展和形成新的中央领导核心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还对刘少奇的许多重大意见都表示了同意和强有力的支持。通篇有数处"少奇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对的"，"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少奇写给中央的几封信，也基本上是对的"。毛泽东在发言中，还对中央过去处理少奇的问题提出批评，他说："过去处理少奇的问题，一般是不正确的。"这些都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有力支持。从会议的情况看。当时形势十分严峻，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个长篇发言，旗帜鲜明地表示对刘少奇的保护和支持，刘少奇有可能被彻底否定，中共的历史可能要重写。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针对性很强，在他之前已有八位代表发言，对刘少奇提出批评。但毛泽东发表了这篇讲话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连带头批判刘少奇的会议主持人张闻天，在他六月四日的总结发言里，也不得不表示"泽东同志的意见，我是同意的"，并承认刘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

毛泽东的讲话，根本扭转了对刘少奇不利的局面。六月六日，张闻天在向白区党代会的报告里，加进了若干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评价。这样，虽然张闻天还是取代刘少奇向白区工作会议重新提出报告，但刘少奇并没有被排除在中央领导之外，六月十日还是由刘少奇作大会结论报告，并被通过。大会也随即宣布结束。⑧

白区党代会是毛、刘关系上的重大里程碑，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治联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白区党代会对刘少奇本人也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这次会议确定了"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代表"，也为他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奠定了基础。

---

①：引自黄峥《刘少奇一生》。

②：刘英《身处逆境的岁月——忆闻天》，见《回忆张闻天》，河南人民出版社。

③：《孔祥帧同志谈"六十一人"出狱》，见张颂甲《草岚风雨》，群众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版第九五——九六页。

④⑤⑥：吴林泉、彭飞《草岚春秋机》，《党史文汇》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⑦：同①。

⑧：见路海江、贺明洲《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一八三——一八五页。

第五章　毛刘同仇敌忾斗王明

一、王明：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安城的上空，罕有地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在简陋的机场上，聚集着欢迎的人群，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连同延安各界的群众，都来到机场迎接——这位大人物，便是王明。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一九〇四年生。一九二五年在武昌商业大学学习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同年由湖北中共组织选送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七年二月，曾为苏共中央派往中国访问的米夫当翻译，到广州、武汉、上海等地参观，不久返回莫斯科。一九二八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教员，一九二九年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红旗报》及《劳动》周刊编辑，中央及江苏省委宣传干事等。一九三〇年冬，以“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为旗号，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进行以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为目标的宗派活动，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夺取了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权，成为中共的新领袖，开始在中共党内推行一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并统治中共达四年之久。同年九月指定博古为中共中央总负责，自己去了苏联，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曾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书

记处候补书记等职。王明此次返延安，便是负有共产国际的重要使命。

飞机终于降落在黄土铺成的跑道上，从飞机上走出一个人，矮矮的，胖胖的，脚上的高统皮靴，油光金铮亮，他举着双手，向欢迎的人群频频招手致意，十足是大人物的派头。来人正是王明。

与王明一起下飞机的还有康生与陈云。穿着灰色粗布棉衣，脖子上围着一条普通的白毛巾的毛泽东急忙走上前，与王明握手拥抱。在两双手握到一起时，毛泽东说：

"欢迎你给我们山沟里送来马克思主义！"

这句一语双关的话，拉开了毛泽东与王明新的斗争的序幕。

王明是毛泽东最大的政敌。三十年代，毛泽东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达三年之久。即使撇开这些历史渊源不说，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反差也是巨大的：在莫斯科养尊处优、住洋楼吃面包的王明，又白又胖，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毛泽东则又黑又瘦；王明是挟着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不禁趾高气扬，而毛泽东是受共产国际批评的对象，自然是谦恭气卑。毛泽东与王明作为抗日战争中两种不同路线的代表人物，从王明踏上延安的黄土地那一刻开始，两人便注定要有一番激烈的较量。

在机场上，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①

当晚，毛泽东宴请王明、康生。饭后，在陕北公学大院召开欢迎大会，毛泽东、张闻天主持会议。王明讲话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斯大林派回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的，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康生、陈云也讲了话。接着是张闻天讲话，之后，毛泽东才讲话，讲得很热烈、很兴奋。像是喝了陈年的醇酒。②

王明此次回国，是负有在中共贯彻共产国际"新政策"的使命。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局势和中共的任务。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从而减轻苏联的压力，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政府有美、英和苏联的支持与援助，是中国抗日的主要力量，即使不能打败日本，也能拖住日本。但他担心中共和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政策会惹怒蒋介石，造成统一战线破裂，而拖不住日本，使苏联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斯大林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和毛泽东绝不能破坏统一战线，要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因此，为了调整中共中央的政策，共产国际特地召开了这次会议。

王明在会上作了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国共合作与各党派的抗日大联合，进而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并建立包括全中国各种武装力量在内、统一指挥、统一供给、统一军事计划的国家军队。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只要进一步转变政策，中共就准备承认其现有的领导地位。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认可了王明的报告，他担心，毛泽东领导下的经过浴血奋战的中共，能否使党的政策、策略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真正地与过去的敌人携起手来。因此，他认为“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王明就是被共产国际选中的被派回帮助中共中央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新政策的“钦差大臣”。

十天之后，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博古、康生、陈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凯丰、林伯渠等出席了会议。

王明在会上按照共产国际的基本精神，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王明在报告中一方面讲了要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他的重点是批评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的精神。

王明回国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

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中共中央与毛泽东是希望籍着抗战这个楔机，使自己获得合法的地位，并且争取无限制的发展空间。这是中共与毛泽东的“应有之义”。因而《决定》提出：“今后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他们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同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

洛川会议通过的毛泽东所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也指出：“国民党政策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依然没有什么转变，对人民抗日运动基本上依然不肯开放，对政府机构依然不愿作原则的改变……对共产党关系也没有进到真诚合作的程度”。“要实现全方面的民族抗战，必须国民党政策有全部和彻底的转变”。

在抗日问题上，毛泽东一方面提出“全面抗战”（即国民党政策必须全面彻底的转变），另一方面又坚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在作战方针上便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是毛泽东的两太原则，其宗旨是仍然将国共两党的斗争放在首位。

然而，王明在报告中批评：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和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认为，应该有统一的群众组织和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要到国民政府去立案，争取合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认为这种提法太尖锐，使人害怕。他不赞成毛泽东在八月二十七日政治局常委座谈会上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南京国民党营垒中有左、中、右三派的提法，认为只能

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也不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提法，认为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他还批评了洛川会议的战略方针和刘少奇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王明还说：“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者。”③

王明报告完毕，毛泽东起而发言。他没有正面反驳王明的讲话，只是坚持八月洛川会议的精神，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强调抗日战争中的山地游击战。

刘少奇出席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刘少奇也是王明“左”倾路线的受害者，与毛泽东未免有同仇敌忾之感。加上白区党代会之后，刘少奇对毛泽东有一种知遇的感情。因此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刘少奇毫不犹豫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并配合毛泽东的发言，先后三次讲了话，向王明作出反击。他说：我们所说的独立自主，不是破坏统一战线，而是尽量争取合法地位去进行工作，发展民众运动，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日。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我们要经过统一战线去进行群众工作，直接动员群众，领导群众，扩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运动。刘少奇还强调要以共产党为领导来团结一切抗日的势力与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坚持敌后的抗战。④刘少奇的讲话无疑是对王明讲话的一种不公开的反驳。

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分歧是很明显的。彭德怀回忆说：“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会议时间很长，似快天明才散会的。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主席是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⑤

王明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其原因是，一方面王明代表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意见，而当时中共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下级服从上级”，是天经地义的事。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八月洛川会议上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遭到包括朱德、周恩

来、彭德怀、林彪等多数红军将领的反对。他们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张把运动战与游击战结合起来，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几个胜仗，来提高抗日军队的士气和振奋全国民心。林彪与聂荣臻指挥的平型关战役，就是违抗毛泽东的指示而打的一场运动战。王明在报告中的观点，与这些人的主张吻合。因此王明的观点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会上，许多人还检查总结过去统一战线工作，承认过去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会议以后，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也反映了这次会议的结果：“此次政治局一致的接受了国际的指示，检查了过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些经验教训，纠正了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偏向，使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新的发展。”

会议还进行人事改组，将遵义会议以来的中央五大书记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改为张闻天、毛泽东、王明、陈云、康生，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张闻大仍主持党务等日常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王明负责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决定由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还决定成立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筹委会主席，王明为书记，刘少奇为委员。

王明的到来以及在中共党内获得支持，无疑是对毛泽东的地位的损害与威胁，毛泽东自然不会等闲视之。从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来看，毛泽东不愧是政治斗争的大师，而王明显得只是幼稚的小学生。由于王明的锋头正劲，毛泽东采取了“避实就虚”的策略，在会议上没有与王明进行正面的交锋，而在私底下做功夫：

其一是坚持不做会议决议。由于王明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而且又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中共中央打算如何贯彻执行，应该也可以做出会议决议，以供指导全党行动。然而，由于王明传达的精神，不合乎毛泽东的“胃口”，毛泽东不打算执行，因而也不想做出束缚自己手脚的决议——精通党内斗争的毛泽东明白，党的决议一旦做出，不同意者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在行动上却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而且决议一旦作出，再要更改就难了。因此，既使是在大多数与会者都赞同王明的情况下，毛泽东也没有作出决议，王明的意见没有经过

组织手续，没有获得法定的地位。对毛泽东来说，这是十分高明而又厉害的招数，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半年多后，当王明不再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时，毛泽东马上召开六中全会，做出否定王明路线的决议。而对于王明来说，这可是一个重大的失策，因为如果在当时王明提出及坚持做出决议，会议是会通过的。然而王明却没有这样做。王明后来曾经感叹地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作个结论就好了。

其二是，毛泽东将王明打发去武汉与国民党谈判，而没有留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王明离开延安这个权力中心，是又一大失策。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和长江局书记再重要，与延安的中共中央相比，毕竟是上与下、主与次的关系，按组织原则，武汉必须服从延安，而不是相反。因此，从斗争的一开始，毛泽东就令王明处于下风与劣势。在十二月会议上，王明如果留在延安参与中共中央最高层的决策，团结与他一起从苏联回来的康生、陈云（两人均是书记），强迫毛泽东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并逐步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权力，那种局面将令毛泽东十分头疼。然而王明在权力尚未巩固的情况下，便被毛泽东打发离开延安（王明自己也不愿意留在条件艰苦的延安，而愿意去大城市的武汉工作），足见在权力斗争上毛泽东的高明与王明的笨拙。

其三，是利用王明来打击张闻天。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张闻天，毛泽东只是常委（后来改为书记），其地位在毛泽东之上。十二月会议上，张闻天成了替罪羔羊，会议决定采取集体领导，而“集体领导”从来就是权力斗争中弱者针对强者的策略手段。于是，张闻天的总书记的职位，便在无形中被取消了，变成与毛泽东平起平坐；而中共中央最高领导的宝座也因此而空了出来，等待着毛泽东去就座。毛泽东这一招，既是迁就了共产国际和王明，又打击了张闻天，可谓是“一箭双雕”。

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表现了坚强的意志和娴熟的斗争艺术，没有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屈服，将王明带来的冲击，减低到最低最小的地步，而没有出现“阵脚大乱”，更没有“溃不成军”，从而为以后的反击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后来，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中共“七

大”会议上说：“遵义会议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战还是运动战？”⑥

三天之后，王明夫妇、周恩来夫妇及博古一起去武汉。他们就两党关系等问题与蒋介石、陈立夫等进行秘密会谈。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次会谈后，蒋介石提出留王明“在汉相助”，王明也表示愿意留汉工作。鉴于此种情况，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决定合并为一个组织，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长江中央局，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在延安任命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本是周恩来，现在却拱手让于王明担任。周恩来这一举动，被毛泽东认为是向王明屈膝投降。后来在延安整风时，这一条成为周恩来挨整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王明与毛泽东分庭抗礼

在武汉期间，王明根本没有将毛泽东与延安的中共中央放在眼里。他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表宣言，甚至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明发布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公开了他从苏联带回的主张，并在中共中央早已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后，又提出六大纲领，继续强调要建立一支“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国防军队。他还提出要求，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从延安迁到武汉。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共领导的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通电成立，王明致电中央书记处并转朱、彭、任、刘，对通电提出指责，说：“通电逼蒋承认，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

影响”。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抗战形势和军事问题，以及为“七大”召开作准备工作。

会上，王明做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除继续坚持过去的观点外，更在军事上提出“七个统一”和运动战为主的方针：“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毛泽东认为这些主张，是右倾投降主义的继续发展。

对于王明的观点，毛泽东还是没有给予正面的批判。但又非常有针对性地着重讲了军事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又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但会议表决时，多数人同意王明继续去武汉，但也规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

会上，王明的主张仍然被大多数与会者赞同与接受，也仍没有形成决议和文件，但会议决定由王明起草一个会议结论。王明又一次获得支持，更加令其“智昏”，更加将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之上，独断专行，将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作为中共中央的路线大肆宣扬。

会后。王明返回武汉，以中央名义写出《三人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不久又擅自起草《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提议》。

政治局会议以后，毛泽东连续就战略方针等问题，批评和反对王明提出的“统一”的主张，毛泽东说：“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之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含恶意在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也指出：应当警惕国民党“同我党争取领导权，孤立我党的一面”。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针锋相对地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另一封《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不顾王明的反对，提出了民主、民生的要求。然而王明扣压了中共中央电文。

王明于四月一日复电中共中央说：我们起草的致国民党代表大会“政治建议书已于二十四日送去，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昨夜已开幕，

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

五月，毛泽东的重要巨著《论持久战》发表。当毛泽东将《论持久战》送交武汉的《新华日报》（中共在武汉的机关报）发表时，王明不同意转载刊登，只同意出小册子。后来，中共中央特意为此事去电长江局，要求尽快刊登，但王明又借口文章大长而拒绝，中共中央再次去电说可分期刊登，王明仍然不予刊登。

一九三八年夏，王明还写了一首诗攻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
一心坐得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通牌。

王明后来在《中共五十年》中说：“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重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月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相矛盾”，“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王明与毛泽东之间，武汉与延安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已越来越明显。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回忆说：“我们把华中局（应为长江局——引者注）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决定并得到共产国际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的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自己的政策。”

王明的这种做法，毛泽东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三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开始反击。

三、毛泽东召刘少奇回延安参战

由于中共北方局驻地临汾在日本侵略军的攻击下面临陷落，刘少奇没有出席三月的政治局会议。因此，在会议上，除了自己以外，毛泽东听不到反对王明的声音。

三月会议以后，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已公开化了。为了加强在中央政治局内反对王明的力量，毛泽东采取了一项重要的措施：将刘少奇调回延安。

这时，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张闻天、毛泽东、王明、陈云、康生中，王明在武汉，留在延安的陈云、康生，是与王明一起从莫斯科回来的人，而张闻天也与王明颇有渊源。毛泽东显得势单力弱。刘少奇回延安工作，无疑为毛泽东增加了可依靠的力量。

刘少奇是在三月中旬回到延安的。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华北工作问题。毛泽东建议刘少奇留在延安指导华北工作。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为了适应目前特殊情况及各方面工作起见，书记处决定北方负责人胡服（即刘少奇）暂时住延安。在中央指导下，仍旧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杨尚昆率北方局工作人员在吕梁山脉，就近与华北各地党部联络，直接布置晋西南工作"。"所有华北各地党与群众工作及地方武装情形除向杨尚昆同志报告外，须同时直接向胡服报告"。

刘少奇一回到延安，即与毛泽东一起，参与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日常工作，指导各地，包括八路军总部、各部队和各省委的日常工作中，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由于王明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派来的"钦差大臣"？因此尽管王明胆大妄为，将自己凌驾于延安的中共中央之上，充当太上皇，但毛泽东只有忍耐，而不能动王明的一根毫毛，这时的中共中央内部，不但思想分歧很大，而且指挥也不统一，王明在武汉搞"第二个中央"，自行其是，对延安发出的指示，王明拒不贯彻执行，毛泽东亦无可奈何。

同时，中共是共产国际属下的一个支部，中共党内的是非争论，只能由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来裁定。而由谁来坐中共的第一把交椅，更必须由共产国际决定。如果由此下去，这第一把手的交椅很可能落到王明的手中。

在这种形势之下，毛泽东决定先发制人：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情况——当然，这些情况是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讲述，对毛泽东有利的。毛泽东的目的在于主动争取共产国际对自己的抗战路线的理解和支持。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任弼时，是因为他与共产国际有比较多的来往，共产国际对他也比较了解。早在二十年代初，任弼时就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来又在莫斯科出席了中共六大，这是其一。在洛川会议上，任弼时支持毛泽东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抗日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的方针。他还曾经总结了华北前线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取得胜利的实践经验，因此他对毛泽东的抗日战略路线从理论到实践，有较深刻的了解。而且任弼时作风正派，工作稳重，为人诚恳。这是其一。

一底八年三月五日，三月政治局会议结束才四天，任弼时便离开延安赴苏联，于三月中旬到达莫斯科。

四月十四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作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

五月十七日，任弼时又口头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关于四月十四日报告大纲的说明和补充。此外，任弼时还单独向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至此，共产国际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了解，也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认识。

六月十一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讨论了任弼时的报告，作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决定》。两个文件中，前一个是内部的，后一个是公开的。

共产国际在决议中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

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侵略者。”

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一周年，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第四版在《中国人民英勇斗争一周年》的通栏标题下，刊登了毛泽东与朱德的照片，还有报导文章。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已接受了毛泽东。毛泽东的计划大获全胜。

任弼时还有一个任务：接替王稼祥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王稼祥原是王明在一九三一年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三人团”之一。然而王稼祥早在当年就倒戈，支持毛泽东。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在第五次反围剿时腹部受伤，伤口未愈便坐着担架参加了二方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他的伤口更加恶化，中共中央即派人护送他经上海赴莫斯科治疗。当时王明准备回国，王稼祥便接替他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任弼时接替王稼祥的中共驻共产国际团长的职务后，王稼祥准备回国。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王稼祥和任弼时，他特意请王稼祥向中共中央转达他的意见：

在当前，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的问题要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下解决。中央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不要再争吵了……⑦

四、毛刘联手斗王明

王稼祥回到延安后，即刻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有了共产国际的表态，毛泽东可以放心大胆地拿王明开刀了。毛泽东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要王稼祥代表中央向武汉的王明拍去电报，要他回延安开会。

王明似乎已获悉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拒绝回延安开会，他要王稼祥到武汉来向他个别传达，还提出把六届六中全会迁到武汉来开。

王稼祥再次代表中共中央给王明发去措辞强硬的电报："请按时来参加六中全会，听取共产国际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共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王明不得不于九月十五日回到延安。

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王明听到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顿时黯然失色，他像泄了气的皮球，再也跳不起来。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桥儿沟的天主教堂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及《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总结报告，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还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后来的"整风运动"，在这里已初露倪端。

刘少奇在六中全会上被选为十二名主席团成员之一，协助毛泽东主持会议的进行。在全会之前的政治局会议以及六中全会上，刘少奇多次发言，批判王明路线，并通过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经验，批判王明的错误主张。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在作全会总结中说：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好，如果所说'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么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统一战线'。⑧

针对王明目无组织，目无纪律的行径，在九月二十六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要在组织上，党规上保证党的团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过去在莫斯科有人说，只要政

治上正确，组织上可以不服从，这是不对的，必须无条件服从组织。会议接纳刘少奇的意见决定成立中央规则起草委员会，由康生、刘少奇、王明起草有关决定，准备提交六届六中全会通过。

这个规则是针对王明的，因此更有必要让王明参与起草。毛泽东并不担心，因为有刘在其中坐镇，王明掀不起风浪。毛泽东对刘少奇之倚重可想而知。

十一月六日，刘少奇代表起草小组向全会作了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对提交全会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作了具体说明。指出：这些决定规定了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及各级党委的工作任务、职责范围和纪律，特别强调每个党员必须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如无中央及政治局、书记处之委托，中央委员不能代表全党发表文件”，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在执行党规党法上应表现为模范。⑨

这三个《决定》全部获得通过，全会认为这是“教育全党同志，为党的建设的一课。”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主要从政治思想上向王明施以打击，刘少奇则从组织纪律上予于打击。除了毛泽东外，便是刘少奇居功至伟。

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路线，赞同毛泽东一年多对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形势的分析。这次中全会正式确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在中共的领导地位，连王明也在发言中公开承认毛泽东的“领袖作用”，表示要“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如北辰而众星拱之”。

在这场打击王明的战役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结成了亲密的战友。会上，中共中央新成立了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周恩来与刘少奇分别被委任为这两个中央局的书记。

在协助毛泽东打败了王明之后，刘少奇又肩负开辟中原抗日工作的重任，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离开延安，到河南省确山县履新。

五、刘少奇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一九三九年三月，毛泽东通知刘少奇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刘少奇于三月十八日离开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于三月底回到延安。

刘少奇在延安的住所，位于延河北边新辟的一排窑洞，邻居就是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吴黎平也住在左近。

抗日战争开始后，延安成为革命圣地，全国各地不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民主志士，冲破国民党的封锁，跋山涉水，纷纷涌向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共领导下的抗战事业。抗战以来，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包括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秘密组织，发展了大批新党员。这一方面壮大了中共的力量，另一方面使中共党内的成份和思想意识复杂起来。便是土地革命时期入党的“老革命”，也多是农民出身，思想上存在浓厚的小生产者的意识。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改造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使他们能够自觉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成为中共面临的迫切问题。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专门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七月三日开始举行，断断续续到八月二十五日才结束。在延安期间，刘少奇经常到张闻天的窑洞中聊天，吴黎平也经常到刘少奇那里聊天。刘少奇说，这次回到延安，看到许多革命青年参加了革命的组织，感到极大的高兴，因为这是革命蓬勃发展的一个表现，同时对这大批新党员加强教育，使之树立正确思想极其必要。刘少奇把这一想法，同张闻天谈了。张闻天便提出要刘少奇去

马列学院为学员作个关于思想修养的讲演，刘少奇欣然同意了。

那时的马列学院，经常请一些中央的领导人去讲课，张闻天讲过中国革命问题，陈云讲了党的建设，而在宣传部工作的艾思奇主讲哲学，吴黎平主讲马列主义。

马列学院位于延安兰家坪，没有大礼堂，平时上课的窑洞又太小，因此重要的演讲常常设在窑洞外面的大操场上。一九三九年七月八日，马列学院的操场上坐满了前来听课的师生。刘少奇开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第一讲。

为了便于让大家记录，刘少奇以浓重的湖南口音，不紧不慢地说道：

"同志们：很对不起！你们很久以前就请我来演讲，我直迟至现在才来。我今天所要讲的问题是共产党员的修养。我想，在建设与巩固党的基本任务面前，讲这个问题，或许不是没有益处的吧！我想分作几次来讲，今天讲一部分，其余的只好留待下次。"

这一天，刘少奇讲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有修养、修养的内容、修养的方法、思想意识修养同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做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的具体标准。他说：

同志们！我们要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最忠实最好的学生之一，我们就需要在无产阶级与一切群众的长期而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进行各方面的修养。首先要有马列主义理论的修养，以及在实践中运用这种理论的修养；要有思想意识与道德品质上的修养，要有党内团结、党内斗争与纪律上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与工作作风上的修养，要有战略、战术、工作方法上的修养；要有善于对待各种人们、处理各种问题，以及各种科学知识与某些专门技术上的修养……

由于内容太多，这天没有讲完。七月十二日，刘少奇又去讲了一次。第二次主要讲共产党员在组织纪律方面的自我修养。

刘少奇的演讲，受到了马列学院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张闻天对

刘少奇的演讲很重视，认为是广大党员，尤其是新党员所迫切需要的。他立即请刘少奇把演讲整理成文，在《解放》周刊上发表——张闻天还兼任这个周刊的主编。

刘少奇于百忙之中把讲稿整理出来，交给了张闻天。张闻天看后认为很好，便交给吴黎平送毛泽东审阅，以便公开发表。那时候中共中央有个规定，凡公开发表的重要文章，都要送请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拿到稿子后，很快就看完了。他给吴黎平写了一封短信，说："少奇同志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应当快登"。通常送毛泽东审阅和稿子，一般要个把星期才能返回来，而这次才二、三天，毛泽东便把稿子退给吴黎平。

刘少奇的讲稿很快被送去排版付印，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日至九月二十日出版《解放》周刊的八——八四期上发表。

"共产党员修养"这二个问题的提出论述是这样的新颖。这样的切中时弊，使延安的共产党员们为之一震。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对党的建设虽然有不少论述，他们都是着重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很少专门论述应该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刘少奇在讲演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丰富经验，透彻地论述了每个共产党员应该加强自己的思想意识修养、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以便有效地为党的事业奋斗。因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后，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强大的教育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读者们纷纷给《解放》周刊写信，希望出版单行本。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共产党员们的要求，很快安排延安新华书店出书。当年十一月就把单行本印了出来。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刊也陆续转载，有的翻印了单行本。没有多久，《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小书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广为流传开来。

一九四二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延安发起整风运动，毛泽东亲自为这次整风运动规定了二十本必读文件，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其中的一本。从那时候起，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在

二十多年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中共党员必读的经典，人手一册。刘少奇的这篇主要著作，伴随着千百万中国共产党人的成长，后来更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传播到多个国家的共产党中去。

---

①：引自张志清等著《延安整风前后》，第三〇一三一页。

②：见张树军等著《民族救星》，第二〇三页。

③：见黄峥《刘少奇一生》

④⑤：《彭德怀自述》二二六页。

⑥：转引自《关于王明的评价》，见《文献与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⑦：同①，第三七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三九页。

⑨：《刘少奇年谱》上卷。

⑩：吴黎平《（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的前前后后》，见《怀念刘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第二篇

『旗帜』与『旗手』

第一章　毛刘结成亲密战友

一、延安整风运动与刘少奇的冒起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胜利结束了，但毛泽东对王明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王明由三十年代初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三十年代末期的右倾机会主义，给毛泽东予重要的启迪：要根除类似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分裂行为对革命事业造成的破坏，要保证自己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全党得到顺利的贯彻和实行，光解决王明的问题是不行的。王明的“左”倾克服了，又来一个右倾，即使王明除掉了，还会出现另一个李明、张明。关键还在于必须根除中共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洋八股以及认识论上的主观唯心主义等，必须提高全体干部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增强全党辨别正确与错误路线的政治思想能力。也就是说，必须在全党进行一次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和整风运动。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便呼吁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说：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子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生动活泼的新作风：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其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

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还提出了今后全党的三大任务：

普遍地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

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

在这里，毛泽东勾勒出了整风运动的轮廓。

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王明并没有死心，他将自己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加“序”再版。王明在“序”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于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高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这是对毛泽东明目张胆的挑战。

与此同时，党内对王明的错误，尤其是三十年代初期以来的错误，看法并不一致。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论政策》一文。毛泽东指出：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在苏维埃（即江西苏区）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①

然而在会上，王明、博古、朱德、康生、陈云、张闻天（其中王明、张闻天、康生、陈云是中央书记处五名书记中的四位，另一位是毛泽东）等人相继发言，不同意毛泽东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党内思想认识并不统一，王明还有很大的市场。因为张闻天、博古、王稼祥、任弼时、凯丰（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都是执行王明路线的人，王明的影响在他们身上还没

有肃清。

整风运动已不能不进行。

整风运动是从六届六中全会后开始酝酿的。毛泽东一方面成立中央高干学习会，学习马列主义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则编辑《六大以来》一书，将中共“六大”以来的文件汇编成册。曾参予这一工作的胡乔木（时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回忆说：

“当时没有人提出（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立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六大以来》成了整风的基本武器”。毛泽东也说：“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即《六大以来》）。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②

“九月会议”，是一九四一年九月召开的一个体现了整风运动前期成果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从九月十日开始，延续了一个多月，这是中共在陕北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康生、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凯丰、博古、邓发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以及李富春、杨尚昆、李维汉、陈伯达、高岗、林伯渠、叶剑英、王若飞、彭真等重要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的内容，是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路线问题以及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性质的问题。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报告。指出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左”倾“路线错误”，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次会议，是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的序幕。

会上，有二十八人发言，结合过去十年的革命历史，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张闻天主稼祥、博古、任弼时等人作了诚恳的自我批

评。王明两次发言，却拒不检讨自己的错误，将责任推到博古及张闻天的身上，并指责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太“左”了，批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只要资产阶级，不要大资产阶级，这不好。

在九月十一日的会议上，陈云发言说：过去十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同志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改变。刘少奇同志批评过去的白区工作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③

第二天，任弼时也说：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够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

④王稼祥在发言中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

康生在九月二十九日的发言中检讨了自己在白区工作的政策上与刘少奇的分歧。承认今天看来是刘少奇对的。当时反对刘少奇，一是由于自己的主观，二是听国际说刘少奇是机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时中央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⑤

九月会议上的这些如此一致的对刘少奇的评价，成为后来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重要观点，也为刘少奇进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奠定了基础。

九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写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和《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两个重要文件，文中采纳了九月会议的意见，多处肯定刘少奇，称赞“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正确的领袖人物”，“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⑥毛泽东对中央其他领导人作这样高的评价，是十分罕见的。

泽东的这两个文件，尤其是《批判》（对王明的九篇代表作所做的

九篇批判文章），写得很尖锐，不但点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名，而且用词辛辣、尖刻，甚至有些挖苦，它是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渲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虽几经修改，但仍显得咄咄逼人，锋芒毕露。这是两个文件后来没有发表的原因之一。此两个文件毛泽东只给任弼时看过。到七十年代毛泽东再次修改此文件时，便将称赞刘少奇的话全部删去。

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延至十月二十二日才结束。然而，在十月三日，会议还在进行的时候，毛泽东就给少奇发出电报：

少奇并告陈毅

（一）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谅已收到电报，希望你能参加七大。（二）动身时望带一台电台；（三）何时可以动身盼告。⑦

毛泽东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尤其是经过一九三七年的白区党代会，一九三八年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以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发表和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认定刘少奇不但是中共党内除自己以外的另一位正确路线的代表。而且也是一位甚有才干和理论修养的领导人。毛泽东环顾周围，任弼时、王稼祥、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康生等人，都是与王明路线有瓜葛、有牵连的人，这些人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都曾经反对过自己，都曾经犯过“路线错误”。在这方面，只有刘少奇是“乾净”的，是一贯地支持毛泽东的，与毛泽东是真正的、彻底的“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在中共日益壮大，抗日战争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之下，毛泽东急需寻找忠诚可靠的政治伙伴。急需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盟友”，以便巩固和增强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于是，毛泽东选择了刘少奇。

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关系合乎逻辑的进一步发展。

“旗帜”与“旗手”都在革命的暴风中崛起，并走到一起来了。

二、为刘少奇牵肠挂肚毛泽东罕有露深情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一行一百多人的队伍从苏北阜宁单家港

出发，进入敌占区，夜行晓宿，隐隐蔽蔽地向北进发。队伍中有一位穿便衣的高个子的中年人，形容消瘦，双眼炯炯，在夜风中卷缩着身子，疾步快行，似乎那单薄的旧棉衣，并不能抵御淮北平原那料峭的寒风。他就是化名为胡服的刘少奇，此行是要千里迢迢，横跨苏、鲁、豫、晋等数省的敌占区，返回延安。

刘少奇自从一九三八年冬出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以来，领导河南、湖北、山东、江苏数省的中共组织，扩充力量，开展抗日战争，建立了多块抗日根据地，实现了中共中央“重点发展华中”的战略目标，使得这块昔日曾是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的土地，如今抗日斗争如火如荼。中原与华北，新四军与八路军，形成中共反抗日本侵略的两个主要力量。

正当刘少奇在苏北、淮海一带四处奔走的时候，毛泽东十月三日的电报飞到了苏北盐城的新四军总部。事情虽是突然，但对刘少奇来说，已非第一次了。当时华中确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处理，刘少奇一时离不开身，于是，刘少奇于十月四日致电毛泽东：“目前华中工作还有些困难，须要进一步解决，请中央考虑我可否暂缓回延安”。⑧

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发电给少奇：

来电悉。（一）即来延安，既于目前工作不利，自宜缓期。（二）七大大约还需等半年才开，甚望你能到会。……两三月后动身来延安参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养，即在延安指挥华中；（三）……华中我军主要是对敌伪分散作战，你来延安指挥华中，似对华中的工作不会有大损失，而你的身体得到休养，则有大益”。⑨

毛泽东同意刘少奇三个月后动身。

中共中央与毛泽东显然一直记挂着这件事。三个月刚过，即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又一次作出决定：致电华中局要刘少奇回延安。第二天，电报通知正式发出，“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而且语气坚决：“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

带电台，动身回延。”

看来再不走是不行了。刘少奇决定开完华中局扩大会议就动身回延安。一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打来电报又给他增加了一项使命，要他代表中央去山东根据地指导工作，解决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二五师领导人之间的团结问题。

从苏北到延安，千里迢迢，交通困难，中间有很多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占领区，光敌人的武装封锁线就有一百多道。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刘少奇回延安途中的安全问题极为重视。二月十三日毛泽东打电报给陈毅、刘少奇：“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二月二十日又来电强调：“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⑩

毛泽东可能觉得这样还不保险，于是又给在华北前线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去电报，要他派人调查华中到华北沿途道路安全情形，同时于三月十三日去电要刘少奇再等一等：

我们正在调查由华中到华北道路上敌人封锁线的情形，安全保障的程度，使得复电即行转告。望你等候这一复电。⑪

一个星期后，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再致电刘少奇：

“兹将彭电转上，你看此种情形有安全之保障否，山东尚无回电，请你直接询问，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⑫

这时刘少奇已于两天前动身。

四月初，刘少奇一行越过日伪军严密封锁的陇海铁路，到达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二五师师部驻地山东临沭县朱樊村。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副书记黎玉，——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已经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正在等待刘少奇的到来。

从苏北到山东这段旅程，当年护送刘少奇的周长胜（时任新四军

团长）有如下回忆：

当晚，夜色降临，四周一片漆黑，旅首长们送少奇同志到村外。我带着四个连队，跟着他，从南朱集附近的一个庄子出发了。

一路上，我们白天休息，夜晚赶路，少奇同志有时骑马，有时下来步行。同志们出于对党的事业负责，出于对少奇同志的尊敬和爱戴，处处小心，日夜守护。第三天，我们来到了陇海铁路边上。少奇同志跨上路基，环顾四周，指着这边，问是什么庄；指着那边，问有没有敌人。问了一会，我正想催他快走，他却转过身子，返回路那边，跳进护路沟里，用手量量沟有多深，用步子数数沟有多宽。这下真把我急坏了。我很清楚，眼前东南和西北角上，就是伪军的碉堡，夜里鬼子又常驾着小压车出来巡逻，一发现什么情况就开枪，万一……我也顾不得什么了，对少奇同志说：“政委，很危险哪，还是快走吧！”“好的，马上就好的。”他仍在量着。等他量完了，爬上来，到了路这边，又跳进护路沟里量起来。我心里很着急，只好向他说：“政委，你走吧，这里随时可能有敌人来。等你过去，我来给你量，保险不会有错，一分一毫也不差。”

见我实在急得很，少奇同志便安慰说：“好同志，不要紧的。我想具体了解护路沟是怎样的。自己了解的，总要比听别人汇报好。你看，耽误的时间不是不多么？”

翻过铁路再走二十多里，就是八路军的鲁南根据地了。这地区情况较好，我们改成白天走路。我发现他的马没有我的马好，就说：“政委，把我的马送给你吧！”“那么你呢？”他问道。“我再从敌人手里缴呀！在鬼子、伪军那里，还怕没有好马？”“对，应该有这种豪壮气概！”他高兴地赞许着，但又接着说：“马还是留给你自己骑吧！”⑭

刘少奇不负中共中央所托，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解决了山东根据地的问题，使山东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刘少奇可以继续上路了。但沿途的安全没有保障，出发的时间便一再地拖延下来。一九四二年

六月一日，毛泽东给刘少奇打来一封电报：

胡服同志：

二十六日电悉，因沿途通过无保障，山东又缺乏统筹之人，故你不宜西进亦不宜南运，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八路军二五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全局似较适宜。如同意，中央即下正式通知。盼复。⑮

过了一个月，交通安全情况仍未好转，七月九日，毛泽东又拍来长电：

“我们很望你来延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安全，故不可冒险，仍以在敌后依靠军队为适宜，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以此标准来决定蹲在山东，还是仍回军部”。“上述掌握山东任务须请你担负之。至于执行此任务，自以你在山东为便利，但如苏北比山东更安全则在苏北亦可执行，或在山东一时期再还苏北，最后再去山东，请你斟酌情形决定。在你确定行止后，中央即通知华中、山东及北方局衬托你以指挥山东、会中全局的权力。”

毛泽东如此殷勤叮咛，拳拳之心跃然纸上，这在毛泽东是非常罕有的。⑯

关于在山东的这一段生活，刘少奇当年的警卫员魏良彬有以下回忆：

当时，山东地区在日寇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经济封锁的同时，又发生了严重旱灾。

那时候，我们经常吃没有脱壳的高粱米，吃的啥样，拉的还是啥样，不消化。有时用地瓜干放在高粱米里面熬粥，这两样东西都是硬家伙，熬不烂，嚼得腮帮酸痛。没有油，也没有菜，我们就把搞来的

野菜用开水烫熟了，放点盐一拌，用来送饭。时间久了，由于营养差，我们警卫班的同志脸上都有些浮肿，但精神却十分愉快。

少奇同志呢，虽然名义上有个小伙房，但除了从老百姓家里借来两个盘子、两个平底碟子、两个粗瓷碗、一把菜刀、一个小锅之外，平时很少看到“保健粮”（指面食）和肉类。少奇同志的炊事员，是安徽合肥人，高瘦个子，绰号“老杆子”。他时常向我们诉苦：“给胡政委作假真难，他本来吃的就少，又有胃病，有时给他多炒个菜，他就不同意。看他那么忙，吃得又那么少，那么不好，我真担心他身体会垮下去。”

有一次，记不清是山东军区还是山东分局，给少奇同志送来一袋面粉和十多斤肉。他不便于退回去，就都给了我们，说：“改善一次生活吧！”

开头，我们坚决不肯要，少奇同志说：“你们比我更需要。我在北方位久了；吃得惯杂粮。”

推来推去，最后我们只得收下了。当大家高高兴兴包饺子时，有的同志激动得掉下了眼泪。

每天，到少奇同志这里汇报情况、请示工作的人来往不断，罗荣恒、萧华同志，以及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我们都见过。少奇同志白天参加会议，作报告，夜里，还忙于搜集材料起草文件。在暗淡的油灯下，经常熬到二、三更天。他的烟瘾大，烟的供应又不多，常常夜里没有个抽，没有东西充饥，我们只有勤给他送开水，并劝他休息。他呢？却总是说：“好！你们先休息吧！”可是说完，还是继续伏在桌子写东西。有一次，住在夏庄时，因为房子小，部队多，少奇同志住在老百姓一间屋子里。那屋子右边有一厕所，靠窗口有座石磨。房东经常在半夜三更起来推磨，吵得少奇同志睡不好觉。我们想建议房东改换推磨的时间，少奇同志不同意，幽默地说：“你们不让老百姓吃饭还行吗？”少奇同志总是这样首先想到群众的方便。

有一回，少奇同志接连几天给部队作报告，嗓子都哑了，几乎讲一句话就咳一声，脸色也不大好。我们劝他：“快找医生看看吧！”

“不要紧！”少奇同志微笑着摇摇头说，“上了点火，过两天就会好的！”

我们劝他注意休息，唠叨得多了，他就说：“我不累，休息了工作怎么办？为了打鬼子，大家都很紧张呀！有许多工作要做嘛！”说得我们回不上话。⑰

半个多月又过去了。刘少奇决定不再等待，继续上路。为了行动方便以应付路上的险情，刘少奇将原先随行的一百多人精减到十八人，都穿上便衣，化装成老百姓。刘少奇则打扮成生意人，化名老许。一九四二年七月下旬，刘少奇一行在旅长曾国华率领部队护送下，离开朱樊村，向西北进发。

由山东到晋陕，都是敌占区。一路上困难重重，险情环生。时任八路军团长的杨秀山有以下回忆：

一九四二年十月的一个夜晚，晋绥军区司令部拍来一份绝密电报，要我率领第七团的一部和七一一六团的第一营，到大原汾阳的公路上迎接胡服同志回延安。我看了电报之后，再也不能成寐了。这里是晋绥三分区的一部分。这个地区周围有四十多个敌伪的大小据点，平均每月向我们进行一至二次合击、反复扫荡。每次扫荡都要持续三天至十天，此外，小规模的袭击就更加频繁。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我们敬仰的少奇同志不受一点惊恐，没有丝毫危险地通过敌占区，其任务之艰巨是可想而知了。我们反复研究了敌情和行动方案，就带队出发了。

这一次，由于情况有变，少奇同志没有出发。

这年冬天，我们又接到军区命令，按原地点再去迎接少奇同志。我带领队伍很快到达了王大庄、西马村、西河村一带。侦察员报令：“敌人在上贤村设下了埋伏，我们联络不上了。”

第二天，我们正紧张地等待着。这时，军区拍来了火急电报，说少奇同志在平川过了几夜，不能再隐蔽下去了。命令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在今晚接到少奇同志。这份电报加重了我们的责任，我们更加焦

急。

第二天清晨，看见对面来了人时我急忙问：“谁？”

对面的侦察员好像理解我的心情，他激动而愉快地回答着：“首长来了！”刹那，一种胜利的喜悦像电流一样温暖着我的全身。我向前走了不远，看到了护送少奇同志的便在队和我们部队簇拥着几个骑马的同志，缓缓而来。我当时的心情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走上前去便冒问一声：“首长们辛苦了！”

一位骑在马上的同志，立刻勒住缰绳，要下马。他和蔼地回答：“同志们很辛苦了吧！”从他那慈祥的面庞看来，不难猜出，他是胡服同志，也就是我们敬爱的少奇同志。

我连忙跑过去，扶住了少奇同志，并说：“你不要下马……”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已经下了马，紧紧的握着我的手……

我激动万分，目不转睛的看着少奇同志。少奇同志穿着一件青布长衫，裤角上还扎了两条带子，化装成商人模样。虽然面容有些消瘦，但他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却隐藏着难以形容的活力，他是那样沉着冷静，神态自若。尽管经过了长途跋涉，越过了敌人层层封锁线，披星戴月，奔波千里，而在他的脸上和眼神里却看不到丝毫倦意。我看着他那单薄的长衫，急忙脱下大衣，送给少奇同志。说：

“首长，天气很冷，请你穿上吧！”

少奇同志看了看我，问：

“你怎么办？”

“我，穿得很多，我，我年轻些……”我恐怕他不穿，急忙申诉着一切可信的理由。

少奇同志笑着点点头说：

“哦，比我年轻些好么！”他并没有穿上大衣，却回过身去给了他的一个随员。他又向我笑着说：“我们走吧！”

本应让少奇同志很好的休息几个小时，但为了保证安全，及早的脱离敌占区更远些，我就请示少奇同志，准备继续前进。他异常和气地：“好嘛！可以继续走。”于是我们部队保卫着少奇同志向晋西北三

分区的地方进发了。

队伍爬上一个高山头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这个山，山顶上没有树，到半山腰才有密密麻麻的树林，蚕练塔村在我们休息的山底下，是我们下山经过的头一个村子。到达这个村子要通过弯弯曲曲的林荫小道，下一座大山。部队正在休息，突然听到山下传一来一阵激烈的枪声，部队转移到山背后隐蔽，并做好战斗准备。我用望远镜看了看，因为山下都是树林，也看不到甚么情况。停了一会，侦察员报告：从东社镇出发的敌人，同我们遭遇了，战斗中有一个侦察员负伤被俘，敌人的企图还不明白。

当时广大指战员们主刻变得沉静了，我和同志们一样，由高兴转为担心。恐怕被俘的那个侦察员经不起考验，暴露了我们的行动，担心战斗打响了会影响少奇同志的安全。的确，以我们的部队力量，乾净彻底的消灭敌人是绰绰有余的。但是任务不是打仗，而是保卫少奇同志的安全。我们应当提高警惕，改变路线和营地，向左方绕行。经过研究，我去请示少奇同志，老实说，我当时的心里真有点忐忑不安。我将情况向少奇同志报告之后，完全出我意料之外，少奇同志平静地说："我完全服从你的指挥！"

这样我们绕过蚕练塔村，经过寨子村，在下午六点多钟到达蔡家社住下了。⑱

九月中旬，刘少奇安全抵达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东南的西辽县。

九月二十一日，一直注视着刘少奇行程的毛泽东后来电报：

少奇同志：

安抵一二九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关于最近时局情况我有电至总部可索阅，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作周密布置。

“刘邓”即是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刘少奇这一漫长的旅途不仅充满艰难险阻，而且物质生活十分贫苦，因为一九四二年正是包括延安在内的各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在一二九师师部，刘邓设宴款待刘少奇，摆上桌来的只有乾羊肉，邓小平后来说：“那是当时最好的东西了，我们很久没有吃肉了。”

十月九日，毛泽东在延安为《解放日报》发表刘少奇《论党内斗争》一文亲自写编者按语：

这是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期间，特为发表，希全党同志注意研读。㉑

刘少奇安全抵达晋察冀根据地，离延安已不远。毛泽东特地在这个时候于《解放日报》发表刘少奇的著作，并亲笔作编者按，这明显地是为刘少奇即将在中共中央登台亮相作宣传准备。

十月中旬，刘少奇到达中共太岳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山西沁源阎寨村。时值日军“扫荡”，停留了一个多月，十一月下旬，刘少奇继续上路，要通过敌占区及同蒲铁路、汾河。这又是一个敌人严密封锁的危险地带。毛泽东又特地通知中共晋西北区党委书记兼晋绥军区副政委林枫、军区参谋长周士第、军局政治部主任甘泗琪，令他们派人小心保护，电文如下：

林、周、甘同志：

少奇同志道路，你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㉒

有毛泽东的电令，林枫等人不敢怠慢，精心组织了得力部队接送。十二月下旬，刘少奇由晋西北进入陕北米脂、绥德、延川地区，于十二月三十日到达目的地延安。

刘少奇此行费时九个多月，穿越敌人一百零三道封锁线，行程三千里。刘少奇后来说："这是一次小长征。"

一九四三年元旦之夜，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新落成的中央大礼堂举行盛大庆祝晚会，欢迎刘少奇顺利归来。刘少奇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陪同下走进会场，全场一千多与会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发表了讲话，刘少奇也简要地汇报了华中、山东的情况，之后是延安平剧院的演出。晚会至午夜方散。第二天，《解放日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盛大新年晚会、并欢迎刘少奇从华中归来的消息。

从毛泽东对刘少奇西来沿途安全所表示的密切的关注，表现了毛泽东对刘少奇深切的期望。毛泽东对中共党内的其他干部，从来没有表示过如此厚密的情感。

毛泽东已经将刘少奇视作自己的亲密战友。

三、整风运动结果：毛刘共享权力

当刘少奇回到延安时，整风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党校在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礼堂里座无虚席。毛泽东在一片掌声中走上讲台，作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在我们党内，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股歪风。整风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毛泽东的这次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地正式开展。

刘少奇刚一回到延安，毛泽东便立即安排他参与中共中央日常领导，并继续指导华中和山东根据地的工作。

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尤其是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对土地革命后期王明"右"倾错误路线进行揭发批判以后，对此负有责任的一些领导人已很难在中央书记处继续工作。张闻天自四二年初便要求到农村

去做调查研究，不在延安；博古也分管《解放日报》，不再参加中央会议；王明自“九月会议”后便称病，不参加任何会议，也不做工作。而周恩来则在重庆负责南方局。调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已是势在必行。刘少奇返回延安后，毛泽东便将此事提到议事日程。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时局与方针的讲话，随后任弼时报告中央机构调整方案。任弼时在政治局内分管党群和情报工作，后又兼中央秘书长，主持书记处的工作。这个报告由任弼时来讲，自是合情合理，而调整方案出自毛泽东的主意，亦是在情理之中。任弼时说：现在中央机构比较分散，需要实行统一集中，拟定在中央政治局下面分设组织和宣传两个委员会作为中央的助手。康生也介绍了机构调整的酝酿过程，说：“少奇同志意见，书记处应有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是像过去那样成为了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处理和决定日常工作”。

“联席会议”即是民主议事，毛泽东只是众多席位中的一位，大家地位平等，凡事常要联席者研究讨论、表决，毛泽东不能独专。刘少奇的提议打破了这种局面，将大权集于毛泽东一身。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在政治局与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组织两个委员会，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各部、委、厅、局、社的工作由书记处或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统筹起来。会议还决定刘少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刘少奇兼任中央研究局局长。㉓

宣传与组织是中共的主要部门。毛泽东与刘少奇分享中共的最高权力。

这次会议所做的决定，对毛泽东、刘少奇以及中共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担任中共中央的主席。“毛主

席”的称呼虽然是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毛泽东担任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起便有了，但那个“主席”是个“小”主席，象征的意义多过实质的意义。一九三五年——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虽然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但职务只是政治局常委，担任负总责（即总书记）的是张闻天。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第一把手这个职位觊视已久，也作了精心的部署。其步骤是先把张闻天的总书记职务除去。这一步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办到。

毛泽东将张闻天的地位与自己拉平后，第二步便是超越张闻天等其他书记，名正言顺地登上第一把手的宝座。经过整风运动。这一步也水到渠成地实现了。

至此，毛泽东除了在一九三六年担任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外，还担任了中央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共三个主席，开了中共党史的先河。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规定“书记处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一点是画龙点睛的最关键之处，是权中之权。在这里没有任何的条件与时空的限制，不管好与坏，也不分对与错，毛泽东都可以最后肯定或否决，毛泽东不但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还立于永不失败之地。这种至尊的;绝对的权力，正是毛泽东所梦寐以求的。

“最后决定之权”，意味着既使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或集体通过的事情是正确的，毛泽东都可以推翻、否决。它的要害是将自己凌驾于集体和党组织之上，从而根本违背了毛泽东自己倡导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违背了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的组织原则。

本来，“最后决定之权”仅是指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决定之权，而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并无哪一个人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规定。然而此次会议开了先例之后，使毛泽东超然于其他中央常委之上。久而久之，将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不但在毛泽东成了习惯，而且在其他人中也习以为常，不以为怪。渐渐地，毛泽东不但在书记处（即中央常委）有“最后决定之权”，而且在政治局，甚至中央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都搞“最后决定权”，凡是不符合自己胃口的集体决定都一

概推翻。毛泽东的家长地位与独裁作风，便是由此开始。

毛泽东刚登上主席的宝座，就作出这样的决定，既表现了他的专制、独裁的本性，又暴露了他理论脱离实际的虚伪性。一九三八年九月，针对王明在武汉目无组织、独断专行、不守纪律的行为，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然而现在毛泽东却公然地违背这些原则。说一套与做一套，对别人一套，对自己一套，正是毛泽东的政治品质。

毛泽东的这一错误决定，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的祸害与遗患，延续到七十年代，而且越演越烈。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正确，其祸害还不明显。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执行了一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越来越多，越来越恶劣，因而“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的危害也就越来越显著，越来越严重，中共、中国以及中国人民，因而饱受苦难。

对毛泽东的这一错误决定，刘少奇无疑是积极的支持者。刘少奇可能没有透彻地了解这个决定的深远影响和严重后果，而且也有为了树立毛泽东在党内威望的良好动机。但不管怎么说，同意和支持这个决定，无疑是一种丧失原则性的错误行为。

在这次权力再组合当中，刘少奇不但第一次担任书记处书记，进入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而且所获得的权力与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居于第二位。“中共的第二把手”、“毛泽东的继承人”这种历史地位，就是从这里开始形成的。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刘少奇是由于支持了这次会议的决定，才获得这种地位的。然而，三十年后，也正是由于这次会议决定的影响，刘少奇陷入了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危机，并且遭受了灭顶之灾，还差一点就“永世不得翻身”。

三月十六日政治局会议后，刘少奇积极地加入批判王明的斗争中，先后发表了《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思想》等重要讲话和文章。前者除肯定自己主持华北、华中工作取得巨大成绩外，还批判了王明主持的长江局的错误。后者除系统地批

判王明路线外，还鲜明地提出中共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另一条是以陈独秀主明为首的“孟什维克路线”，刘少奇说：在二十二年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刘少奇号召“一切干部，一切党员”，“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的环节和部门中去”。

刘少奇不负毛泽东所托，除了在批判王明的斗争中发挥重大影向外，还从组织、政治、思想上大树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为毛泽东建立全党的统治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王明曾说：“在《整风》指导部里，又出现了另一“特别权威者”，即刘少奇……他左手拿着喇叭，右手是歌颂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的专家”。（《王明回想录》一九六页）。

---

①：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六二七页。

②：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九月版，第四八页，

③④⑤：同上，一九八页。

⑥：同上，二七四页。⑦：引自《刘少奇年谱》。

⑧⑨⑩⑪⑫：同上。

⑪：引自郭思敏、天羽《我眼中的刘少奇》一四四页。

⑮⑯：同⑦。

⑰：同⑭一五七页。

⑱：同上，一七八页。

⑲⑳：同⑦。

⑳：转引自黄峥《刘少奇一生》。

㉑：引自《毛泽东年谱》。

㉒：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二七三页。

㉓：同上。

第二章　中共“七大”“旗帜”与“旗手”

一、“个人崇拜”始于延安

历时三年的延安整风的积极意义，是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树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在中共的统治地位，将中共全党团结、统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从而带来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延安整风又带有严重的不足。最显著的，是埋下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种子。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对毛泽东的颂扬之风也日渐炽热起来。延安的报刊上出现了连篇累牍的歌功颂德文章。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在各种场合，都不约而同地发表讲话颂扬毛泽东。阐述毛泽东的丰功伟迹，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似乎成了时尚潮流，也似乎成了一种政治表态。

一九四三年，毛泽东下令周恩来从重庆返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回到阔别三年的延安，八月二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会上周恩来发表演说，他说：

“我这三年在外，做的事实在太少了。可是在这三年中间，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我们党内的进步，却特别的多，特别的大，我们在外边

也看得格外分明。”

“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方向，没有走错道路。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行为错误了。

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①

一九四二年七月，张闻天在一次会议上说：

中国革命过去的历史证明，有了毛泽东的领导，革命力量就会逐渐壮大，就会逐渐走向胜利，就可以转危为安；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领导，即不听毛泽东的意见，或反对毛泽东的领导，革命就会遭到挫折，就会转胜为败，就会从胜利走向困难。②

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提出我们党已经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他说：

“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又说：“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③

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是王稼祥。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他在为纪念中共二十二周年诞辰而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

的道路》一文中指出：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

至此，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公开提出。④

连王明也打起吹捧毛泽东的旗号。一九四〇年五月三日，王明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报告，他颂扬说：

“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在理论上，毛泽东“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是伟大的理论家”；《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王明还说：

“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副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

他还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学习毛泽东：

第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
第二，“学习毛泽东勤于学习的精神”。
第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
第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
第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

王明最后又总结说：

“我们总的意思，还不过是一点，就是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生以及全国的优秀青年，应该以毛泽东为模范，应该学习毛泽东。”⑤

二、中共“七大”：“旗帜”与“旗手”正式登台

在这种政治大气候下，中共“七大”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

这次大会的最大特色，也是它的最大功迹，就在于树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共的旗帜，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也是历史的必然。刘少奇在大会上说：“以毛泽东思想贯串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

于是，毛泽东作为中共的“旗帜”，正式树立起来了。而高举这面伟大红旗的“旗手”，也就非刘少奇莫属。

在大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而刘少奇则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两人都是第一次。

有人统计，刘少奇在《报告》中有一〇五处提到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刘少奇一生》说：刘少奇“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科学的概括和论述，代表全党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从而成为中共七大最重要的历史性成就”。刘少奇因此而被载入史册。

由于这一点，处于第二位的刘少奇的修改党章报告，其名头竟比毛泽东的主报告更响亮。

刘少奇在报告中说：

“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组织者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⑥

刘少奇提出：“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

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连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总共有四个“主席”名衔。而刘少奇则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排名第三，仅在毛泽东与总司令朱德之后。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这种“旗帜”与“旗手”的关系，一直维持到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一九六一年，毛泽东在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前来访华时说：接班人的问题，“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一九四五年‘七大’就明朗了”。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说，继承人“很清楚，是刘少奇”。

---

①：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二月版，第五五三页。

②③④⑤⑥：引自张树军等《民族救星》，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第三章　毛刘蜜月

一、毛赴重庆谈判　刘首次主政中央

中共“七大”以后至建国初期，是毛、刘关系的“蜜月”期。

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决定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八月二十三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选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①

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即四个主席）职务。会议还决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刘少奇兼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

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向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发出电报通告：“在毛离延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两同志为候补书记”。

毛泽东动身之前，将刘少奇召到他所住的窑洞，仔细地交待方方面面的工作，两人谈了整整一天。八月二十八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和延安各界代表，到机场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送行。刘少奇目送着毛泽东等人与专程前来迎接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张治中上将一起登上美式飞机，望着飞机徐徐驶上跑道，冲向蓝天，

直至在白云深处消失。

二、刘少奇："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

毛泽东离开延安后，刘少奇第一次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他既要及时指导全国各地党政军民的日常工作，又要配合好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还要指挥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军队协调行动，与国民党争夺日本投降后空出来的战略地区。这段时间是刘少奇一生中工作最繁重、最劳神、最紧张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刘少奇做出的最杰出的功迹，是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重大战略决策，指挥中共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这一英明决策，为中共在短短的三年内打败国民党，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被日本占领。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红军解放了东北。东北三省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工业、交通发达，是极具战略价值的地区。因此中共、国民党都将之视为战后的必争之地。这是一场具有全局意义的争夺战。

与此同时，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敌后建立的根据地，除了华北、华中两地较具规模外，其余都零星地散布在各个地区，它们规模不大，力量单薄，孤立无援，很容易被国民党各个击破。

而当时蒋介石制定的战略方针是：抢占东北，对中共形成南北夹攻的战略形势。

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在抗战胜利后的千头万绪之中，刘少奇以独特的战略眼光，敏锐而又果断地抓住了当时局势的主要环节，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提出了力争东北，"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刘少奇在发给在重庆的毛泽东的电报中说：

"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军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因此，我们意见，新四军江南主

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为了加强冀热辽地区工作，应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派高岗、李富春、康生等去工作，必须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以陈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去担任，无此领导机关负责，巩固热河是不可能的”。③

毛泽东于当天就发回复电，完全同意“向北推进，向南防御”以及力争东北的方针，说：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又来电，再次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及延安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并提议：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政治局人员分散各地的情况下，全权委托中央书记处，中央主席及代主席，行使中央政治局职权。④

刘少奇的战略部署是：重点放在争夺和控制东北。为此必须从山东、华北地区抽调大批的军队和干部抢占东北；与此同时，将散在江南各地的力量集中、收缩，向北转移，填补由山东、华北抽调兵力赴东北所造成的空白。具体方案便是从山东、河北调新四军与八路军共十万人入东北，原华中的新四军迅速北上山东，原浙东、苏南、皖南的新四军过江北上，占据原华中新四军的根据地苏北、皖北。刘少奇这一战略目标如果能够实现，就可以从根本上克制蒋介石的“南北夹攻”的战略，使中共在战略上处于主动的地位。

早在九月初，刘少奇就展开了抢占东北的部署。

九月七日，刘少奇指示中共华中局，要他们抽调一批东北籍干部，立即分别集中，指定负责人带队，经山东分局送往东北。九月十一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名义，下令中共山东分局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三万人，由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统一指挥，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当时正在延安待命的八路军第三支队政委张启龙，晋察冀军区第十二军分区司令员程世才、副政委伍晋南等一批干部，中共中央原准备派他们南下去新四军第五师和广东工作；现在也掉转方向，改派去东北，即日启程。

正在刘少奇加速往东北调兵遣将的当口，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

上午，延安东关机场突然降落一架苏式小型军用飞机。从飞机上下来的，是苏联后贝加尔湖前线部队贝鲁罗索夫中校和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

原来，八月下旬曾克林带领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部队奉命开进东北，九月六日进驻沈阳，组成了由曾克林任司令员的沈阳卫戍司令部。他们是第一支进入东北的部队，又是第一次接管大城市，孤军深入，缺乏经验，迫切需要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可偏偏他们的电台功率低，在出关后便不管用了，怎么摆弄也同延安联络不上。正在犯难之际，他们获悉苏联红军派驻东北的前线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也想派代表去延安，同中共中央商谈问题。冀热辽军区前委便决定曾克林搭乘苏军代表的飞机去延安，当面向中共中央请示。就这样，曾克林同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一起飞到了延安。

贝鲁罗索夫的使命和曾克林不一样。他一到延安，就去会见朱德总司令，正式转达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意见：在苏联红军退出东北前，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八路军个别部队已到沈阳、大连、长春等地，请朱总司令命令这些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地区；苏联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

贝鲁罗索夫转达的意见，显然就是苏联当局的意见，不可等闲视之。朱德立刻把会见情况向刘少奇作了详细介绍。

下午，刘少奇紧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方意见和东北工作。

讨论之前，先把曾克林请来介绍情况。刘少奇对曾克林说："你从前线回来，辛苦了。我们很想了解东北的情况，你来得正好。"

在曾克林作了详细汇报之后，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政治局委员们一致同意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对苏联方面要求中共军队撤出沈阳、大连、长春等地的问题，刘少奇说：可采取三种方法，（一）撤名义；（二）撤小部分到乡下，主要部分留沈阳；（三）从沈阳至营口、山海关，把撤退闹得轰轰烈烈。三种

撤法都用，公开撤，秘密又去。但冀热辽军区所辖的热、察是抗战以来八路军的活动区域，不能撤出。由山东派四个师到东北，还是去，方针还是争取东北。为了照顾苏联与蒋介石的外交关系，组织武装名义上不用八路军，但须使群众知道是八路军。

最后，刘少奇又提议，为加强东北的领导，成立中共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立即前往东北开展工作。这项提议获得一致通过。

第二天早晨，新的中共东北局领导成员彭真、陈云、伍修权和增派的中央军委后勤部长叶季壮，便同贝鲁罗索夫、曾克林一起，乘他们来的那架小型军用飞机，飞赴东北。

九月十五日晚，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各中央局下达指示：目前我党的任务，就是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强大力量。现在最需要的是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到东北，华北、华中应派遣一百个团架子的军事干部，从班、排、连、营、团到事务、政治人员都配齐，迅速陆续前去东北。一百个团干部的分配为华中二十个，山东三十个，晋察冀二十五个，晋冀鲁豫二十五个。⑤

紧接着，刘少奇便于九月十七日向毛泽东正式提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在收到九月十七日毛泽东的复电后，刘少奇当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重庆来电和战略部署。

刘少奇首先在会上发言说：我们今天的方针，是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要赶快动作，利用时机，控制张家口、山海关，使蒋介石军从陆路进入东北不可能。东北海岸只要五万人在渤海湾一段被我们控制，蒋军就上不了岸，东北局已去了，再派五万军队去，同时要各地配一百个团的干部，马上就去。准备十一、十二月在冀东屯集五万兵力，在苏军撤退时宣布八路军进东北。各地不要疏忽，还有两月多。十五万兵力，东北内部再组织二十万武装，枪支粮食都搞好，我们就能控制东北，这时国共谈判就有希望。因此，我们要当作全党全军的任务提出、我们应向北发展，南面可采取防御。⑥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顾不上休息，连夜起草了三份电报，发了出去。

第一份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全党的指示，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为此，特作下列部署，并坚决执行之。

（甲）晋察冀（除冀东外）和晋绥两区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马占山向察哈尔张家口之进攻及将来胡宗南由北平向张家口之可能的进攻，坚决打击傅、马及其他进攻之顽军，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

（乙）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由山东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

（丙）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退江北。

（丁）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

（戊）晋冀鲁豫军区竭力阻滞并打击顽军北上部队，准备三万兵力在个十一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

（己）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⑦

第二份电报是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的：

“为了控制热、察发展东北，必须调兵北上。我们意见长江以人部

队原则上撤退到江北。苏南、浙东可以撤出军队三万到三万五千，地方党政一万，即可加强江北。皖南、皖中七师部队在佳军进攻下势必撤退，亦可撤出约二万人。为了使国冀赏示能很快安定南京、上海，我苏南力量的撤退可以逐步实行，目前只撤主力。”“新四军、部队北调援，罗荣桓调东北，林彪调冀热辽，陈、饶调山东。新四军地区由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负责，组织分局，归山东（将来改华东局）陈、饶领导。山东部队迅速北调，以便争取时间。”⑧

另一封是向毛泽东建议江南部队尽快全部往江北转移。

毛泽东连夜发来复电：完全同意刘少奇及中共中央的部署，并提出部署的实施“越快越好”，“亦以快为好”。

这是继长征以来中共军队最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方针、规划定下来后，刘少奇又进一步抓贯彻与实施。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向中共山东分局发出指示：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要以全部力量来完成当前任务，要在两个半月内在东北组织起二十万至三十万的作战部队，在冀东屯集五万至十万的军队，以阻绝蒋介石军队进入东北，时机紧迫，越快越好。望罗荣桓、萧华能很快到东北，林彪很快到冀东。在林彪未到冀东前，中央派程子华到冀东主持。

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接到指示，紧急行动起来，迅速组织山东主力部队赴东北。本来林彪在中共七大闭幕后被派往山东，已先行到太行山，这时接到中共中央调令，也就更道向山海关进发。

由于陆路遥远，进展缓慢。刘少奇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九月二十九日，他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指示山东、东北的领导人：山东部队和干部，如从陆路进入东北，两个月也不能到达，那时国民党军队必将进入东北，所以必须不顾美舰巡逻，在胶东和辽东立即采取确实办法，用全力迅速组织渡海，再不能容许片刻迟缓。

刘少奇第二天又追发一电，提出更严密的部署：(一)望令万毅、吴克

华立即带电台及工作人员到海岸附近去与胶东密取联络，接引部队和干部过海，邹大鹏立即带电台到庄河猫子窝一带与胶东联络，收集船只，到胶东接运部队，并筹集粮食。萧华应立即过海，以便指挥全军渡海及渡海后的部署。伍修权立即到旅大与苏军言明我军行动，并与万毅、吴克华、萧华联络。上述各人非至渡海任务全部完成，不派其他任务，并不得擅自离开。(二)胶东指挥机关立即迁至海岸附近，与万、吴后、萧密取联络，全力组织渡海。必须渡过三至四万人，方能打开与支持东北局面。(三)美军于今日在天津一带登陆，我军渡海行动不能因此停止，应利用晚上分散上船，一晚到达旅大口外苏军防线内，再沿辽东海岸东行或北行至适当地点登陆。(四)渡海行动如此迟缓，已是大错，如不立即补救，将逃不了历史的惩罚，望坚决完成此任务。

新措施果然见效，部队移动的速度大大加快了。由于东北军情紧急，十月七日刘少奇又急电林彪，要他率领已到冀东的部队速开东北。与此同时，其他各解放区、各军区也在根据延安发出的一道道指令，进行着相应的调整、布防。

在延安的机关、单位也刮起一股“东北旋风”。根据统一安排，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学校、文艺团体、医疗后勤等单位，纷纷抽调大量人员，编成干部团开赴前线。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又有一批三百多人的干部队伍要出发开往东北，刘少奇亲自来为他们送行。

不到两个月，控制东北的部署基本实现。陆续开进东北的中共军队达十一万人，其中包括罗荣桓等率领的山东主力部队六万余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所属部三万五千人。先后派往东北的干部有两万余名，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彭真、张闻天、高岗，中央委员李富春、林彪、李立三、罗荣桓、林枫和十名候补中央委员。刘少奇在九月二十一日曾电示彭真、陈云，提出进入东北的部队统一用东北人民自治军名义，以便组织大规模的正规军。十月三十一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正式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委，下辖十个军区。

在华东解放区，新四军苏浙军区主力部队陆续撤到苏皖边区和山

东，新四军军部率第二师、第四师、第七师大部分主力部队转移到了山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由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陈毅任军长兼司令员，饶漱石任政委，下辖五个军区。原中共华中局也移到山东改为中共华东局，饶漱石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另在苏皖地区组成华中军区，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委。原华中地区组成受中共华东局领导的华中分局，邓子恢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

这一前所未有的军事大调动，争得了控制热察和东北的先机，打破了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以便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同时，又及时将分散在南方国民党心腹地带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从全国看，中共军队已经摆脱了分散被动局面，处于有利的战略形势。⑨

三、刘少奇及时指示林彪“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由重庆回到延安，刘少奇率领大批党政军干部前往机场迎接。

毛泽东回到枣园住处稍为休息后，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汇报了重庆的谈判之后，刘少奇也汇报了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情况。

会后毛泽东因为在重庆疲劳过度而病倒了。他感到周身不适，睡不着觉，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足痉挛，冷汗不止。他用冷水毛巾敷在额头上以减轻病苦，但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入医院治疗，随后又离开枣园去柳树店休养。

在这段时间内，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在东北方面，为了抢占这块战略要地，蒋介石用飞机、轮船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调运东北，这些全部美式机械化部队共十万人，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指挥下，凭借其精良的装备和空中优势，向中

共军队控制下的山海关，锦州一带扑去。林彪指挥的东北自治联军，兵力分散，协调联络不畅，立足不稳，装备又差，弹药缺乏，第一仗便败北，山海关、锦州于十一月中旬相继失守。林彪率领部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向北撤退。

十一月十九日，驻东北的苏联红军指挥部通知中共东北局，苏军将按照中苏条约将中长铁路站线及大城市交给国民党，要求中共军队撤出大城市。

在这种形势下，刘少奇调整抢占东北的方针，于十一月二十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去电东北局，指出退出大城市后，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挑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在业已建立秩序的地方，要发动群众控诉汉奸及开展减租运动。"

刘少奇把这种策略叫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⑩

十一月二十二日他打电报转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说："已去电要彭真、林彪在苏军撤退后，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十一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东北局说：苏联由于受条约限制，长春铁路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独占东北已无此可能，但须力争在东北的一定地位，除长春铁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的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的控制要作为工作重心，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东北局应本上述方针速作部署。

然而中共东北局动作迟缓，路子也不大对。十二月七日刘少奇向东北局并林彪、程子华发去一电，告诫说：我们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这是一个工作方针问题，望你们迅速考虑成熟加以确定，否则，动摇不定，妨害工作，丧失时机。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又给彭真发电强调："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

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战略要地（如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挑南等），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

毛泽东对东北形势很不放心。十二月下旬他的病情一有好转，便要人把一个多月来东北和延安的往来电报统统调来，细细阅读。一番研究之后，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休养所的病房里写了一篇对中共东北局的指示，再次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方针，即后来收入毛选四卷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文。他写道：“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做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中共东北局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行动起来，东北形势逐渐改观。到十二月底，军队已经扩编到二十二万多人。部队和干部分散向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铺开，发动群众开展剿匪、清算汉奸、减租和开展生产，使东北根据地从无到有，一步一步建立起来。⑪

毛泽东休养延续到一九四六年夏天。

刘少奇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所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以及对东北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决策，无疑是正确的，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最重大的决策之一，为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刘少奇多次说自己不谙军事，但他在这个时期所表现的身手，大智大勇，指挥若定，不失为战略家、政治家的风范。

刘少奇经受了领导中共中央工作的考验，而且表现出色，作出了

杰出的贡献，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又增加了一分。

四、陕北分兵毛刘备率一个“中央”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向中共发动大举进攻，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调集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属下三十四个旅共二十五万人的兵力，出动一百架飞机，向延安发动进攻。当时在陕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彭德怀领导的西北野战兵团，只有二万多人，仅胡宗南的十分之一。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决定放弃延安。

三月十六日，由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领一部分中共中央机关人员从延安转移到瓦窑堡。三月十八日晚，毛泽东与周恩来最后撤离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战斗旅程。

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一队警卫人员乘坐四辆吉普车，在夜幕下离开了延安，他们和警卫人员挤坐在一起，车后面挂着拖斗车，毛泽东的卫士石国瑞、孙振国坐在上面，架着机关枪。毛泽东在车上默默地抽烟，一副沉思的模样。

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问题是：撤出延安后到那里去？

第一晚住在刘家渠。第二天车又继续往前走，不久便来到了黄河边上。

三月二十五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来到子长县王家坪，与毛泽东、周恩来会合。第二日向清涧县的小山村枣林子沟转移。半夜时分，毛泽东等人的支队在一个山沟里停车，大家下了公路，到了河滩，毛泽东在卫士的搀扶下爬上陡峭的河岸，钻进一条仿佛是裂缝般的山谷。沿着山谷里的羊肠小道前进，眼前豁然开朗，看见山前的几孔窑洞，周围哨兵似地矗立着许多枣树，光秃秃的枝丫在寒风中不止摇拽。这就是枣林子沟。

住下后，毛泽东召集了书记处书记们开会。灯光如豆，尽管五个人都坐在炕上，但在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的香烟烟雾中，每个人

的形象都显得朦朦胧胧。

毛泽东首先发言：我反复考虑了，我们中央不能离开陕北。留在陕北，我们可牵制胡宗南二十多万大军，叫蒋介石这个战略预备队失去作用。

任弼时说：“面濒水，三面临敌，万一让胡宗南把我们一网打尽怎么办?”

朱德从背靠的墙上欠起身来，说：“主席的心思我晓得，党中央留在陕北，帅旗不倒，对全党全国人民是个鼓舞，可弼时的意见值得考虑。”

毛泽东阐述自己的看法：“我们在陕北住了十二年，老百姓供养了我们，一遇险情我们就跑，对不起陕北人民啊！”

“我们不能感情用事，要考虑个万全之策。”刘少奇慢条斯理地说。

“当然，”周恩来说话了，“留在陕北有留在陕北的道理，这里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也保障，一方面我们可以做陕北军民的主心骨，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牵制胡宗南的部队，也是对其他战场的支援。”

“总之，不打垮胡宗南我是不过黄河的。”毛泽东好像赌气地说，“要过你们过好了。”

朱德说：“我同意留。”

刘少奇也说：“我也同意。”“不，”毛泽东突然话锋一转，“也不是全集中到这里。弼时的意见有道理，万一我们叫胡宗南一网打了怎么办?因此我们也来个古书上说的，兵分三路，如此如此。”他又说：“我们中央分个工，成立一个中央工作委员会，一个中央前敌委员会，一个中央后方委员会。工委到晋察冀的河北平山县，任务是处理中央委托的工作，前委留在陕北，代表中央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后委进驻晋西北，负责陕北战场后勤保障和安置中直、军直机关及家属的工作。”

“我赞成，”朱德首先响应。

周恩来说：“后委就让剑英和尚昆负责，我们讨论一下我们这几个人的分工。”

都认为留在陕北最危险，自然又是一番争论和谦让。

“泽东同志过黄河，”朱德平统在袖管里，好像一个庄稼汉似地屹蹴在炕头上，背靠着墙壁，“我留在这里。”

“我也同意毛泽东同志过黄河，我嘛，是书记官，理所当然留在这边。”任弼时说。

刘少奇说：“你有高血压，还是你跟主席走，我留下。”

周恩来始终沉住气不开口。

“这样吧，总司令跟政治部主任搭配，我跟参谋长搭配，这样既是政治班子，又是军事班子，两全其美。我和恩来留在陕北，总司令和少奇同志到西柏坡，弼时同志是书记官跟我们走。”毛泽东说。

“同意。”任弼时鼓起掌来。

朱德还要争，毛泽东把他制止了：“就这样定了，夜深了，该休息了，明天恩来还要赶路过黄河。”周恩来要去山西，协助叶剑英、杨尚昆安排转移工作。

会议形成了一个文件，这就是《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的通知》。

通知告诉全党和全军，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将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同陕北人民共同担负起保卫边区的任务。⑫

毛泽东与刘少奇分开了。毛泽东率领中央纵队在陕北艰苦地转战。刘少奇则率领中央工委到达河北省西柏坡，领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和华北解放区的工作。

直到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发生战略性转折，西北战场根本改观，毛泽东才准备离开陕北，前往河北与刘少奇会合。

三月十日，毛泽东去电刘少奇：“我们拟于三月二十日动身东移，约于四月十五日左右可到你处”。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抵达西柏坡。四月三十日，刘少奇前往距西柏坡不远的城南庄，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书记处会议，毛、刘两人才得以会合。

这时解放战争已到了战略反攻阶段，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民主革命胜利的曙光已是不远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是刘少奇的五十岁寿辰，十二月一日是朱德的六十二岁寿辰。在胜利的气氛中，西柏坡的干部为刘、朱合

办了一个简单而热闹的祝寿晚会。朱德写了一首五言诗，以祝刘少奇的五十大寿：

贺少奇五十寿于西柏坡
少奇老亦奇，天命早已知。
幼年学马列，辩证启新思。
献身于革命，群远见新姿。
人山人海里，从容作导师。
真理手求得，平生能坚持。
为民作勤务，劳怨均不辞。
党中作领袖，大公而无私。
群众欣爱戴，须臾不可离。
修养称楷模，党员作范仪。
今年虽半百，胜利已可期。
再活五十年，亲奠共产基。⑬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刘少奇与王光美结婚。这是他的第五位夫人。

---

①②：引自《毛泽东年谱》下卷。
③④：引《刘少奇年谱》上卷。
⑤⑥：见黄峥《刘少奇一生》。
⑦⑧⑨：同③。
⑩⑪：同⑤。
⑫：见李彦清《黄土地·红土地》，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八月版，第121—122页。
⑬：同⑤。

第三篇

分歧与矛盾

第一章　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与刘少奇的科学社会主义

一、毛泽东：“李自成”与“进京赶考”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便提到日程上来。在那些收拾行装、准备上路的日子里，毛泽东的心情似乎不大平静。他多次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提起李自成，说“决不当李自成”。

李自成是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在打入北京，推翻明朝之后，以李自成、刘宗敏为首的农民起义首领生活腐化，内部发生分裂，后来被满清军队赶出北京，最后全军覆没，遭到彻底失败。

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于一九四四年写了一篇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在同年三月十九日重庆的《新华日报》上，该文对李自成成功地进入北京到后来失败地退出北京的历史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总结。

郭沫若的论文连载完后仅二十天，即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宣布将《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学习材料。

八月下旬，在重庆的郭沫若收到了延安印刷的《甲申三百年祭》

单行本。他立即给毛泽东等人去信，感谢他们的鼓舞和鞭策。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①

时至一九四九年，全国革命战争胜利在望，毛泽东要率领中共进北京了，毛泽东于是想起了李自成。在三月五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警告：在胜利面前，要防止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

为了防止李自成的悲剧在中共重演，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还提议：

不做寿；
不送礼；
少敬酒；
少拍掌；
不以人名作地名；
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毛泽东的提议被全会一致通过。这就是建国初期有名的六条重要规定。

有一天，毛泽东与身边的工作人员闲聊，问道："进北平以后干什么，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有没有进城享福的思想？"

"进城以后，少出门，防止出车祸。"警卫员回答。

"不对，应当多见世面，这样才能长知识。"毛泽东否定了。"进城

以后，不能看太阳上下班了，要看表按时间办事了，要买一块手表。”

还有的说：“进城以后，大概不吃小米饭了吧。我吃小米饭实在吃伤了，看到小米饭就饱了。”

毛泽东说，这不是思想问题出来了吗？有了钱买块手表是可以的。吃小米吃了那么多年，不要忘掉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的。就是革命胜利了，进了大城市，可能在粮食上有些调剂，但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在短期内也很难完全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这时，毛泽东再一次提到李自成。他说，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了。那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月，毛泽东如往常一样，到凌晨三、四点才上床睡觉。

“九点钟以前叫我起床。”临睡前，他吩咐值班卫士。

“几点啦？”毛泽东睁开眼就问。

“快十点了。”值班卫士回答。

“让你们九点以前叫我，为什么现在才叫呢？”毛泽东有点急了：当得知是周恩来的吩咐时，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毛泽东这几句诙谐的话，把几个领导人都说笑了。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带着这样的决心和信念，离开西柏坡，踏上了去北平的道路。②

二、刘代表毛秘密访苏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日，正在开滦煤矿视察的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紧急通知，要他马上回北京。

刘少奇于十一日上午回到北京，见了毛泽东，才知道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就建立国家机构、经济管理等事务，同斯大林及苏共中央交换意见，代表团的成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和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

新中国成立在即，毛泽东非常希望这个新生的共和国能得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而且新中国如何运作，确实需要向斯大林和苏联学习。早在一九四八年初，毛泽东就想出访苏联，但斯大林认为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紧要关头，毛泽东最好不要离开中国，改由斯大林派遣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中国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现在，毛泽东决定将出访苏联的重任付予刘少奇，说明毛泽东已将刘少奇视为自己的副手，亦即中共中央第二把手。

在访苏期间，刘少奇与斯大林举行多次会谈，就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此外，还访问了苏共中央、苏联政府机关，包括国家计划委员会、外交部、财政部、商业部、国家银行等，并与这些部门的负责人交谈，详细了解这些机构的组织情况和运作方法。刘少奇还访问了汽车制造厂等一批大型工厂，以及莫斯科大学、列宁博物馆、列宁图书馆、历史博物馆农业展览馆等，注意学习苏联的管理经验和工作特点。

刘少奇在访苏的一个多月期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苏两党的高层领导第一次进行这样全面而深入的会谈，建立了两党两国合作的基础。

临回国前，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设宴为刘少奇送行。在宴会期间，斯大林想起一件事问道："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宣布成立中央政府？"

刘少奇根据出国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酝酿的意见，回答道："我

们目前正集中力量解放和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可能是一月一日”。

斯大林想了想说道：“解决重大问题时固然要稳妥，要掌握时机，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我想提请你们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是极毒辣的一招，不能不防。”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意见。刘少奇回到住处后，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于是，毛泽东便将建国的时间。提前到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在此之前，由于高岗的表现不正常，好出风头，刘少奇令他于七月三十日提前回国。刘少奇与高岗因此结下了怨恨。

八月二十一日，刘少奇到达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随后，在哈尔滨、沈阳等地视察工作，对高岗领导下的东北局在城市工作及农村中执行的“左”倾政策，有了初步的了解。

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时，曾将进驻北平称为“进京赶考”

严格说来，毛泽东这次“进京考试”，是不及格的。

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七六年寿终正寝，长达五十五年。其中以一九四九年的建国为分界线，民主革命时期（一九二————一九四九年）是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年）是二十七年，两者相差无几。然而，综观毛泽东在两个革命时期的表现，便会发现，前后判若云泥。如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便成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在民主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方面，毛泽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树良多，形成了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以及路线、方针、政策，再也不是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的国际相结合。而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也背离了马列主义。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发表的著作、讲话也不少，但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能示以后人的寥寥可数，只有《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该文有不少地方观点错误）等数篇。而其他的，多是错误严重，或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局限性。而且，即使是上述那两篇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著作，却与毛泽东的整个政治构想不相符，因而未被重视，自发表后，毛泽东从未实践过。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共和中国人民，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然而，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破坏与震荡，造成了极度的贫穷与落后，以及连绵不断的痛苦与灾难。毛泽东成了“史无前例”的千古罪人。

同是一个毛泽东，为什么前后判若两人？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们需要回顾一下现代中国革命史。

近代的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长期停滞在封建主义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均十分落后。这种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迥然不同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具有它独特的、有别于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的发展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主要基于他们所处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而提出来的。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在许多方面不适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走什么道路，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去探索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理论。

在这个方面，中共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在中共成立的“一大”上提出的“党纲”规定：无产阶级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社会主义。这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一次革命论”。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以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

历届中共领导人，除了坚持这套“一次革命论”以外，中共党内还出现了“先建立资本主义，后建立社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无论是“一次革命论”还是“二次革命论”，显然都是不符合中国独特的国情的，因此，在他们指导下的第一、二次革命，都失败了。

延安时代以前的毛泽东，也是“一次革命论”者。他在；九三四年一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说：“现在工农民主专政，准备将来变到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去”，“换句话说，今日社会主义胜利的苏联，这是我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向前发展的活榜样！”

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发愤地学习马列主义，并着手总结中国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总结了陈独秀、王明等“右”、“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失败教训之后，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这一历史命题，提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主干，是贯穿及联系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条红线，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重大的杰出的成果。

在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核心，包括《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著作中，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现实目标，是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的奋斗目标，则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产物，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经过的一个特有的社会历史阶段。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种特殊的形式，所以这是革命的第一步，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如同“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④

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亦如此，“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

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⑤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既区别于照搬俄国革命的“一次革命论”，又区别于“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具有独特的创意，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关键之处，在于对待资本主义的策略。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特别是缺乏现代工业基础，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因此，中国共产党不能采取俄国革命一开始就消灭资本主义的经验，而是需要和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得到保护和发展。对此，毛泽东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

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决定了“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而使之获得发展”⑥“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虽然不是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和“最后结果”，却“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⑦

这种不可避免性，反映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之所以不没收独占资本以外的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经济的十分落后，决定了“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⑧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的问题，毛泽东有一个极为精辟的分析和回答。他鲜明地指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

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只有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才“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了欺骗民众，“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⑨

毛泽东从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的角度，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必须借重资本主义相当发展的基本战略，反映了毛泽东的清醒认识和尊重客观规律的现实精神。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从理论和重大原则的高度，再一次精辟地回答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的问题。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⑩

因此毛泽东向全党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闪跃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光芒，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的最高境

界。

与允许资本主义在革命胜利后存在和发展相关联的，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战略，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还说不上向社会主义转变。“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毛泽东还说：“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⑪后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的著名论断，并对一向所说的转变必须具备的各方面条件，作了十分精辟而深刻的概括，这就是：“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⑫这里所强调的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观念形态、精神生活的发展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够实现，而不可能在革命胜利的一夜之间就可以实现。

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说：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间，大约“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从今天看来，毛泽东这个估计明显是“左”了——作者注）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为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但却不能立即可以实行。对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向全党发出了特别的警告：“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很快地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⑬

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制定的这条道路，无疑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实际相结合的正确的表述，它集中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精神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不但指导了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民主革命战争取得了胜利，也指导了建国初期经济恢复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证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正确性，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可是，在建国后不久，毛泽东便彻底地抛弃了这条由他亲手创造，并经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正确的革命道路，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便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即包括农业集体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早地动摇和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将中国改造成单一的“公有制”，奉行平均划一的农业社会主义。为了强行贯彻这种落后的、倒退的、因而不得人心的农业社会主义，毛泽东制造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从而将新中国引上一条贫穷落后、多灾多难的道路，而毛泽东本人，也由正确路线的代表，变成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

四、“农业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

农业社会主义——对大多数读者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社会主义” 自从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产生以来，出现过形形色色的流派。据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概括，，这些流派大致有“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叫做科学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属于“空想社会主义”范畴，是毛泽东针对中国小农经济的特点而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十分准确地概括了小生产者既有进步性，又有落后性和反动性的矛盾的思想面貌。

似乎是由于历史的必然，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能够逃脱农业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范畴：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魔障，成为农业社会主义的俘虏。追述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

看到毛泽东政治思想蜕变的轨迹。

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当时老解放区土地改革中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提出这是一种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指出："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的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应当批判这种思想。"⑮

在这次讲话的二十多天之后，毛泽东在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写的一份报告中讲到晋冀鲁豫边区的一些人认为"不斗工商业，就不能肃清封建、满足群众要求"的话旁边，加了一条注："这种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⑯

由于这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在当时不仅党外，而且在中共党内也普遍地存在，于同年的七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批准，新华社以"信箱"的形式，发表了《关于农业社会主义问答》一文。什么是农业社会主义？（问答）说：

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历史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或实行家，例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是抱有这一类思想的。

俄国的民粹派，被列宁称作"旧时农民社会主义"、"小市民社会主义"、"农奴社会主义"和"反动的社会主义"。民粹派被资本主义在农村造成的两极分化吓昏了头脑。他们从抽象的道德观念出发，否定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意义，把小生产理想化，把原始的农村公社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油彩，"宁肯让农民继续停留在自己陈旧的家长制的生

活方式中，而不要在农村中给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所以，列宁认为：“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无条件是反动的”。

新华社的文章除了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出发回答了什么是“农业社会主义”之外，还剖析与批判了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并把问题引伸到如何正确估计土改后农村中将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问题。文章明确地指出：

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平均主义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带有革命与反动的两重性。从农民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财产这方面来说，这是革命的方面，正确的方面。我们仅仅在这个限度内去赞成并帮助农民们实行这种平均主义，超越出这个限度，那就是完全错误和极端有害的。这种平均主义的反动方面，就是它不独是要破坏封建的土地财产关系，而是要破坏非封建的即自由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就是要平均主义地破坏工商业及一部分中农和新式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并把这一切平分称为“共产”或“社会主义”，其结果是打击了广大工业和农业生产者的向上积极性，必然使社会生产力大大降低和后退。因此，这种思想和这种做法乃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

文章指出了土地改革以后农村出现新的阶级分化的不可避免性，以及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文章认为：

因为土地改革只是废除了封建阶级的私有财产，没有废除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并在客观上还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因此在土地改革之后，农村中的经济竞争，不可避免地会有新的发展，并使农民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新的阶级分化，而绝不能永远保持平均的小农经济。有些农民因为生产条件比较有利，又努力生产，善于经营，他们的经济就可能发展，而逐渐地富裕起来，其中有小部分就有可能进行剥削，而成为新的富农。而另外有些农民，因为生产条件比较不利，

或者不努力生产，或者不善于经营，或者遇到某些不可抗拒的打击，他们的经济就不能发展，而逐渐地穷困下来，其中有一部分就不能不受人剥削而变为新的贫农或雇农。这种竞争与新的阶级分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里，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被允许的。抱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看不见土改以后这种可能的社会变化，看不见这种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仍将存在，而以为可以在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中及土地改革后，就能够造成全体农民在经济上与生活上的平等或划一，否认或者反对这种竞争和分化，结果就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反动的空想。

社会主义不是依靠小生产可以建设起来的，而是必须依靠社会化的大生产，首先是工业的大生产来从事建设。为此，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大量地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制造大批供给农民使用的农业机器，并因此将农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转变为集体农场经济之后，才有可能。没有工业的大量发展，没有大量的成千成万的农业机器供给农民使用，并使农民有可能团结于集体农场之中，而要实行社会主义的农业，那只能是反动的幻想。

新华社的这篇经毛泽东审阅和批准的文章，与“新民主主义论”的精神是一致的，它代表了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认识和政治主张，显示了毛泽东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而反对中国农民历来的政治要求——主张平均划一的农业社会主义。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出发，以毛泽东、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一个长时期的发展，特别是大力发展现代化工业，制造大批供给农民使用的农业机器，并由此把农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转变为集体农场经济，才能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毛泽东与刘少奇一致强调与注重的，是农业集体化必须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之上这个重要的物质条件，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进一步提出“欲农业社会化，必须发展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工业”，从而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置于坚实的科学的基础

之上，并且与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划清了界线。

建国前后，在中国革命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与步骤的问题上，毛泽东与他的战友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是完全一致的。

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的报告。刘少奇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后，还不能马上直接采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他说："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毛泽东表示赞同他的观点，插话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毛泽东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还说："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很具体，很好，两个阶级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同志回中央局后，对这点可作宣传"。毛泽东还要求，"对这个问题要作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请少奇同志作准备，草拟文件，提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讨论。"⑲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刘少奇在华北财经委员会作报告曾讲道：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竞争的政策，经过经济竞争，到十年、十五年后，大势所趋，消灭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一九四九年三月，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发言时说，开始工业化，这是城市工作中最本质的问题。单有军事上、政治上的条件，没有经济上的条件，没有工业的发展，要想转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私人资本是有他的积极性的，必须充分发挥。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到那时候，私人资本和积极性已经用完了。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⑳

一九四九年七月，毛泽东向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毕业生的讲话中说，二十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形即转入社会主义。一九四九年九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之所以没有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这是“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采取这种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到了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也一定要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等进行协商并共同地加以决定。㉑会议期间一些党外人士向毛泽东询问，要多少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毛泽东回答：大概二、三十年吧！㉒

一九五〇年四月，周恩来向参加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统战会议的党员干部说，毛主席访问苏联回来，到处都碰到问，到底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要十五年左右。㉓

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共的主要成分是农民，而且长期在农村从事革命斗争。因此，在中共党内存在广泛而浓厚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点也不奇怪。

建国前后，农业社会主义在农村的表现是土改运动中的平均主义；在城市中的表现则是打击资本主义工商业，过早地实行社会主义步骤的“左”倾冒险主义。

一九四九年五月，正当刘少奇奔走于天津各工厂期间，中共中央将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邹大鹏写来的一封信，转到刘少奇的手上。邹信是向中共中央反映高岗主持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发生许多与中央精神不符的‘左’的错误。从天津返京后，五月三十一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刘少奇写道：

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是牵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最近少奇同志到天津巡视，发现我们在天津的负责同志完全不理资本家，有些干部则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贸易公司在原料及市场方面统制。不给资本家的生产以应有的照顾，

税收机关对私人生产亦未给以应有的照顾。在劳资关系上工人有过高的要求和过左的行动，未用坚决的办法去纠正。强令资本家开工，但资本家开工后的各种实际困难未帮助资本家去克服。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有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初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于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

我们在批评与反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路线的时候，又必须坚决地、严厉地反对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即过早地或过多地在国民经济中采取社会主义步骤，这是一种极危险的‘左’的倾向，我们必须严格地加以防止。

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

这封电文经毛泽东修改（在一些地方加重语气）、审批后，于当日发出。

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是站在刘少奇一边，支持对高岗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所进行的批评的。然而，仅仅在两年之后，情况就完全掉转过来了。

五、“农业社会主义”第一波：刘少奇天津之行

刘少奇从西柏坡进驻北平还不到半个月，就接到中共中央和毛泽

东的委托，要他马上前往天津，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解决天津接管后出现的问题：

天津是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五日获得解放的。共产党接管天津政权很顺利，但接管后恢复经济的工作却不那么顺利。新接收来的国营企业一时难于恢复正常生产，私营企业普遍停产关门，全市经济滑坡，工人大批失业，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左"的政策。

对于中共在接管城市的初期出现"左"的政策，主持中共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在回忆录中曾有较详细的记述：

我们党诞生在城市，但后来长时期生活、战斗在乡村，许多同志不熟悉城市工作，还有些同志难免用一种小生产者的观点看待城市。华北最初接管城市，走过一些弯路，这是重要的原因，如收复井陉、阳泉等工业区，曾经发生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现象，使工业受到了很大破坏。收复张家口的时候，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有的甚至贪污腐化，……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攻克石家庄，物管工作虽有所改进，但仍有不少士兵拿取东西，他们还鼓励城市贫民去拿。开始是换取公物，后来就抢私人财产，以致于不得不实行戒严，甚至枪决了几个人来制止乱抢现象。进城后，外地机关纷纷派人前去抢购物资，四乡农民也准备乘势涌进来。邯郸、焦作、运城等几个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城市的管理上，自觉不自觉地搬用农村的经验，混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损害了工商业的发展。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我曾把这些情况写成专题报告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在这份报告上作了一条重要批注，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㉖

接管北平、天津后，农业社会主义的"左"倾政策的危害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对此，薄一波十分焦急，他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

中央，详细列举了平、津工业生产中的问题：

除了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外，工作中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也是存在的突出问题。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一据天津统计，当时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百分之三十。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扭转。向工人、干部和资本家阐明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城市政策，澄清工人中的模糊认识，消除民族资本家存在的疑惧心理，已经刻不容缓。

天津是中国北方工商业的中心。解决天津问题，对全国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刘少奇便是肩负这一重要使命，前往天津的。

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旬的一天，刘少奇特意从香山进城，到东城区后圆恩寺中共华北局机关找到薄一波，笑着对他说："一波，我来向你报到"。

薄一波二时没反应过来，刘少奇说明原委之后，他高兴地答道："你是中央领导同志，该上哪就上哪，何必来告诉我呢！"刘少奇却认真地说，按组织原则，应该这样做。他还交待薄一波：我在天津的活动，一般情况由中共天津市委向华北局报告，有些重要问题由你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报告，中央和毛主席指示也由你向我传达。

四月十日晚，刘少奇离开香山，乘火车去天津。

列车在夜幕中抵达天津站。在车站迎接他们的是天津市的主要领导"三黄"：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克诚、天津市市长黄敬、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黄火青。主人安排刘少奇一行在海河边小刘庄附近台湾路九号的两幢小楼住下来。

从第二天上午起，刘少奇开始了一个接一个不间断的视察、开会、听汇报、作报告。

四月十一日上午，刘少奇首先来到中纺一厂。这个厂刚刚完成接收，生产还没有完全正常、工人、职员之间还有矛盾。

刘少奇要军代表请一些工人、职员来座谈，听听大家的意见。职工们很想听听这位共产党大干部的讲话，工厂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

刘少奇首先让大家提问题，反映情况。接着，他耐心地向大家解释共产党的政策，要求工人、职员、接管干部团结协作，共同把生产搞好。他热情地提出希望说；天津解放早，现在还有大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天津的工人阶级有责任搞好生产，支援大军南下，为解放全中国做贡献。

下午，刘少奇在小刘庄住处听取黄克诚和黄敬的汇报。黄敬市长在汇报中谈到：眼下一些工厂劳资关系紧张，资方财产被冻结或分掉，而我们的干部却多是站在工人一边；再加上工人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分红利等，使得工厂在资金和管理上出现问题，维持生产有困难，复工复业便成了问题。刘少奇立即表示：这不行，这是“左”的行为，是自杀政策，要抓紧纠正。

他和黄克诚、黄敬当即商量决定，军管会成立调解劳资纠纷的劳动局，资本家可以直接到军管会反映意见，并安排中共基层干部到工会去做工作。”㉘

此后，刘少奇差不多都是上午视察工厂，下午听取干部们的汇报，研究解决各项问题。

刘少奇在天津工作的一个重点，是向中共的各级干部传达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批判和纠正对待城市工商业和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

与此同时，刘少奇还到工厂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解决劳资关系。刘少奇先后到过中纺一厂、造纸厂、自行车厂、电工器材厂、汽车制配厂、电灯泡厂、永利制碱厂和新港码头。每到一处，都召集工人座谈，了解工人情绪，宣传中共的政策。

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

一、在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过程中，最容易发生模糊的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斗争对象，搞乱敌我阵线。他说，民族资产阶级还不是我们今天的斗争对象，“如果当作斗争对象，则是犯了错误，……这错误是路线错误”。他说，“资本家在生产方面占很高的地位”，保护他们，“实际上就是保护生产。“天津的工商业将近有四万家，光是搞生产的——工业就有上万家，有好几十万工人，……社会上很多的必需品，吃的、穿的、用的、鞋子、袜子、牙刷、牙粉……要他们供给，他们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没有他们还不行。”

二、他批评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出现的“左”倾情绪和行为时说，进城了，敌人看不见了，就把眼睛盯准“大肚皮”工商业家，把子弹朝他们打来，像农村分田地一样，要分工厂、汽车、洋房、机器，或向他们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或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或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的坏，不说他们的好，干部、工人不敢接触资本家，否则就是立场不稳。总之，只强调斗争的一面，不强调联合和利用，以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这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

三、私营工商业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所允许的。因为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不是工厂太多，而是太少，“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

五月五日刘少奇在天津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反“左”要比反右困难得多。他说：

不要怕说话，怕被人说投降了资本家，该说的话不说，结果是害了工人，工人失业后骂你，我们要早讲才对。“左”的东西是常常有一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原来的劲头更大才行。反右的时候，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最近

我到天津，资本家很高兴，工人有的可能不高兴，但是不要紧，我是诚心诚意为工人打算，工人将来会知道。最近东亚毛织厂的资本家宋涡卿写信给我，说要扩大生产，再开一个工厂，我也回了他一信，好象我是替资本家打算的。但是假如另开了一个新工厂，使原有一千多工人增加到二千多工人，岂不解决很多工人失业问题？所以只好和资本家搞好一点，不要怕骂投降了资本家。真正替资本家着想，投降了资本家，那是失掉了立场。如果不失立场，鼓励了资本家，而是替工人打算，那就是好的。关系拉好了，弄的立场失了，那就是右了。关系极好，发展生产，又不是失掉立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有人说和资本家拉好关系，就是失掉立场，这是错误的说法。这种人大概立场不稳，一接头就投降了资本家。共产党人不是放在箱子里不见人的，而是经风霜的，这才能考验一个人的立场。

刘少奇在天津的另一项任务，是向资本家做工作，解除他们的思想问题。于是，找资本家谈话，邀请工商界人士开座谈会，参观他们的工厂企业，便是刘少奇的日程安排之一。

对这些资本家，刘少奇也向他们认真解释共产党政府的政策，说：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

有个资本家说："现在我们只能在国营工业的空子里，吃点残羹余汤"。刘少奇回答说："其实不然。今天。中国的工业还不很发展，国营企业还只是些点点滴滴，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

有的资本家反映很不愿意听"资本家"这个称号，很怕听"剥削"这个词，担心"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刘少奇笑笑说："如果你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出另外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仍旧叫你们'资本家'"。"现在，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

怎么办呢？上次我对宋裴卿先生说：你现在才只办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　国家把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和平地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起就搞，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　"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

东亚公司经理宋裴卿在刘少奇同他谈话之后，很快提出了增设新厂、扩大生产的计划，还写信向刘少奇作了汇报。为表示鼓励，刘少奇给他回了封信："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㉙

刘少奇在天津的以批判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为主旨的活动和讲话，起到了良好的积极的作用。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刘少奇的讲话，并批准将他的讲话向各地传达。中共中央还发出专门指示，北平、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纷纷按照刘少奇讲话的精神，制定出城市管理的条例和暂行办法。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专题报导说：

刘少奇同志在津召集资本家谈话，透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发展生产的政策以后，使资本家更明确地认识劳资关系，消除或减少了疑虑，提高了经营情绪。同时，职工会也对工人进行了较深入的教育，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使他们认识到目前只有在劳资两利的方针下，积极发展生产，才能更好地改善生活。

由于劳资双方明确了劳资两利的方针，并经人民政府和职工会合理地解决了劳资间的一些具体问题，劳资纠纷显著减少，如在旧历五月节，即很少发生劳资纠纷事件。这对恢复与发展生产起了推进作用。㉚

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中，也有个别地方用词不当，比如“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当薄一波将这些不妥当的话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说这些话不一定这么讲。朱德在讲述这个问题时，就表达得比较确切恰当：“为了工人阶级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还必须在现阶级自觉地忍受资本家之一定程度以内的剥削。”

毛泽东在当时虽然没有指责刘少奇的失言，但过后也没有放过他。不久后，毛、刘之间发生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分歧与矛盾，从而引发了著名的“高饶事件”。而“剥削有功”这些失言，便成为斗争的内容之一。刘少奇为此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在“文化大革命”中，“剥削有功”更成为刘少奇向资产阶级投降的证据之一。

六、“农业社会主义”第二波：毛刘关于“富农党员”的争论

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制度，是对生产力的一次巨大的解放。获得土地的农民，迸发出空前的劳动生产积极性，中国的农村，出现了一片生气勃勃的崭新景象。

翻身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集中地表现在努力生产、发家致富的强烈愿望上。对于长期遭受封建压迫和剥削，处于极端贫困的个体农民来说，这是正常的，合理的，也正是以小生产为主的中国农业生产力获得发展的最基本和最巨大的动力。同时，这种发展，在农村必然带来了竞争和贫富差别、两极分化。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的，也是中国农业向社会化发展的不可避免的阶段。

面对着这种贫富差别两极分化的现象，如何正确地看待和处理；

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对此，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曾经有所预计，并通过新华社发表文章，向党内外作过相应的政策上的解释和说明。

建国以后，在较早完成土地改革的农村中出现的经济竞争和贫富分化现象，证实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预计。

面对着农村中出现的这种新形势，中共党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考虑是，农村工作的任务应该是积极帮助农民改良技术，解决供销困难，加强技术经济上的领导，以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引导农民继续前进。另一部分人对贫富分化，中农普遍愿意“单干”、发家致富表示极大的忧虑，担心农村中已有的互助组织会因此解体，担心富裕起来的农民会走向资本主义。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农村工作部汇编的一九五一年的一份农村调查中说：“新富农出现后，发展生产两条道路的竞争，在农民思想上，特别是有了三四匹马的富裕农民中，走哪条道路，就更加踌躇徘徊(因为他们有了单干条件)，劳动互助搞不好，他就趋向单干的路，……所以单干户逐年增多，参加换工互助的户逐年减少，这是严重的自流现象。”在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一九五二年九月《关于农村资本主义发展情况和对策给毛主席、中央的报告》中说：“农村阶级分化之所以如此迅速明显，从党的领导作用方面来说，与互助合作开展不力，党在农村的政治工作不强，有极大关系；但是，其实际社会原因：在于个体农民自发发展着资本主义。具体表现在：农村雇佣劳动，债务剥削，土地买卖，租佃和典当，均有了相当的发展；要求我们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给以必要的限制。不能放任自流，任其泛滥。”中共河北省邯郸地委更是焦虑地指出：“农村资本主义的严重滋长，已经是当前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㉛

中共党内对农村新形势产生的这种分歧，实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的分歧与对立。正如毛泽东在《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中所说，土改后农村中出现的经济竞争和贫富分化，是不可避免的，是允许的，不可怕的，而且是有益的；相反地，要求土改后农

民在经济生活中的平等或划一，否认或反对这种竞争和分化，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反动的空想。上述的中共党内一部分人在建国后产生的严重忧虑，恰恰正是毛泽东所批判的反动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中共的党员干部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浓厚，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薄弱，建国后党内出现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分歧，这本是可以理解的。而这种分歧反映到中共中央核心领导班子内部，引起毛、刘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却是人们始料所不及。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村问题上的第一次分歧，发生在一九五〇年关于东北富农党员的问题上。东北地区是全国最早完成土改的地区之一。土改后农村出现的各种情况，在这里都有着充分的反映。因此，以高岗为首的中共东北局，也较早地存在着种种的忧虑，并考虑解决的办法。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至七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召开了大型的座谈会，专题讨论农村工作问题，十二月十日，中共东北局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作了总结发言，着重对土改后农村的新情况和今后发展方向问题，作了阐述。他说："我们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使绝大多数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而要做到这点则需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面发展'。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仍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基于这一认识，他虽然批评了"各种各样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但着重批评了允许单干，允许雇工，允许借贷，允许买卖土地，批评"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任其自流发展的资本主义的路线"；他还提出原则上不允许党员雇工剥削、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等意见。高岗的思想倾向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限制单干，以国家扶助的形式鼓励和发展互助合作，以期遏制农民中"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高岗的总结发言表明，他虽然没有直接否定现行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但实质上是主张土改后立即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东北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精神和高岗的总结发言在东北地区贯彻执行后，很快使东北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和形

式主义倾向。据《东北日报》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九日报道，在辽西、辽东两省新解放区和吉林、松江两省的一些老解放区，有关部门采取了各种方法排斥单干农民。如，单干户出门不给路条，开荒时不准先占场子，及不给贷款、贷粮、贷农具，供销社不卖给任何东西，使单干农民不仅生产上寸步难行，而且人权上受到歧视。

一九五〇年一月，东北局将高岗总结发言的主要内容报告了中共中央。高岗的主张和东北局的作法在中共党内引起了不同意见。

首先表示不同看法的是刘少奇，一九四九年秋，他在访苏归来途经东北哈尔滨时，曾调查了解了东北土改后的新情况。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三日，他签发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对东北局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复信。信中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对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同一天晚上，刘少奇还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等作了谈话，对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

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再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对高岗的主张持不同意见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张闻天。一九五〇年五月间，他在给毛泽东的三封信中，分别就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第一，关于农村阶级分化问题。他认为，“这是农村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要求向上发展的不同表现”，对此，“既不要粗心大意，熟视无睹，也不要过分夸大它的危险而表现恐慌，或采取不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加以限制”。他主张，凡有利于土地的合理使用工矿事业和农村副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分工的租佃，买卖及移居，我们不应反对；

第二，关于互助合作问题。他认为，要反对强迫命令和急性病，反对那种以为要农村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把所有的农民都依照我们的愿望组织在生产互助组内的“左”的观点。

第三，关于富农党员问题。他认为，要教育农村党员坚决为农村合作化的方向奋斗，凡农民党员有向富农转化趋势时，给以事前的警告，使其转变；如不可能，允许自由退党或开除其党籍。㉜

除党员原则上不允许雇工剥削这一点，张闻天的意见与高岗接近外，整个来说他与刘少奇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他们的意见，基本精神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也是符合毛泽东《关于农业社会主义问答》中的基本精神的。

对于刘少奇的这次谈话，周恩来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六日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说：“少奇同志的谈话，可能有个别话走了火，但本质上还是对的”。“走了火” 的话，是指“富农党员”这种提法。共产党员不能有剥削行为，这是中共党章所规限的，“本质上对”则是指刘少奇的谈话符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然而，毛泽东却明显地反对刘少奇这一谈话，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说：“据高岗说，他收到少奇同志谈话记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

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㉝

后来，在毛泽东的默许支持下，高岗将这个谈话当作反对和打击刘少奇的一个武器。

七、“农业社会主义”第三波：毛刘关于山西农业合作化的争论

建国后，中共党内除了在农村的贫富分化、农民“单干”，今后是走社会主义的合作化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发家致富道路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外，还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是否可以仅通过组织合作社就能实现社会主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农业，是否仅仅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即农业合作化）就可以实现，还是必须依靠发展生产力（即农业的机械化），才能实现。这又是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根本原则问题。

引起这一争论的，是中共山西省委。

山西是老解放区之一。土地改革完成得较早，又有组织起来渡过灾荒，发展生产的经历；建国后，与东北，华北地区一样，山西农村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另一方面农村中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富裕起来的中农热心于单干，原来的互助合作组织濒临涣散的状态。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写了一份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说：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的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们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山西省委提出：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为此，应该把“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这两个进步的新因素加以扶植，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

——农业生产合作社。

中共华北局领导人薄一波、刘澜涛等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为慎重起见，他们多次请示刘少奇。刘少奇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他指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村两极分化不可怕，农村还要继续向两极分化，分化到一定程度要组织贫雇农向富农斗争，待有了机器再实行集体化。在现有的基础上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空想社会主义。目前应当巩固和确保私有，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的意见是错误的。㉞

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中共华北局于四月下旬召开了五省互助合作会议。会谈上发生激烈的争论。华北局的干部认为土地改革后应当巩固私有基础，逐步动摇私有基础是错误的；没有机械化就不可能实行集体化、合作化。而山西省代表则坚持认为，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正确的，应当防止农村两极分化，克服农民自发势力，积极试办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长治地委书记在发言中提出，在老区提高互助组的问题，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带领农民前进的问题。农村中发展生产实际上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农民曾经千百次走过而失败了的富农道路，一条是共产党领导的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正确道路。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日益明显，现在的问题是对农民自发的富农路线持何态度的问题，是任其自由发展呢？还是领导组织起来去战胜它呢？在共产党人来说，领导农民生产不仅是为了发展生产而发展生产，而且在发展生产中还有其远大的政治目的，要在发展生产中团结与改造小生产者，逐步地把农民带向社会主义。㉟

会议未能取得统一的意见。中共华北局于是在五月四日正式批复山西省委四月十七日的报告。明确指出："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任务只动摇封建私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官僚资本主义私有；一般地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提

高与巩固互助组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以满足农民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要求，而不是逐渐动摇私有的问题。这一点必须从原则上彻底搞清楚。”批复进一步指示：“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省只能试办几个作为研究，展览和教育农民之用。不能强迫试办，更不宜推广。”㊱

刘少奇在接到华北局的批复并听取了华北局负责人的汇报以后，在多个场合严肃地批评了山西省委的意见。

五月七日，他在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说：“现在有人就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十多年”，“有的同志现在就想从实际上来提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山西省委在农村里边提出要组织农业合作社（苏联叫共耕社）；这种合作社也是初步的，十家、八家、三十家、二十家的农民组织起来，土地、牲畜、农具共同使用。当然这种合作社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可是单用这一种十家八家组织的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我们中国党内有很大的一部分同志存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纠正，因为仅仅依靠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帮助，有了国家的工业化，才能供给农民大量的机器，然后实行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才有可能。”“以为目前组织合作社就可以改造中国的农业，使个体的小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的农业去，那是幻想。”

根据刘少奇的上述思想，薄一波在六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一文，将对山西省委的批评公开化。

七月三日，刘少奇对山西省委的报告作了批语：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

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当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㊲

七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南海给马列学院学员讲课时，介绍了他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理解。并再次指出："对农民自发力量表示害怕"，"用'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趋势'，这完全是空想。""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走上农业集体化。这是完全的空想。"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目前的互助组或供销社都不能逐步提高到集体农场。集体农场是另外一回事，要另外来组织，而不能'由互助组发展到'，也不能由供销社发展到。"

七月二十五日，华北局向中央作了《关于华北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陈述了四月会议及以后的一些情况、争论和解决的问题，刘少奇在报告上作了多处修改，再次强调了他对山西省委意见的批评和对农业互助合作问题的看法。

刘少奇、中共华北局与中共山西省委之间的争论，很快就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当即找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不能支持他们，而支持山西省委。毛泽东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这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和政协《共同纲领》关于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的决定。㊳

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薄一波《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一文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薄文认为：个体农民经过互助合作到集体化的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毛泽东批评“这是违反党的决议的。”㊴无疑的，这也就是对刘少奇山西批语的批评。

就在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分歧的重要时候，高岗于十月十四日向毛泽东送上了《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报告说：东北农村，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经过三年多发展生产的运动，农村经济获得了普遍的上升。“东北农村经济普遍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经过土地改革之后，党就将贯彻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并在组织农民生产与交换方面积极推进了合作互助与供销合作政策，以便有步骤地改造农业经济，使之由个体逐步向着集体发展。”报告列举合作互助组的进步意义，在对合作互助组的指导方针上，报告明确表示：“继续坚持贯彻毛主席屡次指示的方针，即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到较高级的形式。”

毛泽东看了高岗的报告以后，于十月十七日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嘱杨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毛泽东还同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充分肯定高岗的报告。批语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

高岗的报告具有浓厚的机会主义的味道：对毛泽东投其所好，对刘少奇则落井下石。高岗的这一策略无疑是颇为成功。于是，在政治斗争的记分牌上，高岗又得了一分，而刘少奇则又失去了一分。

毛泽东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中国可以在当时的经济基础之上，

而不是在实现国家工业化之后，实行农业合作化；现在，而不是到遥远的将来，就可以动摇私有制的基础，限制和否定资本主义；现在，而不是十年十五年后才开始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

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战略思想上的重大改变，是由科学社会主义向农业社会主义的蜕变。

为了反击刘少奇的观点，实行自己的新主张，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起草一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委派他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来主持这件事。

陈伯达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对《共同纲领》关于“凡是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所有权”的规定，一边保护，一边也可以动摇。现在保护它，就是为了逐步动摇它。毛泽东质问：“为什么不能动摇私有？保护之，就不能动摇之？”对于华北局批评山西省委妄想通过互助合作，用零敲碎打的办法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提出质问：“为什么不能直接过渡，还要经过什么？”㊷

尽管有毛泽东的指示作为“尚方宝剑”，但会议上还是发生了热烈的争论。在谈及土改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时，陈伯达一再强调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是主要的，第一位的，但著名作家赵树理却以自己家乡亲友、邻居为例说明土改后家民最热心的是单干发家，而不愿互助劳动和合作经营，认为现在的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

九月三十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共十三条，主要的精神是要求在土改后的广大农村立即采取组织起来，通过互助合作的形式，发展农业生产，向社会主义过渡，制止农民向资本主义发展。从文中提出互助合作“也不一定都是整齐划一地循序而进”，及认为在有条件的地方立即就可以试办“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急切心情。事实上，《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农业开始由私有的个体

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又批发中共河北省委于十一月十三日给华北局关于农业生产问题的综合报告，该报告提出今年河北省互助组已由六十万个发展到一百万个，并有二十二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在批语中说："河北省委这个报告很好，请你们加以研究，吸收其中有益的经验在各省推广实行。"⑫

十二月十五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毛泽东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批发全国。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通知中说："请都照此（草案）在党内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⑬

毛泽东如此频繁地发出农业合作化方面的指示，这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对事情的重视，以及急不可待的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八、毛泽东由科学社会主义蜕变为农业社会主义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上的争论，其实质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的斗争。

建国前，毛泽东与刘少奇都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反对农业社会主义的，到了五十年代发生争论时，刘少奇的观点没有改变，他仍然将山西省委依靠否定私有制基础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化，而不是依靠先进的生产力，来"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的意见，认为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刘少奇仍然坚持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革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之上。

刘少奇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坚持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关于农业社会主义问答》的思想原则，坚持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

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能照搬理论教条和外国经验这个基本原则，因此刘少奇是站在正确路线方面。

立场与观点发生变化的是毛泽东。

在五十年代初，毛泽东的思想观点，发生了以下的蜕变：

一、从小生产者的世界观出发，过分地害怕农民的发家致富和两极分化。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表现，就如列宁所批判的俄国的民粹派：他们被资本主义在农村造成的两极分化吓昏了头脑，他们从抽象的道德观念出发，否定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意义。正是出于这种小生产者的观念，毛泽东对中国农村中的贫富分化忧心忡忡，他说："在这几年中间，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毛泽东还说："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

毛泽东否定农民的发家致富与两极分化，不遗余力地批判农民的"自发势力"，急于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化来"动摇"、"削弱"乃至"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急急忙忙地用"社会主义"去占领农村的阵地，以"共同富裕"为号召，将中国改造成"平均划一、人人平等"的农业社会主义。正如列宁所说："宁愿让农民继续停留在自己陈旧的家长制的生活方式中，而不要在农村中给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毛泽东的作法，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扼杀先进的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实行，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

的。”

二、脱离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空谈社会主义。

农业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最大的、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农业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小生产经济基础之上，因而是落后的、贫穷的、空想的，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反映。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的，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结果。

毛泽东将土改后中国农村出现的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的萌芽掐断以后，以农业集体化取而代之。毛泽东认为，农业集体化，私有制变为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其实，所有制可以在一夜之间由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但生产力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产生飞跃的发展。农业集体化后，以人力、畜力为主的手工劳动的状况并没有改变，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并没有得到提高，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农经济。而社会主义是不能建立在这种小生产的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否定刘少奇的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为条件的观点，将社会主义以现代化大工业与公有制相结合为标准，改为以单一的公有制为唯一标准，在大工业极不发达，小生产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便急急忙忙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正是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去空谈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关于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根本原则，从而陷入了唯心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泥坑。没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毛泽东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只能是落后的贫穷的农业社会主义。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定义相去十万八千里。

三，将农业社会主义当作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是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以“均贫富、等贵贱”为特色的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和社会生活中有着极为深厚、广泛与长久的影响。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领袖和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农民的平均主义的要求。脱胎于农民，又处

于小农经济包围之中的中共及毛泽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当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传到中国时，往往出现从平均主义角度去加以理解。毛泽东作为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不但没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将这些农业社会主义的要求引导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反而与这种小生产者的诉求产生思想共鸣，同流合污。在毛泽东看来，私有制＝贫富分化＝资本主义＝公有制＝平均分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程度越高，产品分配就越平均，因而也就越是社会主义。至于生产力是否高度发展，人民是贫穷还是富裕，社会是否文明进步、这些都是不要紧的；最重要的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在整个社会实现平均划一便是社会主义了。毛泽东正是由科学社会主义蜕变到“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农业社会主义。

九、毛泽东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为什么会从科学社会主义蜕化到农业社会主义？

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在理论上犯了错误”。这种说法在北京政界，学术界相当流行。然而这种说法并不能回答毛泽东为什么要抛弃在延安创造的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什么会在理论上犯错误。而且，“理论错误”只是问题的“流”，而并非是根源之所在。

另一种说法，是说毛泽东“缺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这种说法同样地并不是问题的根源。世界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东欧的波兰、匈牙利，亚洲的北朝鲜和蒙古等等，同中国一样都是第二次大战后建立起来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同样地经验不足。但是，他们却没有像毛泽东与中共那样，犯下五八年“大跃进”，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路线性的大错误。即使中共内部，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来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同样地不足，但所犯错误的程度，却有大异。以刘少奇为首的其他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上，均

与毛泽东产生了多次的分歧与矛盾，从而引发了中共自建国以后持续不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此本书稍后将有详述。因此，“经验不足”只是次因和外因，而不是内因和主因。

还有一种说法，说建国以后。在胜利面前，毛泽东骄傲了，不谨慎了，听不得不同的意见，脱离实际，脱离了群众，所以犯了错误。这种说法过于表面化和简单化，缺乏理论上的说服力量，因此它不能令人满意地解答上述的问题。

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为什么会执行农业社会主义，成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呢?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毛泽东的世界观是农业社会主义。

中国是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自然也是农业社会主义历史悠久的王国。在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下，中国农村的小生产者早就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从而迸发出平均分配社会财富的强烈愿望。“均贫富”、“等贵贱”，成了历代农民起义的号召和旗帜。

早在东汉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张鲁就创立“五斗米教”，结成原始公社式的组织，“设义米”，“置义舍”，吃饭不要钱；唐末的王仙芝，揭竿而起时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北宋的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大声疾呼：“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南宋的钟相、杨么起义，打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旗号；

明末的李自成，用“均田免粮”作为争取民众的号召；

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以平均主义和平等观念作为自己的纲领。一八五三年，在太平天国颁布的著名的《天朝田亩制度》里，洪秀全向人们详尽地描绘了一幅农业社会主义的模式：根据“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公有原则，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人民二十五家为一“两”，组成生产、分配、军事、宗教、政治、教育等合一的农村公社。在公社里，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一律归公，人民生活所需靠“圣库”平均供给。洪秀全等人认为，经过“天下皆一式”的平均主义，就能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理想社会。

到了近代，以平均主义和平等观念为核心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大同世界”，更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仁人志士的思想和口号。康有为作《大同书》，提出一个“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认为“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国父”孙中山先生亦认为：“民主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也”。孙中山先生更指出：“我们国民党的民主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主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康有为与孙中山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代表了“五四”运动前中国民主思想的最高境界，反映了中国农民反抗封建压迫、平均分配社会财富的政治要求。这种小生产者的政治理想，充斥于中国的历史、社会，成为中国特有的精神文化及一切反封建的民主斗士和革命家的思想营养。毛泽东也并不能脱离这种历史的环境。

毛泽东是个农民的儿子，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农村，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自幼就与母亲的乳汁一起，铸成了他的肉体与灵魂。

毛泽东从四岁至十七岁在家乡韶山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所读的书从《三字经》开始，至四书五经，包括《论语》、《孟子》、《诗经》、《中庸》、《大学》等。稍后又读《礼记》、《左传》、《公羊传》等，这些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孔孟儒学的经典著作。

毛泽东在课堂上接受四书五经教育的同时，还喜欢私下里偷看一些中国封建时代的小说，如《岳飞传》、《水浒传》、《说唐》、《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从这些古典小说里，毛泽东既吸取了农民起义造反的精神，同时也接受了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的熏陶。毛泽东说：我不喜欢读经，我爱读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造反的故事。“我认为，我在易受外界影响的年纪读的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甚大”。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这番话，意思是要突出自己从小就受到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影响，造就了革命造反的精神。然

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所要求的平均主义的思想，通过《水浒传》里宋江的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生动形象，已经在毛泽东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毛泽东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而且对中国古典的文史知识，具有一种天生的偏好，因而，对封建的小农经济的思想，毛泽东吸收、接受的特别多，特别快，其影响也就特别严重和深刻。

毛泽东自幼生长在韶山冲这个穷山僻乡，耳闻目睹的，多是农民贫穷悲惨的命运，与地主劣绅的巧取豪夺。对地主压迫剥削农民，以及农民缺衣少食，买儿卖女的不平等现象，毛泽东深恶痛绝。

一九〇九年夏，长江发大水，洞庭湖周围遭了重灾，长沙城内的奸商囤积粮食，贫民饱受煎熬。第二年春天，发生了一桩震动全国的惨剧：长沙南门外有一个叫黄贵荪的穷苦人，以挑水为生。卖了几天水，才积到八十文铜钱，叫妻子去买一升米，想让一家大小喝顿稀粥。妻子到了米店，老板发现铜钱中有几个是不通用的，拒绝量米。那女人空手回去，向邻居借了几文钱，凑足八十文，再去米店，那知米价这时已涨到八十五文，少一文不行，买半升又不肯。黄家女人苦苦求情，米店老板不耐烦，把米价牌子翻转过来，变成“米已售完”，并叫伙计关板门。这时候一个流氓乘机抢去黄家女人的铜钱，跑去没影。黄家妻子呼天不应，喊地不灵，就带着满腔怨愤，跳了湘江。黄贵荪听到噩耗，心如刀割，抱起两个孩子，也跟着跳进了湘江。

黄家悲剧激起了几十万民众的义愤，他们举行暴动，这就是闻名全国的“长沙抢米风潮”。暴动后来受到官府的镇压，无数饥民被杀，一颗颗头颅被高挂在官府门口的旗杆上。难民们逃出了长沙，有的跑到韶山。毛泽东便是从难民的口中了解暴动的详情。毛泽东说：“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对中国农民贫困、痛苦生活的深切了解和强烈的同情，是毛泽东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世界观形成的温床。

稍后，毛泽东“读资产阶级的书，读七年，学资本主义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信康德‘二元论’”。这时的毛泽东具有强烈的

反封建思想，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如饥似渴地吸收反映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和平等观念的政治思想营养。毛泽东说："在长沙湖南一师读书时，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憧憬和热情"。

这时是一九一八年，毛泽东二十五岁，世界观与人生观都基本形成了。

改造中国，改造社会，是当时的普遍的政治要求，问题在于以什么目标，什么模式去改造。从袁世凯到康有为、梁启超，从孙中山到胡适，从李大钊、陈独秀到毛泽东，他们都有着一套各自不同的理想社会的模式与蓝图，他们正是按照自己的这种模式、蓝图，来改造中国的。而这些理想社会的模式，正是他们的世界观的集中的、真实的反映。毛泽东在这时候也建立了自己的以公有制、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理想社会的模式，这是他自幼便开始萌芽成长，到了一九一八年二十五岁以后，这个理想社会的模式已经成熟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一九一九年冬毛泽东撰写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便是明显的标志。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期间，就曾梦想过一种"新社会生活"。一九一八年夏，刚从一师毕业，毛泽东立即开始"实验自己的新生活"、他与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周定藩等人，在岳麓山下组织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过着一种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共产"生活。"新生活"没有维持多久便夭折了。一九一九年春夏，毛泽东从北京回到湖南；仍然怀念着"新生活"，一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并筹划"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的学校入手"。同年冬，毛泽东将萦绕于心中的梦想，写成《学生之工作》一文，即是"新村"计划中的一章。

毛泽东设计的"新村"，在经济分配上是平均主义，在政治上则是独立平等。毛泽东说："故劳动者欲求完全之平均分配，非在社会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子弟欲求完全之人格独立，非在家庭制度改革

之后，不能得到”。“新村” 里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新村”设有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银行、公共消费社。⑭这种大同式的、以公有制和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新社会，就是毛泽东心中的未来的理想社会。

一九一〇年，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期间，还怀着很大的兴趣参观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并立即写信给陶毅介绍了该团的情况和自己的感想。毛泽东还给周世钊写信，提出想在长沙“创造一种新生活”，并构思了具体的实行方案：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至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法和分配方式，他曾设想一是教课，二是投稿，三是编书，四是劳动。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毛泽东还与陈独秀、王光祈、彭璜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工读互助团”。⑮

毛泽东所孜孜追求的这种“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的政治理想，与历史上的太平天国以及近代的康有为等人的主张如出一辙，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小生产者们梦想的天堂——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信时，正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向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就在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毛泽东却在孜孜追求被列宁批判为“无条件是反动”的农业社会主义，这就正好说明了农业社会主义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强烈与根深蒂固，同时也说明了毛泽东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地肤浅和无力，毛泽东没有能够用马克思主义

去改造和克服自己的农业社会主义世界观——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

后来，所有的这些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等等，都被毛泽东抛弃了。然而，那个农业社会主义却牢牢地根植在毛泽东的心中，不但没有被抛弃，没有被淡忘，反而随着时间的过去，像醇酒似的，变得更加浓烈了。直到近半个世纪后的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又将这个农业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模式提出来进行广泛的实验。这种情形就像大浪淘沙一样。其他的思潮、学说、主义，都被淘汰掉了，只有农业社金主义被毛泽东保留了下来。农业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金子”。

“新民主主义理沦”，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项创造，是在政治理论上的一项研究成果。它不是，也不可能是毛泽东整个世界观的概括和集中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毛泽东并没有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模式，进行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描述。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的毛泽东，今次为何“疏忽”了呢？无它，在毛泽东的心中，他在一九一九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仍然是存在的，有效的，毛泽东认为那种理想社会的模式是正确的，就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因此毛泽东没有丢弃它，也没有改变它——“新村”（也就是农业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有神圣的地位。一方面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坚持小生产者的农业社会主义，这正是毛泽东世界观的双重性、矛盾性与复杂性。

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代表了中国农民反抗封建主义统治，主张消灭压迫和剥削的政治理想，在以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主义“三座大山”为目标的民主革命时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新民主主义论”的第一步革命目标是一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因此，毛泽东成为民主革命时期正确路线的代表，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舞台上，导演出威武雄壮的史剧。

民主革命时期，戎马倥偬，物质条件极其困难，中共及其军队内部实行平均分配的战时共产主义（供给制），官兵一致，上下一致。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与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完全吻合的，

客观的世界与毛泽东的主观世界并没有发生矛盾冲突，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没有受到挑战和考验。相反地，战时的供给制与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产生强烈的共鸣，给毛泽东予以深刻的印象。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中，毛泽东多次提起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不但引起美好的回忆，还给了他许多政治灵感。毛泽东说：“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

建国后，通过什么道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用什么样的标准（即世界观）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信仰到什么程度，在毛泽东的世界观中，究竟是农业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起主导作用，很快地，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便对毛泽东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毛泽东首先遇到的最根本、最重大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允许资本主义在建国后的存在与发展，本是“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核心内容。然而，资本主义是小生产的天生的敌人，当资本主义在土改后的农村中发展，小生产受到分化和淘汰的威胁。这时，毛泽东便退缩了：资本主义遭到毛泽东农业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强烈抗拒，保护小生产成为毛泽东的首要选择，农业社会主义战胜了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政治思想随之发生蜕变。

自从与刘少奇发生农业合作化的争论后，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不断膨胀。

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⑯毛泽东不再将资产阶级当作朋友，而是列为主要的敌人。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他说，我们现在就要用十年到十五

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十五年以后才开始过渡。⑰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建设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向社会主义过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开始。⑱

至此，毛泽东完全抛弃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完全取消了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以社会主义革命取而代之。毛泽东倒退到陈独秀、王明的"一次革命论"。

此后，毛泽东在资本主义问题上泥足深陷，不可自拔。综观毛泽东建国后的治国方针，其根本的总的出发点，是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视为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最主要和最危险的敌人，千方百计地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和复辟。为此，毛泽东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到反右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反右倾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这些连续不断的运动，既是实现农业社会主义，又是反对资本主义的过程，两者已合而为一。

一九五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本主义和私有制，实现了整个社会单一的公有制。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实行"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搞"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等的供给制，将整个广大的农村改造成平均划一的农业社会主义。"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惨败后，毛泽东并不甘心，又重提阶级斗争，批判"单干风"等，以维护自己的农业社会主义路线。到六十年代中期，环境稍微好转后，毛泽东又提出"五、七"指示，企图将全国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消灭分工和商品经济，分配平均、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社会。这是农业社会主义理想王国改头换面的再现。为了再次实现这一理想，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刘

少奇，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然而，“文化大革命”也失败了。在黄昏岁月中，毛泽东仍念念不忘他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理想王国。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接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观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在这里，毛泽东仍然坚持他的“平均划一”的农业社会主义观念，为不能消灭“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与“旧社会没有多少区别”的不平均现象而深感遗憾。一直到去见马克思，毛泽东都没有改变这一观念。

事实证明，农业社会主义作为毛泽东世界观的核心，一直顽固地存在着。毛泽东对它无比向往，执着而又眷恋。它像一条黑线，贯穿着毛泽东的一生，从韶山到长沙，从延安到北京。怀着它，毛泽东渡过了漫长的一生，也为了使它在中国大地上的实现而奋斗了一生：从长沙时期岳麓山下的“工读同志会”及“新村”的计划，到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运动，到六、七十年代的“五·七指示”及“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不但没有放弃农业社会主义的理想。而且还为其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当作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目标，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和八亿人口当中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实验。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相去何其遥远。

十、建国后毛刘思想路线比较

建国后，.刘少奇与毛泽东在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分歧。有比较才有鉴别。从以下的比较中人们不难发现是非功过的所在。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

新民主义理论虽然是毛泽东创立的，但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的。却是刘少奇。在这方面，刘少奇做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九四八年九月，刘少奇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后来几年的

多次提纲和讲话中，勾画了这样一幅蓝图："新中国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这个阶段包括三年五年准备，十年十五年或几十年建设；在这个阶段中，国营经济、合作社要有大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允许大发展；当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工业化实现），就可以一举实行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国有化，这可望和平地实现，然后分地区实行农业的集体化。"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九五一年刘少奇还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对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精彩的表述。

然而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对刘少奇的这一口号提出严厉批判，并完全否定和放弃了这一适合中国实际的道路，其结果就必然是照搬马列主义理论和苏联模式，陷入教条主义的泥坑，从而将新中国推向一个错误的发展方向。

经过四十年的实践后，现在，北京的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刘少奇的口号，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精华"；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理论"，正是"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在经过四十年实践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正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毛泽东对它的批评，是一项重大的错误。

二、关于建国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建国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直到一九七六年逝世。毛泽东一直坚持这一理论，并且不断突出、强化。其实，第一个提出这一论点的是刘少奇。一九四八年九月，刘少奇在《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一文中便提出建国后资本主义经济与国家经济及合作经济的"竞争"，将成为"基本的和主要的矛盾"，并在稍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毛泽东讲了这个问题。然而刘少奇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在莫斯科写给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批评了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后来刘少奇不得不附合毛泽东的观点，但在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鲜明地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

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从而否定了毛泽东的论述。

后来，毛泽东推翻了“八大”路线，并批评刘少奇的提法“马列没有讲过”。然而刘少奇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一九五九年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再次重申了“主要的是生产与需要的矛盾”。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观点是极“左”的，是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照抄马列主义和苏联公式的。而刘少奇的提法才是正确的、科学的。八十年代中共正是肯定和继承了刘少奇的论点，而否定了毛泽东的观点，才带来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三、关于建国后的中心任务问题。

刘少奇历来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共执政后的中心任务，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建国前刘少奇强调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建国后，刘少奇进一步明确提出：“现在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

在这里，刘少奇明确地提出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强调建国后共产党的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他在《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中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做两件最基本的事情，第一件是推翻三大敌人的反动统治，解放生产力．第二件是发展生产力．“而且要永远继续下去，因为生产是更基本的，永远需要的。如果我们在做好第一件事情之后，不能接着把第二件事情做好，那我们的革命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说已经胜利了，相反，我们还要遭受可耻的失败”。

然而，在建国后，毛泽东一直将生产资料所有制由私有变革为公有，以及维护这个公有制，即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中心任务，先后提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命题，“阶级斗争”成为压倒一切的主要内容。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上述观点便被批判为修

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

四、关于资本主义问题。

一九四八年秋，随着民主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刘少奇受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委托，对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国内形势、党的主要任务主作重点以及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和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研究。先后写了《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等文章。“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便是刘少奇有关思想中最光彩夺目和最富创造性的一点。

刘少奇根据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中国的资本主义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积极的一面，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应该让私人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重点是联合而不是斗争，注意发挥它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的进步作用，并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的一整套方式和途径。在农村，保护富农经济则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一项长期政策，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

刘少奇指出利用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借助民族资本，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从一九四九年的“天津讲话”、建国前后有关经济建设的论著、一九五六至五七年有关允许资本家私人开设工厂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的论述以及向资本主义学习的讲话，到一九五九年有关利用资本主义旧形式发展商品经济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学习资本主义组织社会化大生产、试办托拉斯的意见等，可以看到建国后刘少奇一直坚持这一命题。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路线是与刘少奇相反的。建国后不久，毛泽东便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在这里毛泽东断然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发展新中国经济中的积极作用，而将其视为主要敌人，一九五三年更发起社会

主义改造，要让“资本主义绝种”。此后毛泽东一直将资本主义视为最主要和最危险的敌人，极力对其“进行全面专政”，千方百计防止其“复辟”。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将刘少奇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有关利用资本主义的言论，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证据，“天津讲话”更被诬为“向资本家屈膝投降”、“为资本主义奔走呼号”。这一切成为打倒刘少奇的主要罪状之一。

经过了四十年的曲折发展之后，今天北京全面肯定和高度评价刘少奇的利用资本主义思想，指出它是“宝贵的理论财富”，“闪跃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生命力”，“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无可非难的”，“不仅在当时，而且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是适用的”，也是“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的”。

刘少奇上“天堂”、毛泽东就必然下“地狱”。

五、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分针。

刘少奇在这方面的思想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刘少奇以发展生产力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便采用，如利用资本主义；而毛泽东是以“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心，例如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敌人，从而断绝了利用私人资本发展经济的途径；

（二）、刘少奇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量力而行，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而毛泽东恰恰相反，不考虑国情；不顾客观条件，急躁、盲动，求快求急，一九五六年的“冒进”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便是恶名昭彰的事例。

（三）、在具体方针上，刘少奇在五十年代初期便提出按“农、轻、重”次序，正确部署经济建设步骤，注意相互关系和综合平衡。刘少奇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重工业的发展要与农业的承载力一致，强调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不能搞重工业一马当先。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独到见解。而毛泽东在同时期照搬苏联的模式，提出“优先发展重工

业”，即“重、轻、农”的方针，并不要综合平衡，随心所欲地提高经济指标，搞“钢铁翻番”。其结果是挤垮了农业，挤伤了轻工业，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到六十年代才承认“农、轻、重”的方针。

（四）、刘少奇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灵活性。因此他提出允许私人资本办工厂、办商店，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补充；在农村则要有自留地、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然而毛泽东强调与追求的，是单一的公有制，将任何形式的私有制，视为洪水猛兽，不但私人办企业属非法，自留地、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是资本主义，甚至农民养鸡养猪出卖，也是“资本主义尾巴”，要通通割掉。很显然，毛泽东的思想是僵化的、教条的。而刘少奇的思想，北京的学者们现在认为是“代表了当时认识上的一个进步”，“标志着对苏联经济模式的在思想认识上开始突破”，是“试图改革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最早的思想萌芽之一”。

（五）、刘少奇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不能排斥市场和价值规律，他主张“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而毛泽东恰恰就是忽视商品经济和市场规律，认为平均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在五、六十年代大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否定“按劳分配”，把物质奖励批判为“物质刺激”。就在这种极“左”思潮笼罩整个中国的时候，刘少奇却大声疾呼，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认为“可以搞物质刺激”，并提出了“计件工资”、“超产奖励”等具体措施。

六、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刘少奇认为，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有一定的条件与基础，必须经过一个相对稳定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使中国实现工业化，然后才能实行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过早地向社会主义转变是有害的。

与此相反，毛泽东完全不考虑什么条件基础，主张土改后即向社会主义转变。

（二）、关于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形势，刘少奇认为获得土地的农民

有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农村的自发势力与两极分化，是正常的，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必害怕。他反对过早地用农业合作社来动摇、削弱私有制，过早的集体化，会伤害个体小生产者的积极性，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是违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认为这种过“左”的思想，正是反动的、倒退的农业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社会主义。

毛泽东则照搬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和苏联的模式，认为上改后要趁热打铁，以免发生两极分化，并担心农民富了以后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农民的“发家致富”忧心忡忡，因此急于集体化，急于消灭私有制，搞“穷过渡”，将农村改造成平均划一的公有制。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一套正是反动的、倒退的农业社会主义。

（三）、关于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刘少奇提出“先机械化，后集体化”，将公有制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之上，因而是体现了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而毛泽东提出的是“先集体化，后机械化”，完全是空想的、唯心的。

（四）、毛泽东强行实施农业集体化后，不断地急速提高公有制的程度，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合作化的规模越来越大。对此，刘少奇认为中国小农经济依靠手工劳动的条件基本没有改变，为适应这种低下的生产力，生产、经营、分配的单位应小一点，反对生产关系的改变过快过高。一九五五年他支持邓子恢“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一九五七年人民公社化的前夕，他反对“拼大社”的作法，认为生产和分配的单位太大了，损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九五九年他再次批评人民公社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前头，破坏生产力。

（五）、刘少奇还反对毛泽东将农村改造成单一的公有制，主张必须给个人“有一定范围的经济活动自由”，否则就会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因此刘少奇于一九五七年提出包工包产到队，超产奖励，固定三年不变，他认为生产关系不能无限制地变，要有相对的稳定性、固定性。此后他一再表示赞同包产到户，六十年代初期，刘少奇是最早的疾呼采用这一解放生产力措施的中共领导人之一。

刘少奇与毛泽东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指导思想的分歧，其核心

是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实现社会公平（即平均主义）放在第一位，其实质就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的对立。现在，北京方面公认毛泽东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是失败的，而刘少奇的理论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是正确的，如能实行，“就可以走出一条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合作化道路”。而“刘少奇的许多正确主张，对一九七八年以来探索中国农村发展道路，起了先导的作用”。

七、在重大理论上比毛泽东先知先觉。

（一）、刘少奇先于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科学概念。早在四十年代刘少奇便提出了“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到一九五一年，刘少奇在《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文中，正式地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和“两类矛盾”的概念，并对两类矛盾的性质、处理方法等进行了深人而详细的论述。刘少奇这一创举，“为全面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为“为创立完整的系统的两类矛盾论开了先河，体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远见卓识”，“为科学分析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内的矛盾奠定了思想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在哲学上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毛泽东于一九五六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性质不同的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而刘少奇则进一步指出，在两类矛盾中，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这是毛泽东没有提及而人们又模糊不清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方法和原则上，刘少奇强调利用矛盾的统一性去解决党内和社会矛盾，反对片面强调斗争性，乱搞“斗争哲学”；又指出扩大民主、加强民主集中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制度保证。刘少奇的这些论述，比毛泽东更深刻、更具体、更全面。而且，毛泽东是只说不作，在反右运动、“大跃进”中粗暴地践踏这些原则，而刘少奇则是努力遵守并大声疾呼维护这些原则。一九六四年，在“四清运动”中，毛泽东提出运动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派”，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

盾。刘少奇当场提出反对，认为情况较复杂，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的矛盾，“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然而毛泽东将刘少奇的这一科学态度视为“修正主义”，必欲打倒而后快。

（三）、一九五六年，为总结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刘少奇最先听取国务院各部委的汇报，形成一系列重要的思想。毛泽东知道后也听取汇报，并吸取刘少奇的思想精华，才形成《论十大关系》。

（四）、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受到挫折后，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刘少奇率先组织读书会，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与周恩来跟风，形成了一股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热潮。

（本节所有资料及评论，转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六月出版《刘少奇研究述评》一书二三八——页四〇四页。作者注）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数一数二的理论家，建国后毛泽东的思想趋于僵化、迟钝，相形之下，刘少奇显得更加敏锐与活跃，建树与贡献良多。在此方面，毛泽东是根本不可比拟的。

尽管刘少奇的思想受到排斥、打击，但事实证明，建国后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是极“左”的，教条主义的，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而刘少奇则是正确路的代表人物。

十一、毛泽东是中共最大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

据毛泽东在一九七一年南巡讲话中说，中共历史上大的“机会主义路线”共有十次之多，他们是：

一九二一——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一九二七年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

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的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

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一月，王明“左”倾机会主义；

一九三五年“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

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

“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

再就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与林彪）的斗争。

然而，与毛泽东比起来，他们都是小巫见大巫，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

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路线，发端于五十年代初期，随即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起初，这条路线主要表现在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后来不断发展、膨胀，至一九五八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思想等各个领域，在全党、全军、全国取得了全面的统治地位。此后，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路线不断深化、发展，形成既有理论基础，又有指导具体实践的方针政策的完整的体系。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路线对中国的统治，从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足足有四分之一世纪之久，是历次机会主义路线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

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路线，形态也最完备。

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左”倾冒险主义。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其基本特征是狂热、急躁、盲动、冒险，只讲需要性，不讲可能性，只讲主观愿望，不讲客观条件，求大、求快、求高、求纯、求多、求全。于是，原定十五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年便完成了；“两年超过英国”，“七年超过美国”的口号也从毛泽东的口中出现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三年进入共产主义似乎也是可行的”，“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等也成为中共的奋斗目标。“左”倾冒险主义的另一方面，是大量极“左”的、偏激的思想意识和方针政策。如“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等等。毛泽东将工人和贫下中农以外的社会阶层，统统划为敌对的阶级，夸大敌情，扩大打击面；不但在经济基础，而且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既反对资产阶级，又反对封建主义、修正主义，既批判文学、艺术、戏剧、电影，又批判历史、哲学、经济

学、教育、卫生，四面出击。这些极“左”的彩衣下掩盖着的，是特别残酷的法西斯式的封建专制统治。

毛泽东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最大特色是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由于农业社会主义是空想的、落后的、倒退的，毛泽东的政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失去真理，失去支持，不得人心。因此毛泽东只好乞于封建神灵，大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大搞造神运动。又由于农业社会主义时时处处受抵制和反对，为了强行实施，毛泽东只好依靠封建家长式的专制统治，个人独裁，专横独断，党内外都是一言堂。这一套反动、腐朽的东西，成为毛泽东为农业社会主义扫清道路，保驾护航的唯一工具。

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表面上看来确是反对剥削和压迫、崇尚平等的美丽理想。毛泽东那些极“左”的、激烈的理论、言词，似乎表达了消灭人间不平等的迫切心情。然而，恰恰是这种落后的手工式的小生产，“按其本质来说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语）。因此，毛泽东既是农业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又是专制统治的暴君，农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过程，同时就是封建家长统治恢复与确立的过程。毛泽东高喊平等，为“平均划一”奔走呼号，然而他自己却对封建特权、个人迷信、专制独裁甘之若饴。

显而易见，消灭不平等，将社会改造成平均划一是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旗帜。然而，为了维护这种平均划一的社会而必需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家长式的特权，又是对平均主义理想的否定。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不同于十八世纪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它的实质不是对未来的幻想，而是对过去的留恋，它的反动性不在于它的空想成份不能实现，而在于它的实施过程的本身就是对自己的空想成份的否定”，在于对新的、进步事物的排斥与扼杀，在于他极力维护和保留落后的小生产，将中国拉向封建主义的大倒退。这是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根源。

毛泽东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另一特色，是打着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帜。从五十年代初的动摇、否定私有制，到五、六十年代“割资本

主义的尾巴”，“文化大革命”时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越来越“左”，越来越激烈。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笼统地反对资本主义，而是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认为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具有革命的进步作用，将人类的文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马克思就曾说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有史以来的总和还要多。资本主义那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那自由竞争、汰弱存强，以及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法则，都是小生产不可抗拒的克星。而它所崇尚的平等、民主、自由，又恰恰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对立面——资本主义成为实现农业社会主义的最大障碍。这就是毛泽东憎恨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原因所在。

毛泽东反对资本主义的癫狂程度，与他对农业社会主义的狂热程度是成正比的，不但“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都在于反对之列，连农民养猪养鸡拿到市集上出卖和知识分子钻研业务，都属于资本主义而受批判。毛泽东从小生产的观念出发，不但反对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现代文明，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而且也严重地打击和扼杀中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就是建国后的毛泽东时代特别黑暗、特别落后的根本原因，也是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具有特别强烈的破坏性和反动性的原因所在。

打出“反修防修”，赋于现代的色彩，是毛泽东的“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的又一特色。毛泽东将农业社会主义作为衡量一切政治是非的标准，凡是符合与有利于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的，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革命”，反之便是“修正主义”与“反革命”。在国内，毛泽东将刘少奇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与邓子恢提倡的“三自一包”都定为“修正主义”，后来更发展将凡是不同意他的农业社会主义的人统统打成“修正主义”和“走资派”。在国际上，毛泽东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所实行的有关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种种经济、政治改革，也统统视为“修正主义”，如苏联的赫鲁晓夫和南斯拉夫的铁托，便是毛泽东心目中两大“修正主义头子”。而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和国内的“反修防修”，便是毛泽东为捍卫自己的农业社

会主义的“战略措施”。

在农业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毛泽东是孤独的、虚弱的。面对国内外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严重估计“阶级斗争”，夸大“阶级敌人”的力量，就既有实际斗争的需要，又反映了内心的那种怯弱。而“阶级斗争”也就成为毛泽东披荆斩棘的犀利武器和解决各种难题的灵丹妙药。因此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天天讲，年年讲”。这是毛泽东政治路线的另一特色。

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路线在组织上的形态，是严重的宗派主义。毛泽东不但继承了中共历史上机会主义路线的“任人唯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套，而且还大有发展。

农业社会主义实施的过程，也就是与众多的反对者斗争的过程，为此，毛泽东发明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整套理论，将反对者冠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走资派”等罪名，将自己的农业社会主义披上“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外衣，因此更具迷惑性和欺骗性。

利用政治运动来打击反对的声音，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建国后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连续不断，一浪接一浪。各个时期的运动，都有各自不同的名堂，所打击的目标也不同。一九五七年发动的是“反右运动”，打击的是中共党外的反对者；一九五九年发动的是“反右倾运动”，打击的是中共党内的反对者；到六、七十年代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则是打击中共核心内的另一派领导人：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由于毛泽东缺乏真理，正常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政治斗争，已不能适应毛泽东的需要，因此毛泽东只有“依靠群众”：用自己的思想、理论迷惑一部分群众，去斗争另一部分群众，利用一部分党员去斗争另一部分党员，利用基层群众的力量来“炮打司令部”。毛泽东是这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运动的发动者、指挥者，也是最大的得益者。由于是“运动”，所打击的目标就不是以“个”来论数，而是一批批，一茬茬。而且随着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受伤害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九五七年抓的“右派分子”是五十多万人，三年、“大跃进”中受斗争、

批判的升至一千万人，至“文化大革命”更达一亿多人。

又由于是“政治运动”，就可以不要法律，就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泽东与江青都说过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于是就可以任毛泽东罗织罪名，莫须有地将对手们打倒。长此以往，中国没有法治，只有人治（实际上是毛泽东个人统治）。人治下的连接不断的政治运动，是中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的根源，也是中国广大人民无穷苦难的根源。毛泽东时代对人民打击斗争的范围之广大，受害人数之众多，其程度之惨烈，是古今中外罕见的。

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路线，在思想上的形态，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是靠反王明的教条主义而崛起的。为什么建国后毛泽东自己反倒陷入教条主义的深渊呢？北京的党史专家们至今未能有明确的解答。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农业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属于机会主义的一种，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自然没有它的合法地位。为此，毛泽东便要千方百计地从马列的经典著作中寻找依据，为农业社会主义建立安身立命的基础。于是，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就成了毛泽东的必然之举。例如，毛泽东在一九五二年提出建国后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是抄自马列的有关学说，在这一命题之下，动摇、否定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便有了合理合法的地位。此时此地，毛泽东唯恐照抄照搬马列主义不真不确，那里还想去搞“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呢。这就是毛泽东由反教条主义的英雄变成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原因所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毕竟是崭新的课题，马列主义不可能都有论述。因此，在照搬照抄之余，毛泽东还将革命战争的经验，搬抄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例如“大跃进”时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中大搞“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全民大办钢铁”等等，便是采用民主革命的经验。又如毛泽东欣赏战时平均主义供给制，企图取消工资制，提出“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

不论是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毛泽东都表现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毛泽东制定政策、提出计划，只讲主观需要，主观愿望，而不讲客观条件、客观规律。在精神与物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中，毛泽东片面强调和夸大精神、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而忽视物质、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作用。于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就竟然出现在写过《实践论》与《矛盾论》的毛泽东的嘴上。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性，在这里表现无遗。鄙视知识，鄙视人类的先进文明，是这条路线在思想形态上的另一特色。毛泽东反对商品经济与货币交换这类先进的生产方式，因为这些经济活动扩大人们的视野，丰富人们的思想和社会联系，而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自然经济，才是封建统治的基础；毛泽东鄙视文化，鄙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最无知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知识分子要上山下乡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他把人类历史上优秀的文化遗产统统冠于“封资修”，全部赶下舞台。这是因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可以促使人民的思想解放，而愚昧与无知，正是农业社会主义最佳的气候和土壤。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写的《实践论》中说：“我们也反对‘左’的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实现可能的理想，勉强地在现时来作，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这段话正是建国后的毛泽东的写照。

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分裂，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的政治品质上。建国后，在政治生活中，毛泽东经常表现出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对人一套，对己一套；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他文过饰非，推诿责任；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打击对手；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时常使用封建宫廷斗争的权术，搞阴谋诡计，设政治陷阱，为打倒政敌而无所不用其极。晚年的毛泽东，将维护自己的权势地位放在首要位

置，而将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福祉置于脑后，七十年代初毛泽东与林彪关于设置国家主席的争论便是明例（参看著作《林彪与毛泽东》）。与长沙时期那个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热血青年相比，晚年的毛泽东已成为灵魂龌龊、行为卑劣的“粪土万户侯”。实现农业社会主义的过程也是毛泽东由一个革命家堕落为一个封建君王的过程。

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和经营，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从指导思想的理论，到具体的方针政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并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行业，每个角落，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八亿人民，无一不受到其影响。这是历次机会主义路线中影响最深、最广的。

因此，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损失也是最惨重的，仅三年“大跃进”便死了四千万人，经济损失一千二百亿元，而“文化大革命”的经济损失更高达五千亿元。

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而建国后的中共党史，也是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与刘少奇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斗争的历史。

---

①：见《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②：引自海鲁法等《生活中的毛泽东》，华龄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二月版，一三〇页；

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版第六三二页；

④：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二五四页；

⑤：毛泽东《五四运动》，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二三页！

⑥：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九七五页；

⑦：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六一三页；

⑧：同③，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六三九页；

⑨：同⑥，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九六一——九六二页；

⑩：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三二〇页；

⑪：同⑦，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六一四页；

⑫：同⑥，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九六一页；

⑬：《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转引自庞松、王东《滑轨与嬗变》第二四页。

⑭：同⑥，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九六一页。

⑮：《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第四卷一三一四页！

⑯：见《毛泽东年谱》下卷三〇五页；

⑰⑱：转引自庞松、王东《滑轨与擅变》，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版，第三七——三九页；

⑲：引自筹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四七——四九页；

⑳：刘少奇《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第六七——六八页；

㉑：刘少奇《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四三五页。

㉒㉓：转引自《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一期第二十一页。

㉔：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四——〇四一页。

㉕：见《刘少奇年谱》下卷；

㉖㉗㉙㉚：同⑲第五〇一五六页。

㉘㉙：引自黄峥《刘少奇一生》；

㉛㉜㉟㊱：转引自林蕴晖、顾训中《人民公社狂想曲》，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版，第五〇——六九页；

㉝：同⑲，一九八页！

㉞：同㉛，第六三页；

㉟：引自《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一九四九———一九五七）第三一、三三页；

㊳：引自《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一九八九年第”期，第九页；

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九三页；

㊵：林蕴晖《高岗发难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召开》，见《中共党史资料》第

五七期。

⑪：同㊳，一九九〇年第六期，第十七页；

⑫：《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五一七页；

⑬：同上，第五七八页；

⑭⑮：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第八五——八七页。

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四五八页；

⑰：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二一三—二一五页；

⑱：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八一页。

第二章　毛刘斗争——高饶事件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深夜，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住处召见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大将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大将，毛泽东问他们：

“中央要分一、二线，我如果退到二线，怎么办？第一线由谁主持？”

对毛泽东的问题，罗瑞卿感到十分突然，他嗫嗫嚅嚅地说：“主席如退居二线，那当然是少奇同志主持一线了。不过……。”那“不过”的意思，是指现在有些流言蜚语，使得刘少奇的威信受到了影响。

毛泽东听出了罗瑞卿的不言之语的意思，说道：

“你鼻子不灵，嗅觉不灵！世界上人睡觉，有些人睡在床上，有些人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你们说拥护我这个旗帜。为什么听到一些话，不问问旗帜这些话是真是假呢？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他对陈云说，党的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你认为他拥护林彪吗？这时林彪没有了。他（指高岗）不只要打倒刘少奇，是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

对毛泽东的批评，罗瑞卿感到很大的震动——既是因为毛泽东的严厉责备，也是因为事态的严重性，而自己竟然没有察觉。

毛泽东最后说：“这个人（指高岗）还欺骗了一些干部，要把这些干部夺回来！”

毛泽东的这一席训话，拉开了建国后中共党内第一次重大政治斗

争——“高饶事件”的序幕。

一、高岗其人

“高”，是指高岗，“饶”，是指饶漱石。

高岗，原名高崇德，一九〇五年生，陕西省横山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被派往西北军从事兵运工作，参与发动多次武装起义。一九三〇年后任中共陕西省军委交通员，一度前往甘南作军事工作。一九三二年一月任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队委书记。一九三二年七月陕西军委遭破坏后到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参与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一师政治委员，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与刘志丹、阎红彦一起，是陕甘红军与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一九三五年二月，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统一领导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协助刘志丹领导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是年九月红十五军团组成，任军团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刘志丹在前线作战牺牲，高岗便成为陕北红军最高领导人和革命根据地的代表人物。

出于团结地方干部的政治需要，高岗受到毛泽东的重视，长期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加上高岗善于揣摸和奉迎毛泽东的意旨，遂得到重用，平步青云。一九三六年获委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在这些岗位上，高岗表现了良好的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为建立和巩固陕甘宁边区，为毛泽东与中央红军在陕北安家落户作出了努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八年五月，高岗获委任中共陕甘宁区委员会书记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员。一九三九年一月，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一九四一年初，获毛泽东委任为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同年五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获委任为书记。为经营、建设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二年五月，为统一晋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和军事建设，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卫力量，毛泽东主持下的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高岗任副政委，萧劲光任副司令员，徐向前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下辖八路军一二〇师、留守兵团、晋绥军区部队、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等。关向应患肺病人院医治后，高岗被任命为代政委，晋身于与贺龙、徐向前等人并肩的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行列。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高岗的倚重，从毛泽东处理萧劲光与高岗的一段矛盾，便可看出一斑。

萧劲光是个与毛泽东有悠久渊源的红军高级将领。萧劲光是湖南长沙人，一九二〇年加入毛泽东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与毛泽东有所往来，是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第一批团员中的一个。一九二一年赴苏留学，先与刘少奇同在东方大学学习，后入读列宁格勒军政学院。一九三〇年回国，不久进入中央苏区，曾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闽粤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政治委员。参加中央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战争。一九三三年十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萧劲光违背李德、博古等“左倾冒险主义”负责人死守黎川的命令，将部队撤出被敌人重重包围的黎川，受到撤职、开除党籍、判处五年监禁的处分。在关押期间，毛泽东派妻子贺子珍到狱中探望萧劲光，并带去两只鸡。萧劲光说：“贺子珍转达了毛主席的话，大意是，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错误造成的，你应该撤退，做的对。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后来我听说在决定处罚我时，有人主张杀掉我，毛泽东同志坚决不同意，王稼祥同志几次拒绝签字”，“我得到的释放，能活到今天，是毛泽东等同志同‘左’倾教条主义者坚决斗争的结果”。

在当时，毛泽东受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打击、排斥，受牵连的有“四大”，即邓小平、毛泽谭、谢唯俊、古柏，还有“四小”，即萧劲光、陈正人、李井泉、余泽鸿。毛泽东是十分重视这种“患难之交”、“同党同派”的政治关系的。

在遵义会议上，萧劲光获得平反。长征到达陕北后，萧劲光获毛

泽东委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各路兵马奔赴抗日前线，毛泽东却将萧劲光留在身边，委任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员，担负起保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任。

萧劲光在担任上述职务时，与陕甘宁边区地方最高领导人高岗发生了矛盾。萧劲光说："刚到陕北时，陕北红军中'左'的路线正在打击刘志丹同志，也包括高岗。毛主席了解到这个情况，及时地将他们解救出来。刘志丹是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是一个以革命利益为重、很正派的好同志。……不幸，在红军东征山西的作战中，刘志丹英勇牺牲了。志丹同志牺牲后，高岗成为陕北红军中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对陕北的干部是非常尊重的，他特别注重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团结，认为这是保证中央路线顺利贯彻执行的重要条件。而我对这；点则认识不足。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对高岗的印象并不佳，感到这个人政治水平低，眼界却很高，计较个人得失，品质也不好。在我当军委参谋长的时候，高岗从三边剿匪回来，中央决定让他暂留在军委一局代理局长，高岗得知后大为不满，认为这个安排太低。后来，他当了边区保安司令部的司令。成立留守兵团时，保安司令部隶属于留守兵团小因而，在一个时期里，我把对高岗的关系仅处理成一般的隶属关系。有一次飞机场正在修理，有飞机要降落，我让高岗去督促快些把机场修好，结果任务没完成，我还对他发了火。以后，高岗成了西北局的领导，我当时认为，留守兵团属于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与西北局没有直接隶属关系，所以也没有经常向西北局报告工作。对此，毛泽东同志多次教育我，批评我，要我尊重高岗，尊重地方政府，搞好军政关系。毛主席说，军队和地方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做检讨。军队和地方闹了矛盾，军队首先做了自我批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这作为一个原则定下来。毛主席还推心置腹地对我说，要尊重西北局的领导，连我们中央决定的事都通过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过一下西北局呢？部队在哪里住，也就应当尊重哪里的地方政府。"①

在延安"整风"时，萧劲光这些"错误"被提出来，成为整风对

象之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八十八天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亲自到会作报告，指出要联系当前边区的工作实际，特别就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进行整风。萧劲光在会上受到了批评，也做了多次的自我批评。萧劲光说：

“再一个问题是军政、军民关系问题。在军政关系上，留守兵团有不尊重地方政府的现象，对西北局的领导，没有经常向他们汇报，请示工作，部队中也存在一些不尊重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闹纠纷的事情。下面有些部队政策观念不强，在生产上有的与民争利，有的做违反政府法令的事，影响了军民关系。高干会议上批评留守兵团不尊重西北局和地方政府，有闹独立性、本位主义、个人主义、违反群众纪律等缺点错误，这些批评是中肯的，我做为留守兵团的主要负责人，对这些问题要负主要责任”。②

在这次会议上，高岗是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来向萧劲光和留守兵团整风的。高岗严厉地批评了萧劲光和留守兵团，连萧劲光在内，共有团以上干部七十多人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萧劲光说：“在会议后期，对留守兵团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扩大化了，上纲过高，例如说是路线错误，是军阀主义，甚至与张国焘的《军党论》相提并论，对留守兵团的干部打击面过宽，挫伤了一部分同志的积极性。”

很显然，在萧劲光与高岗之间，毛泽东是全力支持高岗的。同乡与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渊源关系，也敌不过高岗在毛泽东心中的魅力。

在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上，高岗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当时的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共十三人，高岗排名第八。在中共领导层中，高岗冒升之快，堪称是“火箭式”。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岗被派往东北地区参与领导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

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东北地区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中，有高岗的一份功劳。

林彪率领第四野战军入关南下后，高岗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甚称地道的“东北王”。一九四九年九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抗美援朝期间，他领导东北人民政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巨大的支援。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说：志愿军能打胜仗，全靠两个“麻子”，一个是“高麻子”（高岗），一个是“洪麻子”（志愿军主管后勤副司令员洪学智。）

高岗身材高大，彭德怀喜欢称他“高大麻”。其实他皮肤很白，脸上麻子浅而白，远一点便看不出来。他的头发梳成大背头，显得精神利落，浓眉毛，高鼻梁，眼睛不大却目光灼灼，戴一副近视眼镜，喜欢从镜框上面闪着两道锐利的目光打量人。他那一身粗大骨骼，再配上一口粗扩高亢的陕西腔，显得威风凛凛。高岗的作风不拘小节，讲话时常配合身体、双手的大动作，感情外露，是个颇具特色的人物。

在高岗的管治下，东北地区成了“独立王国”，高岗被称为“主席”，大庭广众之下，还要喊“万岁”。在东北人的心眼中“高主席”的份量比“毛主席”还要重一些。在东北的一些会议上，高岗批评下属时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像个鸡巴，动不动就硬了起来！”会场上有男有女，高岗就这么讲，一本正经，面不改色。高岗其人，可见一斑。

一九五二年，中国即将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各方面需要充实领导干部。在该年十一月，高岗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一九五三年正式调往北京工作。当时被调往北京的各路诸侯中，还有邓小平（第二野战军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区第二政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任中共中

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勋（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饶漱石（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五位调进北京工作的要员中，数高岗最为位高权重，一时间，北京政坛上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时，要准备茶水和香烟。从毛泽东到刘少奇、高岗，每人都有自己专用的茶杯，编上号码，不能乱用。而政治局委员以外的干部，则不入“号”，茶杯可以混用。政治局委员们喝的是龙井茶，毛泽东、彭德怀、高岗三人喜欢喝浓茶，所以茶叶要多放；而陈云喜欢喝淡茶，茶叶要少放，几片就行，有个色就可以，晚上十一点以后就要改喝白开水——陈云神经不好，夜里喝茶影响睡眠。而林彪是不喝茶的，只喝白开水。毛泽东有吃茶叶的习惯，彭德怀也好此道，并且吃得更厉害。彭德怀不抽烟，因此喝茶很快，常常是第一个喝光，然后伸出一根手指，将茶叶拨出来，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嚼着。建国初期，毛泽东喜欢抽浓烈的“三五”牌香烟，刘少奇则喜欢抽“中华”牌，但平时只抽“前门”牌，因为“中华”牌太贵，抽不起。高岗烟瘾最大，抽的是“中华”牌，每次开会要放一筒香烟，五十支，有时一筒也不够，还要再添。朱德、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都不抽烟。

据曾任中南海勤务员的李维信回忆：高岗来中南海颐年堂参加中央会议，他坐下来不动茶杯，先抓那个“中华”烟筒，有时不等坐下便抓过烟筒揭盖，随即抽出一支烟，点火吸燃，每次都抽得又凶又狠，像是直接用肺往里吸。一筒“中华”五十支，他经常不够吸。因为那时的会议多数是在夜里，一开一夜，高岗的烟不会停。服务员背地里悄悄说他是“一次火”，每次开会吸烟只划一次火柴，吸燃香烟之后便不会停，一支接一支地续燃下去，烟缸一会儿就冒了尖。会议结束后，他坐的位置最难打扫卫生。桌面上、桌下、椅子四周，到处是烟头和烟灰，又被坐久了而不停移动的双脚踩牢在地板上，踩出各种烟灰构成的画面，扫不净，必须用抹布连擦几遍。

那时不讲什么尼古丁致癌，只讲抽烟多了嗓子和气管容易发炎，几位抽烟凶的中央领导身边常离不开痰盂；不抽烟的坐久了这种烟雾腾腾的环境，气管也就跟着发炎，身边也就免不了要摆痰盂。经医生一再努力，中央领导们开始采取措施，改变会议环境和“生存条件”。

人多的会议搬到了西楼大厅，那里采光和通风条件都要好一些，空间也大些。更重要的是开展了“瓜子代烟”的运动。

这场“戒烟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会议桌上不摆烟了，也不摆糖果，因为吃糖不影响吸烟。首长们常常是嘴里含了糖，又叼上烟，服务组便“赔了夫人又折兵”，何况，糖进了嘴，不知是腻喉还是润喉，那烟反而越抽越凶。

于是，决定摆瓜子。

毛泽东喜欢吃黑瓜子（西瓜子），刘少奇喜欢吃葵花子，高岗是不管黑的白的，能吃的就往嘴里放。

毛泽东吃瓜子是有一档没一档，不经心地磕几颗；但是这样磕一夜，那瓜子皮也就积不少。他是嗑一颗，将瓜子皮摆在桌上，摆到香烟盒那么大一片时，就不再扩张面积，而是将皮在原基础朝上叠放。越往上放，越仔细，散会时，形成一座瓜子皮构成的“宝塔山”，服务员打扫卫生时，常常不忍心破坏，总是留待最后清扫。最后也迟迟下不得手，总是看了又看，只是想到明夜还会建起这座“塔”，才小心翼翼将那塔尽量维护着抹进撮箕里。

刘少奇吃瓜子很细心，嗑开后，有时还要看一眼里面的瓜子仁儿，怕嗑出“臭虫”来（人们常把霉变了的瓜子仁儿叫臭虫）。他也很注意卫生，不乱丢瓜子皮，认真放在桌子上。但是葵花子是炒出来的，不象西瓜子有粘性，所以建不成“塔”，只能堆成“蒙古包”，并且时不时要用手归置归置，不让瓜子皮散落开。高岗又不同，服务员们形容他是“抽烟像逮住鬼子汉奸，又凶又狠；吃瓜子像八路军攻城，又快又猛。”他吸烟不误吃瓜子，吃瓜子不误吸烟，手嘴一道忙碌，像进行一项什么伟大的事业一般。不过，这项“事业”进行得既轰轰烈烈，又很粗糙；烟灰随意挥向周围，瓜子皮吐得到处都是。会议进行的越

紧张，气氛越热烈，他的动作也跟着越紧张，越热烈，丝丝吸烟声和劈叭的嗑裂瓜子皮的声音给整个会议增添了不少声色；一道道烟柱从他嘴里喷出，射上天，冲向前，有时还左右横扫，瓜子皮更是飞舞一片，不时落在其他中央首长的身上，他自己却毫无感觉，心思显然都在会议讨论的问题上。直到散会，周恩来或李富春惊讶一声："咦，我身上哪来这么多瓜子皮?"他才恍然道："怎么，吐你身上了？糟糕呢?"

服务员打扫卫生，最难打扫的仍然是高岗的座位。烟头烟灰和过去一样多，还增加一撮箕瓜子皮。他嗑的瓜子皮，有时一撮箕都装不下，要分两次戳。这和高岗正当年富力强，心高气盛，精力充沛，身体强健又生性不拘小节有关，也和体力消耗大而又没夜餐有关。

那时，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几乎没有一天不是整夜开会。这个会刚完又开那个会，大会完了开小会，有时是个别谈话，从来不曾吃夜餐。有几次会议开了十几个小时，仍然没吃一口饭。这就难怪年富力强的要没完没了大嗑瓜子，像八路军攻城一样。李维信在中南海服务到第五个年头，只见首长们吃过两次夜餐。一次是每人一小碗捞糟，没菜，咸菜疙瘩也没一块。另一次是每人一小碗挂面，一两面左右，没肉没菜的清水面。

唯一例外的是朱德总司令。五大书记开会，他常常是开到晚上十点就回去休息了。毛泽东照顾他年纪大了，不勉强他熬夜。就是白天开会，毛泽东也照顾他例外。别人开多长时间也不吃饭，只有朱德不吃不行，到钟点就一定要吃饭，再重要再紧张的会议也不能影响。颐年堂旁边有个厢房，卫士把饭用饭盒送去。朱德一到钟点便独自退席，到厢房里吃饭，并且痛快地呼吸一番，指着会议室小声嘀咕："里边烟气太大，呛得受不了。"

瓜子吃了一年，不抽烟的还是不抽烟，吸烟的也还是吸烟，并且多了一个嗑瓜子的习惯。轰轰烈烈的戒烟运动就这么夭折了。

既然戒不了烟，摆瓜子的积极性就没了。高岗不习惯桌子上没瓜子，大声问："瓜子呢？"服务员聪明地说："首长戒烟我们就摆瓜子。"高岗怔了怔，说"不摆拉倒，我回家再嗑。"

从此，瓜子就在会议桌上绝迹了。③

二、饶漱石其人

饶漱石，江西临川人，一九〇三年出生，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期曾在江西、浙江一带从事青年工作。一九二九年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一度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一九二九年七月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后，饶漱石成为刘少奇的直属部下。一九三二年刘少奇受王明路线批判，被调离上海后，饶漱石接替其职位，任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一九三五年赴苏联，任中华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一九四〇年夏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一九四一年一月随新四军军部转移，皖南事变发生后，与新四军军长叶挺等一起突出重围，遂以中共东南局副书记身份强令叶挺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谈判交涉，致使叶挺被国民党扣押、监禁。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出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饶漱石被任命为华中局副书记，是为刘少奇的副手。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将刘少奇召回延安，刘少奇推荐饶漱石任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其间，饶漱石为了将军长陈毅挤走，制造了“黄花塘事件”，诬陷陈毅召集二十多名干部攻击“华中局及我个人”，又联系陈毅在土地革命时期曾“反毛主席”，策划对陈毅批判斗争，并同时去电延安，向毛泽东、刘少奇诬告。在延安的刘少奇支持饶漱石，而反对陈毅，毛泽东遂以“来延安参加七大”为名，将陈毅调离新四军。

在一九四五年的中共“七大”上，饶漱石当选为中央委员，是年底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一九四八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在建国后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主席均由各野战军司令员担任，唯独在华东是由饶漱石而不是陈毅

担任。

饶漱石为人阴险，手段毒辣，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当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师政委的邓子恢说："当时我有这样一个印象，饶漱石对陈毅很厉害，彭雪枫、黄克诚、谭震林都觉得他手段狠辣。黄花塘事件后，饶漱石确实树起了他的威信，也在高级干部中造成戒心。我在毛主席、少奇面前也敢乱扯乱谈的，但在饶面前就不敢随便讲话，觉得他很严肃。今天看来，他善耍权术，手段很毒辣，故意使问题扩大，然后把你打下去。陈毅虽然没有被一棍打死，却被打伤了。"

在中共党内，饶漱石本是个名不经传的、资历浅薄的无名小卒，只是靠拍刘少奇的马屁，才得到冒升。一九四一年任新四军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和政委、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叶飞将军曾说："一九四一年三月，我接到盐城新四军军部来电，要我派部队将经过上海来苏北的饶漱石护送去盐城。饶漱石是谁？我和旅里的干部都不知道，地方上的领导同志也不清楚，饶漱石来后，只见他留着山羊胡子，穿着长袍，好像基督教的牧师。以后听说他在苏联赤色工会国际、美国、法国工作过一段时间。"

一九五四年高、饶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时，"刘少奇亲自到陈毅住处，诚恳地向陈毅道歉：过去我看错了人，信任了饶漱石，使你受委屈了。这使陈毅十分感动和振奋。"④

三、毛泽东"左"倾再批刘少奇

如上所述，建国初期刘少奇与毛泽东、高岗之间，就农村、城市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发生分歧、争论。刘少奇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高岗则落井下石，从旁推波助澜。

时至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发起社会主义革命，便又批判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之说。

"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刘少奇在一九五一年三月召开的中共第一次全国职工组织工作会议上说的。刘少奇说："中国共产党的最终

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

刘少奇的这番讲话，其精神是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完全相符的，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及《共同纲领》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提法，是对中共在建国后政治战略的一种科学的概括，对全党、全国的实际工作具有指导的意义。

然而，在毛泽东由科学社会主义向农业社会主义蜕化之后，毛泽东认为建国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动摇、消灭私有制，而不应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因此，毛泽东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提法提出严厉的批评。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毛泽东还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对刘少奇提出了批评，他说：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犯右倾的错误。

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

义事业的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周恩来语——作者注）。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⑤

毛泽东在稍后的一次会议上还对山西发展农业合作社问题批评了薄一波，实际上是批评刘少奇。

四、毛泽东批判“新税制”

在刘少奇与毛泽东、高岗发生分歧、争论的同时，周恩来领导下的政务院也发生了“纰漏”，那就是财政部长薄一波提出的“新税制”。

毛泽东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和薄一波：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个主管机关条举告我。⑥

接着，毛泽东对薄一波及“新税制”提出尖锐、严厉的批评：

“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⑦

毛泽东还说：

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

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按照党的总路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为了保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⑧

“反对分散主义”，是指周恩来领导下的政务院。

一九五三年六月，周恩来主持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高岗利用这次会议，会上会下串联，要“批薄（一波）射刘（少奇）”。据陶铸（后任中共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揭发，在会议初期，高岗请他到家里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陶铸放头炮，但陶铸没有答应。

在全国财经会议上，薄一波受到猛烈的攻击和批评。薄一波回忆说：

他（指高岗）在批判我的发言中，无限上纲，什么“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什么“品质不户”等大帽子不断向我扣来。他这样做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薄”是为了“射刘”，为了进而达到推倒少奇同志的目的。他在发言中，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少奇同志曾经说过的一些话，比如一九四七年土改中说过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一九四九年在天津讲话中的一些观点，一九五〇年有关东北富农党员问题谈话中的观点，一九五一年有关山西互助合作讲话中的观点等等，统统安到我的头上加以批判。这种明里攻我，暗中攻刘的“批薄射刘”诡计，明眼人一看便知。高岗调到中央工作后，政治野心越来越膨胀。他把刘少奇同志视为实现其野心的最大障碍，因此他首先把矛头集中指向少奇同志。先推倒少奇同志，再推倒周总理，这就是他篡党夺权的如意算盘。⑨

毛泽东在八月十二日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再次对薄一波及“新税制”提出尖锐的批评。

五、改组政务院　毛泽东贬周捧高

毛泽东认为，在“新税制”的问题上，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事先没有向中共中央和他本人汇报，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并非就此一端，亦并非由此开始。早在一九五〇年，毛泽东就对周恩来控制下的政务院不向他请示汇报而不满。据罗瑞卿的女儿点点在《非凡的年代》一书中写道：

同年（指一九五〇年）九月，李克农同志告诉父亲，他同主席谈话时主席对他说了一些话，意思是公安部不向主席写报告，主席很生气。父亲立即去见毛主席。主席先问父亲为什么不给他写报告。父亲说写了报告呀。主席说，写了，拿我的收条来看。还说，你的党性比××差，比××委的人差。他们××部，××委买茶叶的事我都知道，

你们公安部的事情我不知道。主席这样一说，父亲就紧张了，赶快向主席说明，报告确实是写了的，只是没有直接送达毛主席。以后，总理知道了，就向主席报告说，公安部的一些文件是在他那里压了，没能及时送达主席。这是总理替父亲分担责任。毛主席以后又在一个场合里和父亲说：报告要直接送给我，不直接送我不行。要知道，我们这里是有仓库的。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溢于言表。

“新税制”问题的发生，给了毛泽东向周恩来及政务院开刀的机会。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尖锐地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为此决定：

第一，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

第二，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以及便于政府各部门中的党的领导人员能够有组织地，统一地领导其所在部门的党员，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决议和指示的执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一九五〇年一月九日建立，是统一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中共党组的总党委，由周恩来担任书记——引者注）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

第三，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应分别向中央请示报告，如属两个部门以上而又不同隶于一委的事项，则经由政务院负责同志向中央请示报告。如系主席直接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

如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事项而竟未向中央提出，则最后经手的政府负责同志应负主要责任。

为了更好地作到现在政府工作中的各领导同志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特规定明确的分工如下：

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

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

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

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

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

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对周恩来和政务院的组织处理，毛泽东并没有就此罢手。在同年的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再次下令改组政务院，对其属下各部门的工作领导，重新作了分工：

（一）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二）所属的铁路、交通和邮电部，划归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领导；

（三）所属的农业、林业和水利部，划归财委副主任邓子恢领导；

（四）所属的劳动部，划归计委委员饶漱石领导；

（五）所属的财政、粮食、商业、对外贸易和人民银行，仍属财委主任陈云领导；在陈云养病期间，由副主任薄一波代理。⑩

至此，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失去了领导整个政务院、统筹政府各部门工作的权力，而只剩下领导外交工作的权力，亦即外交部长的权力，周恩来实际上由总理下降为主管外交日的一位副总理。

在这两次大改组中，获得大冒升的是高岗，除了原来负责的国家

计划工作外，政府的经济部门，即政务院二十个部中的八个主要的工业部，都划归了高岗领导，包括工业、燃料、地质、轻工等。当时北京政坛上就有人说高岗组成了“经济内阁”。政务院的重心转移到高岗的身上。

毛泽东的“贬周捧高”及“以高代周”的思想暴露无遗。

六、高、饶向刘、周发难

在刘少奇与高岗的争论中，毛泽东鲜明地支持高岗而批评刘少奇，在政务院的改组中又明显地捧高而压周，不能不是毛泽东在政治上大力支持高岗的明确讯号。

一九五三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中共和国家的组织形式应该随着任务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为此，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召开第八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并具体考虑中共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和总书记，政府体制是否采用苏联的部长会议体制。毛泽东还曾提出中央分成一线、二线的主张。对此，高岗、饶漱石从争夺权力的角度来看，认为这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极好机会。

高岗将这次权力再分配的机会，与毛泽东表示政治上对自己的强有力支持联系起来，与毛泽东多次批评刘少奇、周恩来的事实联系起来，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将“确立新民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问题提到“离开总路线”的高度进行批评，证明刘少奇、周恩来在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而根据毛泽东对政务院的两次大开刀，亦证明刘少奇、周恩来已经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而高岗却是备受毛泽东信任与重用的一颗在中国政坛上迅速冒升的“政治明星”，在这次权力再分配中，毛泽东有意让他取代刘少奇、周恩来。而毛泽东的这种意图，自然是不会明说。于是，高岗与饶漱石便展开了实际的行动，对刘少奇、周恩来进行攻击。高饶的这些阴谋活动，后来被中共中央称之为“反党活动”。

高、饶反党活动的第一波，发生在一九五三年夏天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

正如上文所述，高岗在财经会上大搞串联，掀起“批薄射刘”的狂风恶浪。高岗除了点名猛烈攻击薄一波外，还将刘少奇历次讲话中的“错误”摘录成文件，四处散发。高岗曾直言不讳地对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刘少奇的老底”。高岗除了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将刘少奇的讲话加在薄一波头上横加批判外，还把刘少奇几年来的言行“错误”，集中起来编成资料，以制造刘少奇的错误是一贯的，系统的，是路线错误的假象。

高岗还散布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

高岗还污蔑刘少奇搞宗派，划“圈子”，指名道姓地说某某人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物。他甚至无中生有地说某个领导人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指白区工作系统——作者注），周恩来有一个圈圈（指南昌起义系统——作者注），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

为了推倒刘少奇，高岗公然散布“军党论”（即所谓“党是军队创造的”）。他说，党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新作出结论。他把中共党的干部分成两部分，说毛泽东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应当彻底改组。并煽动说现在白区干部要篡夺党了。

彭德怀后来也揭发说，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里，军委准备召开一次军队系统的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讨论军委准备的报告草稿时，高岗说这个报告草稿没有思想性。毛泽东当即指示：“以彭为主，请高加以修改。”当彭（即彭德怀）为修改报告草稿去找高时，高就指着桌上的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华北土改工作会议的讲话和在延安的关于“和

平民主新阶段”等讲话记录，问彭看过这些文件没有？彭说，没有看过，现在的文件实在太多了。高一再要彭看看这些文件。第二天，高到彭的住处。彭德怀说：他在这里又提起少奇同志来，高说：“刘少奇这个摊摊在七大时就安排好了，说什么刘为白区的领袖，这就是说毛主席只是苏区和红军的领袖，你看这样还像话吗？他把某某某安在华北，某某某安在华东，某某安在东北，有朝一日他就要篡党，取毛而代之。”彭说：不会的，有毛主席在，谁也篡不了党。高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回延安后，身体很不好，那时真危险啊！彭驳斥说；少奇同志对毛主席是绝对忠诚的。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少奇同志的可靠。高岗却说：此一时，彼一时，难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也是主席的意思吗？彭说那次讲话，少奇同志是“走了一点火”。高岗又继续说：天津讲话站在资本家那边去了，难道也是主席的意思吗？也是“走了一点火”吗？妄图煽动彭跟他反刘。⑫

“高饶事件”的另一名干将饶漱石，原是刘少奇的老部下，在新四军时期甚得刘少奇的信任，在中共党内，饶漱石被公认是刘少奇的亲信。然而，在毛泽东批刘捧高的政治形势下，饶漱石认为刘少奇面临失势、倒台的命运，因而决定弃刘而事高，与高岗结为“反党联盟”。

饶漱石就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首先对刘少奇的亲信、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进行批评斗争，据薄一波回忆：

“在一些同志的印象中，饶漱石是个谨慎小心的人，曾受到少奇同志的器重。可是，他一当上组织部部长，就一反常态，同高岗串通一气，反对少奇同志，政治野心昭然若揭。他到职才几个月，就对组织部原有的领导干部进行打击和排斥，发动了对安子文同志的无理斗争。之后，在全国财经会议、中央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又配合高岗反对少奇同志，阴谋篡党夺权。正像毛主席后来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新官上任，刚来即斗。’小平同志也指出，饶漱石同高岗是‘这边一炮，那边一斗’。他们互相呼应，配合得十分默契。

“安子文同志未经中央授权草拟的那份政治局人选名单，饶漱石得

知后，私下里在许多人中间进行传播。在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捏造说：某某是一个宗派，一个‘圈圈’，刘少奇是他们的支持者。在安子文同志就名单问题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处分后，饶却抓住把柄不放。并散布说：财经会议上斗了薄一波，会后还要斗‘圈圈’中的安子文。果然，他未经中央同意，就制造各种借口，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安子文同志的斗争。他指责安子文同志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安子文同志将这些情况如实地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少奇同志找饶谈话，不同意他的这种错误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从事，不要再在组织部内部继续争吵。但他根本听不进去，在组织部召开的再次部务会议上，继续向安子文同志开火，斥责他向少奇同志反映问题是‘胆大妄为’。

“一九五三年九、十月间，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主要是总结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可是，饶漱石却在会上兴风作浪，扭偏会议的方向。在讨论安子文同志作的工作报告时，他和一些人故意夸大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大批安子文同志，并进而把矛头指向少奇同志。中央发觉了饶漱石的分裂活动，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上，饶漱石不顾大局，继续诬陷安子文同志，破坏团结。当他受到批评后，又一反常态地对安子文同志说：我说你对财经会议有抵触，其实不是指的你，而是指的刘少奇。这就透露了他（讨安伐刘）的政治诡计。后来他在检讨中承认在中组部斗争安子文，目的也是反对刘少奇，以取得高岗的信任，进行政治投机。”⑬

高饶反党活动的第三波，发生在全国财经会议之后，据薄一波回忆：

财经会议结束后，党中央提出了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高岗认为谋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成熟，比以往更加迫切地走向前台

公开活动起来。他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对着少奇同志，捏造说刘少奇已不被毛主席所重视。还说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可是，他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林彪来担任。他还要陈云同志去向毛主席转达他的意见，遭到了陈云同志的拒绝。

后来，他南下杭州、广州进行游说。在杭州对陈正人同志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一九五三年十月间，他对设立总书记表示不赞成，而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并反对少奇同志当总书记或者副主席。后来他听说书记处要开会把这个问题定下来，唯恐自己当不上副主席，曾对陈云同志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意思是将刘、周、陈、高都包括在内。遭到陈云同志断然拒绝后，他又反咬一口，诬陷陈云同志。毛主席生病，罗瑞卿同志对高岗说，我们大家都要劝主席多注意休息。高岗却幸灾乐祸。他告诉秘书：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撑得起来。毛主席十二月要休假，提议由少奇同志临时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实际上，过去毛主席离京外出，中央的工作都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少奇同志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书记处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轮流。唯独高岗表示反对，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其用意就是要使少奇同志降格。十分清楚，高岗阴谋活动的本质，就是要推倒少奇同志和周总理，而由他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第一副主席，同时担任政务院总理。他后来在《我的反省》等书面检讨中，承认他的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⑭

邓小平后来（一九八〇年）说：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二一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主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⑮

七、毛泽东转弃高饶

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批评“高饶的反党活动”，是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减掉阳火，打倒一批人。”毛泽东还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当日，毛泽东率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南下到杭州起草宪法，委托刘少奇在京主持中央工作。

一九五四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提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时，在谈话中暗示了高岗错误的反党性质。据当时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了指师哲），楚就是湖南（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了指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⑯

毛泽东在杭州直接指挥北京的批判高、饶的斗争。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和中央书记处。信中说：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报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廿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毛泽东还交待说：全会应发一个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它都可不公布。"关于第三项议程（指加强党的团结），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同日，毛泽东另外又专门写了一封给刘少奇个人的信。毛泽东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高岗得知中央决定召开四中全会的信息后，当即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杭州面见，为此，毛泽东于一月二十二日，专就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致电刘少奇。电称：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待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

了。⑰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一起，找高岗谈话，当面批评他，希望他悔过自新。二月五日又谈了一次。二月三日与饶漱石也谈了一次。但高、饶百般抵赖，企图蒙混过关。

八、“高饶事件”的背后

处理高饶反党事件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于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由刘少奇主持在北京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向全会作了工作报告。针对高、饶的反党活动，刘少奇说：“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

全会上，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四十四位高级干部发了言，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完全支持刘少奇的工作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没有公开高饶问题，与会者的所有发言，都没有点明高、饶的名字，只是冠于“某些人”、“这种人”，就如打哑谜一样。这是十分罕见的奇怪现象。

会后，”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高岗的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饶漱石的座谈会由邓小平主持，进一步揭发和批判了高、饶的罪行。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高岗在家里触电自杀未遂，于同年八月十七日在东交民巷八号的住所再次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而饶漱石则被中共中央逮捕、监禁，于一九七五年病死在狱中。两人都在一九五五年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开除党籍。

在一九五三年秋冬之前，毛泽东全力支持高岗，利用高岗来打击刘少奇、周恩来，这是不争的事实。在高饶事件的背后，是中共党内

更高层次的毛、刘之间的分歧与斗争，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农业社会主义与刘少奇为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与以刘少奇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利用高岗去打击刘少奇，而高岗则利用毛泽东的信任与重用，企图夺取更大的权力。

在整个事件的始终，毛泽东都抱着压抑刘少奇的态度。事件的前期，高岗对刘少奇进行了许多非组织性的、自由主义式的攻击。邓小平在七届四中全会上说：

“我们常常闻到这样一些味道，例如有的人把某些人或者把他自己夸大到与实际情况极不相称的地步……尤其严重的是，有些同志不注意维护中央的威信，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有些已经发展到党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毛泽东同志提倡对党的任何负责同志（毛泽东同志经常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必需根据党的原则在一定场合下进行，或者向他本人提出。……但是不能允许这样的议论发展到党的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⑱

高岗对刘少奇的攻击，已到了“党的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刘少奇是中共的第二把手，书记处书记（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常委），地位比高岗高。按常理，出现高岗非正常地攻击刘少奇（有许多是采用散布流言蜚语的方式）的情况，毛泽东应当出面制止，并批评高岗。然而毛泽东却没有这样做，只是要高岗去找刘少奇谈话。毛泽东的做法，实际上是默许高岗对刘少奇的攻击。当高岗踞傲而没有去找刘少奇，毛泽东也没有批评高岗的不是，反而是刘少奇主动找高岗谈话，检讨了自己在某些问题的错误。毛泽东的这种做法，无形之中助长和纵容

了高岗的气焰，而打击和灭了刘少奇的威风。毛泽东的“捧高抑刘”的心态，表露无遗。

在全国财经会议上，高、饶进行一系列非组织活动，扭转了会议的方向，毛泽东不但不给予批评，反而对薄一波及其背后的刘少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就更加助长了高岗的气焰。正是毛泽东的支持和纵容，使到高岗的野心得到急剧膨胀。

毛泽东利用高岗打击刘少奇，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不能伸手要权要官。因为毛泽东最厌恶、最忌恨那种居功要权的人，毛泽东认为这种人是“个人野心家”，将这种人扶植在身边，最终会威胁到毛泽东本人的权势，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高岗利令智昏，触犯“功高震主”的禁忌，于是毛泽东便放弃了对高岗的支持。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政治局会议上那番“两个司令部”的讲话，就清楚地表露了这种心态：在毛泽东看来，高岗的错误不在于对刘少奇的攻击，而在于组织另一个司令部，从而威胁毛泽东那个司令部。

高岗在暴露了个人野心之后，毛泽东不得不放弃高岗。在这种形势下，重新承认和接纳刘少奇，成为毛泽东不得不采取的选择。即使如此，毛泽东仍然对高岗保持一种依依不舍，而对刘少奇保持压迫的姿势。毛泽东在杭州对七届四中全会方针的指示，就规定刘少奇不得在全会上提名批评高、饶，明确指示“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相反，却要刘少奇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毛泽东的是非倾向十分清楚：高岗对刘少奇的攻击正确的，而刘少奇的思想、观点、立场则是错误的，因此高、饶在全会上没有做自我批评，反而是刘少奇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就是在这种奇怪的安排下召开的，连刘少奇在内的四十多位发言者中，没有一人指名道姓地批评高、饶，他们都像邓小平那样，以“某些人”、“一些同志”来称呼高、饶，整个会议就象在猜哑谜，难怪高、饶在全会上拒不承认错误。

相反地，在毛泽东的压力下，刘少奇于全会的最后一大做了自我

检讨。刘少奇说：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我曾有过一种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对于这个基本方向，我是没有怀疑过的。因此，我主张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在目前要广泛地发展劳动互助和供销合作社，要限制富农经济，对将来要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和消灭富农经济，对于这些，我的观点都是明确的。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我国农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而没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由此逐步地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同时，在目前的劳动互助组与将来的集体农场之间没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间过渡形式，因而，就以为互助组不能过渡到集体农场，而把二者看成在组织上是没有多少联系的两回事。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我有一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在一九五一年春，我赞成华北局在个别地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不赞成推广。同年七月间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在一九五一年秋，中央讨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后，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得到了改正，我也就抛弃了这种想法。

（二）一九四七年我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确定了实行分配土地的原则，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并提出了整党的方针。这个土地法大纲和整党方针，是经过党中央的修正和批准的。全国土地会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这个会议有重大的缺点，这就是没有对于农村的阶级分析做出恰当的决定和没有能够制定一个正确的切实可行的详细的没收分配土地的办法，同时对于错误倾向的批判不够全面。在会议上着重

批评了党内反对地主不坚决以及同情、可怜、庇护地主的右倾错误，这是完全必要的，并从此结束了这方面的错误。对于当时已经发生的一些“左”倾错误，虽然做了批评，但这种批评是不充分的，没有系统的，因而也就不能够认真地去堵塞有些地方的“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一九四八年中央重新发表一九三三年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和任弼时同志的文章后，各地土地改革才逐步完全纳入正轨。我在当时没有能够把指导土地改革这样一个严重的任务完全正确地担当起来。

（三）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在旧政协会议开过会，中央发出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会付诸实施，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阶段。同时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解放区提出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并指出“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万一被破坏。”在这个指示中所谓“和平民主阶段”是属于一种对时局的估计。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的规定，则是对于我们的革命起实际作用性质的东西。对于和平可能性的估计只是一方面，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这些中心工作的指示，则在于我们可和可战，使我们在任何时局变化的场合下，都能够有情而无恐。对于这个文件，我想是应该作这样的分析的。……中央通过的这个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作过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四）一九四九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评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虽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

从刘少奇的上述自我批评，不难看出：关于农业合作化等几个问题，刘少奇并不存在什么错误。然而，毛泽东却认为是错误，在其压力下，刘少奇不得不做检讨。

对于毛泽东的压迫刘少奇而宽容高岗的作法，邓小平深感不平，就在刘少奇自我检讨后，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言说：

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一九四九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⑳

在毛泽东的控制下，中共七届四中和五中全会尽管给高饶事件做了结论，开除了高饶的党籍，高饶两人最后以身败名裂而告终。可是，在政治问题上，毛泽东的倾向性却是十分鲜明的，从头至尾完全没有批评高岗在政治上对刘少奇的诬蔑，也根本没有为刘少奇所受的诬蔑进行平反。那是因为高岗的思想代表了毛泽东的思想，而毛泽东认为那是“正确”的，而刘少奇是错误的，是“右倾思想”。因此，在中共关于农业合作化、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社会等一系列重大的带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上，毛泽东坚持自己的意见，维持了“原判”。

至此，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发生的第一个回合的斗争中，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压倒了刘少奇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开始走上一条落后的、倒退的苦难之路。

而自此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农业社会主义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就贯穿着建国后的整个中国现代史，断断续续、时起时伏地继续下去，一直延续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

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事隔十几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过去高岗攻击刘少奇的“炮弹”又被重新搬了出来。一九六年三月，戚本禹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批判文章中中，大肆攻击刘少奇一九四九年的“天津讲话”，是“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到了一九六九年四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竟然把刘少奇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和天津讲话作为“修正主义”的罪行，写进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

①②：见《萧劲光回忆录》三一六——三一八页。

③：见权延赤《生活中的领袖们》。

④：引自《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第四九六页。

⑤：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八———八二页。

⑥⑦⑨⑪⑬⑭：引自簿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⑧：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九〇一九七页。

⑨⑩⑫⑮⑯⑰⑱⑲⑳：引自林蕴晖《高岗发难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第三章　中共“八大”：刘少奇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下的历史奇迹

一、毛泽东：“大家拥护‘八大’，不拥护我”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即中共“八大”闭幕后的两个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向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常委说：

“大家拥护‘八大’不拥护我”。①

毛泽东的话清楚地反映了两个事实：

其一、是毛泽东对中共“八大”通过的路线、方针是不满意的，有保留的；“八大”的路线、方针没有反映毛泽东的思想。

其二、是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大多数领导人在国内外的大政方针方面，是存在分歧的，在双方的对立中，以刘少奇为首的一方是多数，是“大家”；而毛泽东是少数，是不受“拥护”，处于孤立地位的一“小家”。

这是自一九四九年建国后，毛泽东再一次与中央集体领导发生分歧，处于对立的状态，也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第一次在中共党内处于主导地位。

二十六年后的一九八二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会议上说：“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

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实际上，中共“八大”通过的决议，在一年后便被否定推翻了。能够将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推翻的人，当然只能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二、毛泽东：“八大”的中心思想是反右倾

毛泽东是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举行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同年十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要保证十五年同时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

七届六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毛泽东提出的“八大”的中心思想，被写进决议之中。这是毛泽东为中共“八大”规定的带有浓厚的“左”倾色彩的基调。

时至一九五五年，毛泽东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如脱缰的野马，难以抑制。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虽然毛泽东已一再提前，超速发展，但毛泽东犹嫌慢，认为刘少奇为首的中央领导人制订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规划是保守的、右倾的，尤其对刘少奇伙同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一九五五年春季以“整顿”为名，砍掉“二十万”个农业合作社的事件大为恼火。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绕开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独自主持召开了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猛烈而尖锐地批判邓子恢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被胜利“吓昏了头脑”，像“小脚女人，摇摇摆摆地走路”。毛泽东当时认为，不仅邓子恢领导的农村工作部“右倾”，更严重的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领导层“右倾保守”，拖慢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毛泽东的“急迫”、“超速”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与刘少奇为首的平稳、健康发展的正确路线，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对立。毛泽东认为，当前的主要“倾向”和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不彻底扫荡这股障碍，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能得到顺利的贯彻。因此，毛泽东将反对“右倾保守”定为“八大”的主题思想，希望通过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反掉刘少奇等人的“右倾保守”路线，使自己的路线在全党占统治地位，成为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执行，不可违抗的指导思想。

这是毛泽东为“八大”立下的既定方针。然而事情发展的结果，令毛泽东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三、“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步刘少奇后尘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邓小平草拟的“八大”主要文件起草委员会名单。

“八大”的政治报告由刘少奇主讲，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陈伯达、陆定一等七人组成。修改党章报告由邓小平主讲，起草委员会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胡乔木、马明方、谭震林等九人组成。

经济工作报告是由周恩来主讲。起草委员会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李先念等人组成。

同年的十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八大”的中心思想是“反右倾保守”的指示，并提出：要全党准备“八大”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为起草“八大”的报告，准备找各部门的同志谈话，请各部门同志预作准备。

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是要总结自一九四五年“七大”，尤其是建国以来党的工作经验，提出今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要做到这一点，尤其是要制订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

相结合”的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是一项崭新的课题，刘少奇必须首先占有大量的实际的材料，才能加以概括、总结。

从十二月七日开始，刘少奇依次把中央各部、委、局的负责人约请到自己住处会议室，听取他们汇报本部门、本系统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尤其是带全局性的问题，同他们一起研究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刘少奇一面听一面记，还不时地提出问题、插话，说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汇报会经常从白天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凌晨。

刘少奇在半年之内总共与三十六个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刘少奇的这一系列的座谈会，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国家经济建设的调查研究，也是中共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少奇此次“开先河式”的探索，是卓有成效的，它的成果至今对中共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刘少奇的探索，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和启迪。正当刘少奇忙于召开座谈会的时候，毛泽东正在杭州修改《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一九五六年二月，毛泽东回到北京。一天，薄一波到毛泽东那里汇报工作，偶然讲到刘少奇正在逐个听取部委的汇报。毛泽东听后大感兴趣，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薄一波说：“我当然乐意承担。”没多久，汇报就开始了。

毛泽东是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开始听取汇报的，其形式也是采取座谈会，边听边记边议。只是在顺序上与刘少奇的有所不同，是按照“口”的顺序进行。所谓“口”，是指国务院的某一系统，如“重工业口”，包括了电力部、石油部、各个机械工业部、地质部、煤炭部等，而“农业口”则包括了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等。毛泽东先听取每个“口”即国务院主管该“口”的办公室作综合汇报，然后才由各部汇报。与刘少奇不同的还有一点，即毛泽东只听取政府经济部门的汇报，而不包括“文教口”和中央直属机关，这些部门一文化部、教育部、高教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等，只向中共中央送了书面的汇报提纲。很显然，毛泽东的重点放在经济建设方面。

与此同时，毛泽东于三月三十日亲自起草中央通知，发给中共中央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他们立即着手准备材料，等候中央通知，按指定时间来京汇报。各地的汇报是从四月下旬开始的，除了叫一些毛泽东感兴趣的省、市负责人亲来北京汇报外，其他多是采用书面汇报。

在中央各部门的汇报开始不久后，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还向毛泽东建议：让一些重要工厂、建设工地也向党中央写书面汇报。不久，几百份书面汇报，便像雪片似地飞向中南海。

中共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有时也参加了这些汇报座谈。

在这些汇报的基础之上，毛泽东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经与会者讨论和提出意见后，毛泽东于五月二日召集最高国务会议，作了第二次的讲话。后来发表的版本，主要是根据第二次讲话的记录整理的。

《论十大关系》分为十个部分（即十大关系）：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党和非党的关系；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是非关系；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前五个是经济方面的关系，后五个是政治方面的关系。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刘少奇的思想成果。例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适当地调整我国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关系，更多地发展农业、

轻工业”，“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得具体分析”等，这些观点刘少奇在听取汇报中已经提出了：“要重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要重视发挥沿海工业的潜力”，“要重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学习苏联要有所学有所不学”。刘少奇的这些思想、观点，给毛泽东提供了启发和参考，并作为精华被毛泽东吸收了。

毛泽东把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和这次听取工业战线三十四个部委汇报，看成是他建国后的两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后来的事实证明，前者是一大败笔，而后者却是一大成功，《论十大关系》被中共称为毛泽东“建国后最重要”的著作。之所以是“最重要”，是其中错误最少，因而最有生命力，至今仍对实践有指导的作用。

这两次调查、先后相隔才几个月的时间，为什么会出现农劣而工优的结果呢？原来，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在建国后就亲自抓了。几年来，毛泽东的思想越来越“左”，要求改造的速度越来越急，越来越快，公有制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在“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已先入为主的情况下，毛泽东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选中的都是能入毛泽东“左眼”的东西，加上毛泽东亲自编写的按语，全书充斥“左”倾思想的“左话”、“大话”、“空话”触目皆是。事实证明它已被扔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对于工业，毛泽东不懂，建国后也基本上不亲自抓。因此除了所知甚少以外，也没有先入为主的框框，并且当初的用意也在于批判现行的苏联模式，摸索一条有别于苏联的“中国之路”。因此调查的过程中比较客观，而调查的结果也就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的规律。

从毛泽东对自己的这篇“建国以来最重要的著作”的态度，也可以看出问题之所在。正由于《论十大关系》较正确地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建设规律，不“左”不急，因此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及其他

文件都多方面地引用了其中的精神。然而不久后毛泽东便全盘否定了“八大”路线，并说了“你们拥护‘八大’，不拥护我”的话。而“十大关系”的主要精神也被搁置了。到了一九六五年底，经过三年灾难和经济的调整、巩固之后，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将《论十大关系》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给各级党委学习。然而毛泽东看了整理稿后，批示说：“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②当时毛泽东正“左”得厉害，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对当年的客观、平实之作，自然是“不大满意”了。

一九七五年，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期间，出于整顿文化大革命烂摊子的需要，邓小平又向毛泽东提议将《论十大关系》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邓小平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我们在读稿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但毛泽东似乎并不觉得“那篇东西太重要了”，也并不认为具有多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于是批示道：“可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③直到一九七六年离开这个世界，毛泽东对这篇“建国以来最重要的著作”始终存在保留的态度，并没有“青眼相看”，相反地却是异常的冷淡，与他所钟爱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相比，犹如“正宫娘娘”与被打入冷宫的嫔妃。

四、一九五六年：“多事之秋”

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来说，一九五六年是“一则喜，一则忧”，“先喜后忧”的一年。

所谓“喜”，是指在毛泽东发动凌厉的“反右倾”攻势之下，保守派的代表人物邓子恢，以及他背后的支持者刘少奇等人所组成的阵线纷纷土崩瓦解。在全国上下如十号强台风的“左”倾政治空气下，农

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相继进入了高潮。只经过短短的几个月，一九五六年元旦刚过去，北京、上海等城市就敲锣打鼓，庆祝三大改造胜利完成，超高速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一统江山终于实现了。

面对着全国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毛泽东说：一九四九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一九五五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

毛泽东的高兴并没有维持多久。自一九五六年春天开始，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逆转。

首先是一九五六年二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当时，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是团长朱德，团员有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赫鲁晓夫是在“二十大”闭幕后才向中共代表团通报秘密报告的内容，还派了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北京向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通报解释。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晚年所犯下的肃反扩大化、个人迷信等一系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大量的阴暗面，在全世界引起强烈的震动。对崇尚苏联、以苏联为榜样的毛泽东和中共来说，这是犹如原子弹般的巨大冲击。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抓住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作文章，掀起世界性的反苏、反共的浪潮。一时间，乌云乱滚，阴霾满天。

苏联共产党公开揭露和纠正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引起连锁反应，这些国家政局动荡不安，先后发生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华沙学生上街游行事件”、“匈牙利暴动事件”。这是波、匈两国经济、政治危机长期积累，广大人民群众心怀不满，最后酿成骚动和流血的结果。

“反斯大林”的连锁反应也影响到中国。由于“三大改造”的超高速完成而造成的急剧社会大变动，以及在经济建设上“大冒进”所造成的各方面的紧张，引发了一些城市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上街游

行示威；各地农村则发生农民闹退社、分社、哄抢集体财产物资、抠打干部、进京上访告状等事件。

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至一九五七年春，全国罢工请愿事件达几十起，参加者共万余人；几十个城市的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游行示威，参加人数有一万多人；而各地农村的“退社”风潮，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仅广东省退社的农民达十三万户，二百多个合作社垮台。

毛泽东与中共向来以“为人民谋福利”、深得人民群众拥戴而自诩，自称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鱼水之情”。而在一九五六年竟发生这种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才可能发生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事件。广东省某县发生群众示威时，县公安局出动武装警察镇压，当场开枪打死五人，打伤九人。中共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毛泽东一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权，竟与无产阶级大众发生这样激烈的矛盾冲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既感到极大的震惊，又感到困惑不解。这种情况，是中共自一九二一年建党以来从未遇到的。

国内外政局的动荡不安，使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感到很大的压力。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是“多事之秋”。

五、毛泽东的“冒进”受压抑

在毛泽东掀起的“反右倾”的强台风下，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超高速完成了。在一片胜利的凯歌声中，毛泽东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问题，并转而批判在这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向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刘少奇说：

“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

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工业部门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现象。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④

原来，毛泽东对国务院制订的计划指标不满，认为偏低了，发展的速度慢了，尤其是一九五五年的计划指标，认为太过保守。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定稿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说："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在毛泽东的鞭策下，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省市纷纷修改一九五六年的工业经济指标，加快速度，扩大规模，全国出现一窝蜂的"大干快上"，基本建设项目一再增加，到了国民经济不胜负荷的地步，引起资金、物资、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紧张，财政出现了三十亿元的赤字。

是周恩来首先起来"反冒进"，他说："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即一九五五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又说："（如果）不适当收缩会影响货币、物资各方面的平衡。也可能出现中国的波兹南事件。"⑤

周恩来的"反冒进"，得到以刘少奇、陈云等中共中央集体的支持，刘少奇率领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决议。并指示中宣部起草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于六月二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指出"急躁冒进"已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冒进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

先存在于上面的领导干部中，将矛头指向了毛泽东。

毛泽东对“反冒进”是不满的。然而，在苏共二十大后，“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独裁”，“尊重集体领导”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已成为主流，加上当时国内外政局的动荡不安，压力很大，毛泽东只好按捺自己的不满，压抑自己那膨胀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暂时容忍与接受中共中央的“反冒进”的决议。

中共“八大”就是在这种国内外形势对毛泽东的不利、“左倾冒险主义”受到压抑的政治气候下召开的。

六、刘少奇占上风：“八大路线”

中共“八大”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台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民国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新的党章。

“八大”的主要内容有以下方面：

一、正确规定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而党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成为整个“八大”路线的基础和核心。

二、正确规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这是反冒进的直接成果。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各自的报告中还吸取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的主要思想，如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和财政、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等，作为具体的经济政策。

三、初步提出了打破传统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模式，强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和计划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新的经济模式。

四、邓小平在报告中强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方针，邓小平说："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集体领导，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要正确理解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的功绩，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良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和执行。"

五、大会还规定了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政治战略。

"八大"的重头戏，自然就是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按中共的不成文的惯例，能够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的人，都是党内地位最高的人。"七大"时，政治报告是由毛泽东亲自作，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便是。"八大"时，由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那个明显的含义便是：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中说：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的"八大"政治报告。美国的一些报章便说："中国现代史要重写。"其实李志绥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李志绥是个医生，而不是学者，他对中国现代政治史了解得不深、不细，才出现上述的失误，并因此授人以把柄，北京组织毛泽东的秘书林克等人，对其进行批判。

中共"八大"的主要思想内容，之所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至今仍有生命力，是由于对毛泽东的思想进行了扬弃，吸收其正确的部分（《论十大关系》），而抛弃其错误的部分（"左倾冒险主义"）。在报告起草的过程中，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既不

是完全的统一，也不是彻底的对立。那时候，《论十大关系》新鲜出炉，毛泽东还是满意的。“不满意”是以后的事。正如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对此毛泽东是满意的、赞成的，毛、刘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在“反冒进”的问题上，正如上文所说，毛泽东虽然不是“心悦诚服”，但他是屈服于中央的集体决议，因此在表面上也没有出现公开的矛盾和对抗。并且，基于当时的国内外紧张的局势，毛泽东的“左倾冒险主义”有所收敛，因而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在起草过程中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公开的冲突。中共元老之一的王首道在《追念刘少奇同志》一文中说：“在起草（八大）报告的过程中，他（指刘少奇）和毛主席一块，反复研究，字斟句酌，又根据毛主席提的意见作了认真的修改。毛主席说他修改得很好，并亲笔在样稿的扉页上写了题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又在下边写了‘刘少奇’三个大字，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解释这个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提纲。”

关于起草政治报告的过程，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有以下回忆：

他在着手起草报告期间，那本来就没有规律的生活更被打乱了。他博览了各种有关的资料，找了许多有关的人士谈话，征求意见，进行调查研究。据我们的工作日记记载，他约请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谈话先后达几十人次。动笔以后，他的身心简直就是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连轴转。那时，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他能吃好、睡好，但是在他开动了脑筋，把自己全部投入到写作中去的时候，即使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早已摆好，甚至热了又热；即使明明知道他已很长时间没有合一下眼皮，该休息片刻了，但谁也不敢去打扰他。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他的思想、他的智慧、他的情感已全部凝聚于笔端，全部倾注于政治报告的起草之中？我们谁还敢、而且谁还忍心去打断他那像黄河一泻千里、奔腾

不息的思绪！每当这时，我们只能把对他身体的担心变成一种祈祷，由衷地祝愿他身心永远那样健康，精力永远那样充沛！

在这期间，我们工作人员的精神也很紧张，只要少奇同志在办公室里，我们就不能离开。吃饭时，互相从食堂带点来，解手时，得来回小跑。他写出几页，就叫我马上送到机要室打印。他习惯随写、随修改、随打印，然后再作修改。一个问题或一个章节写完后，还要随时送给毛主席审阅。

当时，少奇同志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周总理负责起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同志负责起草《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所以在此期间，他们互相来往较多。他们经常互相提供材料、交流思想。有时碰头开个小会，有时通电话谈个问题，通报情况。

特别是周总理，他的作息时间和少奇同志比较一致，所以经常午夜两三点外以后还打来电话，问我们少奇同志休息没有。有一次两点多钟，总理打电话问“少奇同志还在办公室吗?”我回答：“他刚进卧室。”总理知道少奇同志进卧室后有坐在床上继续看东西的习惯，便对我说：“我和富春同志马上去一下。”我立即报告了少奇同志，他说：“就请总理他们到这里（指卧室）来吧。”

总理下车后，一边疾步走着，一边还借着灯光在看材料。在上楼梯时，跟在总理校面的富春同志看见总理还那样专心看手中的材料，便提醒总理：“你要看楼梯，不要看文件了。”总理回头朝富春同志一笑：“没关系，我的眼睛比你的眼睛还好。”我把总理和富春同志直接领到了少奇同志的卧室。这时，少奇同志正在床上坐着看东西。他们见面后。没说半句客套话。直接开门见山地谈问题。我急忙要去搬椅子，卫士也准备去沏茶，但总理一伸手，拦住我们说：“不用了，不用了，很快就说完了。”说着总理就近坐在少奇同志午休用的躺椅上，富春同志坐在放衣服的凳子上。

功夫不大，总理他们谈话结束了，先后下到一楼。走在前面的富春同志迷失了方向，本该向右拐，出大门，可他向左走，却进了卫士

值班室。卫士以为去找他们，马上立正问富春同志有什么事？富春同志一看不对，笑着说："啊，我走错门了。"这时，总理也下来了，富春同志回头一本正经地对总理说："糟糕，我迷失方向了。"总理听后哈哈大笑，并风趣地说："今天打破你的常规了，通常这时正是你做梦的时候，来，我做你的向导。"

总理和富春同志的汽车沙沙的飞驰声划破中南海宁静的夜空运去了，而少奇同志和总理亲密无间的友情及总理那爽朗的笑声却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有一个星期天，少奇同志要约一位部长谈政治报告的事。我请电话局总机的话务员帮助找那位部长，话务员回答我："他家里说他去看戏了。"我将此事报告少奇同志，他说："那也得请他来一下。"时间不长，那位部长急匆匆赶到了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少奇同志看见那位部长神色紧张，便亲切地说："对不起，今天没有让你看完戏。"那位部长也连声道歉："让少奇同志久等了。"

一九五六年的盛夏，北京酷热难熬。《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也进入了关键阶段。为了更加集中精力把报告写好，我们随少奇同志来到了北戴河海滨。

夏日的北戴河，风景迷人，气温凉爽。带着咸味的习习海风，使我们心旷神怡，湛蓝的海水更令我们无限向往。但我们却无暇领略这美丽的海滨风光。更无暇享受大海的温柔抚慰。因为少奇同志还是那样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少奇同志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特别认真仔细，一直到离开会时间很近了，他还在逐段逐句逐字地斟酌推敲，甚至对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要反复琢磨。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曾几次打电话对我说："你要催催少奇同志，请他尽快定稿。因为他不定稿，我们大会秘书处的许多工作就无法进行。"我将尚昆同志的意见报告后，少奇同志才说："那就这样定稿吧！"⑥

毛泽东不满意的，是"八大"决议中关于阶级斗争和国内矛盾的

一些提法。”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刘少奇在回答中南海造反派的提问中说：

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是讲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如：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就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它反映了我国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在报告的另一处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决议中也说：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这就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议通过后，第二天见报了，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对我讲那些提法不妥当，但已经来不及修改，所以至今未改。⑦

“八大”决议是在九月二十七日大会通过的，而毛泽东是在十月一日国庆庆典上提出“不妥当”的，然而在决议通过时毛泽东举了手，那是毫无疑义的。按照中共的组织原则，党员可保留个人的意见，但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毛泽东不仅对“八大”的决议不满意，而且还要改变它：一年后便全盘推翻了。

“八大”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从党章中删除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后来，到“文化大革命”时，这成为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罪证。

在新党章中不必提“毛泽东思想”的建议，最初是彭德怀提出的，彭德怀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时承认：

“五六年开‘八大’时是我提出（从党章中）划掉毛泽东思想的，我一提出就得到刘少奇的同意，他说：‘还是划掉的好吧！我是反对个人迷信的’。

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他犯下的许多罪行之一。但这个报告是毛主席和政治局批准的，我参加了那次会议。”

陈毅所说的"那次会议"，是指一九五六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其主要议题是讨论通过"八大"的几个报告。事实上，划掉"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刘少奇个人的主张，而是北戴河政治局会议集体通过的决议，毛泽东本人也是举了手同意的。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批判刘少奇时，似乎这个"同意"就不算数了，正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八大"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在人事安排上。其主要的倾向是削弱了毛泽东的权力，加强了集体领导的体制，具体的措施有三项：

其一，是增设多名中央副主席。"七大"一中全会选举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为毛泽东，没有副主席，下设书记处（相当于中央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为书记。很显然，毛泽东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的大权集于一身，位重权亦重。到了"八大"，毛泽东原先设想一名主席（毛泽东），一名副主席（刘少奇），但后来改为除毛泽东仍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外，增设四个副主席，是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一九五八年五月又增加了林彪，共五个副主席。对此事，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曾说：

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⑧

毛泽东还说："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

其二，是改变书记处的性质，并增加总书记的职位。"七大"时的

书记处，相当于“中央常委”。而“八大”后的书记处，则是中共中央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并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决策的参谋部。而总书记的人选是邓小平。据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回忆，在推举邓小平时，还有一段小插曲：

在大会期间，有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开碰头会。我怕少奇同志找我要文件，就坐在会议室的门口，常委们里面说话，我都听得清楚，那天碰头会的内容是动员邓小平同志出任党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当时小平同志的声音比较大，一再推辞说：“我不行，我不行，我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行，怕难以胜任，还是让别人当吧！”小平同志态度诚恳而坚决。“我们是医生，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还是我们的助手嘛。”毛主席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传到了门外。紧接着是周总理的声音：“毛主席比喻得很形象！”毛主席又补充说：“其实，还是你那个秘书长的差事！”其他几位常委也帮着动员小平同志。这时，我听见少奇同志说话了；“主席，我看就这样定了吧！”“好，定了！”毛主席一锤定音，其他常委也异口同声地说：“定了！”小平同志再也没有推辞。⑨

毛泽东在向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介绍邓小平和陈云时说：

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陈云同志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他是工人阶级出身。⑩

其三，是在党章中增设名誉主席。这是毛泽东提议的。毛泽东说：

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作“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我们准备好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⑪

毛泽东讲这番话时，是真心实意，还是半心半意、虚情假意，现在已很难考究。就如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泽东重提“朱毛”，说“朱毛、朱毛，没有朱那有毛，朱在先嘛”，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政治上表现得如此的谦虚一样，毛泽东在“八大”期间的这段讲话，是他在权力方面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表现得如此的谦让和超脱。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并不重视，也没有实践出自己的这个诺言，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寿终正寝，毛泽东都在眷恋着“中央主席”这个实权职位，丝毫没有“不当主席”的意思，因而“八大”新党章上那个“名誉主席”，也就成了名符其实的“纸上虚名”。

中共“八大”，是在一种十分特殊的国内外的历史环境下，毛泽东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受到压抑，刘少奇的正确路线占了上风而取得的一项积极的成果。由于这种历史环境千载难逢，“八大”也就成为中共在建国后的毛泽东时代中仅有的一次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的“绝唱”。

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提出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是继承刘少奇的思想——五十年代初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与“八大”路线，

中国在绕了三十年的大圈子后，才回到了原来的起点。现在中外都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而邓小平是非马克思主义 用热衷于资本主义人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颠倒了黑白的误解。从本质上来说，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毛泽东恰恰是背离者，是异端；而邓小平是坚持者，是正统。对此，世人切勿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八大”的正确路线，像紧箍咒一样，令毛泽东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难以伸展。毛泽东必然要千方百计除去这个“紧箍咒”，否则，毛泽东就不成为其毛泽东了。

七、墨汁未干　毛泽东推翻“八大”路线

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向世人展示了开明、开放、民主的面孔。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通通是假的，毛泽东既不尊重、也不遵守“八大”通过的决议，而且在一年之后，这些毛泽东当时举手赞同的决议，就被他统统推翻、否定了。

毛泽东最先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修改“八大”的决议。“八大”闭幕后一个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毛泽东脑子中潜伏的阶级斗争之魂就又伺机而动了。毛泽东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又说：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开始，受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党内外刮起一股歪风，“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⑫

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新认识；造成了“反右运动”严重扩大化。之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便又更上一层楼。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时加入了这样的一段话：“被推翻的地主阶级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

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到了一九五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就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会议过程中，尽管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不少人坚持“八大”的观点，但毛泽东最后仍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还批评“八大”的提法是不对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否定了“八大”通过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的方针，开始批判“反冒进”。

到了一九五八年春天，毛泽东更将《论十大关系》及以此为主要思想的“八大”决议的精神，如处理好综合平衡，处理好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等等，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来取而代之。政治上则大搞阶级斗争，批“白专道路”，“拔白旗，插红旗”，“反右倾”，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至此，“八大”路线被破坏殆尽。

“八大”正确路线被全面推翻的同时，是毛泽东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全面复辟。此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路线全面统治了中共和中国整整二十二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八大”的正确路线才开始得到贯彻执行。

中国现代发展史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白白浪费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北京官方以及中国出版的各种书刊，都几乎一致地说：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即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和国内环境（反右运动）使毛泽东在阶级斗争理论上发生失误。例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就说：

毛主席和我们党为什么修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有国内原因，也有国际原因。从国际方面讲，波匈事件，对毛主席和我们党的影响和震动太大了，仿佛中国也存在着这种现实的危险，再加上国内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发动进攻，就更加重了这种危机感。由于偏重于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观察问题，于是就认为“八大”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论断不妥当了，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受国际事件和国内暂时情况的影响而修改党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的做法，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实践证明，八届三中全会修改党的“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论断，动摇了“八大”路线的根基，从此开始了对“八大”路线的偏离，助长了“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它将问题表面化，从而将源流颠倒，本末倒置。

中共“八大”是毛泽东的“左”倾路线受压抑，刘少奇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的结果，它虽然取得了不少积极的成果，但也存在许多局限性。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没有批判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来的“左倾冒险主义”，更没有触动它的根源——农业社会主义路线。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虽然在“反冒进”中讲了一些“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主要应该批‘左’”一类的话，但多是就事论事，就具体政策议论，没有将问题提高到“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高度去认识、对待，没有从理论上、思想上真正进行批判，更没有刨根追源，彻底地清算这条路线，就像中共历史上对待王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一样。

因此，在“反冒进”及后来的“八大”中，毛泽东的“左倾冒险主义”没有受到触动，更没有得到清除，它在毛泽东的脑海中潜伏着，伺机待动。这是“八大”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缺点，“八大”路线这么快就被毛泽东轻易地推翻，其根源亦在于此。

毛泽东是个人意志十分倔强、固执的人。他从不认输，也从不服输。“反冒进”及中共“八大”对他的“左”倾思想的抵制，他是不满意的，对“八大”在主要的内容上没有体现他的“左倾”路线是耿耿于怀的。“八大”会议虽然吸收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主要思想，但在经济建设的路线上却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超高速的“左”倾思想，而主张“稳步发展”。这不但意味着毛泽东的有关思想不正确，也使他的左倾冒险主义受到压制，对此，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毛泽东必然要反击。毛泽东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不会有任何的让步和妥协。毛泽东所要做的，仅是找寻适合的时机。

毛泽东的计划是，制造一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然后以此为口实，全面改变“八大”的政治路线。而一九五七年夏天发生的“反右运动”，便是毛泽东一手制造出来的中国的“匈牙利事件”。

八、“反右运动”：毛泽东制造“中国的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事件”，是该国执行“斯大林主义”，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造成的危机长期积累而发生的。毛泽东没有从积极的方面，如怎样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改善人民的生活，改进共产党的领导来考虑避免类似事件在中国出现，而是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来“吸取教训。”毛泽东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开始，少数社员闹退社，党内外刮起一股合作化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没优越性的歪风：受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在一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中有各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怪议

论，有些人想复辟。他还认为，党内干部中少数人也是动摇的，过不了社会主义关，苏共二十大及匈牙利事件把党内的蚂蚁引出了洞。他提出，要准备出大事，准备出全国性的大乱子，甚至准备再回到延安去。“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为了避免出大事，他认为必须反击歪风。

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反右运动”是毛泽东有目的、有计划地制造出来的。

据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全国马克思主义学会理事的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版）说：

他（指毛泽东）又采用对敌斗争的“引蛇出洞”和“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前所述，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就认为，社会上、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要打退这股逆流。但他并没有打。他明白，经过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成了惊弓之鸟，没有一定的气候是不轻易鸣放的。所以毛泽东在二至四月间的讲话，谈话中虽然也有讲阶级斗争没有完，有毒草就得批评，虽然也有批右的言论，但总的基调是轻松的，阶级斗争气息不浓，是鼓励大家鸣放，认为现在是放的不够。他这样做，用他后来的话说，是“有意识要缓和一下”。为了让人们把大量的“毒素”吐出来。他一再向干部打招呼：要硬着头皮听，让人把话讲完，统统倒出来，而不要急于批评。他认为，共产党整风，就是主动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一九五七年大量的“右派”就是这样主动引出的。

为了将“匈牙利事件”引出来，毛泽东于是不顾中共党内其他党员干部的反对，大力鼓吹“大鸣大放”，“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了制造空气，毛泽东还离京巡游，四处演说、讲话，鼓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学生“帮助党整风”。他说：“需要造成空

气，没有这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

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部署，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五月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而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一些高等院校的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这些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便被记录下来，发表在《人民日报》和各地的报刊上，成为“白纸黑字”的“罪状”。

毛泽东向来是只听歌功颂德，听不得批评意见的。一九五三年，著名的民主人士，与毛泽东交往了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梁漱溟先生，因向毛泽东及中共提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不同意见，被毛泽东当众斥责，并因此而导致两人绝交。今次，毛泽东花言巧语，四处游说“鸣放”，不禁令民主人士满怀狐疑。著名民主人士龙云说：“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现在是不是测验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后整人？”“现在时机不同了，大家知道，共产党想办法改正错误，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么会出尔反尔，开这样大的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然后再整风！”这些民主人士太天真，太幼稚了，他们不晓得毛泽东手段的厉害，轻信毛泽东的花言巧语，“帮助共产党整风”，结果纷纷落入毛泽东的罗网中。

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各种座谈会的同时，毛泽东于五月十五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学习。毛泽东在文章中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毛泽东还说：在整风运动中“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的“阴谋”。

许全兴说：“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和党中央下了反击右派的决

心。但这篇文章党外人士并不知道，所以许多人在五月十五日以后继续大胆鸣放”。

如民主人士张奚若批评中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的名言，就是在五月十五日这一天说的。许全兴还说：“这里应当指出，从《人民日报》的报导中虽然可看出有些言论是错误的，甚至的确有怀疑，摆脱共产党领导的倾向，但从整个报导看，很难得出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结论。毛泽东根据什么材料讲‘猖狂进攻’就不得而知”。

许全兴又说：“还应说明，在反右派运动中一些当作典型的右派言论不是在五月十五日以前‘放’出来的，而是在五月十五日以后‘放’出来的”。如“民盟副主席章伯均的‘政治设计院’是在五月二十一日‘放’的”，“民盟副主席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在五月二十二日放出的”，又如，“‘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的‘党天下’是在六月一日会上放的。”⑯

全国性的反右运动，是从六月八日开始的。那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手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也同时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北京一声令下，“右派分子顿时成为过街老鼠”。

许全兴还说：“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七月一日）中把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和整风过程中提意见说成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反人民的’，认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伯钧）、罗（隆基）同盟’。毛泽东对形势的这种估计和判断是不符合实际的。应当说，当时中国的春季总的来讲并没有形成黑云乱翻的局面。有没有阴雨天？肯定是有的。有没有黑云？肯定也是有的，但并非毛泽东估计的黑云乱翻，不过是在晴朗的天空上飘过几团乌云而已。章伯钧、罗隆基两人长期有隔阂、矛盾，很难说有‘同盟’。至于把两个民主党派向党提意见打成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反共反人民的性质更是错误的”。⑰

据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回忆：

对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某些负责人在一开始就表示不满，提出不同意见。黄炎培六月十五日表示，不要树敌过多，要把可能拉过来的人拉过来，而不要把这样的人推到反党这一派那里去。陈叔通六月中旬说：不能因为对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党的某些领导人没有掌握好这一点，现在问题很严重。邵力子说。现在有许多问题处理的方法太硬，得人心很难，失人心很易，表示对民革中央的反右派斗争要来个沉默抵抗。史良表示不赞成把揭发右派分子的材料登在报上，担心这样做运动搞得很大。六月下旬，李济深表示他要在人代会上发言，提出不要骄傲自满，困难很多，还要努力。这表明，反右运动一开始就受到党外的爱国民主人士的抵制、反对。不过，对这些逆耳忠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没有听进去，反右斗争继续升温。⑱

七月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党内干部会议上说："右派只有极少数，大学生中只有百分之一、二、三，教授、副教授中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此话一出，各地机械地执行，按百分比计算，没有右派的单位也要抓出"右派"来，结果全国共划右派五十五万余人。

抓到这么多右派分子后，毛泽东可以理直气壮地推翻中共"八大"的决议了。首当其冲的是改变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毛泽东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还认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仍应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说："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

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他批评“八大”决议上关于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八大’决议这句话，马、恩、列没讲过”。⑲

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批判“反冒进”。薄一波说：“毛主席认为，反冒进在前，右派进攻在后。反冒进的人说一九五六年是冒进，右派攻击一九五六年是‘全面冒进’，二者之间是相关联的”。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说：“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毛泽东还将“反冒进”的周恩来等人说成“距右派只有五十米”。

在“反右运动”这个大题目下，毛泽东顺理成章地批判“反冒进”。于是“八大”通过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也就被毛泽东轻而易举地扫荡了。

至此，“八大”路线只剩下一个空壳。

在否定了“八大”正确路线后，毛泽东便提出自己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取而代之。毛泽东成功地利用了国内外形势，制造了一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既清除了党外的不同声音，又顺利地实现了他的复辟，一箭双雕。

一九五八年五月，毛泽东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完成了正式的立法程序，确立了毛泽东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共全党的统治地位。

北京方面在总结这段历史时，都一致地认为：反右运动的扩大化，使毛泽东动摇和修改了“八大”路线。这种说法将反右运动放在前，修改“八大”路线放在后，两者是因果关系。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毛泽东图谋推翻“八大”路线在先，“反右运动”仅是手段。据最新公

布资料显示，早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即"八大"刚刚闭幕，大会通过的决议墨迹未干，毛泽东便明目张胆地修改"八大"路线了。

"反对个人崇拜"是"八大"路线的主要内容之一，一九五六年四月、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写成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对个人崇拜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期历史中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存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的中间有它的基础"。"八大"决议便是吸收和反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一集体的思想成果。然而，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便将反对个人崇拜这一内容否定了。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负责起草《再论》的康生向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干部介绍《再论》时说：《再论》和《一论》基本相同，但有一点不同，《一论》中有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再论》中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康生的讲话清楚地表明，在写《再论》时，毛泽东已经不主张反对个人崇拜了，也就是说，仅仅两个月后，毛泽东便公开地否定了"八大"的路线精神。

另一个破绽是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被中共誉为"划时代的伟大文献"，"对马列主义理论重大发展"的文章，是毛泽东于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为酝酿"整风运动"，即"引蛇出洞"而发表的讲话，经过十四次修改，于六月十九日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重申了"八大"路线的精神，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已变成发展生产力；当前的矛盾可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对两类矛盾应正确处理。薄一波说："然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三十年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甚至遭到严重违反"，"就在提出这个理论的一九五七年，发生了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㉑

事实上就在这篇文章修改的时候，毛泽东就发动了反右斗争。在以后的"大跃进"、庐山会议、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对这种理论的严重践踏。在毛泽东生前，这种理论从提出后就从未得到贯彻执行。而

且，自从公开发表后，毛泽东也再没有提过这篇文章。

事实证明，毛泽东自己从来不想，也根本不打算实践这篇文章提出的理论（即"八大"路线精神），更不打算运用这种理论去武装、指导全党、全国的工作。但由于宣传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巨大影响，引起广泛的注目，毛泽东骑虎难下，一拖再拖，到反右运动发起后才不得不发表。

毛泽东独自推翻中共"八大"路线，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此后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严重的灾难，便是由此起源的。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既表明了毛泽东的专横独断、飞扬跋扈的家长作风，也表现了刘少奇政治上的软弱性、不坚定性。对毛泽东来说，这是一种罪过，对刘少奇来说则是一种失责，他不但没有领导全党起来捍卫"八大"路线，反面亦步亦趋，拱手相让。这正是"旗手"的可悲之处。

---

①：引自黄象品、熊吕茂《建国后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国内主要矛盾问题上的离合》，见《刘少奇和他的事业》，中共党史出版社，第四三六页。

②③：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四八六页。

④：同上书。

⑤：引自江明武《周恩来的历程》下册。

⑥⑦⑨：见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

⑧：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见《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

⑩：转引自杨胜群、田松年《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第二二二页。⑪：转引自郑谦、韩纲《晚年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月版第二九页。

⑫：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四七五页。

⑬：同上，三五三页。

⑭：该书九七页。

⑮⑯⑰⑱⑲：同⑭八七页，九〇页，九三页，九八页。

⑳：同⑭，四〇二页。

㉑：同②下卷，第六〇一页。

第四篇

对抗与分裂

第一章　“左倾冒险主义”大泛滥：“大跃进”

一、毛泽东发动“大跃进”

“大跃进”是从“十五年赶超英国”开始启动的，而这个口号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提出的。

进入一九五八年后，毛泽东召开一系列的会议，严厉批判“反冒进”，鼓动大跃进。到了该年五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标志着“大跃进”正式展开和毛泽东的“左”倾路线全面地占了统治地位。

“大跃进”的标志之一，是全面提高各项经济指标。一九五七年通过的一九五八年的经济计划指标是：

钢：六一〇万吨；

粮食：三八八八亿斤；

棉花：三五〇〇万担。

“大跃进”开始后，经多次提高调整，到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将各项指标调高为：

钢：一〇七〇万吨；

粮食：六〇〇〇—七〇〇〇亿斤；

棉花：七〇〇〇万担。

与一九五七年相比，这些指标分别高出：

钢：增加了百分之一百；

粮食：增加百分之七十一九十；

棉花：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三。

这些天方夜谭式的数字，充分地表现了毛泽东令人惊讶的热昏、唯心主义的空想性、随意性，已经发展到忘记了工农业生产最起码常识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荒谬绝伦的地步。

二、热昏的日子：农业“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首先从农业开始的。

农业与农村，向来是毛泽东钟情的所在。建国以来，农业与农村不但是毛泽东的“宠儿”，而且也是他在政治上的“试验室”。

一九五六年，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合作化）以超高速完成以后，毛泽东率先发动农业的“大跃进”。一九五七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便成了农业“大跃进”的纲领。这年冬天，在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发动下，各地农村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全国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吹响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

在这种“热潮”之下，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提出了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问题，时间由十二年提前到五一八年，毛泽东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正是“上面心急，下面只争朝夕”，“伟大领袖”一声令下，各地纷纷响应。河南省提出一年内实现纲要规定的主要指标；连重工业集中，历来粮食、副食品、蔬菜靠外省调拨的辽宁省，也提出一年实现粮食、猪肉、蔬菜三自给。

毛泽东听说山东省有个大山农业合作社，因为深翻土地增产，“不多不少，增产百分之百”，就提倡各地效法搞深翻。毛泽东向湖南省的领导人说：“深翻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

也要干”；又对陕西省的领导人说：“订个五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①

毛泽东还听说南方某些高产地区水稻每亩种植三万蔸禾苗，于是又向全国农村提出“密植”。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所谓合理密植，在湖北、湖南、广东，就是三万蔸禾苗”。并说北方的谷子、麦子、高粱、玉米、蕃薯都可以密植。②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深翻”变成翻得越深越好，有些地方竟有翻到一丈二尺深的，结果，熟地变成了生地，好地变成了盐碱地。而“合理密植”变成了越密越好，一亩地下种几百斤，收获的是一堆秕子。

“八大二次会议”后，在总路线精神的鼓舞下，全国各地相竞放高产卫星，《人民日报》等全国报刊相竞报导。从六月八日报纸报导河南省遂平县放出亩产小麦二一〇五斤的“卫星”后，各地的“卫星”越来越多，也越放越大：

小麦“卫星”最大的，是《人民日报》九月二十二日报导的青海省赛什克农场亩产八五八五斤；

水稻“卫星”最大的，是《人民日报》九月十八日报导的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亩产一三〇四三四斤；

玉米，是河南省商丘王楼人民公社第八生产队放的三五三九三斤（《人民日报》九月十七日）；

高粱，是河南沈丘第十二人民公社郭庄大队第六生产队放的二二七二〇斤（《人民日报》九月二十二日）；

谷子，是河南商丘宋集人民公社田集大队王桥小队放的二七七三三斤（《人民日报》九月二十日；）

马铃薯，是甘肃康县窑坪乡和平农业社放的一〇六三七八斤（《人民日报》八月二十六日；）

此外，花生的最大“卫星”是二六九六八斤；甘薯是二三〇〇〇斤，南瓜达到二〇二七三五斤。③

从今天看来，这些天方夜谭式的“高产卫星”，自然是虚夸的，

是明显的弄虚作假。然而以毛泽东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相信，各地的领导机关和新闻媒界也深信不疑，以《人民日报》为首的报刊进行着力的宣传，推波助澜。

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宣传自己在广东番禺县亲眼看到亩产一百万斤番薯，六十万斤甘蔗，五万斤水稻的“事实”；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红旗》杂志上发表题为《驳粮食增产有限论》的文章，说广东的粮食亩产是可以达到一万斤的；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撰文。从理论上证明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三十，稻麦的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四万斤。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大量的社论，大肆批判“条件论”，“机械论”，“悲观论”，“农业有限论”，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宣称：“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我国农业发展的速度已经进入了一个“由渐进到跃进的阶段”。

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报导毛泽东八月四日视察河北省徐水县的文章中写道：

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毛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三十五万亩。毛泽东听过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帐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

啊?”

大家一时都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投机器。”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着大家。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主席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④

一九五八年，在武汉，毛泽东与著名的哲学家中共“一大”的参加者之一李达之间，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发生了一场争吵。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梅白回忆道：

李达要我陪他去找“润之”。当时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正和卡斯特罗谈话。我请陈毅转告毛泽东，说李达求见。不料李达一见毛泽东就发起火来：“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我赶紧说标语是武大学生在调查发现的。毛泽东要我写出这个口号来。我说：“我也收到群众来信，请求公开批判这个口号，我以‘龚同文’名义写了《论口号不能乱提》。”毛泽东看后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又用红军长征等历史来加以说明。李达听得不耐烦，打断毛泽东的话，说：“你的时间有限，我时间也有限，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毛泽东当即反问：“肯定怎样?

否定又怎样?”李达气冲冲地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长征,但是我相信,一个人要拼命,可以‘以一挡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作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大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我见李达越讲越激动,未等他把话说完,我便碰了李达的腿,示意他不要再讲了,恰好被毛泽东发觉了,他也生气地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李达继续说:“你脑子发热,达到三十九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四十度、四十一度、四十二度……这样中国人民就委遭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毛泽东听到这话就坐不住了……

我见天气已晚,就叫李银桥(卫士长)准备饭菜。李达执意要走,说:“我不吃饭,我是校长,大跃进饿不了饭……”毛泽东只好说“小梅,你送老校长回家。今天他火气很大。”⑤

三、“超英赶美”:工业“大跃进”

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用农业的“大跃进”,来促进、推动由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把持的像“蜗牛一样爬行”的工业。毛泽东曾说:“我现在就是要拿农业来压工业,农业问题解决了,你们工业怎么办?”

工业方面的“大跃进”,是以毛泽东提出的“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为纲领的。

在一九五八年那种“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的年代里,毛泽东不断地将赶超的时间提前。六月,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十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有可能的”到了九月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明年是基本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

赶超的主要项目是钢铁。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薄一波代表国家经委党组向政治局报告的《汇报提要》上批示:赶超英国只需要两

到三年，“这里主要是钢。只要一九五九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毛泽东还将薄一波的《汇报提要》的标题改为《两年超过英国》。

于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一九五八年钢铁产量的计划指标，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往上调。开始时，周恩来等人还考虑到国民经济的全局，计算要生产这么多钢铁，需要增加多少电力、运输、机械设备……，因此，只敢一点点，一、二百万吨地往上加，到了六月份，毛泽东有些不耐烦了，说：“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于是，一九五八年的钢产量便确定为一〇七〇万吨，是一九五七年五三五万吨的一倍。并决定到一九五九年钢产量要达到三千万吨，到一九六二年则要达到九千万吨以上。（以上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对于这种工、农业一齐“大跃进”的形势，毛泽东感到十分振奋。他说：

“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是这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九月五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更满怀信心地说）“今年粮食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即有可能从去年的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七千几百亿斤。棉花，去年是三千三百万担，今年大概有七千万担，可以超过一倍。”⑥

毛泽东还说：“看来，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沿途一望，生气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⑦

为了实现一九五八年产钢一〇七〇万吨的目标，在八月十六日的北戴河会议上，一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这便是“全民大炼钢铁”的由来。

方针提出后，毛泽东身体力行，亲自挂帅抓钢铁生产。毛泽东向陈云下达了八条指示，其中提出："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⑧毛泽东还下令将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生产的党委书记找来北戴河开会，专门研究钢铁生产问题，并在会上宣布了毛泽东定下的纪律。这种架势，严严然是革命战争时期那种"立下军令状"、"以军法从处"的翻版。

由于产量翻番，而炼铁炼钢的高炉、平炉（洋炉子）却没有翻番。因此光靠洋炉子是完不成任务的。陈云便在工业书记会议上提出"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的对策。对此，毛泽东指示："对土炉子要有信心"，"即使在一百个土炉子中，只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就算是插上了红旗"。毛泽东还强调要大搞群众运动，这不是"游击习气"，"农村作风"，而"正是正规的马克思主义作风"，要按纪律办事，"不要'豆腐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毛泽东再次呼吁："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得努力！"

为了确保钢产任务完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用了层层摊派的办法，硬性强令完成指标。钢铁工业基础薄弱的山西省要完成六十八万吨铁，五十五万吨钢；几乎没有什么钢铁工业的广西，也必须生产出二十万吨铁。并下令由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挂帅。九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再次强调各地承担的指标只能超额，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吨不能缺少，就是少一斤也不行。

为了完成毛泽东的"翻番"目标，全国上阵大炼钢铁的有九千万人，加上其他的间接的行业如运输等，全国投入大炼钢铁运动的劳动力超过一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办起来的小土炉达到几百万座，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仅为收购这些成本高而质量差的土铁土钢，国家亏损了五十亿元。至于过量地开采煤碳和矿石，滥砍滥伐树木等等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就无法计算了。

四、人民公社：毛泽东“如获至宝”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高举的“三面红旗”之一，因而也是导致“三年灾难”的祸根之一。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面对着彭德怀等人尖锐而实事求是的批评，毛泽东穷于招架，不得不进行多番的辩解：

“一个是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呵，是我建议的，下的决心，其结果几千万人上阵，‘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碴蚜山的章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一报。”⑨

其实，事情的真相并不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无发明权，有建议之权”，毛泽东是在文过饰非。

事实是：“人民公社本是毛泽东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逢先知语）。

这个乌托邦，早在长沙时代便在毛泽东的脑海中形成了。建国后，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毛泽东逐步将中国的农村，改造成平均划一的农业社会主义。在不断的小社并大社后，时至一九五八年，农村中的生产合作社规模达到数百户，上千户，已经够大的了，而所有制公有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农民们除了自家饲养的鸡鸭猪狗外，已是身无长物。至此，毛泽东觉得实现他的那个理想王国的时机成熟了。随着“大跃进”、“总路线”、“赶超英国”的口号响彻云霄，那个在毛泽东心中孕育了近半个世纪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开始胎动了，如“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如“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如“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引起“胎动”的第一个因素，是“乡社合一”（亦层政社合一）。

乡社合一，一乡办一社的主张最早是由陈伯达提出来的。一九五

七年一月，陈伯达从福建省莲塘乡搞农村调查回来后，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提出了这一建议。但是，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后认为，此事“牵扯较大，必须慎重考虑”，因而未获采纳。

到了一九五八年，理想王国的梦想使毛泽东想起陈伯达的“乡社合一”，于是在二、三月间将他找来谈话，肯定了陈伯达提出的“乡社合一”，认为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型，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

于是，陈伯达于七月十六日在《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文章，公开了办公社乃是毛泽东的构想：“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程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

最先摸到毛泽东的思想脉搏的地方领导人，是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等人，他们是从刘少奇口中得知的。一九五八年七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口的谭震林在郑州向河南的领导干部又讲了毛泽东关于办包括“工农商学兵”的大公社的一番道理，他们回去后便将合并了的大社叫“公社”，中共河南省委在八月二日上送的《关于建立人民公社情况的报告》说：“这一运动，首先从农村开始。小社并大社，自留地归集体，大搞公共食堂，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在城市街道居民中，组织生产、办工厂、搞集体生活福利事业。这在实质上已经形成了公社的雏型，但还没有肯定的统一名称。有的农村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农场；在城市有的叫社会主义大院，有的叫社会主义大家庭等，直至《红旗》第四期陈伯达同志所写《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引证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的指示后，才明确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方向。”⑩

据中共河南省委八月十三日向中共中央的电话汇报称：全省已建立人民公社一四六三个，占计划数的百分之五十二，其中七月十八日成立的修武县人民公社是一县一社，近三万户人家。

与此同时，河北省、山东省也陆续建立了“人民公社”。

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滋润下，“人民公社”破土出世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当时毛泽东正在北京中南海接待到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商讨苏方提出的“建立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问题。毛泽东将赫鲁晓夫顶回去后，便迫不及待地于八月四日离开北京，顶着炎炎烈日，南下巡视“人民公社”。第一站，毛泽东到达河北省的徐水、安国。

在徐水，毛泽东称赞“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指示要推广；还称赞农民上山炼铁，问粮食多了怎么办？可考虑让农民一天干半天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

“人民公社”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以及毛泽东迫不及待地前往视察的消息，也吸引了刘少奇的极大的注意。毛泽东走后的第二天，即八月。六口，刘少奇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来到徐水。传达了刘少奇关于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指示。几天之内，全县成立了人民公社。⑪

八月二十二日，徐水县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规定一九五九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一九六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宣称：“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时光。”

八月六日，毛泽东到达河南省新乡七里营视察。在公社办公室门口，看到“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赫然挂在墙上，便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他同时指出，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⑫

八月九日，毛泽东到达山东。当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的

讲话于八月十三日见报，“人民公社好”于是传遍全国，各地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

另一个捉摸到毛泽东的政治脉搏的人，是上海的柯庆施。为了增加“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因素，“消除资产阶级法权”，柯庆施提出在农村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各地纷纷仿照推行。

谭震林在四月提到的碴蚜山卫星农业社，回去后立即改名为卫星人民公社。《红旗》杂志编辑李友九与河南省委共同搞了一份、《碴蚜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由陈伯达送交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对《简章》作了修改，批示：“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说：“我在河南调查过后，叫河南同志跟红旗杂志合作，搞了一个卫星公社的章程，我得了那个东西，如获至宝。你说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不然我为什么如获至宝呢？”⑬

“如获至宝”四字，可圈可点，毛泽东那种喜出望外之情，溢于言表。

既然是“至宝”，就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于是，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于八月十七日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北戴河会议）。中心议题之一，便是正式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全国普遍建立“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为一体”的人民公社。毛泽东八月九日才说“人民公社好”，八月十七日便召开北戴河会议，其情意之急切，其行动之雷厉风行实属罕见。

在会议上，毛泽东对“人民公社”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阐述。毛泽东说：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锦花、油料实行共产。那时道德大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都不休息。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萌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

过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甚么不可以这样干

呢？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变化，大概几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掉，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老年，每个青年，都有工资，发给每一个人，和以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直接领取工资，青年、妇女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有一个公的特点，是劳动效率比合作社可以提高。⑭

在北戴河，人热天也热，曾在中南海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待处任职的李维信，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北戴河会议中的珍贵的镜头：

这年夏天，北戴河群星灿烂，集中了中华民族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

那时条件艰苦，但是“群星”都是从艰苦的黑暗中闪烁出来，也就不觉什么艰苦，反而其乐融融。

道路泥泞，部队来垫石子，那场面能使人嗅到过去战斗生活的气息。

礼堂小，闷不通风，摇破纸、扇也禁不住汗流如注，便索性搬出礼堂开会。临时搭个席棚子，摆开藤椅藤桌，不够了就用木椅木桌替代，一百多号中央委员和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就在席棚下开这种最高级会议。随着太阳的移动，总有不少人要经受阳光灼烫的考验。

每人面前能保证一个茶杯，但是不能完全保证水。那么大那么高级的会议，全会场只有韩树元和李维信两名服务员。茶杯里的水泡茶不泡茶分不太清，因为水本身就是黄的。

李维信回忆说：那条件已经算改善很多了。早二年，周恩来在北

戴河主持会议，条件更差。喝不上开水，从北戴河的西山那边拉水来，水质糟糕，全是黄水，没有锅炉，只有两把铁穿壶。就是壶中间空，可以直接在里边燃火烧水的那种壶。我和张宝忠两个烧水供大家喝；没有煤，用木柴烧，忙晕了，张宝忠没灌水就烧，烧化了壶里的焊锡。一把壶报废了，只剩一个壶，再烧也供不上那么多人喝开水呀……

一九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有锅炉烧开水，但是人多，出汗多，喝水多，供水仍然紧张。

天气热，会议气氛也热，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是坐在藤椅上讲。讲到激动处，身体不断前倾，藤椅后腿翘起来，很高，随着毛泽东抑扬顿挫的话音上下晃动。

叶子龙在旁边看着担心，朝李维信招招手。“你去，弄块毛巾垫到主席的藤椅腿上，小心别摔了。”

李维信弄两块破毛巾，猫腰蹲到毛泽东椅后，将毛巾绑到藤椅后腿上。毛泽东发觉有动静，藤椅腿落下来。回头望望，李维信小声说：“垫块毛巾，怕主席椅子不稳摔着，”

毛泽东笑了，一语双关：“总有人怕我们跌跤喲。”他向中央委员和书记们宣：“休息一刻钟。”

条件比过去好的一个标志是这次会议还搞来了西瓜。水不够，瓜来代。虽然只吃了这么一次瓜，那乐趣却比十次还浓。

有好瓜没有好刀，李维信找来一把刚擦去铁锈的钝刀，刀把也活动残缺，先发瓜皮踏踏刀，再去切瓜。中央委员们一拥而上笑着、嚷着、骂着，围住李维信抢瓜吃。李维信运动着大笨刀尽力而又匆匆地切，周围晃动着那么熟悉的令人尊敬的面孔：李井泉、陶铸、叶飞、江渭清、王恩茂……这一刀刚下，三、四只手已经伸过来。“手，小心手！”李维信一边切，一边喊，“切着手啊……”。

这一拨人抢了瓜钻出去吃。那一堆人早又挤到前边，仍然是熟悉而亲发的面孔：柯庆施、杨尚昆、周小舟、曾希圣、阎红彦、陶鲁茹、吴芝圃……

李维信大汗淋漓，手痛得厉害，知道磨破了，但不能停，而且心

里很热，这场面就像当年八路军打了胜仗，年轻的战士们生龙活虎打牙祭。

这次切瓜，李维信手磨破四个泡，流了血。毛泽东看着“抢瓜”的场面，一边笑，一边感慨：“有当年那股劲哟……要趁我们还不老……”⑮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热潮中，毛泽东是“热源”。下面摘录的便是热昏了头的毛泽东，在那些热昏的日子里所说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热昏的话：

——“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那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大学、街道都办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要考虑取消薪水，恢复供给制，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

——“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有很大的迷信。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

——“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

年是有可能的！”

——“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设想十年可以搞四亿吨钢、二千万台机器，二十亿吨煤，三亿吨石油”。

——“（由于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于是，在一九五九年召开的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撤消了司法部，人大常委会也撤消了法制局。中国完全进入了“人治”的社会）；

——“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提出准备十二年后过渡到共产主义。对此毛泽东解释说：“我们一定要苏联先过渡，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我们先过渡，苏联脸上无光，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无光，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渡。如果我们先人共产主义怎么办？还是挂社会主义招牌，行共产主义实质，有实无名”。

“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前人的乌托邦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⑯

五、刘少奇紧跟毛泽东“大跃进”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里，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的“旗手”与“旗帜”之间的关系，有着突出的表现。

除了对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刘少奇以“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形式，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进行详细而又全面的解释，从而令毛泽东感到十分满意之外，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每一部署，刘少奇都亦步亦趋地紧跟。

在中国建立“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为一体”的“人民公社”的构想，刘少奇就是毛泽东首先透露的对象之一。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刘少奇与周恩来、陆定一等人一起到达广州，同毛泽东讨论

准备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央委员会报告》草稿。当时，毛泽东向刘少奇说起几十年后中国的情景：

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教育事业，也将朝这个目标发展。⑰

受到毛泽东的感染，在由广州回北京（四月下旬）的火车上，便发生了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一起大吹“共产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那一幕。当火车到达河南省省会郑州时，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到车站迎送，刘少奇便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向他透露，并说他“可以试验一下”。刘少奇稍后回忆说：

公社这个名词，我记得，在这里（郑州火车站），跟灵芝同志谈过。在广州开会，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时任刘少奇政治秘书），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个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

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灵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探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那个时候，托儿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还

不叫公社，）工农商学兵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乡社合拼是老早就有的。陆定一回去，马上就编了那本书。八大二次会议，我去讲了一个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后头要北京试验，要天津（泛指河北省，因为当时天津市属河北省，是河北的省会作者注）试验。公社就是这样采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陆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发言里边讲了这个东西。⑱

河南省最先得知“大机”。于是“人民公社”便首先在河南省兴起。

在一九五八年中，刘少奇是宣传“人民公社”最积极、最热心的其中的一个。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

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中写的。康有为二十七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毛主席讲话时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毛主席讲两次，家庭要消灭。（刘少奇把办托儿所、公共食堂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的事业，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　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六月三十日，刘少奇同《北京日报》社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试验。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作工的净作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不能搞单打一，现在

农业合作社已开始办工厂、商业、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部有了。我看，三、四十年后可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⑲

七月五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问工人谈话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

七月十九日，刘少奇到达天津视察，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商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七月十四至十八日，刘少奇到山东视察，再一次讲了"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

对于"大跃进"，"十五年赶超英国"，刘少奇也十分热心而着力地宣传。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刘少奇在视察北京石景山发电厂时对工人说：你们谈的很好，我听了很高兴。这样做下去，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穷，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于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于完算数，有这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了。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⑳

一九五八年九月，刘少奇在江苏省视察时问一个乡党委书记：试验田的水稻每亩能打多少？这书记回答：可以打一万斤，刘少奇笑着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当地方负责人向他汇报劳动力紧张情况时，刘少奇说："人民公

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刘少奇还对各地从人民公社里组织大批“远征队”上山采矿，到城市炼钢铁的做法给予赞扬。他说：“现在各地方炼钢铁、采矿石、修水利都是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各人自带工具，自备粮食，或者实行粮食供给；或者是半供给半工资，这个办法很好，一个钢铁基地就集中了几千几万人。他们搭一个棚子睡在炉子旁边，生活虽很苦，干劲却很大，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精神，是新的劳动工资制度的萌芽，它给我们今后新办工厂的劳动制度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㉑

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发动“人民公社”运动，是向《三国志·张鲁传》和康有为的《大同书》“取经”的，从这些农业原始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先人的身上，毛泽东为自己的“理想王国”吸取思想养料。早在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谈到将来家庭的命运时，就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他说：“家庭是原始公社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曾提到此点”。在八月二十四日上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吃饭不要钱时就提到东汉的“五斗米教”，他说：“张道陵的每人出五斗米的教，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苏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大大小小一年三石六斗，就开量叫他吃。薛仁贵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我们搞公共食堂；也可以打回去吃。”

十二月三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即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再次谈到吃饭不要钱时，又讲了张陵的孙子张鲁的故事。他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搞。他统治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

十二月七日，毛泽东再次阅读“三国志·张鲁传”，写下了长篇的批语：

这里（指《张鲁传》——引者）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巾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克、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㉒

十二月十日，毛泽东又再写了另一条批语，并将《张鲁传》及批语印发给参加会议的中共各级领导人。批语写道：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使乐"，可见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且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

吃饭不要钱（目的似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教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史皆经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㉓

从这些讲话、批示中，可看到毛泽东对《大同书初《张鲁传》的原始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赞赏和认同，毛泽东与之产生思想共鸣，并将它们摄入自己的“理想王国”的蓝图之中。刘少奇明显地受到了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影响，也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与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曾经组织新村，日本也有个人组织新村，我在入党以前看过组织新村的材料，很形象化，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看了心里激动了”。八月六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到徐水县传达刘少奇关于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指示时，除了号召大家学习《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主义著作外，还把从北京带来的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徐水的领导人。据北京的党史专家考证，送《大同书》既不是陈正人，也不是刘少奇的意思，而是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讲话中（指一九五八年四月在广州的谈话），谈到《大同书》有直接关联。

刘少奇在一九五八年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的支持，无疑是真诚的、热心的。然而刘少奇不是“三面红旗”的始作俑者，他能以“旁观者”的客观的心态，不带主观意志，不带感情色彩地去观察事物。因此，当“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祸端百出之后，刘少奇就更愿意、更容易去接触实际，揭发错误，从而对“三面红旗”的检讨、反思也就更深刻一些。正是这一点，使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治联盟出现裂纹，并由此而酿成杀身之祸。

六、毛泽东不甘心让位　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

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发生了毛泽东忍痛让出“国家主席”的插曲。

“国家主席”是一九五四年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的，而第一任国家主席也是毛泽东。其实，早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刚成立时，毛泽东便担任了“主席”，但那时是叫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到一九五四年第一届人大时，才正名为“国家主席”。那时候，毛泽东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一身兼任六个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开了历史的先河。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后，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独裁一时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气候。中共中央顺应这个历史潮流，在“八大”会议上也提出了“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迷信”等政策。在这种大势所趋之下，加上中国对外交往日益扩大，涉外国务活动日渐繁多，一向讨厌繁文得礼的毛泽东不胜其烦。于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天提出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并说最迟不超过一九五八年底之前实践。

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在天安门城楼谈话时，透露了此意向。当时这些党外人士颇多不通。五月一日，陈叔通，黄炎培联名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在十五、二十年内，“最高领导人还是不变为好”，“集体领导中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着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五月五日，毛泽东看了信后批示：“可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但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以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

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

辞去国家主席意味着退居二线。然而到了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亲自到台前“挂帅”指挥“大跃进”（在此之前毛泽东甚少涉足国民经济），已经不愿退居二线了。然而说出的话如泼出的水，于是只好在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辞职。然而，在讨论国家主席的继任人时，毛泽东竟然一声不出。按常规，毛泽东作为中共第一把手，应当提出继任人选，供全会讨论，可是毛泽东却像事不关己似地沉默着。由于毛泽东的沉默，其他人也不便开口，会场上一时出现冷场。是邓小平打破这个沉默，说：“都不提，我提，刘少奇”。话刚落音，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于是刘少奇的任命便顺利通过。

国家主席的继任人选不是由毛泽东提出，而是由邓小平提出，这是十分不寻常的。在毛泽东的统治权术中，有一条叫做“权力平衡”。毛泽东作为“掌门人”，在权力的分配中，必须注意不可让某人或某一集团所获得的权力过多过大。否则就会坐大，威胁到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中共的核心领导中论资历、水平、威望，除了毛泽东便是刘少奇了，刘少奇当时已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再担任国家主席，其权力就太多大重了，权力架构的平衡就会打破，毛泽东的地位就要受到威胁。毛泽东不希望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但不能，也没有理由出面反对。这就是毛泽东矛盾的心理状态，也是他沉默的原因所在。

与一九四二年对刘少奇的安危牵肠挂肚相比，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情谊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当年的那份纯真已不复再。现在，在毛泽东的心中，刘少奇是战友，但更大的程度上是潜在的、具有巨大威

胁的对手。

---

①②⑧⑪：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③：谢春涛《大跃进狂澜》六〇一六四页。

④：引自林蕴晖、顾训中《人民公社狂想曲》。

⑤：引自贾思摘《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

⑥⑦⑨⑩：同④三二九、三二五、三〇五页。见《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一日。

⑬：引自苏晓康等《乌托邦祭》。

⑭：同④。

⑮：见权延赤《生活中的领袖们》。

⑯：引自苏晓康等《乌托邦祭》、林蕴晖、顾训中《人民公社狂想曲》、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⑰⑱：同①。

⑲：引自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一七四——一七五页。

⑳㉑：引自《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六三——六六页。

㉒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六二七——六三〇页。

㉔：见贾思楠《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二〇二页。

第二章　庐山会议：毛挟刘肃整彭德怀

一、“大跃进”紧急刹车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高潮是在九、十月。然而，刚进入高潮不久，毛泽东便看出问题了。

问题一，是一九五八年系“大丰收之年”，然而奇怪的是，在这样的好年景下，城市里竟然缺粮、缺菜、缺肉、缺蛋，总之是能够吃的都缺。

问题二，是由于“大跃进”，基建项目“大干快上”，又“大炼钢铁”，将资金、原材料、电力、交通运输等都额外占用了，挤了轻工业。致使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的轻工用品十分紧缺，商店里的货架空空如也。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亦说：“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毛泽东在彭德怀面前是打肿脸充胖子，“大跃进”后岂只头发卡子、肥皂太少，人民吃穿用的，如牙膏牙刷，毛巾手绢、衣帽鞋子，连锅碗瓢盆，所有的东西都一下子不见了。

问题三，是“大跃进”还挤掉了外贸出口，大批工厂停工待料，出口商品信誉扫地，出口瑞士的煤炭，三分之一是石头，外贸逆差达七个亿。

此外，由于财政结余用光，出现大量赤字，银行只好增发钞票，

造成通货膨胀，物价腾贵，国民经济出现了建国以来罕见的危机。

一方面是“千军鼓足干劲，万马力争上游”的热气腾腾的局面，另一方面却是困窘处处可见，危机重重迫人。毛泽东心知不妙，于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离开北京，外出视察，以求弄清真实情况。就所了解到的情况，毛泽东开始情急似火，心忧如焚。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亲自在郑州主持召开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部分省、市的领导人，大家广泛地讨论了人民公社运动出现的种种问题。这就是开始刹车纠“左”的第一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开始向各路诸侯发出“降温”的指示。

十一月五日，柯庆施向毛泽东汇报上海市人心浮动、思想混乱的情况。

其他省市领导人如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等均不约而同地反映人民怕废除钞票，怕归公，因而发生了挤提和抢购。

毛泽东说：废除货币，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北京现在也乱得很，我们没有章程，天下大乱。

毛泽东在会上还说：“现在开的支票（指经济指标）太大了”，“真是逼死人，脑筋里头就是钢，农业没有人抓了”。他劝各地诸侯“还是社会主义为题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不去赶美，只赶英国”。几个月前那种“两年超过英国，七年赶上美国”的干云豪气，一改尽洗。

毛泽东在华北平原一带视察的同时，刘少奇也在十月十五日离京到华东视察。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在“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等问题上。而刘少奇似乎是注意工业、文教等诸方面。在杭州，刘少奇视察了浙江大学，还与省委书记江华等人谈话，说：

要大力发展生产，使群众有足够的肉、蛋、油、糖吃，而且要办好公共福利事业。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不要滥用，马克思、列宁说的共产主义是高标准的。虚报浮夸当然不好，有些地方一

下模不准确是难免的，但是故意假报就不好，现在许多地方的产量都要打折扣。报纸登的不符合实际，不能全怪报纸，是你们地委县委自己报的，地委县委书记签过字的。问题是干部作风问题，对于这种作风要批评。要反对说假话，要反对这种虚报浮夸的作风，要踏实一点。①

刘少奇谈话的调子，与几个月前的“空想主义的理想，我们也要实现”相比，显然也低调了许多。刘少奇在浙江接到通知，于十一月七日赶到郑州，参加第一次郑州会议。至此，刘少奇才知道毛泽东开始“纠左”。

入冬以后，“人民公社”的弊端进一步暴露。不少农村开始缺粮，公共食堂断炊，农民外出逃荒。为了尽快扭转形势，毛泽东接连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武昌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一九五九年一月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三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四月二日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短短的时间内频频地召开这么多的大型会议，这在中共党史上还是第一次。“大跃进”、“人民公社”所造成的危机之严重、情况之紧迫，以及毛泽东心清之急切，由此可见一斑。

二、毛刘的分歧

毛泽东是“三面红旗”的始作俑者，它们是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集大成者。而刘少奇虽然也说了一些大话、空话、昏话，但他只是个追随者。

因此，如何看待“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毛、刘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将自己与“三面红旗”牢牢地挂在一起。为了自己的声誉、威望，毛泽东要千方百计地为它们辩护，要不惜代价地

捍卫它们。因此毛泽东的立场是不自由的，思想是不客观的，对一九五八年闯下的大祸，他不可能有实事求是的，彻底的认识，而且不认错，不服输，从而制造了更多的错误和更大的灾难。“三面红旗”成为毛泽东沉重的政治包袱，负着它，毛泽东艰难地走完了最后的二十年。

刘少奇的处境完全不一样，他没有毛泽东的那些束缚和包袱，他是自由的、客观的，他对局势看得更深更透。他唯一的束缚是“旗手”的角色。可是，当他在真理与谬误，人民与领袖，革命与个人之间作出正确的抉择之后，他就能够摆脱这种束缚，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了。

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矛盾、斗争，以至最后的决裂，便是由此而引起。

首先，毛泽东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一九五八年成绩是主要的，是九个指头，而缺点和错误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大原则、大前提；

其次，一九五八年的缺点错误的性质，毛泽东认为只是缺乏经验，具体措施不完善，尤其是下面各级官员执行不力、贯彻不好而造成的。毛泽东说：“去年情况本来很好，但带来一些盲合性，只想好的一面，没想到困难的一面”：

毛泽东并没有认为自己是“左倾冒险主义”，他要纠正的，是下面各级官员比他还要“左”的“超左”，和各个方面的混乱，稍加整顿，以便更好地“大跃进”。因此，毛泽东说人民在一九五八年表现出来的热情与积极性很宝贵，不可泼冷水，“气可鼓不可泄”，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否则就是原则性的错误；

对一九五八年的缺点错误，在毛泽东来说，就事论事可以，但绝不能“上网上线”，不可以牵涉“路线”、“主义”这些重要问题，也不可以联系到“思想意识”、“政治作风”（如骄傲自满）等敏感部位。而且，对缺点和错误，毛泽东自己讲可以，别人的批评，尤其是那些毛泽东不喜欢的人的批评，毛泽东就感到特别刺耳，难以接受，从而认为是“别有用心”。

因此，毛泽东一方面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大讲“压缩空气”，“反冒进”，“当一点右派”，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另一方面，在十一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看到山东范县提出的一九六〇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当即批示：“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乎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②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十一月三日的会议上大赞三国时候张鲁的五斗米道。在十二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更批印了《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发给与会的各级官员。

在大灾大难临头，在开始纠正错误的时候，毛泽东还如此崇尚古人的原始社会主义，毛泽东对那个“平均、公有”的农业社会主义社会之迷恋、执着，可见一斑；而毛泽东对一九五八年的缺点错误的认识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到了一九五九年夏天，毛泽东认为经过八个月紧张而艰苦的“纠左”工作，情况已经清楚，问题也得到或正在解决，形势已开始好转，紧张而沉重的心情可以放松。下一步是让全党总结经验，统一思想，部署好今后的工作，以便继续“大跃进”。在这种思想之下，毛泽东认为在炎炎仲夏中上庐山开会，既可以避暑，又可以远离尘嚣，松驰精神，过一阵“闲云野鹤”的生活。而庐山是天下名山，历史古迹多，神仙故事多，于是便将初期的庐山会议称为“神仙会”。

三、毛泽东的“钓鱼”与彭德怀的“为民鼓胡咙”

在庐山上，最敢讲缺点错误的是彭德怀，那沙哑、厚重的湖南口音，不时地从西北组传来：“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

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

“裤子要自己脱，不要人家拉嘛。江西现在还讲去年增产百分之六十七多。这是脱了外裤，留了村裤，要一次脱光，省得被动！”

“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全民办工厂，限额以下搞了一万三千多个，现在怎么办？每个协作区、省都要搞个工业系统，不是一、两个计划的事情。”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容易犯右的错误，与资产阶级决裂容易犯‘左’的错误。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发生的，从去年九月到十一月，而影响不只三个月，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

“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一大堆，对广开言路很不利。有些人就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周小舟那天对我说，去年的粮食造了假！我不敢相信，他说，数字是压出来的，报一次数字上去，上面说不落实，第二次报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假，下面干部就摸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

“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也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的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之下，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③

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并没有如实地传达到毛泽东那里。会议印发的《简报》中，把彭德怀意见中那些言词最尖锐的部分，特别是涉及到毛泽东的一些话，都删去了。发现这种情况，令彭德怀很不满意。

在这种形势下，彭德怀决定给毛泽东写信，系统提出自己的意见，并说明“给你作参考”。

薄一波在回顾庐山会议这段历史时，说自己有两点不明之处。

其一，是他（指毛泽东）曾不知多少次地讲过，在党内要畅所欲言，敢于讲真话，领导者要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并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处理党内矛盾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然而，在庐山上这些优良传统却遭到了破坏。如前所说，彭德怀同志作为政治局委员给中央主席写信，这是完全正常的。按党章规定，这是每个党员都有的权利。怎么彭德怀同志写信就成了“下战书”？他的信上明明写着“供参考”，怎么能说他的目的是“争取市场，组织队伍”？这样的政治判断，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毛主席虽然一再表示，“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的身上”，并讲：“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而庐山会议的事实表明，毛主席有错误自己讲可以，别人讲，就听不大进去了，特别是过去有些积怨的同志讲就更听不进去了，这应该说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庐山会议期间’七月四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处同王任重等同志谈话时，念起明代杨继盛《号椒山》的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并说这是椒山先生名句，他从青年时代就喜欢，且照此去做。遗憾的是，在庐山会议上，他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共产党人有了缺点、错误，自己讲出来，作自我批评，诚然可贵，同时也应让别人讲，欢迎别人进行批评，应该有让人“面折其过”的政治雅量。当然，这是需要有很高的党性修养的，要做到、做得好就更不容易了。毛主席的党性原则、党性修养不可谓不高，大家对此都是景仰不已的。何以到了庐山会议上，却未能实践“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究竟还有些什么思想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我一直在思索，至今也尚未得到满意的答案。大家还可以继续研究。

毛主席历来提倡尊重实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比如，据周谷城同志回忆，有一次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他和毛主席进行交谈中，毛主席谈到西汉的赵充国时说：赵充国主张在西北边疆实行屯田，这个人

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到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赞成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反对的却只有十分之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又比如，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毛主席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建议他读一读《汉书·贾谊传》并说，贾谊的《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读”。贾谊给汉文帝的《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它为国家长治久安提出一些谋策，虽措词激烈，但切中时弊，毛主席称它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足见他是很赞赏贾谊的居安思危、痛陈弊端、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精神的。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几乎就在他赞扬这些古人，推崇他们上书的同时，当彭德怀同志把他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和流弊写成信件，并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居安思危的忧虑和意见，送给毛主席后，毛主席却没有称赞彭德怀同志“能坚持真理”，像看待赵充国那样，也没有称赞他的“上书”是“切中当时事理”的“政论”，像看待贾谊的上书那样，反而把彭德怀同志的信看成是“反党的意见书”，并给他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帽子。毛主席评古人的话和评彭德怀的信两相比较，反差何以如此之大，这中间是何缘故？大家也还可以继续研究。④

薄一波的问题谁也解答不了，恐怕只有毛泽东自己才能回答。然而，据李锐说：“按照黄克诚后来同我谈过的，他们两人（指毛泽东与彭德怀）相互成见很深，有许多历史上的疙瘩没有解开。上海会议上主席做报告批评了一些人的时候，讲过一句话：‘彭德怀是把我恨得要死的’，以此作为印证，黄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和一九五九年四月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都呼吁“团结”，讲到要警惕党发生分裂问题。后来毛泽东自认那是针对彭德怀而讲的。毛泽东已经预料到，“大跃进”出了大纸漏后，在党内彭德怀一类的人要出来骂

娘。于是先打个“招呼”。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还大讲海瑞，提倡学习海瑞，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

“刚直不阿”，人们首先便会想到彭德怀。对此，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梅白曾有一段回忆：

一九五九年四月初，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了八届七中全会。会前，我到毛泽东那里去，他便问我：“你认不认识海瑞？”又说：“我希望中国能多出几个海瑞”。我问：“是不是‘钓鱼’？”他说：“不是”。第二天，毛泽东在会上讲了海瑞。会后，他对我说：“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他还说：“我把问题交给少奇、恩来他们办，自己退到二线。但过一段后又‘不安分’，实际上还是一线。张文伯先生在湖北时建议我少过问具体事，多考虑方向性的问题，不要以个人意志代替大多数人的思考，但我不放心”。⑤

毛泽东说不是“钓鱼”，但李锐说：“后来也曾听有的老同志谈到，上海会议时讲海瑞问题；就是“钓鱼’，就是‘引蛇出洞’。我认为，‘五九年的夏季形势’是否可以套用‘五七年的夏季形势’，这个问题有待史学家研究”。

确实的情况是，上海会议结束后，彭德怀找来了有《海瑞传》的那一卷《明史》，有半个月的时间，这本线装书常置彭德怀的案头。彭德怀是上钩的鱼。

对彭德怀的信，毛泽东很快就作出反应：于七月十六日，批示印发给大会，并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在中央常委会上还说“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毛泽东还指示：让彭真、陈毅、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同志也上山来，参加会议。“如果林彪同志身体可以，也请他来”。

薄一波、安子文是一九四五年在延安的华北会议上整彭德怀的主

要人物。将他们召上山，是纠集反彭的政治力量。而黄克诚后来说："当时毛主席临时通知我上庐山参加会议，是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凑班子的。既叫'反党集团'，总不能只有一个人。你们想想，彭德怀搞'反党集团'，要是没有黄克诚参加，谁会相信?!"⑥

四、庐山上的刘少奇

当时在庐山上的中央常委除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人。林彪与陈云均因病请假到这时候，刘少奇还摸不清毛泽东的底细。他说：

"主席，下面的讨论，如何进行呢？"这既是试探，又是请示，因为刘少奇是大会的主持者。

"你说呢？"毛泽东反问道。

"我看还是按照成绩讲够，缺点讲透这个精神，再用一周时间，让大家把各种意见都讲出来。"刘少奇说道。

"好的，就按少奇说的办"。毛泽东并没有透露他的计划。

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对庐山会议的前半段，有以下的回忆：

少奇同志在庐山的住处是一幢非常漂亮别致的小洋楼。据说是原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的别墅。

七月十六日，我收到会务组送来的题目是"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打印件，即彭德怀同志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我失声念了出来。"什么内容？"当时在场的吴振英、李福坤等同志都想知道其内容。

我念完之后，马上送给了少奇同志。回到办公室时，大家正在议论这封信。

"作为总结经验教训的东西，彭老总的信是开会以来讲的比较具体比较深刻的一个，和我们平时议论的内容一样，句句都是事实，也代表了我们的想法。"

“彭老总不愧是个武将，敢于提意见，敢于承认错误，正如他在信中所说‘类似张飞’。”……

大家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很快，会务组又印发了张闻天同志在华东小组会上的发言。他的发言也肯定了成绩，批评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批评了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片面性，特别强调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

大家又议论了一番。认为“同彭老总的意见书讲的基本一致，但分析得更透彻更深刻，更有说服力。”众口称赞张闻天同志“不愧是个秀才，是个理论家。”

光美同志是个热情健谈的人。她在工作和学习方面很愿意和同志交流思想。我和她谈思想讲认识，也很随便，没有什么顾虑。有一天，我把大家议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和张闻天同志的发言的情况向她谈了以后，她说：“大家有什么想法，还是讲出来好。少奇同志不是说成绩讲够，缺点讲透嘛。当面不让人家讲，人家就会背后讲，我们虽然不参加会，但也会有想法和看法。彭德怀的意见书和张闻天的发言，虽然尖锐了一点，也是符合组织原则的，党的会议嘛，而且他们讲的一些具体事情也是符合事实的。”⑦

王光美的这一番话，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刘少奇的意见。

而彭德怀的秘书在回忆录中说了彭德怀准备写信时，秘书劝他不要写：“少奇、总理他们了解的情况很多，你没有管经济，没有他们了解得多，你能不能同他们谈谈，请他们去同主席讲会更方便些吧！”

提到少奇同志，彭摇了摇头说：“他的处境也很难。恩来受了好几次批评了，哪里还敢再讲话！”实际上，自从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共中央常委中，是有人不敢讲，有人不多讲，有人不想讲。毛泽东与他们之间，就像老子与儿子一样。

毛泽东上庐山后住在“美庐”（那是蒋介石、宋美龄的避暑别墅），开始时只是一个人闷在房里看书；午后，美庐的工作人员常见他或坐

在阳台上对着斜阳抽烟，或在后面的竹林里独自徘徊，或是绕着院子里的长方形水池踱步，有时，还看见他坐在楼梯上发呆，垂着头，敞着衬衫，神情恍惚。

批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美庐热闹起来，毛泽东传召的一些人，如柯庆施、罗瑞卿、谭震林、康生、李井泉等等，频频出入美庐。

李锐说："七月十九或二十日，晚上跳舞时，我坐在总理的旁边，我有意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总理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总理一直在主持国务院会议，在抓计委，急着安排好今明两年计划。七月二十二日下午，政治局还开会修改《议定记录》草稿。"《议定记录》全名是《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那是在"神仙会"阶段的安排，将会议对毛泽东提出的十九个问题的讨论总结一下，作为"会议纪要"，会议通过后便结束，大家下山，各奔前程。负责起草的是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吴冷西和李锐。

二十二日晚上，政治局又开会讨论了《议定纪录》。刘少奇有些着急，他希望尽早定稿，因为会议延长一周的期限已到，时间不多了。

七月二十二日晚发生的事情，有如下的记述：

晚上，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一直开到深夜。

十二点钟，刘少奇别墅"一二四"号楼下警卫值班室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值班警卫接了电话，连忙告诉秘书：

"毛主席的秘书来电话，说请刘少奇同志立即到他那儿去。主席一定要这边回话，少奇同志人在不在？去不去？都要告诉主席。"

上庐山来二十多天，毛泽东处来的电话，头一次这样嘱咐。"哦？"秘书心里一沉，刚转身想上楼，护士拦住了。

"哎呀，刘主席睡前吃了安眠药，有四十分钟了，药性刚起作用！"

"是不是告诉主席，少奇同志吃了安眠药，早就睡了。"保健医生

建议，“不要告诉少奇同志吧？”

秘书垂着头，在迟疑。他懂得这样晚来电话是不一般的，不能不报告。他脚步轻轻地上楼。站在门口他又迟疑了片刻，终于抬手按了门铃。轻柔的铃声透过木质的门板。他退几步，身子倚着走廊的墙。

一会儿，王光美开门出来，顺手把门掩上，轻声说：

“有事找刘少奇？”

秘书说了。

“可是他……他吃了安眠药，已经睡熟了。”王光美两个手掌下意识地握着：“这两天他太累了。你也知道，那天他从床上摔下来了……。”

是的，那天晚上，王光美忽然在楼上喊医生。原来，刘少奇上床，一阵目眩，从床上栽下来。王光美哭了。可是，此刻她揣模了一番美庐电话的口吻：“人在不在？来不来？都要告诉我一声。”这显然是命令。她猛地清醒了。

“哦，我还是叫醒他！你立刻给美庐回电话，说少奇同志就来。”

“药正在起作用，可不要摔倒了！”保健医生也来了。说道。在这里的江西省公安厅一位副厅长也上楼了。

门敞开了。已经穿好制服的刘少奇，被王光美搀扶着，拖着脚往外移步，双目极力欲睁，却又深重地瞌上。副厅长和秘书立即上前，让王光美慢慢闪开，一左一右一搀扶着下楼。

出门。秋凉的夜风吹起他那一绺绺或灰或白的薄发，他打了个寒噤。王光美急忙给他披上风衣。

从“一二四”号到美庐，不到二百米，下坡路。那位副厅长和秘书架着昏昏沉沉的刘少奇，配合他的步子，踉踉跄跄往前挪着。王光美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他被夜风吹醒了些。到美庐门口他说：

“你们回去吧。”

“等会儿来电话，我们来接你。”

约摸三点钟，他们去接了。

来接的还有其它中央常委的警卫、秘书。

据当年此夜在美庐值班的一位烧锅炉的工人后来回忆道："我在锅炉房守夜，忽然发现后院竹林有个亮点，晃来晃去，不知是什么东西？再仔细看了一会，这么晚了？好一阵子，那人才从竹林里出来，我一看，妈呀，是毛主席！天亮后我去那里转了转，见林子里扔了一地的烟屁股……"

文中有一点不正确的，是说刘少奇从床上栽下来的时间在七月二十三日之前。其实，应该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之后发生的，据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回忆：

七月二十三日，振英跟少奇民志从会场回来，一进办公室就压低声音对我说："不得了啦，毛主席发火啦！毛主席在会上对彭老总的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他'右'倾动摇，同党外的右派一样，向党进攻，会场的气氛非常紧张。看吧，热闹还在后头哩。我们议论了半天，竟然一点问题也没看出来。"

果然如此，会议简报上的批判言词一天比一天尖锐，扣给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帽子也一天比一天多、一天比一天大。神仙会的气氛早已荡然无存了。

随着对彭、张等人批判的升级，大家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了，面孔的表情也严肃起来了。有一天，光美同志问我："大家有什么新的议论？"我说："我们对目前的局势都感到很突然，开始时谁也没有看出问题，更没有看到彭、张的言论会引出这么大的乱子。"

"这次庐山会议，由纠'左'发展到反右，确实出乎预料。彭、张的意见也是想反"左"的。大家都有个认识过程。我们党有个规矩，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要服从中央的决议"。光美同志说话时表情严肃，而且我感到她也不像以前那样直爽了。

有一天下午，我接到毛主席的卫士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邀请光美同志到芦林水库去游泳。我告诉光美同志后，她感到有些惊奇："毛

主席怎么约我去游泳？”既像问我，又像问她自己。我说：“毛主席可能还有别的事吧。”她迅速找出游泳衣赶到毛主席那里去了。

大约两个小时后！光美同志游泳回来了。我看到她兴高采烈的样子，便急匆匆地问：“游得怎样？”“毛主席说我游得及格！”她笑着回答我。

过了一会儿，她对我说：“毛主席约我去游泳，没有说别的事，只是关切地问我少奇同志的身体怎么样，我告诉他，少奇同志的肩周炎还没有好，最近工作繁忙，很疲劳，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毛主席听完后，认真地说：‘请你转告少奇同志，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开完会后让他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光美同志虽然说得很轻松，但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自从彭、黄、张、周问题出来后，少奇同志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他除了开会就是看文件、与找来的同志谈话或者是长时间地思索，在吞云吐雾中，他沉浸于思想的海洋里。他拒绝参加一切娱乐活动，谁劝也不去。我们工作人员和光美同志一样只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谁对他也无可奈何。

一次，在我们住处工作的江西籍的工作人员想同少奇同志照张相，留个纪念。当振英向少奇同志报告时，他很不耐烦地说：“会议不是延长了嘛，走的时候再说。”振英讨了个没趣后，对我们说：“少奇同志最近心情不好，可能是与会议有关，请大家注意点。”

一天凌晨四点多钟，一阵急促的电铃把我从梦中惊醒。我立即跑到了少奇同志的卧室，一看，光美同志正神情紧张地扶着倒在地板上已睡香了的少奇同志，我也被惊呆了，片刻后我才叫来卫士和医生，我们一起把他抬到床上。医生迅速地为少奇同志量了血压、模了脉，并对光美同志和大家说：“不必紧张，血压和脉搏都比较正常。”然接他从少奇同志床边的小柜上拿起安眠药瓶看后说：“问题就出在这上面，药吃多了。”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少奇同志服过安眠药后，又看了一会儿文件，他站起来准备上厕所时突然摔倒了。”光美同志向医生解释说。

医生安慰光美同志几句后说："少奇同志疲劳过度，加上又吃多了安眠药，这种情况谁也受不了的。让他好好睡一觉就好了。"

这天下午，少奇同志起床后，光美向他叙述了凌晨发生的可怕的事情，少奇同志笑了一下，说："我不知道。"然后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⑨

毛泽东邀请王光美去游泳，是有意拉拢刘少奇。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急需刘少奇的支持，以打倒彭德怀。

五、毛泽东收起罗网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终于向彭德怀发出攻击，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落入毛泽东预设的罗网中。庐山上的政治风向逆转，由"纠左"转向"反右倾"，而中国也就滑入灾难的深渊。打倒彭德怀，对毛泽东来说是蓄谋已久，但对刘少奇来说，却是晴天霹雳。刘少奇不得不再次附和毛泽东的决定。

此后，庐山会议转入批判彭德怀"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的斗争。从八月二日起，更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作出组织处分。

毛泽东一开始就决心要将彭德怀置于死地。毛泽东说："对事，也要对人"，"要算历史总帐"。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对彭德怀的结论。会上，周恩来说："对彭的问题还要三七开，不要全盘否定"。刘少奇、朱德等均表示同意。

"看来我只好再上井岗山了。"毛泽东克制着愤怒，意味深长地说。

至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才明白，对彭德怀，毛泽东并不想"治病救人"，而是要一棍子打死。朱德叹息道："怎么能想象，当年是在一个锅里吃饭的呵！"

在毛泽东的威迫下，刘少奇不得不执行毛泽东的意旨，批判彭德怀。毛泽东亲自主持，两次召集中央常委会，给彭德怀算历史总帐，

参加者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旁听。主讲者是毛泽东，其他人间有插话。毛泽东对彭德怀作的结论是："合作与不合作是三七开"。于是从历史上数落彭德怀屡次的"不合作"，由平江起义讲到抗美援朝，从井岗山讲到延安，从攻打长沙讲到百团大战，从军事讲到哲学，从马克思讲到列宁，以此证明彭德怀历来反对自己，这就是彭德怀三顶大帽于之"反对毛主席"的根据和由来。

在第二次的常委会上，朱德先发言，态度比较温和，没有击中要害，毛泽东使用"隔靴搔痒"的动作当众奚落朱德，弄得朱德脸"红，就停止了发言。接着是林彪发言，他言简意赅，可谓"击中要害"。林彪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式的人物"。毛泽东便将林彪的话作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和批斗彭德怀的基调。

刘少奇是在第二次常委会上发言批判彭德怀的。刘少奇说：

我们长征中认识，认为你爽直，对同志、友邻部队都照顾，感觉政治开展。也注意政治。一件事感觉不好：会理会议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主席：电报张飞会打，曹操不打。）（：林彪：有意见向下讲，不向上讲。组织原则问题。）以后想权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别性少提，但搞不好，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主席：交不亲的朋友）一下冒犯了。打击时，是敌对态度，当然也不总是采取敌对。（主席：对抗性有几种横直不合作，敌视，有意见不讲，另一种即敌我阶级斗争。前者意识形态不同，观点不同，谈不来，客客气气敷衍，谈的来无所不谈。）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指一九四五年延安召开的整彭德怀的会议——作者注）。（主席：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做报告，怕做不好，

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做为好。有人要求彭去党校讲讲。何必去党校作报告。不开会，也势必做不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四十天娘。）帐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主席：关向应讲中了，你这人是搞派别活动的。）值得反省，有些不满并没有讲出来，延安整风审干，也不满意我。（主席：这是我的责任，好、坏都负责，九条方针没有照办，相当长时期下面未执行。北京后来审干反右，自杀也几十个。还是犯左的错误，罗瑞卿他们负责的。）感觉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当面讲这些话。⑪

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七月二十二三日上午毛泽东发动对彭德怀的攻击后，散会时刘少奇将毛泽东的秘书、负责起草"会议纪要"的胡乔木邀进自己的住处，并留他一起吃午饭。发生了这样大的逆转，那个"纠左"的"会议纪要"还要不要继续写下去呢？"纠左"还要不要搞下去呢？两人在饭桌上谈论了这个问题。最后，刘少奇明确地向胡乔木说：文件你们还是接着写。⑫

对此事胡乔木事后有如下回忆："庐山会议在毛主席讲话以后，少奇同志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他要我起草，我感到不好写。我对他说，是不是同主席谈一下。少奇同志生气了，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后来我请彭真同志找少奇同志谈，决定不写了。现在看来，如果写出来，少奇同志也要牵进去。（一九六一年）从广州回来时，在路上我向毛主席说少奇同志在庐山会议时曾经想提出写个反'左'文件的建议，毛主席听后没有表示什么，只是

说：‘呵，有这回事！’后来开工作会议，少奇同志在这件事上对我批评得很厉害。”⑬

然而，在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的文件却是《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纠左”的《议定记录》作废。在全会召开期间，刘少奇又曾找过胡乔木，提出把反右倾的决议只发到省一级，另搞一个继续“纠左”的决议发到县以下单位。但胡乔木回答：“在目前的形势下，已是办不到了”。刘少奇是中共中央第二把手，对党的工作有建议，却不敢向毛泽东提，而是向毛泽东的秘书提。刘少奇是希望胡乔木能把他的意见向毛泽东转达。然而，刘少奇怕毛泽东，胡乔木就更怕毛泽东。胡乔木没有转达刘少奇的意见。

从庐山回到北京后，彭德怀与张闻天曾分别找刘少奇谈话。下面是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的有关回忆：

从庐山开会回来不久，一天上午十点钟，彭德怀同志独自一人散步时，来到了少奇同志家的大门口。哨兵按了门铃、我出去一看是彭老总，便赶快把他领进我们办公室里。

我一边请彭老总坐，一边说：“少奇同志还没有起床，你要现在找他，我可以把他叫起来。”

彭老总摆摆手说：“不，不，不要叫。”

“少奇同志什么时候可以起床？”他问。

“通常要到下午两点钟左右”。我答。

“想汇报汇报思想。”彭老总像是对我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声音很轻。

我马上对他说：“那等少奇同志起床后，我就立即通知你。”

“不用通知我，中午我也要休息一会儿，看情况自己再来吧。”说罢，他站起来，转身看着我们的书架子，并问：“有什么好书呀？”

“你觉得哪本书有用就拿去看吧！”我顺水推舟。

“我现在要研究经济哆。”大概那一架子书中没有他需要的书，他说完就向外走去。

我跟在他后面，小心翼翼地把他送出大门，看到他还着方步，用右手背拍着左手掌，迈一步拍一下，慢慢悠悠，显得悠闲自在。

看着他慢慢远去的身影，突然一股酸楚涌上了我的心头，这就是那位被毛主席称赞为“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元帅吗？

少奇同志起床后，我把彭老总来的事向他报告了，并说：“下午，他可能还会来。”“那好哇！”少奇同志说。下午三点多钟，彭老总果然又来了，我把他直接领到了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少奇同志看到彭老总进来了，赶忙站起来，伸出双手热情地同彭老总握手问候。我马上退了出来，他们谈了些什么我当然不知道。

过了几天，张闻天同志来电话说，想来同少奇同志谈谈，并用担心的口气问我：“不知道行不行？”我马上报告了少奇同志。他说：“哪有不行之理？他什么时间来都可以，如果方便的话，请他现在就来吧！”

我打完电话后，张闻天同志很快就来了。这次，他们也谈了很长时间。张闻天同志告辞时，少奇同志还下楼把他送出了大门口。

这两件本来并不复杂的事情到了一九六七年的春天，似乎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阴谋。当时在江青、康生的操纵下，中央文革的专案组抄了少奇同志的家，把我们秘书的值班日记也统统抄走了。他们发现了少奇同志同彭老总、张闻天谈话的记载后，便派人到中央办公厅学习班找我，追问：“刘少奇同彭德怀、张闻天谈话的详细记录在哪里？”我说：“少奇同志约人谈话，秘书是不参加的，包括王光美在内。他们的谈话也不会有什么记录。”对我的回答，专案组当然大为不满。

后来，在批判少奇同志时，说他在庐山会议之后还继续勾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搞阴谋活动，就是说的这件事。其实，即使少奇同志对彭德怀、张闻天同志有同情之心，当时他也不会背离中央的决议精神去谈问题，更不会搞什么阴谋。然而，在“文革”那个疯狂的年代，谁会去澄清这些事实呢？

六、毛授意刘搞个人崇拜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获得了胜利，但他知道这只是表面的，他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与威胁，急需个人崇拜，以便继续推行农业社会主义。于是，在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给刘少奇出了个题目："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和"关于所谓个人崇拜问题"。对此，刘少奇在八月十七日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及九月九日在北京的批斗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共讲了两次。刘少奇说：

"第二个问题，所谓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在苏联共产党二十次大会以后，在我们党里面有人要在中国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或者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一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后期'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这些问题。"

"要在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中间建立威信，被六亿五千万人口所承认，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这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斗争考验才建立起来的。一个有威信的党，这个党又是由多少固定的、被称为领袖的、最有威信的、最有经验、最有影响的那样的集团来主持，这是几十年形成起来，才有可能把六亿五千万人民团结起来。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才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且战胜资产阶级、动员几亿人口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没有这种威信，特别是没有多少个人的威信，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破坏这种威信，就等于破坏革命和建设，为反动派效劳。"

"……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党里面一要有领袖，要有领袖，就要有威信。在那个时期，彭德怀同志是反对在党章写那一条的。在二十次大会后他是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的。但是在不久以后，在北戴河讨论'八大'的党章的时候，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那一条没写上去，彭德怀同志提议要加上那一条。当时我的答覆是这样。我说：'七大'那个时候有必要写这一

条，‘八大’这个党章没有必要了，可以不写，就是这么简单答覆的。我想，我是积极搞提高某些个人威信的。”

刘少奇又说：“我这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会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有人借着苏联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要在中国反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完全错误的，是一种破坏活动，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破坏活动。”⑮

从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需要个人崇拜，到庐山会议和军委会议上刘少奇说要搞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就在中共全党明确地树立起来了。个人崇拜这个恶魔一旦放出去，就很难收回来。只经过短短的八年，要搞毛泽东和林彪的个人崇拜的刘少奇，就被毛泽东和林彪打倒了，并被折磨至死。这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和悲剧。

---

①：见黄峥《刘少奇一生》。

②④：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③：引自苏晓康的《乌托邦祭》

⑤：贾思柄：《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一六五页。

⑥：《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二五五页，人民出版社。

⑦⑨：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八三页

⑧⑩：同⑤二〇九页。

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⑬：《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五页。

⑫⑭：同⑦。

⑮：引自苏晓康《乌托邦祭》及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

第三章　“继续大跃进”与史无前例大灾难

一、继续“大跃进”

打倒彭德怀的反动，便是继续“大跃进”和“更大的跃进”。

为了反击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被认为是协调、正常；得不偿失的大炼钢铁，被认为是取得巨大的成就；全面紧张的市场供应，被说成是“供应情况良好”；供给制等平均主义的做法，被当作共产主义的萌芽；不得人心的农村公共食堂，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阵地”。毛泽东不惜将谬误说成是真理，将失败说成成就，将国民经济这辆不胜负荷的车子，继续向更“左”的道路上驶去。

庐山会议以后，喊得最多最响的口号是：“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国民经济的大跃进”。为了反击国内外“敌人”对“大跃进”的“诬蔑、攻击”，为了表明反“右倾”对革命干劲的鼓舞和对经济建设的促进，各地区、各总站又对生产建设的各项指标进行不断的加码。

在基本建设方面，一九五九年九月二日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确定新上限额以外的基本建设项目二百三十个；十一月二十二日又追加基建投资 13.6 亿元。然而由于层层加码，到年底，全国基本建设投资达到 349.7 亿元，比基建急剧膨胀的一九五八年还多 80.7 亿元，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在农业方面，中共中央提出“力争在原定的农副业总产值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十左右的计划之外，再增加33.5亿元以上的产值，使一九五九年的农副业总产值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十五”，“仍能实现大跃进”。

工业生产方面，在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六日召开的全国工业生产会议上又制定了一九五九年第四季度的新的“跃进”计划，将钢等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全面提高。经过全力的拼搏，到一九五九年年底，钢产量达到一三三五万吨，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七，工业总产值达到一六三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九。

与此同时，一九五九年十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农业书记会议，提出由基本队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问题。一九六〇年一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所有制向基本社所有制过渡的计划。这是毛泽东的新的战略部署，也是他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末至一九六〇年春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再次论述了关于中国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见解。他说；“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的第五段，现在证明是正确的。首先社有化，然后国有化，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我们提出首先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使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前一种过渡，就是要把农业生产资料统统变为国有，把农民统统变为国家的农业工人，由国家发工资，主要的步骤，将是在社有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社有经济占到了全社经济的一半以上；实现由基本队有到基本社的转变。这样，再变为国有就好办多了。”他指出：“将来我们的农村，不只是土地国有化，而是一切国有化”。

在这里，毛泽东描绘了一幅中国农业生产发展的道路；通过生产资料从私有——队有——社有——国有的转变，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后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毛泽东用以指导农业集体化的一贯思想，即通过不断的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不断提高其公有化程

度，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的这种脱离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单纯依靠不断改变所有制和提高公有化程度（即生产关系），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是不折不扣的空想的、反动的。倒退的农业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新战略部署，导致了一场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程度更为严重的“共产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地人民公社争相将所有制由基本队所有向公社所有过渡。

为了尽快发展社有经济，各地普遍地掀起大办社有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文教事业，大办水利建设的热潮（据后来统计，“大跃进”中曾提出过五十多个“全民大办”的口号一见谢春涛：《毛泽东和中国的一九五八年》）。这些大办，都是靠无偿抽调各生产队及个人的资金、财物、劳动促成的。例如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人民公社在大办社有工厂时，没有厂房，便让社员腾出住宅五百多间；缺少资金，便由社员凑了四万多元，没有机器设备，也在社员身上打主意。仅建服装厂，就动员社员个人交出了五十多台缝纫机。因此，在当时发展社办经济的过程，就是刮共产风的过程，就是侵犯社员个人利益的过程。越是“大办”，“共产风”就刮得越烈，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官僚主义风也伴随而来。

第二项措施是扶持帮助穷队赶富队，在资金，劳力，生产资料等方面搞“共产主义大协作”，“一平二调”。平调的范围上至土地、房屋、粮食、生产工具、劳力，下至家具、砖瓦、木料、筷子、夜壶，什么都包括，生产队以下的“共产风”，更是一阵接一阵，干一件事，搞一个运动，就刮一次，就是一次大破坏，在粮食供应不上时，就没收社员的小杂粮，蔬菜，或去别的队刮“共产风”。（见王延春：《关于沔阳县贯彻政策试点情况的报告》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五日）

还有大办公共食堂。公共食堂问题，是庐山会议斗争中突出的内容之一。彭德怀、周小舟等都提出了批评，张闻天说得更直截了当：“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

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①作为针锋相对的反击，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接连对公共食堂问题写批语，批评解散食堂是“悲观主义思潮”，“是腐蚀党的，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说解散无为县食堂的张恺帆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此后，各地在“反右倾”中，把是否坚持参加公共食堂，当作是否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继续“大跃进”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九六〇年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贵州省委召集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公共食堂问题。会后向中央报告了全省十三万个食堂百分之八十是巩固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是不巩固的情况，以及整顿食堂的措施；省委的报告提出：“农村经过社会主义教育之后，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所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

毛泽东批示道：贵州省委的报告写得很好，这篇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②

在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压力下，到一九六〇年四月，据十四个省市的统计，参加食堂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八点九，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八点六。这个“社会主义阵地”，毛泽东一直坚持到一九六一年，才被迫放弃。

公共食堂是毛泽东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诞生出来的一项政策，完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给五亿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痛苦与灾难。在当时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公共食堂犹如雪上加霜，使无数农民饿病而死。公共食堂是“大跃进”中最令毛泽东得意和喜爱的政策之一，坚守的时间也最长久；但却是危害性最大、最不得人心，最令群众憎恶的政策之一。晚年毛泽东的思想与人民大众的意愿完全背道而驰，公共食堂便是一个极典型的事例。

重新刮起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

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造成了更加严重的破坏。史无前例的灾难降临了。

然而，被表面的胜利所鼓舞的毛泽东，在一九六〇年又策划了更大规模的“大跃进”。毛泽东在一九六〇年一月的上海会议上说：“在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统治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资产阶级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够实现‘大跃进’？”会议确定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是：钢八四〇万吨，粮食六〇〇亿斤，基本建设投资三四五一四亿元，这是自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之后的第三年“大跃进”。③

一九六〇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望六十年代》，说：“我们不但对于一九六〇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对于整个六十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信心”。一月二日，又发表社论《开门红，满堂红到底》，说：“我们努力的目标不但是开门红，而且还是满堂红、红到底。”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上述的跃进计划。然而，会议后不久，便对已通过的高指标计划不满足了，于五月又提出了一套新的“大跃进”计划，工业总产值年增长速度要由原来的百分之二十五增加到百分之四七点六；钢产量要由原来计划的一八四〇万吨提高到二〇四〇万吨，基本建设也要再增加五十七亿元。④

然而，脆弱的中国国民经济根本经受不起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折腾。工业的高指标，是靠挤掉农业来完成的，而钢铁等高指标，又是靠挤掉轻工业来完成的；基本建设上的高指标，是靠挤掉改善人民生活来完成的。这一切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加上农村中炽热的“共产风”，农业首当其冲，成为受破坏最惨重的领域；与农业相关连的轻工业，也遭受严重破坏。而它们正是关乎全国人民生活的吃穿用。违背客观规律所遭受的惩罚不可避免地降临了。

早在一九五九年冬，灾荒便在河南、山东、安徽一带的农村出现。由于农业欠收，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作物严重减产。然而在“反右倾、鼓干劲”的严峻形势下，各地干部浮夸成风，均以“大丰收”、“大跃

进”上报。各省、市、自治区便按浮夸上报的数字搞“高征购”。饥荒开始了，农民大量外流逃荒，许多人患上浮肿病，并且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据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〇年春，正阳县就死人八万多，新蔡县死人近十万。遂平县碰蚜山人民公社就死亡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队（村）竟高达百分之三十。一九六〇年全国总人口为6.632亿人，比一九五九年的6.72亿人净减了一千万。加上正常的净增率千分之二十，即一千三百万，一九六〇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二千三百万。（见谢春涛著《大跃进狂澜》及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

在城市，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副食品及日常生活用品便紧缺了。到一九六〇年五月以后，各城镇普遍出现缺粮断粮。据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当时，这些地区的库存粮所维持销售的时间，北京为七天，天津为十天，上海几乎已无大米库存，辽宁八、九天。京、津、沪等直辖市尚且如此，各地的中小城市的困难情况可想而知。

在全国农业“大丰收”、“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下，全国城乡竟普遍缺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令经济计划部门核实粮食生产数字。据薛暮桥重新核实，一九五八年的实际粮食产量，并非是八届八中全会“核实”的五千亿斤，而是只有四千亿斤。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也不是五四〇一亿斤，而是只有三四〇〇亿斤，即比公布的数字要少二〇〇〇亿斤，虚夸数达百分之三十七，跌到一九五四年（三三九〇亿斤）的水平。棉花油料等产量同样虚夸不实。基于高估产，中央及各地政府搞了高征购。一九五九年度征购粮食一〇二四亿斤，占年产量近百分之四十，而一九六〇年度征购数也高达百分之三十六，使得农村留粮一九六〇年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七，按人口平均数，由一九五七年的四〇九斤降到一九六〇年的

二六四斤，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五。（见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由于上述原因，农村中的饥荒很快漫延到全国，至于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的一些地方，在夏收刚过就出现了偷青、吃青和外流逃荒的情况。

至此，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才了解到问题的真相。可是，为时已晚，灾难已铸成了。

在农业继续减产的同时，工业也开始全面下跌，各种指标难以完成。外贸收购和出口，“计划完成得很差，”“国家外汇收支出现了很大的逆差”。财政收入也出现赤字。全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粮食紧缺，副食品紧缺，日用品紧缺，市场上没有禽、肉一蛋等食品供应，就连锅、碗、盒、筷、火柴、肥皂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也很难买到。

二、三年“大跃进”的代价

“大跃进”从一九五八年初发动、至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宣布停止，历时三年。

“大跃进”的实际效果，是大破坏，大滑坡，大倒退。实际上，从一九六〇年第一季度起，国民经济就每况愈下。

一九六〇年，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严厉督战之下，以“钢铁元帅”为首的重工业虽然完成了指标，但其他方面都垮了下来。

农业方面，继一九五九年下降后，一九六〇年又下降了百分一二点六；

经核实该年粮食产量为二八七〇亿斤，比“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的三九〇〇亿斤下跌了百分之二十六，降到一九五一年二八七四亿斤的水平；

棉花该年产量为二一二六万担，比一九五七年的三二八〇万担下跌了百分之三十五，也降到一九五一年二〇六二万担的水平；

油料作物该年产量为三四〇五万担，比一九五七年的八三九二万

担下降百分之六十，跌到建国时的水平以下。

轻工业下跌得更厉害。与一九五九年相比：下降百分之二十八六十。

钢产量虽然达到一八六六万吨，比五九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但这是靠大上基本建设项目，挤伤农业和轻工业换来的。⑤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基本建设投资合计九九六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五年的总和五五〇亿元还要多百分之八十一。由于各地盲目上项目，许多项目未经科学的论证，成本高，效率低，质量差，到了一九六二年调整、巩固时期，不少企业被撤、停、关、拼，造成很大的浪费。而且挤垮了农业，挤伤了轻工业，重工业自身到一九六〇年底后，也立不住而掉了下来。

到一九六一年，粮食产量达到二九五〇亿斤，略有回升，但其他方面部垮了下来，整个国民经济表现出全面的大幅度的衰退。

建国以来，中国每年均有出口粮食三十亿斤左右。但自从一九六一年起，中国需进口粮食一〇五亿斤（五百二十多万吨），一九六二年进口四百万吨（八十亿斤）。直到一九六四年以后才逐渐减少。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说："这两年进口粮食，共需外汇六亿六千万美元。这笔外汇，可以购买相当于建设四十个洛阳拖拉机厂所需要的进口设备"。

由于浮夸和浪费，国家财政连年出现赤字。一九五八年——一九六〇年三年合计赤字一六九·四亿元。一九六一年仍有十九亿元赤字。

为弥补赤字，便大量印发钞票，造成建国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商品价格高涨。

这一切所组成的痛苦和灾难，都落在中国六亿老百姓的身上。饥饿、营养严重不良，加上连年艰苦紧张的劳动，以及恶劣的政治环境，人民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

据统计，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三年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四千万人。

八年抗战期间，全中国死亡人数是三千五百万人。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在苏德战争中，苏联的死亡人数二千万人。三年灾难比战争还要残酷。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死亡人数最多的“天灾人祸”，也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天灾人祸”。大跃进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之惨烈，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毛泽东的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祸害，超过了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朝代的帝王将相。

据另一项估算，因为三年“大跃进”，中国国民经济损失达一千二佰亿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投资才五百五十亿元。“大跃进”损失了两个五年计划的资金。

而且，后来还用了五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才使之恢复到“大跃进”前一九五七年的水平。中国经济发展走了一个大大的弯路，浪费了八年宝贵的时间。而恰恰在这段时间里，一些国家如日本等，经济与科技得到迅速的发展。中国与他们的差距拉大了。这又是一个长时间内弥补不了，从而也无法估算的重大的损失。

三、毛泽东的反思

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始作俑者，也是中共中央内较早发觉出了纰漏的一个。早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即头脑最发热的北戴河会议后两个月，毛泽东已经觉察到如火如荼的运动中的乱子：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指示要压缩空气，提出纠“左”。然而，在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却变本加厉发动更加猛烈的“大跃进”，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这就是庐山会议以后的“大跃进”更加轰轰烈烈，灾难也更加惨重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对于农村中发生的灾难情况，是否不了解呢？不是的。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在回忆录中写道：

“不久（时指一九五九年九月）又有两名警卫战士探家归来，并且都带了窝窝头回来，郑重向毛泽东汇报：‘俺们村里，这样的窝窝头，

每人每天也只能分到两个。”

毛泽东怔怔望着那窝窝头，恍若梦醒一样。他接过窝窝头，掰开来望着里面掺的各种说不清名堂的植物纤维，眼里渐渐溢出了泪花。

他将窝窝头掰一块交给身边一名工作人员，再掰一块，分给一名工作人员……。

他没说什么，自己率先拿了一个整窝窝头啃起来。他慢慢咀嚼着吞咽下去。于是，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淌了下来。”一九五九年十月，卫士长李银桥陪同毛泽东南下视察：

“专列开入山东时，沿途土地龟裂，到处是白花花盐碱。进入安徽后，情况更糟糕，大田里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却插着一堆一堆的红旗。毛泽东一路凝视默想，吸烟不断。

车到合肥市正是晚上，整座城市黑沉沉一片，不见灯火，不闻笑语。地方党政负责人汇报，合肥地区还是水利发电，由于长江水流枯竭，只剩主航道有点水，已经无法发电。

毛泽东凝望黑沉沉的城市，没完没了吸烟。后来他望着我们，慢条斯理讲了历史上几次有名的大灾荒

回到北京，毛泽东向我们郑重宣布两条：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

他说：‘全国人民都在定量，我也应该定量。是不是肉不吃了？你们愿意不愿意和我一起带这个头呵？’

我们回答：‘愿意！’

毛泽东庄严宣布：‘那好。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⑥

毛泽东第一次表现出觉醒，是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把质量提到第一位，恐怕到时候了。五八、五九年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要把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他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公布数字的时候，总是要少一点。要做的多一点，说的少一点。

六月十八日，毛泽东把他近来考虑的一些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问题，结合历史的回顾，写了一篇《十年总结》的文章。毛泽东回顾说：

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前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

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但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

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钢。……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了一个一千六百五十万吨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始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一千三百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

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马鞍形。七、八两月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胜利。

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

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千六百五十。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第三次郑州会议，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帐可以不算。到四月，因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如此等类。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我们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长时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不少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肾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一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于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

尽管是轻描淡写，但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极其罕有的主动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在言语上也谦虚，温和了好多。与五八年初“大跃进”发动时的那种信心十足、咄咄逼人，显然已有了很大的不同。

六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国民经济中的种种问题以及全国各地的灾难更多地暴露出来了。七月五日开始，中共中央又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主要研究国内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问题。在会议进行过程中，七月十六日，苏联政府突然知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并撕毁经援合同，停止向中国供应重要设备。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严重地打击了中国的经济建设，令处于经济危机中的中国“雪上加霜”。

面对严酷的事实，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对一九六一年的经济计划安排，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以便加强农业和轻工业，改善人民生活。周恩来听了汇报后说：对方针

的提法，与其讲整顿，不如提调整，并建议增加“充实”二字。这就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来历。其后的五年内，中国正是执行这“八字方针”，才使国家走出灾难的深渊。

与此同时，农村中的灾难如同洪水猛兽，饿病、饿死人的报告，不断地出现在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在甘肃省委的一份报告上代中央草拟的批示中写道：

“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大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一九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⑦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发表讲话，进一步总结“三年跃进”遭到惨重失败的沉痛教训，说：

这几年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且是挤了农业、挤了农业的人力、物力，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广。这三年都是指标过高了后来退不下来了。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后从九月份开始大搞，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又大搞，一九六零年又一年，这三年大炼钢铁，挤了农业。⑧

毛泽东又说：

做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

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其理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郑州会议讲不能一平二调，方针是对的，说不算帐，不退赔，这点不对。上海会议十八条讲了要退赔。紧接着我批了浙江、麻城的经验报告。一九五九年，四月我批了两万多字的东西，现在看来，光打笔墨官司，不那么顶用。他封锁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那时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么认识共产风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不是说服，思想还有距离，所以决心不大，搞的不够彻底。

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摸不了底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一九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明后年，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搞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要提高质量、规格、品种，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要缩短工业战线，重工业战线，特别是基本建设战线。要延长农业战线，轻工业要发展。重工业除煤炭、矿山、木材、运输之外，不搞新的基本建设。⑨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中的一九六〇年冬天是这样的：

到了一九六零年年冬，饥饿的盲流一股股在中国大地上流窜……

毛泽东躺在他那张过于简朴，但又很适合国情的木板床上，身上搭了三条补丁连缀的毛巾被，靠在林栏上看文件。

他老了，眼角发散出细密密的皱纹，头发不知不觉便白了许多。我还时常为他梳头，想起三大战役胜利后，他说“白了一根头发，胜了三大战役，值得”。那情景彷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而现在他的白发已经不能一根根去数清了。我的心有些酸。

这一天是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虽然眼望文件，却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他其实是在想心事。后来，他将文件放在床上的书籍堆上，小声招呼值班卫士：“小封啊，我起来吧。”

这一天是封耀松值正班。他照顾毛泽东穿衣起床。毛泽东没有出去散步，直接走到沙发那里坐下来，仍然心事重重地在那里沉思默想，不时呼出一口沉闷的粗气。

“主席，给你煮一缸麦片粥吧？”封耀松小声请示。

毛泽东摇头，靠在沙发上，只用手朝办公桌上的烟盒指了指。封耀松帮他取来烟，划燃火柴。

毛泽东吸燃香烟，吸得很深，然后重新靠在沙发上。工夫不大，他便被一团弥漫的青烟笼罩了。

烟雾中，传出毛泽东一字一板的声音：“小封，你去把子龙、银桥、高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下午，我们七个人同毛泽东围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没有酒，没有肉，只是油多放了一些。毛泽东的竹筷子伸向菜盘，没等夹起菜忽然又放下了。用目光扫视我们七个人。于是，我们也放下了筷子。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

我们都无声地点头，神情肃穆。

毛泽东用手指指叶子龙，又指指我："子龙、银桥，你们下去，不去山东改去河南，广泛调查研究，把真实情况反映给我。"

我和叶子龙说："是，主席。"

毛泽东转脸望住封耀松："小封啊，你去不去？"

封耀松说："去。"

毛泽东点头："那好，那好。"

毛泽东重新环顾饭桌上的七个人，目光忽然变得锐利，声音变得严厉："要讲实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

这一顿饭，毛泽东没吃几口便放下筷子。他吃不下去。我们也吃不下去。纷纷放了筷子。夜里，封耀松用电炉子替毛泽东煮了一茶缸大片粥，劝说毛泽东喝下去。然后劝毛泽东睡一觉。

"睡不着啊！"毛泽东声音悲凉，"全国人民遭了灾，我哪里睡得着啊？"他又讲起历史上一些大灾荒，讲了当年红军吃树皮，啃草根的斗争生活，说了他的理想和追求。

毛泽东睡不着觉，下床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来给我们七个人写了一封信。是用铅笔写的，写了三页：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

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六十七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⑩

这是毛泽东思想最沉重，情绪最低落的时刻。

与此同时，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写信给秘书田家英，令田家英与陈伯达、胡乔木（三人均是毛泽东的秘书）各率领一个调查组，分别赴浙江、广东、湖南农村作调查研究，每组组员六人，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一九三〇年春季的）一份，调查最坏及最好的生产队，"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⑪

毛泽东似乎真的想要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来个"实事求是"。然而后来的情况表明，事情并非是这样。

毛泽东信中说的《调查工作》，是指毛泽东在三十年代江西苏区时写的一篇文章，早已失去。正当一九六一年毛泽东高喊"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时候，竟然失而复得，令毛泽东非常高兴。原来这篇文章的石印本，是一九五九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到各地收集革命文物时，在福建省龙岩发现的。一九六〇年中央政治研究室从革命博物馆借来，被田家英见到，便马上送到毛泽东的桌面上。

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广州会议上说：

这篇文章是一九三〇年春季写的，总结那个时期的经验。这篇文章之前，还有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东西找出来我不记得，这篇文章我总是记得就是了。忽然找出来了，我是高兴的。⑫

在毛泽东那浩繁的著作中，《调查工作》一文其实并不显得如何突出，也不占有怎样重要的地位。然而这篇文章恰恰在一九六一年那样一个艰难的年代失而复得，这无疑令处于困境中的毛泽东感到振奋。而在那样一个浮夸风、瞎指挥满天飞的年代里，当六亿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毛泽东是多么渴望有一种解救危难的仙丹妙药。而《调查工作》的内容，正是毛泽东所大声疾呼的"调查研究"，因此这篇不起眼的小文章一出现，就被毛泽东视为拯国救民的良方。

广州会议是中共中央在南方召集的专门研究人民公社条例的会议，主持者是毛泽东。而同样的会议，也同时在北京举行，主持人是刘少奇。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彭真。信中说：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叫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建议研究一下一九三〇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自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⑬

在给刘少奇等人写信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又在“三南”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其他书记的调查研究工作由第一书记抓。他说：“医生看病叫诊病，中医叫望、闻、问、切，先搞清楚病情，然后开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下决心，然后布置部队，后勤等。历来打败仗都是情况不明。过去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就是因为情况不明。”

毛泽东还要胡乔木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从现在起，县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亲手进行有系统的调查研究。在大会讨论这封指示信

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边念信稿，毛泽东边插话解释。信稿不过八百字，而毛泽东的解释记录却有上万字。毛泽东说：

“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也很大”；

“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

“为补课起见，我现在提倡调查研究……第一书记亲身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

“听李雪峰同志（时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讲，河北省原有一五二个县，现在并为六十三个县，没有一个县委书记做典型调查。这种现象很值得注意。”⑭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通过批示，频频向全党发出警告。在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报告上毛泽东批示：

“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⑮

毛泽东还在田家英推荐的成本禹写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一文上批示：不许“采用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这顶的那种调查法”，“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⑯

毛泽东的信以及一系列的批语，如同“圣旨”，引发了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高干纷纷下乡“调查研究”。其中，最突出，也最具影响力，后果也最悲壮的，是刘少奇的湖南调查。本书稍后再述。

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之所以遭到惨败，从思想方法来说，固然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调查研究、浮夸风、瞎指挥，犯了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然而，在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核心，那就是农业社会主义，用彭德怀的话来说，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才是毛泽东以及中共绝大多数高干何以犯了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抓“调查研究”，只是清流，而没有正源。

毛泽东对“大跃进”失败的反思，仅停留在主观主义和调查研究，即思想方法这一层面，再深挖掘思想意识的层面，毛泽东是绝不允许的。“左倾冒险主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等，都成了不可触及的

“禁区”。在具体问题上，毛泽东相应地也设下了“底线”。比如“单干”、“四大自由”、“包产到户”、对“反右倾”的否定等等，尽管经过“调查研究”后，都“符合实际”，符合群众的意愿，对恢复生产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都遭到毛泽东的否决。

毛泽东虽然也检讨了自己犯了错误，但更多是批评与责难地方官员，指他们搞封锁；令中央情况不明；又是他们瞎来乱搞，使运动中出现了众多的乱子。毛泽东将主要的责任推卸到地方官员的身上。

既使是自己的错误，毛泽东也是笼统地讲，具体内容欠奉；培训在枝节问题上承认有错，在方针、路线以及重大关节问题上，却坚持没错。

毛泽东对“大跃进”失败的反思是有限度的，而不是彻底的。然而，毛泽东开出来的“调查研究”的药方，给予人们了解事情真相的机会。因此，在两个月以后，当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带着丰硕的调查研究的果实回到北京，他们立即对“大跃进”的失败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从而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刘少奇等人的深入检讨，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毛泽东不悦了。毛泽东与刘少奇政治联盟的裂纹，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反思，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为什么一个不彻底，另一个彻底，一个勉强，另一个却心甘情愿呢？毛、刘的差异，主要存在于政治品质上。“实事求是”是需要勇气的，无私才能无畏。刘少奇以大智大勇的姿态，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大跃进”的惨败，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包括他自己）的“人祸”，表现了他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无私无畏的崇高品格。相反地，毛泽东出于维护自己的声望、地位，不想彻底地检讨“大跃进”的失败。在这里，毛泽东将一己私利置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这是毛泽东的可鄙和可悲。

代表中共中央对大跃进失败所做的结论——错误与成绩是三七开（而不是毛泽东说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造成错误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不是毛泽东说的主要是天灾），是由刘少奇说出，而不是由毛泽东说出，这是值得深思的。是毛泽东的理论水平不够高吗？

不是。毛泽东是中共党内头号理论家，“大跃进”又是他发动和领导的，对“大跃进”的总结，毛泽东应该更深刻，更彻底才是。是毛泽东没有进行调查研究，而掌握的资料不够吗？也不是。毛泽东虽然没有亲身去农村做调查研究，但他派出了身边的秘书、卫士组成多个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他们都将在农村的调查所得和所见所闻，不分巨细地向毛泽东汇报。并且刘少奇等人的调查所得，也要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还可以看到中共的各种材料。因此，毛泽东对实际材料的占有是丰富的、全面的。然而毛泽东刻意文过饰非，因此没有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做出一个较为“实事求是”的，能够为人们所接受的结论。对毛泽东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遗憾，极大的不幸，他对国家、对人民没有尽到自己应负的责任，对历史也欠下了一笔巨大的、永远也无法还清的债帐。

在全党大搞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到了一九六一年夏大，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方针政策进行了大幅的调整：

在工业领域，正式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各项指标都大幅度地降下来。计委主任李富春说：“重工业这样下降，是一个惩罚，是没有按规律办事。重工业速度发展过快，基本建设拉长了，城市人口增多了，工农业矛盾突出了，所以退也是应该的。你不退，有什么办法？”毛泽东说：“去年（指一九六〇年）一八五〇万吨钢，现在（指一九六一年）一一〇〇万吨，降下来七五〇万吨，我看可以。无非是外国人骂中国人不行。”

在农业方面，制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三十年不变；在公共食堂问题上，刘少奇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以及田家英、叶子龙等人的调查所得，食堂没有优越性。周恩来曾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朱德于五月九日写信给毛泽东说，他在四川看到的是：社员吃饭“两道烟”（食堂打饭，自己回家

做菜），浪费人力物力。到陕西，反映更强烈，说食堂有五点不好：社员口粮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动力；浪费时间；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胡乔木于四月二十六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韶山公社食堂的问题，认为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谢富治（时任公安部部长）于四月十九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投票的结果，百分之九十的群众赞成停办食堂，赞成办的仅百分之十。胡耀邦在五月六日的报告中写道：青壮年、妇女、老年人，基层干部，没有一个说食堂的好话。⑰

在全党全民反对办公共食堂的呼声如排山倒海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放弃这个被视为是“共产主义萌芽”，社会主义阵地的至爱的“宠儿”，于六月同意解散食堂。

关于供给制（即吃饭不要钱），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也是一项“共产主义因素”，是体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然而，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刘少奇说：他不同意实行供给制，只同意对“五保户”（即老病残军烈属户）实行“部分供给制”，并说这部分供给制“实际上是社会保险”。还有的报告指出：供给制耗费了公社大部分的收益，剩下可供按劳分配的部分微乎其微。浙江省桐庐县的一个大队，一九六〇年的一个劳动日只值〇·〇三元，社员劳动一年仅得工资二·五三元。因此，当时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一个劳动力还不如一只母鸡，一只母鸡下个蛋可卖五角钱。由于工分不值钱，农民不积极出工，不愿意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是破坏农业生产力的一大害。⑱

在铁的事实面前，毛泽东还是恋恋不舍，以致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时，毛泽东还坚持供给制与工资制七三开，有所退步，但还留下一部分。到了六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绝大多数的一致意见之下，毛泽东不得不同意全部取消供给制。

至此，人民公社在分配方面的两项“共产主义因素”（也就是“优越性”）都被否定了。

这一切方针政策上的改正，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响应，收到良

好的效果，农业很快开始复苏。至此，毛泽东认为国内的困难形势已到了“锅底”，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今后形势会逐步好转、回升了。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二上庐山，八月二十三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主要研究经济与教育的调整问题。

两年之前，毛泽东在庐山上打倒了彭德怀。当时，彭德怀曾写下了这样的一段笔记：

我七月十四日写给毛主席的信（即意见书——引者），七月十六日由中央办公厅印发到会同志，至七月二十一日，各小组经过六天的讨论，对信完全同意的，只有一个同志，基本上不同意的也只有一个同志。其余在发言中的大多数同志是基本上同意的。但还有一部分同志，还没有发表意见。至于我写这封信，是在西北小组会议上，一些不便讲的问题，要点式的写给主席作参考的，希望主席考虑信中的一些问题，主席竟把问题提到如此十分严重，如此十分尖锐，提到离开现实情况的原则高度。因此，国内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在左倾急躁冒进的基础上，再加以猛烈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并把它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它将要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甚至引起党内外一段时间的混乱，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后果！

二十三日晚彭注

两年来的实践表明，彭德怀的话应验了。但毛泽东是不能承认这个错误的。然而彭德怀那高大的身影已与“大跃进”连在一起，沉重地压在毛泽东的心上，令他难以忘怀。毛泽东多次为自己辩护。一九六一年一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八月庐山会议原来纠“左”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党内又从右边刮来一股风，彭德怀强迫与我们争论。那时非反右不可，右倾机会主义和国际修正主义相呼应，和国内右派呼应，向党进攻，不反不成。但是庐山会议的反右打乱了

原来的纠“左”的步骤。一九六一年六月的北京会议上，毛泽东又说：庐山会议，彭、黄起而攻之，搞派别，他们实际是高饶的漏网分子，想乘机整我们，应该反。我们的错误是不该传达到县以下，如果传到县级以上就好了，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精神，继续反“左”就好了，一反右，造成一个假象，以为工农业生产大发展了，其实不是那样。

一方面坚持反右倾正确，一方面又认为应该继续反“左”。这就是毛泽东的矛盾的、不能自圆其说的思想状态，也是他既要坚持“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又不能不承认“大跃进”惨败的严酷事实，既要坚持自己的正确、英明、伟大，又不得不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反思”问题上的遮遮掩掩，不愿意脱下裤子割尾巴的心理状态。

对于这第二次上庐山，逄先知在《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一书有如下的回忆：

上山之前，毛曾对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不能不联想到第一次庐山会议。第一次庐山会议引起的灾难性后果，毛的感受不会比别人的少。从一九六〇年复天起，农村中的严重情况逐渐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的心情沉重起来。在那些日子里，他常常闷闷不乐，沉默寡言，有时长时间地呆坐在那里，凝视不动。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少有的。到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初，他亲自主持起草中央“十二条”指示信，首先下决心解决农业问题。

……对于错误地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这时并无后悔之意（“反右是正确的”），但对于因反彭德怀而打断纠“左”过程、从而遭受更大的“共产风”的破坏，则是痛定思痛，心情确实很不舒畅。他决定二上庐山，想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是不是也包含着想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呢？

果然，这一次会议没有紧张的气氛，没有批判的场面，大家的心

情平静而舒坦，比较地敢于批评和议会工作中的问题和失误，又产生了几个好的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田家英在第一次庐山会议后期是受压的，参加这次会议却是另一种心情。

继《农业六十条》之后，这次庐山会议又搞出《工业七十条》和《高教六十条》，再加上前不久通过的《科研四十条》，还有《文艺八条》，在毛泽东看来，事情已经比较清楚，并在好转。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说："问题暴露出来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这个上升与过去不同，认识接近实际，可以稳步上升了。"

毛泽东还说："这几年来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事实上，当毛泽东讲这番话时候，中国的国民经济不但没有上升，反而还在继续滑落，危机还十分严重地存在着。毛泽东的不切实际的说法，令他的秘书田家英非常不安：

当时毛泽东对国内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已经到了"锅底"。田认为，在农业方面可以这样说；在工业方面就不能这样说，因为工业生产仍在继续下降。他半夜里睡不着觉，便到梅行（当时参加起草《工业七十条》）的卧室去讨论这个问题，直至天亮。⑳

不能把毛泽东的这一番讲话，看作是简单的"盲目乐观"。毛泽东的讲话，是他顽固地坚持"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再次大暴露，说明了经过三年"大跃进"的惨败后，毛泽东的主导思想一点也没有触动，一点也没有改变。从而也表明了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反思，是多么地肤浅，不彻底，多么地虚假和不可靠。在"左"倾的道路上，毛泽东已迷途而不知返，无可救药的了。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还说："总路线是正确的"，"人民公社

只要在退赔问题上改了，就能成为红旗”。㉑

第二次庐山会议标志着毛泽东对“大跃进”惨败的反思进程已，经终止了：无论是从深度（“退到山谷”）还是广度（“错误就那么一点”），都是到此为止了。

毛泽东在政治上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而极力掩饰“大跃进”的错误的同时，在生活上极其荒淫。据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中透露，正当六亿人民饿饭的时候，毛泽东却乱搞女人，从文工团的演员到幼儿园的教师及女机要员，从黄花闺女到有夫之妇，毛泽东都大搞特搞，极尽骄佚淫逸。

这些情况表明，邯业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毛泽东已由量变到质变，由一个革命家蜕化为封建君主。

庐山会议快要结束时，毛泽东为江青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了一首诗：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波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家那种面对艰难而从容不追的风度，另一方面亦可看作是冥顽不化，坚持错误的宣言。

一九六一年冬天，被“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毛泽东摆脱了一年前的那种心情沉重，显得轻松和愉悦。他对刘少奇等人说：去年的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六十条》一搞，最近把队为基础更进一步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见效了。

毛泽东兴致盎然，诗兴大发，找来了陆游当反面教员，写一卜了《卜算子·咏梅》，诗前有语：“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浪漫时，
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自比“傲霜雪”、“只报春”的梅花，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冰消雪化，春暖花开。春天降临神州大地。然而，毛泽东发觉到，那个春天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样“山花烂漫”。一场更大的纷争和灾难，又在酝酿之中。

四、刘少奇的反思——湖南调查

刘少奇对“大跃进”的反思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至一九六一年三月。

在这一阶段，刘少奇对“大跃进”的问题，已经觉察到了，但看到的还不多。由于还没下到农村，还没有与农民群众直接见面，因此看到的也不深刻。见于彭德怀的前车之鉴，讲出口的也就更不多。

从一九六〇年一月的上海会议后，刘少奇先后到天津、石家庄、郑州、洛阳、西安、宝鸡、成都、重庆、武汉、长沙、南昌等地视察。由于这些视察，多如往常那样听地方领导报喜不报忧的汇报，到事先安排好的地方去参观，与事先安排好的人见面，听到的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说话。而且这一路上多是在大中城市里，参观的也都是国家级的大型企业，如洛阳拖拉机厂、西安机械制造厂、庆安机器制造厂、

宝鸡东风仪表厂、成都量具刃具厂、重庆钢铁公司等等，在这些先进的、现代化的企业里，厂房高大，机器隆隆，从资金到原材料，都是国家保证提供的，不仅看不到“大跃进”的乱子，相反是一派热气腾腾的，你追我赶的“跃进”景象。

因此，刘少奇在这一阶段，既表示赞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的“跃进”计划，另一方面小心翼翼地发出一些注意防止和克服“大跃进”乱子的言论。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听取中共河北省委汇报工作时说：

要以农业为基础，各方面都要支援农业。马克思说过，任何一个社会的生产水平，要看它用多少人搞饭吃，还剩下多少人去搞工业、运输、教育、文艺、科学等等。说社会分工，实际上首先是农业和其他各方面的分工。我们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搞饭吃。所以，农业技术革命要搞好。一平二调，刮“共产风”，也就是人家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这是不好的。马克思早就说过，平均主义对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利的。想不要社会主义阶段，跳到共产主义去，光要不断革命论，忘记革命发展阶段论，这是不行的。必经的阶段，是不能跳过去的，不能单凭主观愿望，想过就过。生产关系的改变，要使生产积极性更高，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过渡早了，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妨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要和公社的同志们讲清楚，这是不能胡来的。过渡的迟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渡，要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一是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一是人们的觉悟提高到了一定的水平。你搞平调，人家不愿让你平调，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过渡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条件都不够。㉒

很明显，刘少奇坚持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主义。刘少奇只是不敢如建国初对山西省委那样明言批评而已。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日，刘少奇在主持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

以及中央一些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说：

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比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有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大家一番热情，总想多一点，快一点，盘子摆得大一点，基本建设项目多上一点，许多同志主要的想法是这方面。一方面，我们应该敢想、敢说、敢做，但是还要切实可靠，充分可靠，一切经过试验，实事求是，冷热结合。本来，去年庐山会议头一个阶段就想讨论这样一些问题的，想总结一下，得到教训，使以后这些事情减少一些，后来彭德怀问题一出来、这些问题丢到后边去了，庐山会议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庐山会议提出这些问题，有些同志是得到教训的，而有一些同志我看是没有得到教训，或者得到的教训很少。计划偏大，有些事情不那么切合实际，统计又不那么确实，有浮夸之风。这些问题的发生，包括中央在内，中央的计划偏大，盘子安大了，要求过急了，敢想、敢说、敢做我们大提倡，报纸上也大登，实事求是这方面就登得比较少，中央跟你们共同负责。这些问题不纠正，继续下去，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可以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这就是今天会议的意思。㉓

此后，刘少奇在一些大小会议上都发表了一些类似的不痛不痒的讲话。

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发动者兼直接领导者，作为第二把手的刘少奇，不便于对“大跃进”说三道四，最好还是让毛泽东自己总结，自己检讨。因此，刘少奇在中央的一系列会议上说话不多，有时不得不提出一些意见，也是委婉的、表面的，只就事论事，不刨根问底。刘少奇似乎在等待。

另一个因素是，一九六〇年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公开破裂，中、苏两党展开公开的争论。刘少奇亲自领导了这场对苏斗争，在此方面花费了许多的时间与精力。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更率领包括邓小平在内

的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庆祝大会。除了与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等人举行多次会谈，以图解决中、苏两党的纷争外，还到列宁格勒、明斯克等地参观，历时一个多月，使得他关注国内问题相对地减少了。

第二阶段是从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至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的“七千人会议”。

在这段时间，“大跃进”的祸害已表露无遗，全国各地灾难如洪水猛兽，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毛泽东虽然已开始承认错误，进行检讨，但不痛不痒，没有切中要害。因此，在毛泽东指导下的中共中央虽然已采取了诸如“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等措施，但见效不大，灾难继续扩大，危机进一步恶化。局势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促使刘少奇走到台前，取代毛泽东亲自主持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工作。收拾“大跃进”的烂摊子的楔机，在于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写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那封信。毛泽东的信上文已引述。在信中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提出尖锐的批评。毛泽东的信，除了表达他的不满之外，似乎还包含有推脱责任的意味。毛泽东向全党批发他在一九三〇年写的那篇《调查工作》，是向全党表示：大家看吧，我向来是注重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毛泽东在信中批评刘少奇等人不作调查研究，只满足于听汇报、看文件，才将“大跃进”搞成如此样子。在这里，颇有“众人皆昏，唯我独醒”之意。

毛泽东的信对刘少奇是一记沉重的“将军”，也为刘少奇插手纠偏工作，从而打破毛泽东一统局面启开了方便之门。刘少奇决心深入农村，找出“大跃进”惨败的真正原因所在。刘少奇师出有名了。毛泽东主持的广州会议于三月二十三日结束。四月一日，刘少奇便率领王光美以及秘书吴振英等几个工作人员，到了湖南长沙。刘少奇对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湖南省委的负责人说：“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

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从简，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据王光美回忆：“他这次穿的是一套蓝布制服，戴一顶蓝布帽，著一双青布鞋，到了宁乡县委的大院里，大白天同县委负责同志走了个照面都未被认出来，错了过去。有位同志发现了我，才又转回来说：‘刘主席呢?’我指着旁边的少奇同志说：‘这不是!’”。

第二天，四月二日，刘少奇一行冒着绵绵细雨，来到湖南省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刘少奇一行乘坐的两辆草绿色的帆布吉普车，在凸凹不平的乡村路上缓缓地，晃晃荡荡地行走。南方的四月，应是禾青水绿，春意盎然。然而一路上，刘少奇看到的却是荒山秃岭，庄稼稀落，一片衰败的景象。车子开到一块写着“宁乡县东湖塘人民公社万头猪场”的木牌跟前停下来了。刘少奇走进“万头猪场”，环顾一看，猪圈又脏又乱，猪却见不到几头，而且疲弱得皮包骨头，走路摇摇晃晃。刘少奇没有人住宁乡县委为他准备的招待所，吩咐随行人员：“就在这个猪场住下来，调查研究就从这里开始！”于是，刘少奇人住了养猪场的一间破烂的饲料房里，其他随从人员便住到了旁边一间空猪舍里。秘书们借来了门板，为刘少奇架床，但却找不到稻草铺床。一个过去是鱼米之乡的地方，现在却找不到一把稻草，刘少奇不禁陷入沉思。

刘少奇信步走到屋后的山坡上，放眼望去，只见田地荒芜，杂草丛生，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在挖野菜。路边有一堆已经风干了的人粪。刘少奇走过去，用脚搓开，仔细看了看，不禁摇头叹息，对秘书说：“你们看，这里面多是粗纤维，是粮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缘故，农民吃饭已经成了问题。”刘少奇的心灵初次受到冲击。

猪场饲料房成了刘少奇的临时办公室。他在这里逐一召见先期到达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组和中共湖南省委工作组汇报情况，同时插空子找老百姓谈话。所见所闻使刘少奇得到的印象非常强烈。他对一起听汇报的张平化说：“宁乡县问题那样严重，如果说大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没有调查研究，这个教训很大。”

是不是湖南的农村都是这个样子？刘少奇决定多看几个地方再作

判断。

经同中共湖南省委商量，刘少奇又选择去长沙县广福公社大华大队。这是一个全省出名的先进单位。他要去看看这个“红旗大队”的情况究竟怎样?

从四月十二日起，刘少奇在天华大队一间阴湿的土砖房里住了十八天。他除了召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外，还走村串户，到田头地边、农民家中查看，找老人、妇女、青年个别交谈。每到一处，他总是鼓励群众如实反映情况，讲真话。他一再对这里的干部、社员说：“愿意讲的话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

真实情况越来越清楚。原来这个“红旗大队”的情况也和王家湾差不多，虚报浮夸严重，群众生活困苦。这里的干部还多了一个“先进”的包袱，不愿揭露问题。

五月二日，刘少奇一行来到宁乡县。刘少奇早在一九二〇年，二十二岁时便只身离家，投身革命。打那以后，他除了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因回湖南养病在长沙同母亲见了一面以外，在漫长的岁月里，他转战南北，国事倥偬，再也没有机会回过家乡，算来已四十年了。

中共下乡县委本来在花明楼区政府所在地准备了十二间房子，作为刘少奇和随行人员的居住、工作用房。可他连看也没去看，晚上不声不响地进了炭子冲他家的旧宅，还是住在他小时候住的那间屋子里。

旧居的堂屋权充接待室。刘少奇在这里连续召集各种座谈会，找人、个别谈话，了解这几年农村的真实情况。这里毕竟是他的故乡，什么事情要瞒过他，就不那么容易了。

许多汇报材料说，湖南去年遭受大旱，农村经济困难是因为天灾。

刘少奇找来小时候一块放牛的农民朋友李桂生，同他一起回忆童年往事，然后问他：“人们说去年乾旱很厉害，安湖塘的水车干了吧?”

“没干，还有半塘水。”李桂生肯定地回答。

“还有半塘水，这说明干旱并不厉害嘛！你还记得吗？小时候那一年，塘底干得晒得谷，那样天旱，每亩田还收得两三担谷呀!”

“叫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一点影响，不是主要的。我讲直

话，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五风’刮得咯样!”李桂生直话直说，一语惊人。

李桂生带刘少奇去看附近的公共食堂，指着胡乱堆在地上灶上的炊具碗筷和一小堆葛笋叶，说：“这是全食堂一餐的菜。炒菜只放盐，不放油，吃不饱呀!”

刘少奇后来又到一些农民家里，揭开锅盖，打开碗柜，看到油盐罐子里只有盐，没有油，锅里炒的是野菜。来见面的亲戚、熟人当中，有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他步行到赵家冲看望亲姐姐刘绍德，他的外甥女鲁新秀告诉他，她家所在的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十一人，她的父亲“吃糠耙粕屙屎不出来闭死了”。七十岁的老姐姐颤巍巍地对他说：“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哆!”父老乡亲的生活这样困苦，刘少奇的心情十分沉重。他一再向乡亲们道歉，表示他的工作没做好，对不起大家。

在长沙县天华大队调查时，刘少奇就发现公共食堂是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因之一，指示当地停办。可宁乡县的公共食堂，这时仍普遍存在着。反右倾斗争把人们搞怕了，谁也不敢挑头解散食堂。

刘少奇找来担任过大队书记的农民朋友王升平，问他：“你说说看，食堂到底好不好?”

“咯到底是讲得还是讲不得呢?”王升平已经因为“右倾”被撤了职，心有余悸。

“怎么讲不得呢?”刘少奇鼓励他，“把你请来就是要你讲心里话。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好，讲得我就讲。”王升平壮了壮胆说，“要是叫我和群众说心里话，食堂还是早点散伙的好。再办下去会人死绝。拿拓木冲食堂说吧，开伙时一百二十人，眼下不到八十人，死了十多个，跑了十多个，还有几个得水肿病住在大队临时医院。过去家家户户养猪养鸡，入了食堂没得吃，养不成。如今二十户人家，只剩下集体的一头母猪，叫鸣的鸡公子都没有……”。

听到的，看到的，都表明这里的食堂也不受群众欢迎。刘少奇当

机立断，要王升平回去把他所在的拓木冲食堂停掉。㉕

刘少奇这次湖南调查的收集，集中地表现在五月七日他与炭子冲农民的谈话中。

这一天，在炭子冲刘少奇旧居的堂屋里，坐满了男女老少。他们都是当地的农民，还有几个基层干部。刘少奇把乡亲们迎进屋，给他们让坐、递烟。王光美为大家沏上茶水。刘少奇说：

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

乡亲们谈谈看，社员的生活比一九五七年是好了还是差了呢？不是好，是差了吧？生产比以前降低了！是这样，就承认这个现实。（群众：生产是降低了，生活差了。）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生产降低了，生活差了？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做得不好。我问过几个人，门前塘里的水是不是车乾了？安湖塘的水是不是车干了？他们说都还有半塘水。看来旱的影响不是那么重。我记得过去有两年遭受旱灾，安湖塘和门前塘里的水都车子了。所以主要是这里的工作犯了错误。这是不是完全怪大队干部呢？也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上边要负主要责任。当然，大队干部不是没有责任，要负一小部分责任。有的是中央提倡的，如办食堂。因此根子还在中央，不过到了下边就加油添醋了。

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样子，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你们食堂散没有散？（群众：散的多。）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舂米，一个食堂占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甚至半数的人都去做饭了。烧硬柴砍树，不砍茅草，砍了山林。还有其他毛病。好处也可以讲个一两条，

说是出工齐。出工齐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嘛！

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

关于将农民们害苦了的“共产风”，刘少奇说：

关于退赔问题，“十二条”讲了。到底退赔得怎样？我看一般是差得很远。听说你们有一条规定，丢失的东西要有证明才准登记。搞乱了，哪里去找证明呢？这个帐要一户一户地结。这个帐要记住。赔清以后，立块碑，或者写一个大单子，用镜框子镶起来，挂在公社里。不这样搞，老百姓下不得地。不要半途而废，马马虎虎了事。要扎扎实实算一回帐，算得疼一点，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算疼了，社员也要疼一下，疼几年。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㉖

五月十一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系统地报告了他在湖南农村调查的情况，对解决公共食堂、社员住房、退赔社员财物，巩固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制，一系列在农村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五月十五日，刘少奇结束历时四十四天的农村调查，带着丰硕的成果离开长沙、返回北京，准备出席五月二十一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农村造成的灾难是那么的怵目惊心，只要不是别有用心便都会看到。刘少奇能够实事求是地反映广大群众的呼声，发现“三面红旗”所造成的灾祸，在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下，这一点虽然不易，但并不是难得。刘少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将这些现象，加以归纳总结，深化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而得出造成灾难的主要原因是中共中央（实际上是毛泽东）工作中的错误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而且还敢冒毛泽东的大不韪，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安危，

挺身而出，大声疾呼，道出真相，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刘少奇不退缩，不跟风奉承，不顾个人的安危，勇于承担历史赋予的使命。对此，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历史也会公平地为他记下这光辉的一页。

五月二十一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其情况与过往没有多大的差别，基本上弥漫着两种风气：其一是以毛泽东为首的，认为产生灾难的原因是自然灾害和苏联的背信弃义，也就是“天灾人祸”。另一种则是明知道毛泽东讲的不是事实，但也不敢道明真相，正是明哲保身，少说为佳。面对着湖南农民生活的那种凄惨景象，刘少奇不再犹豫了，就在这次会上，他针对以上的种种说法和推倭责任的风气，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讲话。刘少奇说：

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我看，在农村里面，我们的工作有缺点错误，也有天灾；在城市里面，在工业方面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错误。农业方面是高指标、高征购等等。工业方面也是高指标，横直要搞那么多钢材，那么多煤，那么多交通运输。文教也是这样。结果，把原材料和各种东西都搞到这些方面来，其他方面就没有了，势必挤了农业和轻工业。这是从中央起要负责的。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茹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湖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有

成绩就是有成绩，有一分成绩就是一分成绩，有十分成绩就是十分成绩。成绩只有七分就说七分，不要多说。我们这几年确实做了一些事，也做了一些不见效的事情。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不把责任放在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人身上。我们现在是来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要下决心。

我们的这些缺点错误，从一方面来讲，由于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够，有些是不能避免的；从另一方面来讲，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早一点发现，早一点转，这是可能的。我们转慢了一点，问题发现得迟了一点，所以，损失比较大。但是，现在转过来还不迟。我看在座的同志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经验教训了。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㉗

刘少奇的观点鲜明尖锐，一针见血，揭示了问题的本质，获得了中共中央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接受，成为中共中央的主导思想，而毛泽东那些模糊笼统，作样子走过场式的检讨，很快地为人们所厌恶和抛弃。从此之后，毛泽东再不讲“大跃进”惨败的原因之类的话，变得缄口寡言了。同时，毛泽东开始真正地退居二线，不再挂帅揽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当了徐霞客，而调整国民经济的重任，则落在刘

少奇的肩上。

在刘少奇的影响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为了具体总结经验教训，组织了几个人，集中在北京动物园内的畅观楼，查阅一九五九年以来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看其中提过哪些“左”的口号，制定过哪些“左”的政策规定，彭真说：“要冷静地研究三面红旗是红旗？灰旗？白旗？”与此同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在一些场合下说：

我们现在的政治空气怎么样！谁要实事求是，就给谁扣帽子，什么“三论”：条件论、悲观论、神秘论。什么“五派”：伸手派，算帐派，观潮派，摇头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是主观精神，总要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上吧！没有客观基础，就只剩下一个主观精神了……

一定要改正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改，连无产阶级专政也要翻掉。

九个指头一个指头，但一个指头可能是杜勒斯的癌症。

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几年还不够，可是这几年“左”倾错误的经验够了。㉘

毛泽东为维护“三面红旗”所设置的种种“禁区”，被刘少奇率先打破。从此，对“大跃进”的检讨，才真正进入实质阶段。

在此后半年中，刘少奇对“大跃进”失败的反思，不断有所深化。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在会见印度外交部秘书长拉·库尼赫鲁时说：

农村人民公社对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利还是不利？我们已经试验了三年，还存在一些问题，也出了一些毛病。现在只试验了三年，至少可试验十年，再作总结。我们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有很大的进步。本来也可以继续办它好几年而不进入公社。但是农民群众已经在高级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织公社，想对发展农业生产创造更好的条件。农民要这样做，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赞成还是反对。当时，我们也曾考

虑到将来也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也许不完全适合，但对不对，这要由历史来做结论。㉙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七日，刘少奇在沈阳听取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

现在，有些人有怀疑、抱怨、牢骚，讲出来好。不要人家一怀疑就不让讲话。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要切实让人家讲话，这样党内就生动了，就可以讨论问题了。人民公社是有优越性，问题是丢掉了高级社的一套东西，搞了平均主义、供给制、食堂等等。可以设想，如果保存高级社的一切优越性，在此基础上联合组织人民公社，优越性就可能更多一些。现在看不出优越性；难于说服人家，农民就说服不了。等三五年后，经济恢复了，人民公社显示出更多的优越性来，有了事实，才能说服人。㉚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九日，刘少奇在哈尔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和省长李范五汇报工农业生产情况时指出：

你们三级干部中有人怀疑三面红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客观上存在一些现象。“大跃进”现在有些跃退了，公社的优越性不那么明显，减低了，于是出现三面红旗是否正确的问题。高级社的优越性不要吹掉，没有更好的办法时不要动它，要保留。㉛

很显然，刘少奇对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在中国是否需要这么早就办人民公社，以及“三面红旗”是否正确，都已产生深深的怀疑了。刘少奇与毛泽东在政治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鸿沟。

刘少奇的言论，与当年的彭德怀相比，要严重得多，尖锐得多，大大地超出了毛泽东可以容忍的程度。毛泽东的不满意是很明显的。在八月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便说：“现在已退到谷底。形

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而且还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那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毛泽东不但在为自己辩护，而且在向刘少奇等人反击。那些话已不是摆事实、讲道理，已不是正常的讨论和交换意见，而是带有强烈的意气和感情的色彩，带有强烈的不满和温怒。毛泽东的话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仅仅几个月之前，毛泽东还在大声疾呼：“要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一九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毛泽东的话语犹在耳边，现在，对调查研究反映出来的事实，毛泽东却不能接受，也不愿意接受，反而歪曲事实，掩饰真相，意气用事，迁怒于实事求是的人。毛泽东的这种作法，充分表明了他晚年的那种理论与实践脱离，说一套作一套，“马列主义尖朝外”，只对别人，不对自己的恶劣作风。

第三阶段是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刘少奇对“大跃进”的反思进一步深化，得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过去”，“经济调整要伤筋动骨”的结论。详情本书将后述。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大跃进”的反思上的这种天差地别，中共的广大党员干部不会看不到。相形之下，毛泽东那文过饰非，对国家对人民没有责任心，虚伪等等的恶劣性就更加突出地暴露在全党、全国人民的面前。毛泽东恼怒了。

五、刘少奇：毛泽东不满意的接班人

一九六一年九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于是，便发生了“毛泽东夜谈接班人”的这一幕。

伯纳·劳蒙哥马利是世界着名的军事家，一九六〇年五月，他首次访华，历时五天，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外交部长）的接见。后来他感到该次在华时间太短，遂于一九六一年九月五日再度访华，历时二十日。在华期间，除了会见中国领导人外，蒙哥马利还指名到几个不向西方开放的城市参观，在国防体育协会主任李达上将陪同下，访问了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回到

北京后又会见周恩来，还准备会见毛泽东。

蒙哥马利此行的一个目的，是对中国进行战略考察，尤其是毛泽东身后的接班人问题，他甚有兴趣，在各地访问时，他曾多次设法探问。因为，根据苏联和斯大林的经验，接班人的问题涉及到中国的将来是否稳定，西方国家对此十分注意。蒙哥马利在郑州时便说：斯大林是一位有权威的政治领袖，但缺少远见，生前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继承人，死后出现了“三驾马车”，局势混乱，贝利亚被杀掉，结果让只会用皮鞋敲桌的赫鲁晓夫取得权力，他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毛泽东得知蒙哥马利的情况后，决定九月二十三日在武昌会见这位英国元帅。

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夜谈接班人问题，熊向晖有如下的回忆：

这天下午，我和浦寿昌（周恩来的秘书）飞抵武昌。机场上停着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到东湖毛主席的住处。

在向主席汇报时，我先提到蒙哥马利对主席很钦佩，对中国很友好，但也在对我们进行战略观察。然后讲了我向总理讲过的情况和迹象。

主席连续抽烟，有时插几句。我讲完后，他问，英文里“继承人”是什么？我说：“SUCCESSOR”。主席叫我在一张纸上写出来。他看了一会儿说：“SUCCESS”这个词他知道，意思是“成功”，怎么加上“OR就变成“继承人”了？

浦寿昌作了解释。主席说：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

浦寿昌说，英文里没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接班人”翻译成英文，还是“SUCCESSOR”，习惯上理解为继承人。

主席说，这个元帅讲英语，不懂汉语，他是客人，就用“继承人”吧。

主席说，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这次在北京

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

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呀？是不是也像中国人那样怕犯忌讳。我说也许是。

主席说，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这也难怪，他是英国元帅，是子爵，不是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么清楚。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得大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呜乎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

主席说，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一九四五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的鼻子嗅不到。一九五六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我们没有搞“抽样调查”，英国元帅搞了，一搞，发现了问题。中国一些群众也没有捅破这层纸。这位元帅讲了三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

了有好处，让国内国外都能看清楚。什么长生不老药！连秦始皇都找不到。没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九月二十二日中午，蒙哥马利在李达上将等陪同下，从北京生专机抵达武汉，住在汉口胜利饭店。晚上六时半，毛主席在东湖会见他，并共进晚餐。蒙哥马利赠送毛主席一盒555牌香烟，提出许多问题，其中包括：一九四九年建国时，毛主席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现在考虑的又是哪些问题，对解放以后的中国怎么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是否还适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何区别，对他提出的三原则有何意见，等等。

毛主席还一回答。谈到九时半，蒙哥马利说：今天的谈话使我学到很多东西，我想主席一定很忙，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能否明晚再来谈谈？主席说：明晚我到别处去了。谈话就此结束，互相道别。尽管谈话中彼此问过年龄（这年毛主席六十八岁，蒙哥马利七十四岁），但蒙哥马利并未问及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

没有料到，三十四日凌晨五时左右，浦寿昌通知说，主席改变了计划，决定当天下午再同蒙哥马利谈一次，并共进午餐。这使蒙哥马牙喜出望外。

这次追加的谈话是从下午两时半开始的。寒喧几句后主席就说：元帅是特别人物，相信能活到一百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七十三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蒙说：马克思可以等一等。这里更需要你。

主席说：中国有句话，七十三一八十四，阎王爷不清自己去。蒙借机提出：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主席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主席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蒙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你。你现在不能离

开这条船放下不管。

主席说：暂时不离，将来学丘吉尔的办法，随时准备灭亡。接着主席讲了五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压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主席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主席还说，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喂鱼。

谈到下午五点，主席邀蒙哥马利坐船，看他在长江游泳。主席游了近一小时，上船穿好衣服，把蒙哥马利送到汉口胜利饭店，又谈了近一小时，并把他事先写好并署名的《水调歌头·游泳》词一首，赠蒙哥马利元帅，作为那盒“555”香烟的答礼。㉜

蒙哥马利此行的目的，是要打探毛泽东的接班人情况。要令蒙哥马利与西方世界释疑，不仅需要明确接班人是刘少奇，更重要的是要介绍刘少奇的优点和长处，以证明刘少奇并不是马林科夫。由于这些事情只能由毛泽东来说，因此周恩来特意安排了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会见。

奇怪的是，在九月二十三日的第一次会见中，宾主都没有提到接班人的吸，而且当蒙哥马利提了要求“明晚再来谈谈”时，毛泽东回答“明晚我到别处去了”，拒绝了蒙哥马利的要求。同时，尽管当时只是九时半，时间并不是很晚，会见也只进行了三个小时，毛泽东也并没有挽留蒙哥马利，从而使会见就此结束。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的政治目的并没有达到。

毛泽东是在二十四日凌晨改变主意，决定当天下午再同蒙哥马利谈一次的。这样的一段小小的曲折，清楚地反应了毛泽东心中的犹豫。

毛泽东向一位英国人谈论自己的“接班人”问题，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和政治上的封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绝大多数的国家，也与中国吵翻脸，围攻中共和中国。与此同时，印度乘火打劫，挑起领土纠纷，迫使中国发动自卫反击战争。中国处于多方面的敌对国家的包围之中。在国内，又面临着国民经济的崩溃，史无前例的灾难。在这

种情形下，蒙哥马利代表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战略观察”，想了解毛泽东身后的中国是否稳定。面对着这种挑战，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出马，谈论“接班人”问题，以释蒙哥马利及世界各个国家的疑虑，巩固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地位。对毛泽东来说，这是责无旁贷的事。

通观毛泽东的讲话，有两点值得人们的注意。

在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上，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这篇谈话，一直被视为是毛泽东信任刘少奇、毛刘关系融洽的铁证。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正如邓小平在一九五三年所说，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中共第二把手的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公认的历史事实，而不是毛泽东或那个人敕封、钦赐的。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不得不承认，也不能不承认，这是不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因此，毛泽东不讲“接班人”则已，要讲就必须提刘少奇。否则在中共党内通不过，在全国人民中也通不过。在当时的形势下，毛泽东还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题。因此，不管毛泽东心中愿不愿意，毛泽东都必须向蒙哥马利提出刘少奇是自己的“接班人”。

那么，在毛泽东的心底里，将刘少奇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是否是由衷的，心甘情愿的呢？对刘少奇这位“接班人”，毛泽东是否很满意，觉得自己选择正确，党和国家后继有人而欣慰呢？从毛泽东与熊向晖和蒙哥马利的谈话中，完全看不到这一点。

于是，在整个谈话中便出现了一个大破绽，那就是毛泽东请接班人问题，只回答了自己的选择，而没有讲为什么这样选择。为了使西方国家释疑，毛泽东不但要提出刘少奇是接班人，更重要的是要介绍刘少奇，说明刘少奇是一位出色的、有能力的接班人，并不像斯大林选择的马林科夫，而中国也不会出现苏联的混乱局面。这本是题中应有之议，然而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毛泽东介绍接班人的事情，似乎只做了一半。毛泽东向外人，尤其是外国人谈论自己的接班人，竟没有一字一句的评价，没有只字片语的赞扬，这是十分不正常的。是毛泽东的疏忽吗？不是，像毛泽东这样的老练而富有经验的政治家，不

会犯有这样的过失。是毛泽东不愿意讲对刘少奇赞赏的话，毛泽东不愿为刘少奇唱赞美歌。因此才出现毛泽东提出刘少奇是“继承人”，但又没有向蒙哥马利介绍刘少奇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矛盾的现象。

毛泽东的这种矛盾的复杂的心理状态，明确地表现了他对刘少奇及其接班人地位的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是刘少奇的能力、水平、威望资历不够吗？不是。在当时，刘少奇在这些方面都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状态。毛泽东的不满意，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是，刘少奇与毛泽东不够“亲”。建国后，尤其是五十年代中期后，毛泽东“任人唯亲”的倾向已十分明显，处理彭德怀及任用林彪，便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刘少奇虽然是旗手，但自建国以来，他对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及“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跟得不够贴，不够紧，思想不够“左”，对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诸多抗拒。建国初发生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将山西省的发展农业合作视为“空想的、反动的农业社会主义”，以及后来的“反冒进”，都表明刘少奇的思想与毛泽东距离颇大，每逢历史转折的关头，刘少奇都不能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跟不上毛泽东的前进步伐，每每都需要毛泽东大喝一声，猛推一把，刘少奇才踉踉跄跄地跟上来。对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也是一样，刘少奇从湖南调查回来后，其认识明显地偏离毛泽东，其程度更超过彭德怀。对此毛泽东感到强烈的不满。

其二，是刘少奇的权势已过于强大，毛泽东已感到严重的威胁，担心这位接班人会超过自己，压倒自己。一九五八年武昌会议上关于国家主席提名问题发生的不正常现象，便明显地表露了毛泽东的这种心态。

出于这两点原因，毛泽东在与蒙哥马利的谈话，自然是有所保留了，于是说一半，留一半，呈显出矛盾与复杂的心理状态。毛泽东并不满意刘少奇这位接班人。

---

①②：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二二三页。

③：同上，三九四页。

④：谢春涛《毛泽东和中国的一九五八年》。

⑤：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

⑥⑩：权延赤《领袖泪》二七——三二页。

⑦⑧⑨：同①。

⑪⑫：引自逄先知《毛主席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三七一四一页。

⑬：同①三七六页。

⑭⑮⑯⑰⑱：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⑲：郑谦、韩钢《晚年岁月》一四九页。

⑳㉑：同⑪。

㉒㉓：《刘少奇年谱》。

㉔：王光美《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

㉕：引自黄峥《刘少奇一生》。

㉖：刘少奇《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㉗：刘少奇《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办法》（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㉘：贾思楠《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二〇一页。

㉙㉚㉛：引自《刘少奇年谱》。

㉜：引自《世界知识》一九八八年第二十期。

第四章　毛刘分裂：“七千人会议”

一、国民经济继续恶化

一九六一年过去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自一九六〇年七月的中共北戴河工作会议通过以后，实施已一年多，但见效不大。一九六一年的国民经济，仍然大幅度滑落，危机越发深重：

粮食产量只有二九五〇亿斤，只及一九五一年的水平；棉花、糖、烟、麻、茶等经济作物继续大幅度减产；

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八．二；其中：

钢产量只有八七〇万吨，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五三．二；

轻工业全年总产值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二一．六；

国家财政收入，比上年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七．八。①

粮食和副食品继续严重缺乏，生活必需品仍然极度紧张，人民获得的粮食、食油、棉布的定量分配品，比上年继续减少，城乡居民仍有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经济的困难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一九六一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工作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说：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虽然已经提出了一年多，但

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以致调整工作不能有效地进行。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我们的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②

之所以造成调整工作不见效，形势继续恶化的原因，主要是毛泽东的遮丑护短，文过饰非，从而导致中共党内思想认识下一致，与国民经济的严峻现实很不适应。有些人认为“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是一个指头”，不应将困难看得过多过重，“气可鼓不可泄”，认为只要再有个丰收年，便可再度“大干”，继续“跃进”，因而不愿缩小基本建设规模和降低高居不下的经济指标。再有一种人虽然也看到了几年来的失误，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调整的必要性，但见于彭德怀的前车之鉴，对种种的错误、问题不敢想，也不敢提；而更多的人对当前的形势表现迷惘，不能理解、信心不足、不知所措，因而在实际的调整工作上踌躇犹豫，迟疑不决。还有许多党员和干部，对“大跃进”特别是“反右倾”以来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上级领导缺乏民主作风，下面不敢讲真话、不敢提意见的状况意见极大，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关系紧张，许多人牢骚满腹，怀有严重的埋怨情绪。

这一切都严重地影响了调整工作的贯彻执行。

在这种形势下。从中央到地方，广大党员干部迫切希望中共中央总结经验，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克服困难，走出灾难的深渊。

出于这种迫切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二、“七千人会议”：毛泽东“捂盖子”

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以及重要

厂矿的负责干部，解放军的一些负责人。规定全国县委有二人、地委有三人、省委和中央各部委有四人参加会议、共有七一一八人。因此又称“七千人会议”。这是中共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工作会议。

会议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开幕。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和通过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对会议所做的报告。

刘少奇的报告，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刘少奇负责起草，参加起草的还有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吴冷西、姚臻等人。据吴冷西回忆：

刘少奇同志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报告的主旨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作风，无论总结四年工作，分析当前形势，提出克服困难的方针政策，都要实事求是。在报告初稿的起草过程中，他对参加起草工作的同志反复强调这个思想。在报告的整个起草和修改过程中，以至整个大会过程中，少奇同志都身体力行。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出来以后，先送给毛主席看。原先设想，毛主席看过并认为大体可用以后再提交政治局讨论。过了两天，小平同志告诉我们，毛主席的意见是不要等他看了，也不等政治局讨论了，就把初稿直接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请大家提出修改意见。③

在毛泽东的控制下，这个报告自然不能深入地检查“大跃进”以来的失败教训。刘少奇的观点未能在报告中体现。

果然，当刘少奇的书面草稿发到与会代表时，下面议论热烈，意见纷坛。例如在报告草稿中，为了免给“三面红旗”抹黑，而把困难的原因说成主要由于三年自然灾害，从而引起许多代表的不满。而在列举四年来工作上的错误缺点时，有些人说“讲得不深不够”。有见于此，中共中央便决定以刘少奇为主，成立一个成员规格更高的报告修改小组，其成员除了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外，

还包括政治局委员，各中央局和主要省市的书记及中央主要部门的负责人，其二十一人。小组深入各省市的讨论会议，倾听及收集代表们的各种意见，进行补充修改。

会议原定在一月二十八日通过刘少奇的报告后结束，以便让代表们各自返家过春节。而毛泽东也不打算在会议上发表讲话。然而刘少奇书面报告的修改拖长了时间，直到一月二十七日，报告的修改稿才发到代表们的手上。于是会议又决定一月三十日或三十一日结束，代表们三十一日晚便可离京返回各地。

报告是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之名印发的。刘少奇的《报告》分为三大部分：

一、目前的形势；

二、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

三、党的问题。

由于这个《报告》是在毛泽东的把持下起草和修改的，因此《报告》在总的方面体现的是毛泽东的捂盖子和文过饰非的主导思想。

例如在“目前的形势”这一部分，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工作成就，列举了十二条，对“大跃进”评价过高，肯定了一些不该肯定的东西。而对四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则只列举了四条：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比例失调；在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变动过急，刮“共产风”；权力下放过多，造成分散主义；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业生产的困难。

关于造成目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报告》只是泛泛地论述，如“经验不够”，“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等等。刘少奇提出和坚持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起先在起草委员会，后来在中央政治局都得到了一致的赞同，只是在最后定稿时遇到毛泽东的反对，没有能够写进去。

刘少奇提出的“大跃进”以来“缺点是三分，成绩是七分”的另一个“三七开”的观点，也没有能够写进《报告》里去，《报告》说：“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的性质，不是路线性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这几年“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而决不是相反”。

《报告》中的这些重要观点，都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因此《报告》遂得以通过。尤其重要的是，《报告》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这种判断掩盖了“大跃进”错误的严重性和灾难性的真相，使人们真以为“错误只那么一点”，从而减轻了“始作俑者”的责任。这是毛泽东特别看重这一论断的原因所在。

《报告》没有也不可能有对“大跃进”进行认真的检讨，也谈不上总结经验教训。很显然，这只是毛泽东在压力面前向全党和全国做的门面功夫。

《报告》上写的是刘少奇的名字，打上的却是毛泽东的烙印。

三、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戏剧性的转折，发生在刘少奇的即席讲话。

据吴冷西回忆：

少奇同志的报告稿在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通过以后，毛主席建议，这个报告几易其稿，多次讨论，大家都很熟悉，不必再照本宣科了，可作为书面报告印发，另由少奇同志在大会上作补充说明和解释。少奇同志当天亲自通宵草拟了一个讲话提纲。第二天（一月二十八日）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聚在后台休息室（原北京厅），少奇同志把讲话提纲交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就一页一页地传给其他常委看。提纲一共有十几页，因为字写的很大，很快就传看完了。⑤（刘少奇是在一月二十七日发表即席讲话，吴冷西在时间上恐有误——作者注）

一月二十七日上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全体大会，这时，七千多名代表早已在人民大会堂内坐定。毛泽东与中央常委们在一片掌声

中走上主席台。毛泽东随即主持开会，宣布由刘少奇讲话。这就是对中国的政局发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吴冷西（曾长期任《人民日报》社长、新华社社长）说：

少奇同志素以观点的鲜明性和尖锐性著称，他在讨论问题时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而且力求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少奇同志也素以论证充分、逻辑性强见长，他的谈话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使人心悦诚服，即使你不完全同意，也难以辩驳。这些特色，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充分显示出来了。⑥

刘少奇的即席讲话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对形势的估计，“出现一个大的马鞍形”。刘少奇说：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一九六二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主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关于造成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问题，刘少奇说：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

没有增加，而且减少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一九六〇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全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关于“缺点与成绩三七开”的问题。刘少奇说：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

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

关于“三面红旗”的评价问题。刘少奇说：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批评“大跃进”以来提出的一些口号。刘少奇说：

几年来，各个地方和中央都在群众中提过不少的口号。除了正确的口号以外，其中有些是不正确的，有些是部分不正确的，有些是解释得不清楚的。我认为，应该认真地清理一次，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对这几年来在观念上不清楚的许多问题，弄得更清楚些。

我现在举几个例子。

有一个口号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要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说明白。

有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曾经反对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叫做“条件论”，或者叫做“唯条件论”，这也是不正确的。那种完全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反对重视条件，不能反对重视客观条件。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要有客观的条件，还要有主观的条件。必要的客观条件和必要的主观条件，都成熟了，都具备了，问题才能解决，事情才能办好。一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时间、地点、条件。就是说，要具备一定的时间条件、空间条件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条件，事情才能办好。条件是可以经过人们的努力去创造和改变的，但是不具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事情是不能办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是重视条件的。我们不能反对、也

不应该反对重视条件。但我们不是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者。我们认为，主观能动性在符合客观规律性的条件下，是能够发挥伟大的作用的。

还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引号里面的“左”。“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号里面的“左”派。我劝告同志们，不要做那个引号里面的“左”派，要做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只有这样的左派，才会经常是朝气勃勃的、具有干劲的左派。不排那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那种加引号的“左”派。那种“左”派不会有真正的经常的干劲，他会由一时的狂热突然转入消沉。那种“左”派不但不值得敬仰，而且应该受到批判。这种人就其所犯错误的后果来说，和右派差不多，不见得比右派好一点。有些人在犯了极左的错误以后，转过来又犯极右的错误。所以，那种“左”派和右派常常是相通的。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这几年，还有一种用具体的指标、数字来确定是左或者是右的做法。比如说，亩产八百斤就是左派，亩产七百斤就是右倾。这也是不正确的，在这种具体指标、具体数字的问题上，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上去。对于生产技术的问题，也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上去。

此外，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是从哪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哄起来了。这种方法，是不好的。

我建议，诸如此类的口号，中央还可以再清理一下。各省委也可

以清理一下。（毛泽东：中央书记处已经清理了一次，但是还没有清理完毕。《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事业局，究竟还说了哪一些对人民不利的话？要清理一下。）我建议，关于这个问题，由各地委、各县委提出意见，交给省委，由各省委加以清理，加以解释，写出文件来，送给中央。经过中央批准，再发下去。这些口号的清理，一律要经过中央，各地方不要自行决定。⑥

刘少奇还讲了彭德怀问题：彭德怀“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一也并不算犯错误”，“我们动不动就给自己的同志扣上反党的大帽子，其实人家只是对某一个具体领导有意见。反对某一个人怎么能说就是反党呢？你反对毛主席，也只是反对毛主席个人嘛”。

从今天来看，刘少奇的讲话是有局限性的，如他说“我们犯的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发生错误的原因，刘少奇也只总结了“经验还很不够”和“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等。然而，从当时来说，刘少奇的讲话是比较客观、实事求是的，因而也显得更加深刻和透彻，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刘少奇的讲话代表了中共党内的正确路线和健康、进步的力量。

不论是无意亦或有意，刘少奇讲话的矛头，处处都指向毛泽东。

刘少奇在讲到缺点和错误已经改正时说：“比如供给制、公共食堂现在已经不办了，高指标已经不搞了，许多‘大办’也停止了，基本建设战线也缩短了，水利建设也不搞那么多了。”这些东西都是毛泽东提倡和坚持的。刘少奇还说：“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等等”，都是缺少或没有根据的，没有调查研究，没有与群众商量，没有按民主集中制办事，“就草率地加以决定，全面推广”。这些也都是毛

泽东在“大跃进”中的“政德”。

刘少奇在讲话中批评和驳斥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公式，便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批判“反冒进”时提出来的；

造成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去背信弃义的破坏”，亦即“天灾人祸”，也是毛泽东的观点；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也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高潮中赞同的，著名的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认为这是唯心主义，而与毛泽东大吵一通。

批判“唯条件论”和“左比右好”，“宁左勿右”，也都是毛泽东所欣赏的观点；刘少奇对“三面红旗”一的评价，是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是毛刘分歧的核心部分。尽管刘少奇对“三面红旗”说得很委婉，说“现在都不取消”，“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似乎是仍然在坚持。然而，凭毛泽东那犀利的目光和敏锐的政治触觉，他不会不感觉到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态度暧昧，有所保留，换句话来说就是对“三面红旗”的正确性抱有怀疑。“三面红旗”是毛泽东晚年农业社会主义政治理想的集大成者，毛泽东对它至诚至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来使之实现。而刘少奇对此竟持怀疑态度，这是毛、刘在政治思想上产生重大分歧的重要因素。

至于彭德怀问题，尽管刘少奇坚持一九五九年肃整彭德怀是正确的，但那番说话实在是尖锐，刺到了毛泽东的隐痛，犯了“大忌”。刘少奇说彭德怀所讲的“不少还是实事求是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这么一来，毛泽东当初打倒彭德怀的理由，还所剩几何呢？这不是陷毛泽东于不义吗？刘少奇在讲话中虽然说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所以庐山上批判彭德怀是正确。但查了整整三年，查不出一点证据，明白人一眼便看出，那是在罗织罪状。如此一来，毛泽东如何立足于中共党内？刘少奇此番话，后果严重，完全出了格。

刘少奇的讲话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

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和群众中，进行了错误的过火斗争”，以及“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等等，听起来好似每刀每枪都是刺向毛泽东，毛泽东成了无形的众矢之的，刘少奇这些尖锐的、不留情面的话语，不能不令毛泽东感到如芒刺在背。

刘少奇的讲话必须是实事求是，必须是观点鲜明、尖锐，才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说服力，才能纠正党内错误倾向，统一全党思想，把调整工作纳入正轨。然而这样一来，必然会得罪毛泽东，会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对自己不利。在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之间，在毛泽东与人民之间，刘少奇选择了后者，表现出刘少奇的高尚思想情操和崇高的政治品德。

刘少奇是一位正直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在中共党内，在同志之间，他不善于施用阴谋诡计和权术手段。在“七千人大会”以及整个检讨“大跃进”的过程中，刘少奇都没有向毛泽东进行攻击，追究个人责任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权力斗争。相反地是尽力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和尊严，在此方面可谓是煞费苦心。然而毛泽东并没有领刘少奇的情，相反地却迁怒于刘少奇，恩将仇报，以至发生后来的又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与刘少奇都与常规常理“相反地”采取了行动。从这两个“相反地”当中，人们可以看到毛、刘两人在思想情操和政治品质方面的云泥之别。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讲话怀有强烈的不满，这是显而易见的。由始至终——从一九六一年五月刘少奇第一次在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两个“三七开”的观点以来，毛泽东始终没有发表同意刘少奇的这些观点的讲话，相反地，却在不同的场合提出“错误就那么一点点”和“形势已到了谷底，开始上升”进行反击。在七千人大会上，尽管刘少奇一再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毛泽东千方百计地将刘少奇的观点从《书面报告》上抹掉，使其不成为代表中共中央的正式结论。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指示，向全党传达的文件只限于毛泽东一月三十日的讲话，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林彪一月二十九日的讲话，以及周恩来和

邓小平的讲话。而“大会的主要精神”。即刘少奇一月二十七日的即席讲话，则只限于在高级干部范围内传达。毛泽东极力限制和缩小刘少奇讲话的影响力。

刘少奇的讲话，以鲜明、尖锐的观点、深刻透彻的说服力，以如大河奔泻的逻辑性，以及不可辩驳的事实，使绝大多数的与会代表心悦诚服，感到刘少奇真正是敢于实事求是，真正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刘少奇的报告，讲出了许多人多年来想讲而又不敢讲的话，道出了他们敝在心里多年的心声，赢得了代表们的尊敬和信赖，使中共党内正义的、进步的力量，团结在刘少奇的旗帜下。这是中共党政军多数的干部都投向了“刘少奇的司令部”，而与毛泽东疏离，甚至相叛，使毛泽东处于孤立的根本原因所在。

刘少奇的讲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会代表们感奋不已，热烈讨论，议论纷纷，各种各样的意见，如决了堤的洪水般涌现出来。有的代表说：

“说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的，是执行中的问题，为什么全国都推行错了？这几年造成损失，不次于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损失。全国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死了多少牲口，这笔帐应算清。不能笼统地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缺点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

“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自己也不怀疑。但是，为什么实际出了这么多问题，而且这么严重，这么普遍，造成这么大的困难？”

“‘三面红旗’是不是正确，原则上好讲，实践上难讲，抽象讲好讲，具体讲不好讲”。⑦

会议中群情汹涌，不可收拾。到二十九日下午许多代表反映说：话还没有讲完，还憋了一肚子气。有的小组还反映，有人压制民主，不让讲话。见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便又决定将会议延期至二月七日，决心让代表们把要讲的话讲完，把“气”出完。在一月二十九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说：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平要给人家有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作了准备的，而且有的作检讨作了几年——五九年、六〇年、六一年。有好几个省，从五九年起就自我批评，不只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称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这么几天，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国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千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我们常会见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帐，不打击，不报复。⑧

因此周恩来说：这次会议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从一月十一日开幕到二十九日上午，主要是围绕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书面报告》；"第二个高潮"是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七日会议闭幕，中心就是"出气"。

四、林彪："毛主席是正确的"

面对着七千名代表汹涌澎湃般的批评，毛泽东一方面将会期延期至二月七日，让代表们"出气"；另一方面，毛泽东布置包括自己在内而刘少奇除外的中央常委向全体会议作报告，以便冲淡刘少奇讲话的的影响，力图将代表们对"大跃进"以来的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纳入毛泽东的框框之内。

在毛泽东的安排下，打头阵的是林彪。这是刘少奇讲话之后的第一个大会报告，时间仅在两天之后，即一月二十九日。而林彪的讲话与大会的基调"检讨总结、自我批评"是完全相反的。林彪的讲话是经过精心的准备的。据黄瑶著《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记载：

当时，（指一九六一年底）中共中央已决定在翌年一月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林彪要在这个会上发言，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便奉命组织一个班子为他起草发言稿。一天，在三座门讨论这个发言稿的第四稿时，叶群（林彪妻子）提出，在发言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集体会斗中形成的"这句话意思不完备，应该加上"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天才"这几个字。

罗瑞卿不同意。他用商量的口吻说："现在已经不再提个人天才了呀！"。

叶群颇为理直气半地说："个人天才，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才不提了，斯大林时代还是提的，现在对毛主席，在中国和在全世界，都可以这样提。"

罗瑞卿站起来很严肃地对叶群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这句话不是我写的，这几个字从中南海出来的，是田家英提的"。

叶群立即针锋相对地说："田家英提的不等于是毛主席提的。即使

退一万步说，是毛主席叫田家英提的，那也是毛主席自谦的意思。我们现在用这个话在客观上贬低了毛泽东思想。”

双方争持不下。到第五稿时，罗瑞卿仍然坚持不加“个人天才”的字样。发言稿送到林彪那里，林彪十分不悦，决定撇开这个稿子，另起炉灶。⑨

林彪将准备讲话稿叫做“拉条子”。就象战争年代准备大战役似的，林彪在他那宽大而空旷的房子里不停地踱步，想起几句话或几个字，便随手写在白纸条上。随着不停的踱步，白纸条也越来越多，散落在沙发、茶几、地上。最后，秘书们将这些“条子”收集起来，理出头绪，编排顺序，这就成了林彪的讲话稿。林彪说：

所发生的毛病，使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少得多。

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右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达拉，向“右”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

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

的意见受不列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⑩

林彪的讲话，使毛泽东的错误——包括“左”倾冒险主义和个人专断的作风，得到了很好的掩护，使毛泽东的罪责得到开脱。

林彪的讲话，得到了毛泽东的极度赞赏。林彪刚讲完，毛泽东便带头敲掌（见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二〇六页）。

会后，毛泽东指示罗瑞卿、王任重和田家英把林彪的讲话稿在文字上作一番推敲、整理，毛泽东还亲自进行了一些修改，于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批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毛泽东要求将其“发给党内干部学习”。⑪

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和即席讲话，毛泽东也有批示：

少奇同志：

二月十七日的信及两个文件（指上述刘少奇的两个报告），均已看过，修改得很好了，即请你处理！

毛泽东二月二十三日。⑫

只要相比较一下便可发现，毛泽东对林彪讲话的评价要比刘少奇的讲话高得多，而且那叫“好”声，是由衷的，真正发自内心的。

在同年的四月二十九和三十日，毛泽东在武汉又特地同罗瑞卿连续谈了两次话。他问罗瑞卿：

“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篇来？”

罗瑞卿回答：“我怎么讲得出来？我水平差得远，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出来。”

毛泽东大度宽容地说：“讲不出来，可以学嘛！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的。我也是这个方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一遍。”

五、毛泽东避重就轻漫谈“自由王国”

在林彪讲话的第二天，即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向全体大会发表讲话。

毛泽东讲了六个方面的问题：

一、这次开会的方法；

二、民主集中制问题；

三、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

四、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五、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六、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六个方面的问题，真正与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有关的，只是第二和第四个问题。

关于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说：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那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他特别严厉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的现象：

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如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那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

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毛泽东说：

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评性、认识客现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

“民主集中制”和“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是毛泽东讲话中的两个重点，就其篇幅来说，后者比前者还要长些。

作为中共中央主席，作为“大跃进”的发动者和直接领导者，人们希望从毛泽东那里听到一套比刘少奇的讲话更深刻的、全面的总结。然而毛泽东拿出来的，仅是民主集中制和认识客观世界这两个问题来交差，从中央领导人到地方各路诸侯，都不禁感到深深的失望。

“民主集中制”和“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一个是工作方法，一个是思想方法，是“大跃进”惨败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即思想意识。对此毛泽东心中是一清二楚的。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提到“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即是“左”倾冒险主义，亦是农业社会主义），点到了要害，刺到了痛处，令毛泽东勃然大怒便是明证。

其次，毛泽东思想上的骄傲，不谦虚谨慎，政治作风上的独裁、专横独断、听不得不同的意见，也是“大跃进”惨败的重要原因。

可是，这些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毛泽东都没有说，而将“民主集中制”和“认识客观世界”这两条拿出来搪塞，明显地毛泽东是在避重就轻。

既使是“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批评的锋芒主要是对着省、地、县三级党委的负责人，对中央尤其是中央核心领导却只字不提。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的损害，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确实是“大跃进”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然而，问题的根源恰恰首先来自中共中央核心，就在毛泽东身上。自从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以来，乃至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都是将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之上，独断专横，听不得不同意见，大搞个人崇拜。上梁不正下梁歪，全党及全国各地的民主集中制才遭到严重的破坏。毛泽东在检讨这一问题时，对自己没有任何的反思与自省，没有一个字的自我批评，而是将批评的锋芒指向全国省、地、县三级党委的负责人，声色俱厉，神情愤慨。从这里又一次暴露了毛泽东的只说不做，理论与实践脱离，对别人一套，对自己一套的虚伪性。

毛泽东如此作法，还有转移目标的用意。毛泽东了解到，自一九五八年以来，由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全国各地上下级之间，各级党委内部之间，矛盾十分尖锐。尤其是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为了完成任务指标，对下面采用高压政策，其他干部敢怒而不敢言。毛泽东在讲话中对第一书记的指责，如同火上加油，将各地的矛盾挑开了。毛泽东还说“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果然，毛泽东的讲话在与会代表之中反应强烈，各地代表纷纷向“第一书记”开炮，代表们几年来的怒气、怨气，都发泄在“第一书记”身上。而毛泽东成功地转移了众人的斗争锋芒，站在一边乘风纳凉。

至于“认识客观世界”，那是一个无休无止的过程，正是“活到老，学到老”。因此，由于未认识客观世界而犯的错误，一般都会受到宽恕与原谅。毛泽东正是利用人们的这一弱点，在大会上提出这个问

题，避实就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至于最令全体与会者瞩目的毛泽东的自我检讨，毛泽东说：

去年六月十二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许多中共的领导人及北京出版的书刊，都不约而同地将毛泽东的这次自我批评说成是“诚恳的”，“真诚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就说“体现了党的领袖的广阔胸怀”。其实，毛泽东的自我检讨是肤浅的、虚伪的。北京的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研究权威廖盖隆就认为“毛泽东对‘大跃进’的错误的认识，只是初步的，不能说是彻底的。而中央的其他同志，比如刘少奇，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比毛泽东深刻。”（见张素华等著《说不尽的毛泽东》上卷四五一页）

如果是从总结经验教训出发，毛泽东应当详细而具体地讲出自己自一九五八年以来在那些方面犯了错误，根源何在，造成了什么后果，今后应如何避免等等。然而毛泽东没有这样做。

很显然，毛泽东的此番表白，只是为了向全党交待一下。由于只是“交待”，而不是“检讨”，因而只是笼而统之，一笔带过，既没有具体事实的罗列，更没有深入详细的分析。

既使是应付了事实的“交待”，毛泽东是不是“真诚”的呢？

将毛泽东由衷地赞赏林彪的讲话同他关于承认错误的话作一比较，不能不使人感到这番话的虚伪——毛泽东的内心里并不认为自己在“大跃进”中犯了错误，“三面红旗”并没有错，毛泽东的检讨服欺骗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门面功夫。

“三面红旗”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这么严重的灾难，死了那么多人，作为发动和直接领导这场运动的毛泽东，竟然没有任何的悔意，毫不负责任，不知道此时此地的毛泽东，国家和人民在他的心中还有多少的份量，还有多少“为人民服务”的气味。

六、毛、刘结怨

“七千人大会”是建国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毛泽东为首的错误路线的一次重大较量，在中国现代史上占重要的地位。

刘少奇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两个“三七开”，表现了他的勇气和胆识。其实，两个“三七开”只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三年灾难的一些表象，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然而薄一波说这是“难能可贵的，没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气，不可能提出这种实事求是的意见来”。（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〇二五页）吴冷西也说：“被当时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需要非常的距识、卓识和韧性”。（见《实事求是的榜样》）刘少奇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正是“一人之下而亿万人之上”。既使如此，刘少奇要说一些公正的、比较客观的话，亦需要“大无畏的革命勇气”，需要“非常的胆识”。当时中国政治的黑暗，可见一斑。

格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刘少奇没有，也不可能对“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进行揭露与批评，更没有对毛泽东的错误路线进行清算和批判，失去了一个为国家为人民除恶务尽，减少和消除祸患的机会。中国人民和刘少奇本人，都为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刘少奇不但没有除恶务尽，反而多方维护毛泽东。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不但没有提及毛泽东的任何缺点错误，还将毛泽东描绘成正确的代表，抗灾救难的英雄。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尊严，刘少奇可谓煞费苦心。

对刘少奇的一番好心，毛泽东恩将仇报。毛泽东对刘少奇没有与自己沆瀣一气，掩饰“大跃进”的失败与错误，是心怀恨意的。由于

刘少奇揭露了造成灾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错误无所遁形了，毛泽东的威望受到严重的损害。

经此一役，中共中央和全党接受了刘少奇的思想，成为全党的主导思想。以刘少奇为首的正确路线占了上风，而以毛泽东为首的错误路线处于下风。其标志是，“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真正接管了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大权，国民经济向着刘少奇等人指引的方向进行调整。而毛泽东从会后便真正退居第二线，投闲置散到处游山玩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做了徐霞客”。不过毛泽东并不是放弃权力，而是拥权自重，当一名横加挑剔的“太上皇”。

“七千人大会”，是毛、刘分裂的开始。对于这次挫折，毛泽东耿耿于怀。直到一九六六年毛泽东成功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才开始与刘少奇算这笔帐。用江青的话来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恶气”。⑭

---

①：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

②：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三九八页。

③：吴冷西《实事求是的榜样》。

④⑤：同③。

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⑦：转引自郑谦、韩钢《晚年岁月》二〇四页。

⑧：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⑨：黄瑶《三次不死的罗瑞卿大将》二〇五页。

⑩：同⑨。

⑪：《毛泽东文选》第六卷六二页。

⑫：《毛泽东文选》第六卷五一七页。

⑬：同⑩。

⑭：引自廖盖隆《关于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见《党史探索》第一四〇页。

第五章　对“大跃进”“伤筋动骨”的纠正

一、刘少奇：对经济形势要重新认识

“七千人大会”对形势作了比较乐观的估计，毛泽东与刘少奇都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然而，事隔不久，刘少奇及中共中央便发现，这个估计是错误的——最困难的时期还并没有过去。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迫不及待地离开北京，在上海、杭州、长沙、武汉流连，做“徐霞客”。而刘少奇留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落实大会的精神。大会为全党确定了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向，然而具体怎么调整，计划怎么安排，没有来得及研究，那么多人在一起，也无法研究。刘少奇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这个问题。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开始举行，会期为三天。中央常委除毛泽东与林彪不在北京外，其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都出席了会议。由于与会人数不多，只有几十人，会场设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历史上便称之为“西楼会议”。

会议首先讨论了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提出的一九六二年年度报告。核算下来，发现一九六二年财政收支方面将会有三十亿元的赤字，细究之下，又发现自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的财政预算，每年均有赤字，而且逐年增加，四年合共为一百八十亿元。因此，到了一九六二年二月，通货膨胀及物价上涨的趋势不但没有缓和，而且还继续恶化。

一九六二年如果不能彻底扭转这种状况，国民经济不可能得到改善。在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犹如雪上加霜，形势是十分险恶的。对此，刘少奇说：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要重新认识，看来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处在一种类似非常的时期。

陈云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

陈云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对于存在着困难这一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他认为："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这几年处于大变动中，大家对形势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取得认识的一致，需要时间，需要事实的证明。""把各种不同的看法说出来，进行讨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有利于使我们的认识超于统一。高级干部的看法统一，非常重要。"①

陈云分析了当时严峻的经济形势，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一九六一年与一九五七年相比，粮食产量减少了八百多亿斤，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减产也很多。粮食不够吃，人民群众肚子里没有油水，身上缺少衣着，这都是农业减产直接带来的后果。

（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职工和城市人口增加过多，不仅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

（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

（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

（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

陈云认为，上述五点困难中，前两点是最基本的，其他三点是派生出来的。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如不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将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

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也将影响社会的安定。

陈云提出了六条大刀阔斧的克服困难的措施。

陈云的讲话当即得到了“全场完全自发地长时间地鼓掌”，得到了大多数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和赞同。刘少奇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②刘少奇的愤懑之情，跃然纸上。

刘少奇还说：“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刘少奇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和方针政策。”

国务院立即于二月二十六日召开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传达贯彻西楼会议精神。到会的大多数是部长、副部长。先由李富春、李先念分别作关于工业、财政问题的报告，然后陈云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重申和发挥了他在西楼会议讲话的内容。

陈云说：“我看今年的年度计划要作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又说：“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③

陈云的讲话，是对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的补充和具体化，它冲破毛泽东划下的“禁区”，实事求是地、具体地将“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摆在人们的面前。国务院的部长们一致反映，很久没有听到这样实事求是的精彩报告了，认为问题分析得透辟，解决的办法切实可行，大家自发地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会后，刘少奇主张立即以中央名义将陈云的报告转发全国，并要求在按语中说明："对困难的估计，是有十分只讲八分好，还是有十分就讲十分好？困难有十分，只讲七八分，讲少了，工作被动；把困难估计够，甚至估计得多一点，我们工作主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邓小平说得更干脆，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报告全都传达，怎么讲就怎么传达。

西楼会议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毛泽东的错误路线斗争的继续。在"七千人大会"上，"大跃进"造成的困难，没有讲够，也没有讲透。刘少奇的讲话只是大原则，没有，也不可能具体地详细地讲。陈云的讲话补上了这一点。这就是陈云被毛泽东忌恨，称之为"老右倾"的原因所在。

三月十二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为慎重起见，刘少奇说："我们这个会是通过了，可是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

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西楼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听了汇报，又看了文件，表示同意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等三人的报告批发到全国，但只限于给省、军级高级干部参阅。毛泽东仍然在捂盖子，竭力掩饰自己的错误。

这是刘、毛分为了二线后，刘少奇第一次专程向远离京城的毛泽东进行请示汇报。刘少奇虽然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大权在握，但他不敢忘记中共的组织原则，不敢将毛泽东这个太上皇扔在一边。

由此开始，便成为惯例：毛泽东经常离开北京，而且中共中央越是遇到重大问题，他就越是远离北京；对具体事务不参与、不过问，但却横挑鼻子竖挑眼，诸多苛求；遇到紧急、重大的问题，刘少奇就必须千里迢迢飞到"御前"，请示汇报，获得毛泽东的点头、认可。毛泽东与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线领导人之间，一个像刁蛮的老太婆，另一个则像贤良的小媳妇，两者变成十足的，"婆媳关系"。

由于毛泽东定下了限制，刘少奇认为陈云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应该

让更多的人了解。回到北京后，刘少奇要秘书邓力群组织几个人，把陈云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言论收集起来，编辑印发。陈云的经济言论编印好后，刘少奇也没有忘记毛泽东，特地写了一封信：

主席：

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

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校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④

刘少奇从思想上、组织上以至舆论上，全力支持陈云就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他深知，这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责任重大，工作相当艰巨，况且陈云的身体又一直不大好。刘少奇亲自登门看望，同陈云促膝长谈，交换意见。他对陈云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四月十九日，刘少奇签发中共中央通知，向全党宣布了陈云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决定。

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报告下发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反响很大，纷纷要求扩大传达范围。毛泽东不得不同意这一要求，中共中央于四月二十六日发出补充通知，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市级。

于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线对国民经济（也就是对"大跃进"失败的总结）的重新认识，打破了毛泽东的层层禁锢，成为中共中央的主导思想，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

二、刘少奇："伤筋动骨"的调整

刘少奇等人对形势重新认识的高潮，出现在五月七日至十一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会议上。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出席的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各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共一〇五人。会议主要讨论中央财经小组于四月下旬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这是一次规格很高、内容又十分重要的大型会议。

然而，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工作会议。自一九五八年以来，中共中央总共召开了二十五次中全会或中央工作会议。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没有参加这样的工作会议。这是一种无声的抵制和反抗。

会上，刘少奇发表了长篇的重要讲话。他说：

财经小组搞了个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看来，可能还有一些指标完不成。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们每年都调整计划，而且每一次都是往低里调，都是年初计划高，年末调低。只有一九六〇年调高一次，从一千八百万吨钢调到两千万吨钢，结果没有完成。这一次又是调整指标，一九六二年的指标又是调低。同志们，是不是以后不再调低了？让我们搞点低指标好不好？搞了这么多年高指标，我们搞一年低指标行不行？以后计划要这样定：计划定低一点，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按短线来平衡，不是按长线来平衡，而且要留有余地，以便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这个高指标的尾巴，一直还没有割掉，今年要把这个尾巴割掉才好。

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讲清楚。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这个话是很难

讲。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你们回去跟省委书记讲一讲，然后大家才好讲。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

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但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⑤

与会者在发言中说："现在困难很大，而调整的速度却很慢，主要是因为大家对困难的深度和克服困难的艰巨性认识还不一致。比较普遍的情况是：还有些盲目乐观情绪和侥幸心理，似乎只要今年农业有个好收成，明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所以，大家都在观望、等待，硬撑着空架子，不肯收摊子减人，又错过了近半年的时间。如果继续拖下去，不仅会加重困难，使以后恢复起来更加费劲，而且万一国际上有个'风吹草动'，粮食进不了口，全局就不堪设想。"有的反映："现在还有些部门和地方对恢复农业的困难没有足够的认识，进行调整的决心不大，还是陈兵列马，以为只要有一两个好麦收秋收，就可以全部人马重新再上。这是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有的说："要向群众摊开困难。讲明为什么要退，为什么要减，不要隐瞒。""要有'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决心，把一切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使用在刀口上，打歼灭战，同时忍痛割掉一些东西。"⑥

周恩来在会上的发言中也说："这两年的调整中，我们觉得，我们总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总是希望好一点，好得快一点"。"前年经济调整的时候，觉得很快就调整过来了，去年经济调整也还是这样想。现在看，这个调整时期要相当长。一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恐怕就是个调整阶段，甚至于还不够。粮食的恢复，总要三、五年，少的三年，多的五年，有一部分地区也许要超过五年。至于农业的全面恢

复，包括经济作物，农、林、牧、副、渔，都要超过五年。”⑦

会议通过中共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下决心对国民经济作大刀阔斧的调整，不惜“伤筋动骨”。具体措施有：

（一）坚决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在一九六一年已经下放一千万城市人口的基础上，一九六二年再下放一千二百万。

（二）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一九六二年基本建设投资由三八四亿元减为六十七亿元，施工项目减少三分之二以上。

（三）缩短工业战线，关、停、并、转一批企业。全年减少企业一万八千个。

（四）调动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

从“七千人大会”到五月中央常委会议，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线领导对当前经济困难及其原因的认识，再次冲破了毛泽东“七千人大会”定下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困难就那么一点点”的框框，又产生了一个深化与飞跃，从而对形势的认识更清醒，更符合客观实际。在此基础之上，中共中央实施的一系列有的放矢的调整措施，就显得有力和切中要害。

然而，刘少奇的这一番努力，显然是与毛泽东的“文过饰非”，遮遮掩掩的意愿背道而驰的。“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多暴露一分，毛泽东的罪孽也就多增加一分。毛泽东不会喜欢刘少奇的这种“揭盖子”、“掀底子”的作法，这无异是一种有意过不去的叛逆行为。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与仇视，因此而又加深了。

与此同时，刘少奇还在政治领域进行大规模的调整，纠正对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科技的政策。以邓小平为首的书记处，实行“一揽子”甄别平反，对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甄别平反达七百多万人，还为一批“右派分子”摘了帽子。

经过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这次规模空前的经济调整迅速取得了显著成效。至一九六二年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粮食产量达三千二百亿斤，财政收支在连续四年

出现赤字之后，首次出现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市场商品供应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略有改善。至此，尽管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但经过四年“大跃进”百般蹂躏，已处于全面崩溃边缘的中国国民经济，才真正走出谷底，脱离了险境。国民经济调整见效，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左”倾路线的错误与彻底破产，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错误路线，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然而，毛泽东是不会承认失败，也不会甘心失败。毛泽东的反击正在酝酿之中。

三、突破毛泽东农业底线的“包产到户”

一九六〇年，灾难、饥饿和死亡，像洪水猛兽般蹂躏安徽这块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曾经“左”得出众的土地。宿县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农民，得到乡社的允许，带着生病的儿子到山区养病和生产自救。他和家人开垦荒山十六亩，种上了庄稼。一年下来，除交给乡社一八〇〇斤的粮食，还收获口粮、种籽一五〇〇斤，以及饲养猪鸡卖得六十元钱。

这位老农的事迹，与周围赤地千里、饥荒遍野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当地的农民得到启发，纷纷要求包田耕种。一九六一年春，附近的全板等县农民也提出了这种要求。一时间，“包产到户”的要求如燎原烈火，燃遍江淮大地。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是曾希圣。这位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左”得出奇的人物，给安徽省的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格外深重。这时，他抱着一种咎歉的心情，体恤和答应农民的要求。由于“包产到户”自来被毛泽东认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了避嫌，曾希圣加以变通，于一九六一年三月六日起，近全省百分之四十的生产队，施行了“生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饱受灾荒折磨的农民，为了自救活命，也都

纷纷自发地施行“包产到户”。在湖南省、河南省和甘肃省，“包产到户”的做法被称为“借地”，即借出一部分土地给农民耕种。在“大跃进”时代“左”得出格，后来却“土地磁化严重，耕牛死亡严重，人口外流严重”的“三严重”的河南，除了借地外，政府还发给一把铁锹（共发放了一百万把），少量种籽，让农民生产自救。当地农民称这一措施为“救命政策”。

在浙江、江苏、陕西、甘肃、四川、贵州等地，也有不同程度地公然打出“包产到户”的旗号，有的还甚至分田到户。

“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民对毛泽东的“一公（公有制）二平（平均主义）”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一种抵制和反抗。自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包产到户”的呼声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毛泽东屡禁不止。最近的一次，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各地出现灾荒，“包产到户”一时又“甚嚣尘上”。在“反右倾”运动中，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将其压下去。到一九六〇年以后，灾荒蔓延至全国，“包产到户”也就以烈火燎原之势，遍布神州大地。

在“包产到户”这个重大问题上，以刘少奇为首的正确路线，与以毛泽东为首的错误路线之间，发生了巨大的矛盾与斗争。

后来被称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的邓子恢，是大力疾呼，提倡“包产到户”最努力的一个。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对农村的灾难，农民的疾苦最为了解。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和思考，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四日，邓子恢大胆而观点鲜明地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的报告。邓子恢说：“在农业生产力还处于以人畜力经营为主的当前阶段，这种小自由小私有，是最能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和责任心的”，“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强调建立生产责任制是“今后搞好集体生产、巩固集体所有制的根本环节。”

五月底至七月中旬，邓子恢还先后应邀在军委总后勤部、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高级党校等单位做过长篇报告，分析近年来农业的形势和经验教训，再次肯定了“责任田制”，认为不能把“包产到户”说

成是单于，并一再在农村工作部内说："应该实事求是地向中央陈述意见，共产党员时时刻刻想到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不怕丢'乌纱帽'"。⑧

刘少奇是支持"包产到户"的。一九六二年夏，刘少奇在与中央机关派往农村工作的一批人员谈话中，就强调"必须实行责任制"，他说："我看实行责任制，"户包一块，或者一组包一片，那是完全可以的。问题是如何使责任制跟产量联系起来"。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包产到户"有过一段曲折的认识。

田家英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一九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期间，他将安徽的一个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他看到材料里讲到一些缺乏劳动力的社员特别是孤儿寡妇在生产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含着眼泪写了那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好互助求生。她们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带我们的话，要求给一条半，一张犁，八个寡妇互助，爬也爬到田里去。'看到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要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问不过去的。"信中还说，为了总结经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田在这封信里所表达的主张和流露出来的情感，同毛泽东是一致的和相通的。毛立即将这份材料连同田的信批给政治局常委和几位大区书记传阅。陶铸见到田家英说："家英呀，我赞成你的意见。"陈云则对田家英的意见不以为然，说：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嘛！

时隔一年，经过一段调查，田家英的思想起了变化。他认真听取和思考农民的意见，觉得很有道理。在私下多次对我说，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为了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这种家庭经济还是有它的优越性，集体经济现在"难以维持"。

田家英就是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同我一起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的。当时，陈云也在上海，我们将三个点的调查报告同时送给他两人。得到的反应迥然不同。陈云读后很称赞，说“观点鲜明”。在这之前，田已将炭子冲大队的调查报告寄给了刘少奇，刘认真地看了，认为很好。毛泽东却很冷漠，大概没有看，只听了田的口头汇报。毛对田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这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问题的又一次明确表态。

我们从上海回到韶山，调查工作已接近尾声。此时，包产到户在全国呈现迅速发展之势，推行包产到户的呼声日益高涨，成了党内议论的重要话题。

我们回到北京已经是六月底。在北京听到的关于包产到户的声音，跟我们在下面听到的几乎一样，不过这些言论更带理论性和系统性。

回到北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作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就被刘打断了。刘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接着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且详细讲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田问：“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说：“可以。”刘少奇又吩咐田家英把他的意见在“秀才”中间酝酿一下，听听反应。他为慎重起见，并且希望能够真正听到“秀才”们的真实意见，嘱咐田不要说是他的意见。接着，田又向邓小平报告关于起草《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设想。邓的话不多，很干脆：“赞成。”田家英立即组织起草班子。他的指导思想就是：当前在全国农村应当实行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包括集体、半集体、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以便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与此同时，田家英还向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得到一致赞同。

看来，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但是，中央究竟是否决定推行包产到户，还要通过关键的一个关口，那就是毛泽东的同意。田家英似乎觉得比较有把握，因为中央常委的几位同志几乎都支持搞包产到户，至少是不反对；但是心里又有些嘀咕，不知道毛现在的态度究竟怎样。

他知道这样的建议是要担风险的，但他不顾个人得失，终于下决心，以秘书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这时，毛正在河北邯郸视察工作，田家英打长途电话要求面陈意见。那边传来电话说："主席说不要着急嘛！"从这句话里，我们已经微微感觉出毛的不耐烦的心情了。

过了两天，毛泽东回到北京，田家英被召见，地点在中南海游泳池。田家英系统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大意是：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另外百分之六十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这种情况，同刘少奇性急地打断田家英的汇报，滔滔不绝、毫无保留地讲出自己的意见，完全不同。最后，毛突然向田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子把他问住了。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提问，他毫无准备。毛接着又问："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答："是我个人的意见。"

当时，毛没有表示意见。没有表态，这就是一种态度，不过没有说出来而已。

田家英从游泳池回来，情绪不大好。他说："主席真厉害。"意思是说，毛主席把问题提得很尖锐，使他当场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毛泽东善于抓住对方谈话的要害，出其不意地提出问题，迫使对方无法含糊其词，无法回避问题的实质，非把自己的观点确定而鲜明的摆出来不可。

大概是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会议，田参加了，还有陈伯达。毛终于说话了，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大意"。会上，毛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六十条"好像有些偏爱，他多次说：人还是

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有了“六十条”，农村形势就大不一样。在他看来，有了“六十条”，再加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这二条，农村的问题，就调整生产关系方面来说，已基本上解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毛调整农村政策的最后界限，如再进一步调整，搞包产到户什么的，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⑨

邓小平也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的一个。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全会全体代表的讲话中，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他说：

生产关系究竟以甚麼形式为最好，恐怕要探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探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探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现在要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过去就是对这些问题考虑得不够，轻易地实行全国统一。有些做法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我们没有照顾，太轻易下决心，太轻易普及。（《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第三〇五三〇六页）

陈云也是大力支持“包产到户”的。陈云本是个仅慎寡言的人。但他在一九六二年夏天认为“包产到户”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的办法，并打算向毛泽东进言。七月初，陈云从上海回到北京，写信给毛泽东：“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个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毛泽东从邯郸回京后，当夜即约见陈云。陈云陈述了个体经济与合作经济在我国农村相当长时期内还要并存，当前要注意发挥个体生产积极性，以克服困难。

当时毛泽东未表态。第二天传出，毛泽东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就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陈云闻讯后沉默不语。⑩

四、刘少奇千方百计维护毛泽东

在三年灾难时期，刘少奇多方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威信，维护毛泽东提出的"三面红旗"。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刘少奇在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有右倾思想的人，和彭德怀同志讲的差不多，他们说中央领导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表现一"左"一右，不"左"即右，或者说太偏了。因此他们要求中央不"左"不右的好，绝对正确的好。他们要求不"左"不右，要求领导革命没有任何偏向，要求四平八稳。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领导呢？是没有的。不发生一点偏差的群众运动，也是没有的。

刘少奇还说：就是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他们的困难，他们所发生的问题，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所发生的后果，比我们大得多。我想，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绝不次于马克思列宁的领导，假如马克思、列宁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因为没有看到过他们，所以就神化了。从毛泽东同志领导以来，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是不是正确的领导，最好的领导呢？我想是的。对于这样的领导，应该满足了，不要再有要求了，不要既不"左"又不右了。一"左"一右，有一个时期"左"一下，有一个时期就要偏一下，是必要的。毛主席说过，矫枉过正，有一个时期就要偏一点，不偏就纠正不过来。但也不是一直偏下去，一直偏下去就不得了。一个时期对于某个问题，要有重点，强调某一个方面，强调得比较厉害一点，这是正常的领导，正确的领导。毛主席讲过，凡是犯路线错误的，他自己是不能纠正的，只有别人来纠正，就是要把那个领导推翻。所以，一个时候的、范围不大的"左"一右的领导，就是正确的领导。如同飞机驾驶员、轮船驾驶员，他那么一左一右，就是最好的驾驶员。

一九六一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一方面提出两个“三七开”的观点，大力疾呼要坚决纠正错误。另一方面又说“我们的一些缺点错误，并不牵涉到总路线”。⑪

“不是路线错误，是执行总路线的具体政策、具体工作中犯了错误”的话，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及二月二十一日的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一再地重申。

刘少奇作为“旗手”，维护“旗帜”的威望是他的责职。刘少奇用心之良苦，处处可见。

正是刘少奇的百般维护，使得毛泽东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得到维护，得以逃过被彻底批判和清算的命运。

然而，刘少奇如此良苦用心，并没有令毛泽东满意。对于刘少奇的这些许许多多的维护，毛泽东从未作过什么表示，更没有只字片语的赞扬。与对林彪讲话的那种由衷的赞赏相比，真有云泥之别。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刘少奇虽然是“旗手”，但也是一个有起码良知的革命家。面对着“大跃进”所造成的灾难，刘少奇不能昧着良心，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硬说毛泽东“没有错误”。刘少奇还不至于厚颜无耻到此地步。刘少奇是在承认“犯了错误”的前提下进行辩解的，于是，“不是路线错误”，是“具体政策”上的错误，“左”一下、右一下是正确的领导之类的话便出来了。毛泽东并不欣赏刘少奇的这种说法，“具体政策上的错误”毕竟也是错误，毛泽东不愿意听到这些话。而且一“左”一右即是摇摆不定，容易与“一贯的，长期的”联系起来，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在这方面，林彪可就高明得多，也“厚颜无耻”得多。林彪不仅明言毛泽东没有错误，是下面把好经念歪了，而且从历史上说明毛泽东是一贯正确，“八九不离十”。林彪的讲话“媚力”十足，荒谬而不符合事实。然而毛泽东却更加中听，直是“说到心窝里去了”。因此“水平很高”的赞语便出来了。

这一件事，深刻地反映了毛、林、刘三人的内心世界：毛泽东的

虚伪、林彪的媚骨与刘少奇的忠直。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维护的不满，从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讲话可以看得出来，她说："刘少奇诬蔑毛主席的领导是'一左一右的领导'"，又说"刘少奇开修正主义的飞机，一左一右地飞向莫斯科"。⑫

刘少奇绝没想到，他对毛泽东的煞费苦心的维护，换来的却是毛泽东夫妇的仇视与自己的厄运。

---

①：引自陈云《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一九六二年二十六日），见《陈云文选》第三卷。

②：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〇四六、一〇五二页。

③：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三月七日）见《陈云选》第三卷。

④：引自黄峥《刘少奇一生》三八五页。

⑤：刘少奇《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见《刘奇选集》下卷。

⑥：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四二一页。

⑦：同上。

⑧：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〇八三页。

⑨：逢先知《毛主席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六四一六五页。

⑩：同⑧。

⑪⑫：同⑥，四七七一四七九页。

第六章　毛泽东的反击：“阶级斗争天天讲”

一、一九六二年夏季的形势：两种前途的选择

一九六二年夏天，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顺利地进行，全党全国都投入这一伟大的斗争中。然而，人们感觉到，北京政坛上的这种景象，似乎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因为中国政治的“风眼”毛泽东，显得异乎寻常的沉默。

经过一九六一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月庐山会议，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以及“西楼会议”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各自的阵容都亮开摆明了，在对形势的估计、对“大跃进”以来成绩与错误的看法、对造成灾难的原因、对“三面红旗”的评价、在彭德怀问题上的观点、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力度和广度，以及人民公社问题、包产到户问题、甄别平反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等问题上，两人的分歧深如鸿沟，可以说相同点已经微乎其微了。

如果说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是不满意的，那么对“西楼会议”和一九六二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则是愤懑加上不安了。刘少奇所领导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逐步深入，令毛泽东感到巨大的威胁。

首先，对困难形势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实际的估计，在客观上无异是对毛泽东“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批判；对困难形势认识越严重，对“大跃进”的错误认识得越深刻，毛泽东

所要担负的罪责也就越沉重。而调整措施的出台和实施，实质上就是对“三面红旗”的否定，调整的措施越多、越广、越深入，对“三面红旗”的否定也就越多，越广、越深入。作为久经考验的政治家，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不会不了解到这一点。

例如，取消供给制，解散食堂，将基本核算下放到生产队。实际上使人民公社远离了毛泽东所欣赏的“一大二公”，变得面目全非，在很大程度上退回到了五七年高级社的水平。而“包产到户”如排山倒海般不可遏止，则已经是接近对农业合作化的否定了。甄别平反如一风吹，不但是对五八年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否定，也是对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反对意见的肯定；至于对知识分子的“脱帽加冕”和对科学、文化、教育政策的调整，实质上也是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教育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的否定。虽然刘少奇等人还在坚持“三面红旗”，但在实质上，“三面红旗”已成为空壳。

更有甚者，调整的深入使人们不再满足于对“三面红旗”的怀疑，而把反思的视野扩大到一九五八年以前，甚至是建国初期的岁月。其代表人物便是邓子恢，他在一九六二年七月的一次讲话中说：“一九五八年以来问题很多，但事实上毛病不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合作化以来就有毛病了，根子很深”。他又说：“为什么互助组时期最好呢？那时的经营管理是个体所有，彼此互相分工，农民积极性很高。”这种将一九五八年的错误，同三大改造时已现端倪的“左倾”急躁情绪联系起来的，肯定不只邓子恢一人。

一九六二年的夏天，摆在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两种前途：

其一，是让调整工作继续深入发展下去，其结果将必然是触及面越来越深广，最后导致“三面红旗”全面、彻底的被否定，而且还追朔根源，上纲上线，将建国以来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路线全部否定，使中国按照刘少奇指引的方向前进和发展；

其二是，对正在进行中的调整工作，进行有力的干扰、打击，虽不能令其半途而废，也起码要扭转其趋势，改变其方向；不能按照现

有的轨道继续发展下去。也就是说，中国还要遵循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路线继续走下去。

中国的这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实际上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从客观的形势来说，优势在刘少奇一边。在当时的情形下，只要刘少奇略做鼓动，振臂一呼，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都会有大多数人站在刘少奇一边，集合在刘少奇的旗帜下，虽不致于将在革命战争年代立下不朽功勋的毛泽东扔进大字或杀头，但起码也可以迫使毛泽东退居“名誉主席”，用组织形式确定他不得过问朝政，使毛泽东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并清算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中国不但可以避过另一场劫难，而且可以进入一个崭新的健康的发展时期，中国现代史将要重写。刘少奇如果在一九六二年采取措施结束毛泽东统治的时代，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于党、于国、于民，均是功莫大焉，而他自己也将与马、恩、列、斯、毛并列，名垂青史，而不会像后来那样，落个杀身之祸的悲惨命运。

这一点，刘少奇是应该做的，也是可以做的。建国后毛泽东实行农业社会主义路线，给中国带来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尤其是“大跃进”这样全局性的错误，比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更为严重。而据毛泽东自己说：凡是犯路线错误的，他自己是不能纠正的，只有别人来纠正，就是要把那个领导推翻。刘少奇应当像当年遵义会议一样，结束毛泽东的错误统治，这是历史赋予刘少奇的使命。可惜刘少奇辜负了这项使命。刘少奇没有乘机结束毛泽东的统治，固然表现了他的正直、忠良的品德，但这也恰恰是他在政治上所犯下的一大错误，表现了他欠缺坚定的政治原则性，表现了他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刘少奇自己就没有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解脱出来。为此，中共、中国和刘少奇本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刘少奇和中国，都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对刘少奇和中国来说，这都是极大的损失和不幸。

一九六二年夏天的形势，毛泽东不会不清楚。为了维护自己的权

势地位，毛泽东不能让刘少奇领导的调整工作继续下去，毛泽东必须反击。

毛、刘之间的新的一轮斗争很快到来了。

二、北戴河会议：毛泽东突然袭击

刘少奇是在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由北京到北戴河，准备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而没有出席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则已于七月二十日先期到达，好整以暇地等着刘少奇的到来。

于八月六日开始的北戴河会议，是五月北京中央工作会决定召开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重点是讨论和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等一批文件。也就是说，会议的主题是调整经济工作。然而当时中国的政治气候，正处在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分岔口上，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农业社会主义路线"，正在进行较量，刘少奇虽无伤虎意，毛泽东却有害人心。于是北戴河会议便成为毛泽东向刘少奇反攻发难的机会和场合。

就在会议开幕的当天（八月六日），毛泽东在发言中即离开了会议原定内容，提出了几个既出人意料，又令人震惊的问题：阶级、形势和矛盾。关于阶级，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关于形势，毛泽东说：

形势问题，也要算一算，国际问题，究竟是什么情况。国内形势，究竟这二年如何？有甚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

多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等等。有人说，农村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这个说法对不对？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关于矛盾，毛泽东说：

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的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对于这次讲话，毛泽东八月九日说：“我在大会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顺理成章。”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重新为会议确定了主题，为会议定下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基调。而刘少奇及中共中央预先定下的经济工作的会议主题，被扔在一边。薄一波说：“实际上，由于毛主席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等问题，从八月六日起，会上大部分时间是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三风’，只用了很少时间研究和讨论工作问题。”①

果然，在八月九日，毛泽东又发表了更加令人震惊的讲话。在这一天的发言中，毛泽东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在这个总题目下，他又讲了单干问题、形势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总结经验等问题，对刘少奇为首的第一线领导，发动猛烈的批判、攻击。

此后，在八月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二十日的五次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插话，继续发挥他的阶级斗争的观点。连同九月二十四日开始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达十次之多。

很显然地，毛泽东是向刘少奇发动突然袭击。事先，毛泽东并没有将他的讲话内容以及改变会议主题的事情向中共中央常委会报告，也没有向个别中央常委透露，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第一线领导，完全被蒙在鼓里。毛泽东需要的就是这种令对手毫无防范，被打个措手不及，毫无还手之力的效果。如果让刘少奇等人事先知道毛泽东讲话的内容以及改变会议主题的作法，便会在常委会上进行讨论和表决，不但隐藏在阶级斗争理论外衣下的险恶用心可能被揭穿，且一旦举手表决，处于少数地位的毛泽东的阴谋很难得逞。

毛泽东在这里施展的，当然不是阳谋，而是不折不扣的阴谋诡计。为此，毛泽东不惜公然违背半年之前自己在七千人大会上所提倡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个人推翻了中央常委集体通过的决定。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大义凛然地说：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各级党委"是集体的领手，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算的道理呢？""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②

毛泽东的话犹未落地，现在便少数不服从多数，个人推翻集体组织的决定，"个人说了算"，当"霸王"了。

三、威力强大的凶器："阶级斗争"

毛泽东今次选择"阶级斗争"作为反击的武器，是十分高明的一着，充分表明了他不愧是一名谙熟历史和韬略的政治斗争大师。在中共的政治生活里，阶级斗争向来被称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阶级斗争"，一个阶级斗另一个阶级，自然就是敌我矛盾性质。而凡是提出"阶级斗争"者，都是事先占据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个立场，而对方自然而然就成了"阶级敌人"，就可以实行"专政"。因此，"阶级斗争"向来是一件杀伤力极大的凶器，它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神圣的光芒，如同皇帝所赐的"尚方宝剑"，对拥有者来说，既是最好的护身符，又是克敌制胜、所向披靡的武器。因此提出"阶级斗争"者，永远是整人的，而不会被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同时，"阶级斗争"是一种观念性的抽象的东西，无形无实，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说它有，它就有；说它无，它就无！说它重，它就重；说它轻，它就轻。有与无、轻与重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而且，"阶级斗争"只是一个总题目，它的涵盖面包罗万象，可以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加上具体的不同的名目，用于对付不同的对象。因此，在中共党史上，"阶级斗争"一向被当做政治斗争、党内斗争的工具，谁掌握了它，谁就无往不利。而毛泽东便是将"阶级斗争"运用得挥洒自如的超级大师。

拿近的来说，例子便是彭德怀。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说：

庐山会议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③

于是，功勋卓著的彭德怀被打倒了。

远一点的例子，是三十年代初江西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为了打击和铲除与毛泽东政见不同的以李明林为首的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毛泽东利用“前委书记”（江西中央苏区当时最高领导者）的职权，举起“阶级斗争”这把凶器，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具体命名为“打AB团”。毛泽东搞阶级斗争，不搞则已，一搞就非扩大化不可。“打AB团”的扩大化之惨烈，是中共党史、军史上所罕见。陈毅当时任红二十二军军长兼政委。红二十二军官兵总共三千人。毛泽东派去“督战”的亲信李韶九（时任“前委秘书”亦即毛泽东的秘书）要陈毅在红二十二军中“打出五百名AB团”。陈毅对此持怀疑态度，没有完成任务，李韶九便认为陈毅是“AB团”，险遭杀害。陈毅虽逃过劫难，他的妻子萧菊英却饮恨自杀身亡。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狂风扫荡之下，以李明林为首的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全遭杀害，连以江西武装力量为基础组建的红二十军，也全部遭到消灭，红二十军不复存在。据有关方面估计，在肃反运动中，仅红一方面军三万余人中，被杀的达四千多人，加上地方的党政干部，被杀人数过万。红军的力量被消灭了近五分之一。后来的调查显示，毛泽东的“AB团”纯属子乌虚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共党内使用“阶级斗争”这个武器，显示出补风捉影、凭空捏造、杀伤极大的特性，造成血债累累，中共至今天无法结案定论。

建国后，毛泽东曾多次运用“阶级斗争”这个武器打击持不同政见者。时至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党内处于少数派地位，又大权旁落，“阶级斗争”更成为毛泽东赖以安身立命的武器。现在，中国的专家学者都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称为是“理论上的失误”。是“失误”这么简单吗？只要深入研究一下便会发觉，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所做所为，更像是一起准宫廷政变。

如果毛泽东真的认为当时中国的阶级斗争很严重，大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毛泽东为什么不搞阳谋，光

明正大地。按组织原则规定的正常的程序，先向中央常委会提出来，而要采取那种“突然袭击”的手法呢？毛泽东的作法明显地表现出他的心吓鬼胎，虚张声势，另有图谋，是一种不正常的阴谋诡计手段。

破绽之二是：毛泽东从一九六二年二月的“七千人大会”之后，一直少露面，少讲话，默默筹谋反击。经过半年的运筹，对“阶级斗争”这个题目，毛泽东应该是已经“熟筹”，成竹在胸。然而在北戴河会议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并没有像七千人大会做报告那样，将自己已经“熟筹”的意思全部地、翻箱倒柜地说出来，而是出个题目，放一点风。毛泽东这种闪闪烁烁，显然是在试探空气，窥测局势，观察刘少奇等中央常委的态度反应。如果遇到强烈的反对，毛泽东便将退缩，否则便放松缰绳，勇猛直闯了。事情果然是这样，毛泽东在八月六日出了“阶级、形势、矛盾”的题目，“露了一点意思”后，刘少奇那边没有作出必要的反应，似乎是毫无准备而手足无措，于是毛泽东便于第三日，即八月九日再发表讲话，这一次讲得更多更重，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提出了猛烈的批评。然而，刘少奇等人仍没有反应，于是毛泽东便放开了手脚，大干一场了：毛泽东在此后接三连四频频发表讲话，对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人的批评、指责，一次比一次严重。刘少奇原订的会议的主题被推翻，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主题所取代，毛泽东的阴谋得以实现。

事实上，“阶级斗争”是毛泽东出于个人的政治需要，为了反击调整工作带来的对“三面红旗”的挑战，而用来打击刘少奇的武器。在“阶级斗争”这个总题目下，毛泽东大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矛头所向，直指刘少奇领导的调整工作。

关于“黑暗风”，毛泽东批评说：“现在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使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又批评说：“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有劲了，怎么办？”八月九日，当有人说

到："现在有人怕讲光明，讲光明就感到有压力"时，毛泽东插话说："说压力，那你先压我嘛！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了，这不是压我？"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清楚地说明了所谓"阶级斗争"，就是刘少奇领导的调整，触动了"三面红旗"，使毛泽东的威望、权势、地位受到威胁，毛泽东感到"受压"，因而要进行反击。

关于"单干风"，毛泽东批评道："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行了，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

毛泽东又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一方面是贪污多占，放高利贷、买地、讨小老婆，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一方面是破产"。"有人说，人民公社要垮百分之六十，留百分之四十，还有的人说全部解散搞单干……以上谈的算什么矛盾，我也说不清楚。概括起来，首先是承认阶级，阶级是存在的，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矛盾。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全部闹革干就是退到比赫鲁晓夫还不如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了。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这个问题要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有小资产阶级专政？是走赫鲁晓夫道路，还是走南斯拉夫道路，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大家议一议"。

很显然，毛泽东认为"黑暗风"、"单干风"等（实际上是调整工作）就是阶级斗争与阶级矛盾的表现。

关于"翻案风"，毛泽东说："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五九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

推翻”。又说“近来有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的；搞对了的，不能平反，不能一律平反。”

毛泽东又说：“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至此，毛泽东已将他的思想全盘托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否定，就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还说：

“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着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的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以后，都经过几次复辟，经过了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反复，如南斯拉夫就是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结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④

刘少奇被打个措手不及。在毛泽东的雷霆万钧的攻击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达到了以下几方面的目的：

其一是通过宣扬：全国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假象，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制造一个危机感、紧迫感，以便转移人们对“三面红旗”的批评与调整国民经济的注意力；

其二是在“阶级斗争”的大帽子下，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扭转调整工作的趋势与方向，制止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对“三面红旗”的进一步检讨。毛泽东这一招十分高明。“三面红旗”明明出错，用通常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很难阻止人们的批评。唯有举起“阶级斗争”这个凶器，才能将人们吓住、镇住。批评“三面红旗”成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谁再批评，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的这一招果然灵验，刘少奇等人自然不想当中国的修正主义，于是纷纷俯首顺降。

其三是扭转了毛泽东自“大跃进”失败后所处的政治劣势。自从“三面红旗”失利以来，毛泽东一直处于被动的、受批判的地位。重提“阶级斗争”不但灭了刘少奇的威风，长了毛泽东的志气，而且还将中国政坛的主导权重新掌握在手里，毛泽东在经济调整中退居二线，但在政治领域却重返了一线。

四、刘少奇再次向毛泽东屈服

到了八月下旬，毛泽东的思想已经在北戴河会议上占了主导的地位。十分善于利用中共的组织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毛泽东趁热打铁，希望能通过中共组织决议的形式，将自己的意见确定下来，作为全党的方针路线。于是，毛泽东便提出召开八届十中全会，继续讨论“阶级斗争”问题。

至此，刘少奇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他只好服从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只有一点小小的反抗，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中心论”提出了一点无关宏旨的质疑。在八月二十日的核心小组会议上，刘少奇说：

"这次会议如何传达？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联系很广，传达时要联系到对干部的教育问题，讲好了，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这是个复杂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阶级斗争一联系，什么问题都联系上了，比如自留地多少，生产责任制，包工包产。现在实际上是研究的问题，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⑤

刘少奇阵营的大将之一的陈云，受到很大的压力，在会议初期便写信给毛泽东和邓小平，说因身体不好，要求请假退出会议，并表示："七月二十四日《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我已看过，我完全同意中央这一决定"。⑥

陈云不但没有参加稍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而且从此以后长期称病休养，不问政事，时间长达十五年，直到毛泽东去世，江青"四人帮"垮台，陈云才再次在中国政坛上露面。

陈云所表态同意的《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是一九六二年七月毛泽东拒绝陈云和田家英关于"包产到户"的主张之后，指定陈伯达按照他的意思起草了的文件。这个文件的主题思想，当然就不是"包产到户"，而是要"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陈云表态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言外之意是表示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包产到户"的意见。陈云"缴械投降"了。陈云的表态使他躲过了毛泽东的点名批判（田家英没有"表态"，因而在北戴河会议上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然而，陈云是不满的。于是称病退会，算是一点消极的、无声的抗议。会后，毛泽东说："陈云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因此在会上没有点名批判。"

陈云本是批判"三面红旗"较坚决的一个，但也是最早退出战斗的一个。作为主帅的刘少奇也好不了多少，在毛泽东发动第二轮进攻的两天之后，即八月十一日，刘少奇在中心小组上便作了自我批评，说："五月会议我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一是说一九六二年夏收减

产已成定局，一是说单干在全国估计已占百分之二十。”⑦至此，在没有经过任何抗争，刘少奇也缴械投降了。

刘少奇的阵营全线溃败，而毛泽东则乘胜全面出击。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刘少奇又一次不得不向毛泽东靠拢，并且毫无保留地同意和接受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和修正主义的理论。在全会的最后一天，即九月二十六日的会议上，刘少奇作了一次重要的讲话，他说：

赞成主席的讲话。我们党在革命胜利以后，在毛主席领导下，一直是比较顺利的发展，但到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因为受到天灾和我们工作中有错误，算是遇到一些比较大的困难。问题是采取什么态度。我们在困难面前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克服困难，坚持毛泽东主席、党中央革命的道路，继续胜利前进。这是大多数同志的态度。第二种，在困难面前被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后倒退、单干，这是邓子恢同志的态度……

毛泽东插话：名义上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说是经营方式，实际上就是单干。

刘少奇继续说：除邓以外，还有许多人向中央写信，主张单干，邓是代表。第三种，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企图推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马列主义领导，这就是彭德怀、习仲勋的态度。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动摇、不坚定、丧失信心、不懂马列主义；第三种是敌对态度。

毛泽东插话：第二种是不懂马列主义，是属于认识上的，过几年一看好些，就改了……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当时在颐年堂就批评过邓老。

刘少奇又说：单干是没有出路的，只有社会主义大农业才能使农民免于贫困和破产，农业才能过关。邓老主张单干，就是违背了最重要的两条，因此是香花还是毒草，是很清楚的，是一枝毒草。

毛泽东插话：可以建议，但不能采纳。……

刘少奇又说：宣传单干优越性，肯定是毒草。如果党领导单干，党就要变质了，就不是共产党。现在我们的困难到底有多大？就是如此而已，大家都经过了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开始好转，应该继续前进，要坚持革命的道路，但宣传还要注意一点，还要讲有困难的。今年五月会议对困难估计多了一些。如果采取第一种态度，把困难估计得多一点，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采取第二种态度，估计困难太多，就会动摇社会主义的信心，丧失前途，那就有很大的坏的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可以巩固，单干风大，实际单干不多，并不严重，只有安徽、甘肃多一些，已经单干了的，可以重新组织起来的。这股单干风要打下去。

毛泽东插话：有一家就一家，几家就几家，十家有三家、五家、七家愿意的就组织起来，不愿意来的就不来，也不要骂他们是走台湾的道路……将来要来还可以来，现在不要闻风而来……。

刘少奇接着说：第三种态度，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向党进攻的是反动的。他们希望我们犯错误，对我们的困难幸灾乐祸。彭、高、习是无原则的阴谋反党集团。……在七千人大会上，我说彭的信从表面看来有些是符合事实的，他就说不是反党纲领。是纲领，纲领不能一点事实也没有呀！有部分是符合事实的，才能迷惑人，这次信也是迷惑人，开始有些人认为问题没有那么大。

毛泽东插话：提出与蒋介石一样的纲领，不会拿出来。

刘少奇：我们这次会议揭发了彭、习反党阴谋，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反党集团实际上是几支反党别动队，人数不多，用不着全党去对付，我们工作不要受干扰，由少数人对付他们……庐山会议上过当。

毛泽东插话：高级干部十几万人，十七级以上讨论一下，不要卷人这个斗争。

刘少奇接着提起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中说的一大段话："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阶级斗争没有结束"，"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

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之后，刘少奇说：斯大林在一九三五年说已经解决，这是不正确的，同列宁讲的不符合。

毛泽东插话：与列宁说的相反。由于国际国内因素的存在，列宁经常讲被推翻的阶级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比无产阶级还强大。无产阶级无经验。

刘少奇又说：两条道路的问题未最后解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毛泽东插话：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又出了赫鲁晓夫。现在看起来，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时间，我经常这样想，要经过反复。

刘少奇说：斯大林在集体化以后讲谁战胜谁的问题国内解决了，国际未解决。在这里还是主席讲得对。

毛泽东插话：我是根据列宁的说法。列宁有预见，他是在一九二四年死的，革命胜利后他有七年实际经验。

刘少奇：斯大林不对，麻痹了自己。

毛泽东插话：后头又出了反革命，惊惶失措，杀了很多人，有些应该杀，有些不该杀，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

刘少奇：谁胜谁负要经过长期才能解决，苏联、南斯拉夫、东欧的经验都证明了，我们要接受教训。我国如果彭、高、习的阴谋实现了，也要复辟，实际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性质与蒋介石一样，形式上可能不同。

毛泽东插话：彭上台也会打着社会主义旗帜骗人的。

刘少奇：谁胜谁负问题还未最后解决……

毛泽东：至少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刘少奇：我们党要从这里取得教训，提高警惕，以后还会有这类事情，所以必须在党内加强教育……

毛泽东：在英国、法国，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斗争，胜利又失败，在法国搞了好几次，总是不稳定的。

刘少奇：要准备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我们要准备五代到十代，我们算第一代，共一百年到二

百年。⑧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与刘少奇一唱一合，显得格外的亲密无间。在这里，刘少奇完全否定了自己在半年前的立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以及大力支持包产到户。刘少奇除了极力为自己说过的话圆场、辩解外，还反戈一击，对彭德怀及包产到户进行严厉的批判。不少书刊、文章都说：会上刘少奇对"包产到户"的批判，比毛泽东还厉害。那既是毛泽东"怀柔"的两手策略，又是刘少奇向"左"急转的一种姿态。一个故意示人以柔，一个有心示人以刚，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两人都向世人显示了他们的另一面。

毛泽东利用高超的权术击败了刘少奇，毛泽东预期的目标都达到了。毛泽东大获全胜。而刘少奇则再次屈服于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路线"。

八届十中全会之前，在力量对比、时局形势、党内威望，也就是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刘少奇不但不比毛泽东差，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优势地位。然而北戴河与八届十中全会上斗争的结果，却是毛泽东大胜而刘少奇大败。究其原因，首先是刘少奇政治上的软弱。

刘少奇对中国的革命建设问题的认识，虽然比毛泽东更正确、更符合实际，但他的最大的弱点，是政治上的不坚定性。他缺乏一种为真理而斗争到底的勇气，缺乏那种为了捍卫自己正确的信念而坚定不移、不屈不挠地战斗的精神。一旦遇到毛泽东的压力，他往往轻易地退缩，放弃自己的信念，屈从于毛泽东的错误的思想、路线。虽然刘少奇时常是出于维护中共中央内部的团结。尊重和维护毛泽东的威望，服从党的组织原则，然而刘少奇在这方面往往做得太过分，失去了最基本的政治原则性，变成盲从，愚忠，变成失去自己的方向的追随者。这是一个政治家的大忌。在政坛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你吃掉我，便是我吃掉你。即使是在共产党内部，也是这样。"两军相遇勇者胜"。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久经考验的毛泽

东，深明此中的道理。因此，在党内出现分歧、矛盾时，毛泽东是又勇、又刁、又蛮、又狠，寸步不让。而刘少奇的不坚持原则，克己相让的谦谦君子作风，必然使他处于败势。

造成刘少奇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旗手”这个历史包袱的负累。“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一个“情意结”，也是毛、刘之间建立接班人关系的重要因素。自从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上，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方针”以来，刘少奇被中共全党确认为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旗手，”建国后，刘少奇担任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任，亲自主持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四卷。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这既是一种政治荣誉、政治资本，但也是一种政治包袱。你既然是“旗手”，你就必须处处做紧跟与“维护”的楷模，就必须做一个“忠诚的卫道士”。当“旗手”与“红旗”本身发生分歧与矛盾的时候，“旗手” 当然就必须克己、退让，“旗手”必须遵循“红旗” 的方向，步调一致，亦步亦趋；“旗手” 当然就不能有任何的有异于“红旗”的独立自主，乃至于不忠不敬、异心异志。否则，就是“不孝顺”，就是叛逆。正是这种历史的因素，束缚了刘少奇的思想和手脚，从而决定了刘少奇在政治上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决定了他在对待毛泽东错误路线上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刘少奇注定了永远只能当“旗手”，而不能成为“红旗”。

老谋深算的毛泽东，正是看准了刘少奇在政治上的这一弱点，充分地利用自己在政治上的这一优势，挟令刘少奇跟随他“为虎作张”。而刘少奇的态度又影响到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毛泽东得以在中国政坛上横行无阻。刘少奇虽然时常抱有不满，但又身不由己，无可奈何。

在这种复杂的现实与历史的关系之下，刘少奇要结束毛泽东错误路线在中国的统治，根本是不可能的，而刘少奇的失败，以及他自己和中国人民灾难性的命运，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中共和中国，都是一

个转折点。继推翻八大路线后，毛泽东再一次扭转了中国发展的方向，中国再一次失去向良性发展的机会，被推向坎坷多难、贫穷落后的农业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人民不但因此遭受了无穷的灾难，中华民族也失去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时间。

对刘少奇来说。毛泽东为他编织的那个令他死于非命的罗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六十年代初期，尽管刘少奇有几年风光的日子，但毛泽东的阴谋的罗网已经张开了，刘少奇在劫难逃。在刘少奇被毛泽东、江青一伙折磨至死的十年后（那时候毛泽东已寿终正寝，江青也成为人民的阶下囚，中国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所撰写的缅怀文章中，曾悲愤地诉说："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的确，刘少奇的命运是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连在一起的，当这位人民选出来的国家主席被毛泽东、江育折磨受难的时候，广大中国人民也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劫难。而那场"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便是从八届十中全会源起的。

毛泽东在老病交加的黄昏岁月中回首往事时，曾说过自己的一生功过是"三七开"。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给毛泽东"盖棺论定"的时候，也说过毛泽东是"功大于过"，虽然没有明确打分，但大概是"四六开"吧。如果没有"八届十中全会"，或者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之前谢世，那么历史对毛泽东的评价将还会再高些，也许有"二八开"，甚至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八届十中全会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毛泽东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显然他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也风光了一段日子，但他是向着一个无底的深渊，一步步走去，再也不能回头，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沉沦。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和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裁决，反正时间还多着呢。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便再也没有安宁平静的日子了。自从一九六二年十月以后，毛泽东对这个自己一手创建、六二年后被刘少奇控制的革命先锋队组织，是越来越憎恶，越来越看不顺眼了。经过"四清运动"、"反修防修"等一系列的风风雨雨之后，

到了一九六六年，中国共产党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劫难，用中共元老谭震林的话来说：“这一次，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不久，中共便遍体鳞伤，在全国范围内瘫痪了，中共的高、中、低级干部，绝大多数都没有逃脱被批挨斗的折磨。而毛泽东给中共施予的这个打击，便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筹谋的。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无论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还是面临日本鬼子的枪林弹雨，都是前扑后继、不屈不挠、勇往直前，从没有被敌人压倒而瘫痪过。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竟然出现了全国性的瘫痪，而且时间长达到三、四年!

---

①：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一〇七二页。

②：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③：毛泽东《机关枪与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④：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⑤：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组的发言，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

⑥：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⑦：同上一〇七五页。

⑧：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五一三——五一七页。

第七章　从貌合神离到分道扬镳

一、毛泽东的假想敌：刘少奇与修正主义

就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一样，当彭德怀尖锐地指出，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左”倾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以后，毛泽东就反过来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资产阶级动摇性”的表现，是“右倾机会主义”，并且把彭德怀打倒。在一九六二年，当刘少奇对“大跃进”的“左倾冒险主义”提出了深刻的批评，对“三面红旗”表示了明确的保留态度以后，毛泽东也反过来指责说这是“右倾”，并冠以现代化的称呼——“修正主义”。

在“七千人大会”上，为了表示对刘少奇的不满与愤怒，毛泽东在讲话中突然提出了修正主义的问题，与整个会议的反“左”基调相左，十分令人注目。毛泽东在讲了一大通民主的必要性之后，话锋突然一转，说：“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提出这些警告，是针对谁的，意图是什么呢？一九六七年二月（这时刘少奇已经被打倒），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我们党内斗争，多年来没有公开化。到一九六

二年一月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就看出问题来了，因此就提出了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法西斯式国家”。毛泽东矛头所指是刘少奇。

就是从这时起，毛泽东已经将刘少奇视为假想敌，并置于瞄准圈内。

“修正主义”是毛泽东新的政治武器，它的出笼，大有来头。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前后，毛泽东一边倒，以苏联为师，以斯大林为师。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便成为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师法的金科玉律。在马克思与思格斯的著作里，没有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创立的一套社会主义的模式，主要有四点：

一、经济上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集体所有制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上层建筑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二、是统一的中央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

三、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商品经济只限于消费领域，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不起调节作用；

四、是社会主义越深入，阶级斗争就越尖锐。

这就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内容与特征。

斯大林模式中的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吻合的。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向来是不盲从，不教条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然而，对斯大林的模式，毛泽东却奉若神明，照搬照抄。

一九五六年苏共反斯大林后，毛泽东也对斯大林模式作过检讨，发现其某些枝节的弊病是片面注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把农民挖得太苦，权力过分集中，经济成分过于单一等等。然而，毛泽东的这些科学的、理智的检讨，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地就被他那顽固而强大的农业社会主义世界观所吞没了。毛泽东与苏共及赫鲁晓夫产生严重的分歧。赫鲁晓夫不仅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在苏联实行经济、政治改革，搞“自由化”，这与毛泽东“平均划一”的农业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在反对赫鲁晓夫

的“修正主义”的同时，毛泽东挺身捍卫斯大林。而斯大林的模式不但没有被触动，反而被毛泽东发展了，如“消灭资产阶级法权”，“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等，毛泽东不但没有跳出斯大林的模式，而且越走越远了：按照农业社会主义的理想，他认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还不干净，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以及所实行的“高薪制度”，可以滋生出“新的资产阶级”。毛泽东要建设更加“纯洁”、“平均”、“完美”的社会主义。毛泽东不但比斯大林更“左”，而且更“空想”。

毛泽东坚持斯大林模式与坚持自己的农业社会主义是统一的。在国际上赫鲁晓夫以及南斯拉夫的铁托反对斯大林而被毛泽东打成“修正主义”；在国内，刘少奇对“三面红旗”（也就是农业社会鲁义）的批评，也就被毛泽东打成“修正主义”。这就是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提出“反修防修”，并将它作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主题的背景。

“反修防修”的中心问题，是防止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事件在中国重演。因此，毛泽东最关切的课题，是防止赫鲁晓夫那样人物在中国出现。毛泽东自比斯大林，而中国的赫鲁晓夫，不言而喻便是刘少奇。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的这种猜疑越来越深，越来越强烈。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只是提“修正主义”，到了六四、六五年，毛泽东便反复讲“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到六六年，毛泽东就直指“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在劫难逃了。

二、“四清”运动：毛刘联盟分裂

毛泽东不是善男信女，所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当然也不是“花拳绣腿”。毛泽东需要制造一种新的形势，用于冲击刘少奇领导的调整经济工作，转移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并造成将刘少奇拉下马的政治环境。这就是“四清运动”。

刘少奇被委任为领导全国运动的总指挥。他不明了毛泽东的内在

玄机，相信毛泽东的“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真诚地追随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表现得比毛泽东更激进、更左，将敌情估计得过分严重，各个试点县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实行大兵团作战，搞秘密扎根串连，打击面过宽，人人过关，打人、体罚及自杀、逃跑事件屡屡发生。运动出现了扩大化的现象，被毛泽东批评为“形左实右”。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讨论刘少奇提出的关于“四清”、“五反”运动中的几个问题，并讨论起草新的文件，即《十七条》。在这个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与矛盾终于爆发了。

毛、刘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毛泽东认为前一阶段运动的具体做法过“左”，认为“四清”工作队集中大堆人员是搞“人海战术”；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联，结果“冷冷清清”，反人家的右倾，实际“自己右倾”。毛泽东强调要依靠群众，清少数人，有则清，无则不清。不可打击面过宽，要把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解放。特别是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整社员群众。

很显然，在运动的具体做法方面，刘少奇是“左”的而毛泽东是“反左”的。

其二是，在运动的指导思想方面，毛泽东却是“左”的，而刘少奇则是不赞成和反对“左”的。在运动的性质及主要矛盾和斗争对象等问题上，毛、刘两人出现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他们头上，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问：怎么讲主要矛盾呀？

毛泽东说：还是讲当权派，他要多记工分嘛，五大领袖嘛，你五大领袖不是当权派？

刘少奇讲：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多种情况是有工人出身，在立场、经济、组织上四不清，他们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富当了权的，还有已经戴了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当了权的。

毛泽东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和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没有希望。

毛泽东还引用杜甫“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诗句，说明就是要搞大的，大的倒了，狐狸慢慢清。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根本问题在这里。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还说过：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个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①

毛泽东结合南斯拉夫和苏联的“修正主义”，先后提出了中共党内有“官僚主义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官僚资产阶级干部”，现在更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步步紧逼，不断升级。“反修防修”背后的杀机逐渐暴露出来了。

刘少奇不会看不到毛泽东的杀机。因此他不同意毛泽东的“走资派”的提法，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称作为一个派，人数就太多了。因而提出：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有人还说有两类矛盾交叉。情况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好，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泽东坚持与强调，首先要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派。

刘少奇说：还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毫不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张时任煤炭部部长——作者注）

本来已经是弩张剑拔的空气，突然凝固了。会场上一片寂静。②

针对会议上刘少奇等人对运动性质的几种提法，即“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或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毛泽东加以严历的批评：“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一九六二年，北京一个月，北戴河一个月，搞出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搞那个资本主义。”毛泽东又说：“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一直是讲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从杭州会议以来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还说：“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③

会议上毛、刘发生的争论，有一次是毛泽东正在发言中，刘少奇插话而引起的。毛泽东认为刘少奇这是不让他讲话，满面温色，争辩了几句后，便猛吸着烟，沉默不语。加上会议开始之前，邓小平以为是一般的会议，曾好意地说：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于是认为邓小平不让他参加会议。

第二天，毛泽东手持两本小册子来到会场，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本是《中国共产党章程》。毛泽东扬着手中的小册子说：“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规定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规定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不让我来开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讲话，违反宪法……”接着，毛泽东便尖锐地批评刘小。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人海战术”，其实是毛泽东同意的。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六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提出

了《关于集中力量进行城镇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建议》，说“各个县分别搞时，一是缺少办法，一个是县委同下边犯错误干部有牵连。因此，建议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在省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一个县可集中工作队员上万人，声势浩大。省地机关派工作队，上下左右同时清理……”。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批复刘少奇的信说：“少奇同志：‘对建议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意（议），照此办理，迅速实行。”④

然而，不到半年后，毛泽东便批评这个他当初“完全赞成”的“人海战术”，说“有的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县，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⑤这是毛泽东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另一例。

毛泽东与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还猛烈批判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参加了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的“四清运动”。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介绍了工作队进村后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进行对敌斗争的一整套做法，后人简称“桃园经验”。刘少奇与陈伯达主张将王的报告印发各地工作队。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对此事批示道：“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并“请小平同志办”。

据王光美说：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推荐给江青看，毛主席多次鼓励表扬我，还在中央会议上表扬了刘少奇，鼓励我到各地去讲”，“毛主席要少奇同志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后十条》（草案）”⑤然而刘少奇照办后，毛泽东却猛烈批评刘少奇是“极左”，“形（左）实右”。这是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又一例。

从毛、刘的分歧与争论中，我们可看到，毛泽东在运动的具体做法上是反“左”的，但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和斗争对象等指导思想上，又是极“左”的。而刘少奇则相反。会议最后否定了刘少奇搞的十七条，而通过了按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二十三条》。一方面《二十三条》纠正了许多“左”的偏差，在微观上反“左”。但另一方面又

认为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并必然要反映到党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而支持走资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有的甚至在中央。这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共的各级领导人，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实际上是在宏观上的极“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显然是不协调、不正常的矛盾现象？

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发动“四清”运动，是打着“反修防修”的外衣，行打倒刘少奇之实。千方百计把斗争的矛头引向刘少奇以及刘少奇控制下的党政权力系统，目的在于摧毁刘少奇及其权力系统，夺回失去的权势。什么运动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派”，走资派的支持者有的在中央等等，都是毛泽东精心策划的计谋。因此在这些方面，毛泽东显得格外地“左”，格外的高调，出招狠重，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如果确实是“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毛泽东应当像刘少奇一样，针对基层采取严厉措施。然而，在具体做法上，毛泽东不愿让基层组织受过大的震荡，从而影响与转移了斗争的主要目标。因此毛泽东反对刘少奇的“左”，在《二十三条》中做了许多纠“左”的政策规定。毛泽东对基层宽松的同时，却接三连四地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说明了毛泽东斗争的重点不在基层，而是在中央，什么“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通通是假象。这就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四清运动”乃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是虚，是掩人耳目的烟幕，打倒刘少奇才是实。

这就是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出矛盾性的原因所在。

搞清楚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毛泽东大搞阶级斗争及发动“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如北京的专家学者所说为了“反修防修”，因而仅是“在理论上犯了错误”，还是为了打倒刘少奇，至今仍是悬案。澄清上述事实，人们就可以冲破毛泽东制造的假象，了解到他的真正用心：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大动干戈，妄顾国家与人民的利益，驱使几亿人

民为他效命，发动了那么大规模的运动，造成了那么严重的后果，此情此罪，在古今中外是空前绝后的。对此人民与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另一个论据是，自从一九六五的年夏天以后，毛泽东就不再注意这个对“反修防修”且有重大意义的“四清”运动了，致使这个运动虎头蛇尾，不了了之。薄一波说：“从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开始，毛主席对这场运动已经不太感兴趣了，……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各地的四清运动已无法搞下去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示》，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运动实际上也就不了了之。”⑥

至此四清运动在全国只搞了三分之。

会下，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代表中共中央找刘少奇谈话，说：局面已经非常严重了，千万不能跟毛主席发生矛盾，你们两个主席发生矛盾，下边就乱了。你要多考虑，对毛主席可不能不尊重。

接着，开了一次中央生活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说：打断毛主席的讲话，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

毛泽东说：不是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不共戴天的地步。

维持了三十年之久的毛刘政治联盟，终于分崩离析。

这次工作会议，是中共现代政治史的转折点。从此，毛泽东与刘少奇为首的中共第一线领导人彻底决裂，并给他们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就是在这个时候铸定的，而“文化大革命”这个怪胎，就是在这个时候种下的。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回答斯诺提问的“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说道：“那就早。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

对。”

毛泽东的“当场刘少奇就反对”之说，是与事实不符的。曾长期任毛泽东的秘书及中共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于一九八〇年七月八日夜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问题时说：“毛主席一九七〇年对斯诺的谈话，是在世界上发表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五年一月，刘少奇反对‘走资派’的提法。其实，刘少奇没有直接反对，只是说，有人说，有两类矛盾的交叉。像这样的问题，不讲不清楚，但都讲又太繁了。”⑦刘少奇“镇压学生”的“罪状”，是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以后才发生的；“叛徒、内奸、工贼”的大帽子也是一九六七年夏天后才接上去的。那么在一九六五年一月时，毛泽东凭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仅凭刘少奇不同意“走资派”的提法？毛泽东的理据是何等的薄弱。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刘少奇对中共、国家与人民的不忠，有的只是工作上的不同意见，仅此毛泽东便要将党的第二把手、国家的主席“搞掉”，毛泽东的专横跋扈及以私利作为依归，在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的这些所作所为，自然不能当作是“马列主义”的，至于是什么主义，读者可自评论之。

---

①④⑤⑦：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六〇三页、五三九——五四一、六〇四、六〇五。

②：见贾思楠《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二〇六页。

③⑥：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一一三〇页。

第八章　刘少奇风貌

生活中的毛泽东，喜欢吃辣椒、吃红烧肉，爱好游泳和古典诗词……由于出的书多，人们对这些都耳熟能详。

然而生活中的刘少奇是什么样的呢？他的爱好、饮食起居是怎样的呢？至今人们所知甚少，似乎是个谜样的人物。

一、融化在党组织里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克对刘少奇有以下的描述："刘少奇是本书研究的主要人物中特征色彩最平淡的人物。一个地位显赫的灰色人物。那些领导人物像周恩来、邓小平及北京市长彭真，甚至和毛（泽东）一样，都有着强有力的个人色彩。但是刘少奇似乎缄默到了腼腆，谦虚到了不出头露面的地步，一个受到组织大于个人原则教育的人，以至他的个性消失了"。①

在中共的高层领导中，有几位"专家"：朱德是军事专家，陈云是经济专家，周恩来是外交专家（建国前是统战专家），而刘少奇则是公认的党务专家。由于刘少奇长期主管中共的党务工作，又撰写过多篇重要的关于党组织建设的著作，因此在一般中共党员及民众的印象中，刘少奇成了中共党组织的化身，他与党早就合而为一，融为一体，他属于党，党也属于他。党的事业，就是他的事业，而他的事业、也就是党的事业，党的生活也就是他个人的生活，离开党的活动，几乎就看不见他个人的存在。一提到党，人们就会联想到刘少奇，正如一提

到红军，人们就会联想到朱德一样。

刘少奇自从加入中共以后，五十年来，无论是职位高低，也不论是身为一方诸侯还是出任国家主席、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都能自始至终自觉地将自己置于党组织之中，他既是党的领袖，又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尊重组织，尊重集体，尊重同志，坚持民主，是他的最大特色。

早在一九二六年，刘少奇在《工会代表会》的序言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工会的权力，应该十分集中，才能奋斗；同时又一定是民主的集中，才能容纳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致为少数人的包办，变成专利。所谓民主集中制，就是工会的权力集中在大多数人的会议上，不是集中在个人身上，即凡事须经过大多数人的会议决定。②

这是见诸文字的刘少奇对于民主集中制的第一次说明。刘少奇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要比毛泽东早得多，深刻得多。刘少奇一贯强调实行高度的党内民主，反对党的领袖个人独断专行，将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认为这种现象是社会上特权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这种人是站在党员群众之上，而不是结合于党员群众之中；他们是站在党的组织之上来命令党、支配党，而不是站在党的组织之内来服从党，受党的支配，接受党员及代表机关的监督。刘少奇认为，领袖的地位必须在党组织之中，不应也不能在“党之外”。或在“党之上”，他能“领导别人，亦能接受别人的领导。如果某一领袖拒绝接受党组织的决议，拒绝党员及其代表机关的监督，那他就不应也不能是党的领袖了。

刘少奇是这样提倡的，也是这样模范地执行的。

一九三二年，刘少奇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打击。被撤去了中央职工部部长的职务，降职为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刘少奇一方面保留自己的正确意见，多次向中共中央申辩，另一方面又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出任上海工联会党团书记时，不畏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积极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深入到沪东区纱厂从事党的基层建设工作。

一九六一年，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中，发生

了这样的两件事；

其一是，刘少奇在天华大队的调查中，发现公共食堂存在许多问题，全大队一千多口人，挤在十五个公共食党吃饭，大锅饭加平均主义，严重的灾难加干部的多吃多占，农民连吃饭都没有自主权，吃不饱吃不好，群众意见很大，纷纷提出解散公共食堂。刘少奇说："食堂没有优越性，这样的食堂要解散"。刘少奇征求天华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的意见，这位"左"倾思想十分严重的总书记却说大多数人不赞成解散公共食堂，并与刘少奇发生剧烈的争执与对抗，四下散布说"刘胡子不是来抓生产的，是来找岔子的"。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没有利用职权向彭梅秀命令，下指示，强制执行自己的意见，而是向彭梅秀说："我作为国家主席，是你的领导，作为共产党员，我们是同志，天华大队的工作有成绩，但问题也不少"。并建议由总支召集有群众代表参加的扩大委员会讨论公共食堂问题。③会议的结果与彭梅秀说的相反，大多数人都赞成解散公共食堂。根据大家的意见，总支作出了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定，群众皆大欢喜，奔走相告。对农村中一个大队的党组织，刘少奇尚且如此尊重、其"不将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民主作风可见一斑。

其二是，刘少奇在听取中央调查组关于手工业问题的汇报时，与工作人员杨波发生了长时间的争论。宁乡县城关镇原有二十四个手工业合作社，在"人民公社"运动中，二十个转为社办工业，四个变为国营企业。所有制如此改变后，为市场和人民需要的产品减少了，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都下降，成本上升，工人收入减少，不仅群众意见很大，这些企业也面临危机，急需尽快解决。怎样解决？刘少奇认为必须从所有制入手，由现在的全民所有制退回到原来的集体所有制，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实行按劳取酬，民主管理，自负盈亏，才能调动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而受到"左"倾思想影响的杨波，认为把社办工业退回去，恢复手工业合作社，那就体现不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和优越性，认为只要健全领导，改善经营即可渡过难关，并从多[illegible]行辩解。刘少奇与杨波之间发生了争论，

刘少奇耐心地倾听杨波的意见，也心平气和地向杨波解释自己的意见。这场争论持续了两个多钟头，使刘少奇原先定于二十三点离开当地返长沙的时间推迟了。时针已指向零时，杨波仍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刘少奇说："杨波同志，看来你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那好，我再给你五个月的时间，去搞两个点，一个按我的办法搞，一个按照你的办法搞，然后再来总结，看哪个办法好，群众满意"。会议结束时，已是凌晨一时，刘少奇即乘坐吉普车返长沙。④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少奇的意见是正确的，而杨波的意见是错的。对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的不同意见尚且能够如此对待，刘少奇不专行独断的民主作风可见一斑。二十六年后，杨波撰文纪念刘少奇，越发为刘少奇的伟大风格所感动。

与刘少奇相反，毛泽东自来是将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

在井冈山时代和江西苏区早期，对上级机关，甚至是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泽东是合己意者就执行，否则就拒不执行；所到之处，对当地党组织或发号施令，越权干涉，或越俎代疱，包办代替，而且作风专横。中共湖南省委曾为此向中共中央多次告状。而在红四军内部，毛泽东更是擅权而专制，与朱德、陈毅等人发生激烈的矛盾斗争。当毛泽东的意见得不到支持，处于少数时，毛泽东不是服从多数，遵守党组织的决议，而是愤然辞职，离开革命队伍去"养病"。

受到王明路线的打击后，毛泽东的家长作风有所收敛。然而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毛泽东的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恶劣作风又有所抬头，尤其是建国以后，更加"蔚然成风"，每当毛泽东的意见不被中共中央接受，毛泽东便往往个人推翻中共中央的决议、决定，将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取而代之。推翻中共"八大"路线，发动"大跃进"，就是十分突出的例子。

如果说毛泽东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地解决革命的战略问题的哲学家，那么刘少奇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化为共产党员的具体要求，成功地构筑中共组织的设计师和建筑师。毛泽东不是将自己当作一名普通党员，而是以"导师"、"家长"自居。而刘少奇虽然成为中共的第二号领袖，但他始终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资态出现，始终将自己置于

党组织之中。

毛、刘本性差异之大，此是一端。

二、最重要的特征：勤奋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克说："刘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勤奋，不懈的努力把这个外表上毫不引人注目的人物送到了高层地位。但是他是应该获得这种地位的，因为他很有天赋"。

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回忆录中也说："他话不多，性格内向。他给人的印象是慈祥长者，从不对人发脾气，也不会跟你开什么玩笑。他的特点就是勤奋、任劳任怨，整天一声不响地默默工作。他的嗜好是抽烟和散步。散步时，如果天气冷就围围脖或是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散步也是很少跟人聊天，他就是沈思寡言。"⑤

五十年代，毛泽东是中国的最高统帅，而刘少奇与周恩来便是他的左膀有臂。周恩来专管政府与经济事务，而刘少奇则是专管党务及政治事务。毛泽东掌握大方向和重大决策，具体事务则由刘少奇、周恩来执行。因此，在中国，工作最多、最劳碌的便是刘少奇、周恩来两人。

为了配合毛泽东的作息习惯，刘少奇也改为通宵工作，每天凌晨三、四点，甚至七、八点钟才睡觉，下午一、二点钟起床。他起床后，秘书首先要向他报告今天有什么国务活动，并把他睡觉时收到的紧急文件、电报交给他，如有急需处理的要特意向他说明，提醒他先看。

处理完紧急电文后，刘少奇一般先浏览一下当天的几种报纸，如果有重要文章，就选出来放到办公桌上，准备另找时间看。之后吃简单的早餐，接着开始办公，或看文件，或写东西，或找人谈话，或出席各种会议，一直忙到下午七八点钟左右，再吃第二顿饭——午饭。饭后休息一小时，八点钟开始工作，一直到第二天凌两点钟左右吃第三顿饭——晚饭。

刘少奇吃完晚饭后习惯散步，大约半个小时。既使是散步，刘少

奇的头脑也没有闲着。毛泽东也有散步的习惯。这时他完全是放松休息，常常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天说地。而刘少奇虽然是在散步，但思想却仍然在紧张地工作，因此他不愿聊天，只是一个人默默地走着。因此卫士们说他是“沉思寡言”，而不是“沉默寡言”。

散步后，刘少奇便把当天（实际上是昨天）的两本大参考、外国报刊资料和从报刊杂志上选出的重要文章放到床上，洗脸、刷牙后就盘腿坐在床上，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到凌晨五、六点钟后，他服安眠药入睡。此时，已经朝霞初露，或者是旭日东升了。

在睡前的那两、三个钟头里，周恩来那边不时有事。周恩来知道刘少奇是通宵办公的，因此每天凌晨三点钟左右要批出一些传阅文件，特别是一些比较急的文件，机要室不敢延误时间，秘书们便争分夺秒地送给刘少奇看，如果秘书们一时疏忽而没有送出，精细的周恩来事后必追查、批评。有时周恩来还亲自来到刘少奇卧室里交谈。有一次跟着周恩来一起来的还有三、四个领导人，狭小的卧室里挤不开，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就干脆站着谈。

刘少奇一般每日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忙时，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甚至，“连轴转”，几日不眠不休。

中国的政坛，主轴心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都要受其支配。毛泽东召集会议没有固定的时间，有时上午，有时下午，有时晚上，有时凌晨，而且要求很急，毛泽东的秘书在通知的电话里常说“现在就来”，有时刘少奇的汽车还没有到，“毛办”那边就又来电话催促。而刘少奇也一再叮嘱秘书：“只要是毛主席那里通知开会。不论我在干什么，你们都要立即通知我，我们都要绝对服从毛主席那里的召唤”。⑥

如此一来。刘少奇就辛苦了。有时刘少奇正在酣睡，被秘书叫醒后。因安眠药正在起作用，他总是显得很疲倦，很难受，连卫士为他泡好的浓茶也来不及喝一口，昏昏沉沉地便立即坐车赶到毛泽东那里。

由于刘少奇的住处离车库较远，等车浪费时间，刘少奇便吩咐：“如果我休息了，你们可以先要车，后通知我起来”。这样就可以早一

点赶到毛泽东那里。

相反地，如果刘少奇有事要向毛泽东报告，总是先向“毛办”询问毛泽东是否在休息，如果已休息，刘少奇就决不去打扰毛泽东。

刘少奇的办公桌，是一九四九年进入北京城后就使用的，一直伴随着他到“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张普普通通的办公桌，特点是宽大。桌面除了一盏台灯，一副台历和笔墨纸砚外，全部是文件。这些文件一叠又一叠，摞得高高的，放得满满的，刘少奇批阅过的，很快地撤下去，而新送来的，又源源不断地摆放上来，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刘少奇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骤看上去，满桌是文件，似乎杂乱无章。但刘少奇的摆放却是井然有序。第一排的文件中，毛泽东和其他中央常委批的传阅文件，都放在正前方。而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文件，则放在第一排的左前方，第一排的右前方则是摆放秘书新送来的重要文件，紧急的就放在刘少奇随手可及的第一排，依次还有第二排、第三排。刘少奇每天批阅多少份、多少字的电文，秘书们说不清，王光美也说不清。

刘少奇办公时有跷腿的习惯，办公桌桌下的空间不够高，时常碰着腿，秘书们便提议重做一张。但刘少奇不同意，提出在抽屉下的隔板上挖一个大洞，跷起来的腿便碰不着顶上的抽屉了。秘书们认为那样不好看，但刘少奇说：“我要的是实用、方便，不像你们年轻人那样讲究美观。要美观就要重做，那太浪费了”。中间抽屉有一个大洞，那是刘少奇的办公桌与众不同的另一个特点。

刘少奇办公时聚精会神，有时秘书有事进来，在他身边站了一、二十分钟他都没有发觉。刘少奇要求办公时秘书们尽量不要打扰他，中断他的思路。因此，秘书们送来文件或取走文件，除非有必要，都尽量不出声，放下或拿起就走，不必问他还有什么事。一些放在抽屉中的文电，就尽量在刘少奇不在办公时更换。刘少奇本来就少言寡语，加上聚精会神地工作，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秘书们说，跟他在一起工作，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久而久之，连自己也变得沉默寡言了。

刘少奇对政务要求严格，精细严谨。对各方面反映、汇报的情况，他必问清楚来龙去脉，反复地从各个方面提出问题，尽量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要求秘书们向他反映情况、提供材料时，不允许掺杂自己的分析与评论，如有意见可以另外明确提出。一九五四年秋，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办（情况简报人，要求用朴素的语言如实地反映情况，不许夹杂个人的任何主观评论。他说：你们的任务是向中央反映客观情况，为中央分析判断问题提供依据，如果你们掺杂自己的意见，那就搞乱了客观事实，中央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分析了。

新来的秘书上任时，刘少奇提出的要求是："在我这里工作，要如实向我反映情况，就是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凡是需要我过问的事，你不能自做主张，更不能借我的名义去办不该办的事情。对外联系态度要和蔼，要谦虚谨慎，礼貌待人，不能张牙舞爪，盛气凌人。"

"另外，我这里没有什么节假日。这就需要任劳任怨，埋头苦干"。⑦

三、遵守纪律的模范

刘少奇自来是留长头发。向后梳成背头，整整齐齐，显得儒雅而有风度。然而，刘少奇在一九四〇年却理过短短的小平头。事情是这样的：

在华中根据地的江北地区，新四军四、五支队跟日伪军一连作战三个多月，部队伤病员不断增加。然而当时医务人员少，医药缺乏。为此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发出号召，要求各连队干部、战士理掉长头发。因为留了长头发，在头部负伤时包扎、消毒都不方便。但是这个命令却执行得不好，很多平时、战时都表现得十分出色的干部、战士，都舍不得留了多年的头发，便置政治部的命令于不顾。尤其是干部不带头，命令便很难执行。刘少奇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召开了连

队政工干部会议，要求人人都剪掉头发。他说："我们很多同志参加革命时，决心为人民服务，敢于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献给人民革命事业，难道连推掉自己的长发这样的小事，都没有勇气和决心？我也不例外，响应政治部的号召，把我从白区工作到现在留了二十多年的背头推掉。希望全军同志都这样做"。会后，刘少奇马上召来理发员，把长背头剪成短短的小平头。⑧

在中共党内，刘少奇是遵守组织纪律的模范。中国元老刘澜涛说："少奇同志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原则性、组织性和纪律性很强。他非常尊重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非常尊重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和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注意党的团结和统一。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对重大事情的决定，都尊重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他指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最高原则。他确实是身体力行，说到做到的"。⑨

刘少奇的组织纪律性，突出地表现在模范地执行党的决议，不打折扣，不因个人私利与喜恶而有所选择。刘少奇对毛泽东的顺从，也是组织纪律的一种表现，因为毛泽东是第一把手，具有最后的决定权。刘少奇将毛泽东当作党组织，而不是当作个人看待的。因此，在五十年代后。毛泽东多次推翻中共中央通过的刘少奇的正确意见，而代之以自己的意见。一旦组织做出决定后，刘少奇都会无条件地服从，并模范地执行。在"高饶事件"中，毛泽东无理地要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检查，刘少奇尽管内心不高兴，但还是无条件地执行了。

四、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

刘少奇还是勇于承认错误的模范。

一九四八年，刘少奇在河北省领导土地改革，某些地区出现了过"左"现象，搞"村村放火，家家冒烟"，对地主乱斗乱杀，并且搞绝对平均主义，侵犯中农利益，连工商业也被"共产"。刘少奇发觉这些情况后，便明确地向华北局负责人指出：第一要紧急煞车，第二不要

责备下面干部，由他承担责任。他一再说，工作中出了毛病，大家很紧张，不能光是指责。⑩经刘少奇这么一说，干部们感到压力轻了。刘少奇还帮助干部们总结经验教训，用以指导其他地区。这年夏天，毛泽东指示在晋察冀边区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刘少奇自动对此作了检讨。

建国后，在许多大政方针上，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发生分歧，偏离了毛泽东的路线。并在许多时候刘少奇都是正确的，但在毛泽东批评了之后，刘少奇都会承认错误，并多次作了检讨。举其大者，就有一九五四年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对农业合作化等问题的检讨，一九五九年八届八中全会上关于“反冒进”的检讨，一九六一至六二年关于“大跃进”的检讨，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对形势估计过分严重的检讨，一九六五年关于对毛泽东不尊重的检讨及一九六六年关于派工作组的检讨，同年十月关于历史上执行错误路线的总检讨。刘少奇的检讨都是真诚的，并没有文过饰非或推卸责任，倭过与人，过后也“痛改前非”，使自己进一步紧跟毛泽东。由于刘少奇的观点往往是正确的，他放弃自己的观点而服从毛泽东，从而也就是放弃了正确，服从了错误。尽管如此，但刘少奇仍不失光明磊落的本质。

与刘少奇相比，毛泽东在这方面就黯然失色，显得虚伪与龌龊。

罗瑞卿大将（曾任公安部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女儿点点在《非凡的年代》一书中曾有如下的记述：

“以后（指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将父亲叫去，以一种私下的场合里问父亲：‘林彪的这一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父亲说：‘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主席说：‘讲不出来，要学嘛！’……主席对父亲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并要父亲回北京后去找陈伯达，同他商量开出几十本马列著作的书目来。由主席圈定后请父亲好好读一下。

“父亲回到北京后就去找陈伯达，开出了马恩列斯著作三十本，其中还有一本是普列汉语夫的，是毛主席定的。三十本书的目录送交主席后，毛主席又做了指示说：军队中年以上的干部，凡有阅读能力的，

都可以选读几本。还要父亲去找陆定一同志，要他出线装的，供高级干部阅读。并说：'印出线装的，我也很想看。'

"后来，在一九六五年底的上海会议上，林彪把这三十本书的事说成是父亲故意以学马列主义冲击他的学习毛主席著作。那时候，回击的只有父亲一人，而毛主席庄严地沉默着。"⑪

毛泽东的度量与政治品质，由此可见一斑。六十年代初对"大跃进"惨败的检讨，毛泽东不仅缺乏度量，表现出令人作呕的虚伪与透过与人，而且他对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死了这么多人的千古劫难毫无悔意，仍然认为自己没有错，那已经是毫无党性、毫无人性。对此，人民与历史都不会原谅他。

刘少奇严于律己，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凡事自己带头，以身作则。而毛泽东则是说一套，做一套，对人一套，对己一套，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两人的这种天差地别，在中共党内形成鲜明的对照。

五、"高举"是有原则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指控的最重要的罪状，是"大反毛主席，大反毛泽东思想"。自从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以来，刘少奇是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都公认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旗手"，建国后又担任了《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如此一位毛泽东思想的"守护神"，怎么会变成"大反毛泽东思想"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刘少奇与林彪同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且，在中共党内，刘少奇是最早"高举"的一个。然而毛泽东对林彪的"高举"特别受用，而对刘少奇的"高举"（五十年代后）却特别反感，最后在"旗手"（即"接班人"）问题上导致"弃刘而用林"。毛泽东对刘、林两人的态度何以出现如此的天壤之别呢？

中共元老刘澜涛在一篇纪念刘少奇的文章中说："少奇同志对于毛泽东同志，是把他作为党的杰出领袖拥护，而不是作为神来信奉的。

他从来不相信世间有超人的圣人。他肯定革命领袖的重要作用，又认为任何领袖和英雄，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只能做一部分工作，尽一部分责任。他反对夸张领袖的作用和把领袖神化的做法。他忠于毛泽东思想，同时又科学地解释毛泽东思想。”

据刘澜涛回忆，早在一九四七年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时边区群众写了‘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饮水不忘掘井人’等标语。我们晋察冀边区下级党组织某些文件中，也出现这样的词句。少奇同志说：人民贴出这样的标语，是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我们党内的文件有这样的词句，也是表现了干部朴素的阶级感情，这是很可贵的。但是应当认识，救星不是哪一个人，而是我们整个党。那种提法是不科学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刘澜涛还说：“少奇同志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提高了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从和少奇同志多年接触中感到，他对毛泽东同志的态度是有高度的党性原则的，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三十多年前他能这样解释问题，是他高度原则性的表现，也是他真正拥护毛泽东同志的表现。”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件事被说成刘少奇“早在一九四七年就反对毛主席的罪证。”⑫

刘少奇作为一位有高度政治修养和良好的理论基础的政治家、革命家，他对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除个别地方以外，基本上是基于科学，格守原则的。最突出的标志是，在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刘少奇发表不少的文章、讲话，为这些评价设置“上限”。

正如刘澜涛所说，刘少奇是把毛泽东视为党的杰出领袖，对党和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领导人来拥护，而不是将毛泽东当做神来信奉。既然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因此他不会也不可能一贯正确，永远正确。因此刘少奇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都犯了许多错误”。⑬刘少奇的这一句话，说明了他对毛泽东有所崇拜，但并不迷信。

由于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祇，因此在毛泽东犯有错误时，也可以反对。刘少奇说：“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⑭

并非是十恶不赦的弥天大罪。刘少奇向来认为，领袖既是领导者，也是普通的共产党员，普通的党员可以批评、反对，为什么毛泽东就不可以批评反对？因此，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发动时，刘少奇说：“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写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标语，大家要斗他，工作组要保护他。现在看来，说这个学生是反革命的结论，材料是不充分”。⑮当时，正是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最炽热的岁月，对毛泽东只要稍有不敬，就会被打成反革命，更何况是反对。刘少奇为一名反对毛泽东的学生辩护，与当时疯狂的极“左”的政治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

一九四五年的中共“七大”，是刘少奇“高举”的顶峰，从那以后，刘少奇很少发表那么热烈的赞美之词，相反地，却说了一些“冲淡”、“降温”的话。

在“七大”上，刘少奇说：“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又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它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刘少奇的这些论述，在当时出于树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统一地位，有意突出与强调，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刘少奇的说法，未免存有偏见与片面。难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能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了吗？刘少奇强调得过分，将话说得太绝了。

到了四十年代末期，刘少奇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关系摆法上，刘少奇作了必要的修正。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刘少奇向马列学院学员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是有世界历史以来无比丰富的，世界上任何大的原则性问题均解决了，如民族问题、工人运动问题、秘密工作问题等等……毛主席说，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马克思的理论都可以学……有的人认为，何必学这些东西？中国的书还读不完，毛主席的书还读不完呢，或至少先读中国的书再读外国的书吧！这个说法是不对的”。⑯在这里，刘少奇不但强调要学习马列主义，而且将马列主义放

在与毛泽东思想同等地位，这种情况与“七大”时已有很大的不同了。

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刘少奇在庆祝中共诞生四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说：“全体党员和干部都应该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学习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列主义原理，所阐明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学习党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学习苏联和兄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⑰

在这里，刘少奇已是将马列主义放在毛泽东思想的前面。

一九六二年八月，在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刘少奇对共产党员仅提出“做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⑱毛泽东思想不但已失去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也不能与马列并驾齐驱了。

在“七大”上，刘少奇曾说：“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要叩就失败，就后退”。⑲然而，到了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时，在评价毛泽东在中共的革命作用时，刘少奇如此说：我们党在历史上犯过四次路线错误，自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下，却没有犯过路线错误。这个历史的变化究竟应当怎样解释呢？很明显，这不能仅仅用党的历史长短，经验多少去解释”，“也不能仅仅用某个时期党的领导者个人情况如何去解释”。“从我们党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的经验多少和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的关系，但是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时期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斗争中的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㉑很明显，到“八大”时，在刘少奇的思想中，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已由“最重要”降为“次重要”，“最重要”的已不是毛泽东个人，而是党的集体与组织。

刘少奇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对马列学院学员的讲话中还说：“许多问题列宁早已解决了，因为（我们）未看《两个策略》（列宁的著作——作者注），使中国革命胜利一下子迟了二十年。如果二十年前全党都研

究《两个策略》，就可以使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不致失败”。㉒列宁的作用似乎也在毛泽东之上。

林彪吹捧毛泽东思想，最出名的是“顶峰论”和“最高最活”，即“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和“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对此，毛泽东十分受落。然而，作为一个理论家，刘少奇是不同意这些说法的。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正当“文化大革命”正在发动的时候，刘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说：“（马列主义）当然还要继续发展，不是到毛泽东思想阶段就为止了，如果这样看，是错误的，是机械唯物论”。㉓刘少奇的说法与林彪的说法显然是针锋相对。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六十年代初，就林彪的“顶峰”问题，中共中央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分歧。以毛泽东为首，还有康生、陈伯达等人，是欣赏和赞同林彪的说法的；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还有陆定一（中宣部部长）、罗瑞卿、罗荣桓（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彭真（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耀邦（共青团中央书记）等人，是反对林彪的说法的，并多方设法抵制林彪鼓吹的那一套，罗瑞卿多次将“最高最活”从一些文件、文章中删掉，便是一例。因此“顶峰论”和“最高最活”在“文化大革命”前并不多见。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在全会的公报上全录了林彪的吹捧经，这才开始在全国泛滥开来。

一九六四年九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向刘少奇报告：省委要求各地委、市委、县委，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必须认真地学习毛主席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对此，刘少奇批示道：“这些话不完全正确”。“这里联系到这样一个原则问题，就是我们应当向谁学习，是向党内和党外群众中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不管他们的职位高低，还是向职位高的人学习，不管他有没有真理。我们的原则，只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不只是向职位高的人学习”。刘少奇又说：“我赞成当前干部和群众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特别赞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口号”。然而刘少奇强调：“同

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着作和讲话当成教条”，“现在党内把毛泽东思想当成教条大有人在，已经不是你一个犯这样的错误，党内已有一部分干部犯同类性质的错误。”[21]林彪的那一大套吹捧经中，刘少奇赞成的，只有“活学活用”这一句。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还有这样的耐人寻味的一段：“在过去的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就比上述情形更坏。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维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他也可以不待别人推举，还自封为‘领袖’，自己爬到负责的位置上，家长式的在党内发号施令，企图教训我们党，责骂党内的一切，任意打击、处罚和摆布我们的党员。这种人不是真心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斗争，而是党内的投机分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蟊贼！”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书于一九三九年。上面这一段话，是影射王明、博古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到一九六二年再版时，王明已流亡苏联，而博古亦作古，然而刘少奇没有作改动，照样印出。这本来不足为怪。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们，都不约而同地将刘少奇描绘的这个形象套在毛泽东头上，一致认为刘少奇是在影射毛泽东。其实，这也难怪造反派和红卫兵们，刘少奇描绘的那个“蟊贼”形象，对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们具有典型性，是普遍适用的，而五、六十年代的毛泽东，与三十年代的王明之极之相似，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

刘少奇与林彪的“高举”，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有原则的，一个是无原则的。林彪的那些如痴如狂的吹捧，已经脱离最基本的实事，违反了最基本的科学原理，显得荒诞不经，充满了对封建腐朽的气味。而在中国实行农业社会主义，导致“大跃进”的惨败的毛泽东，失去了真理，丧尽了人心，正需要林彪这种无原则的吹捧。“大跃进”的惨败引致天怒人怨，刘少奇不敢昧着良心说毛泽东的领导没有错误，但

又不得不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因此只好说："一'左'一右，有一个时期'左'一下，有一个时期右一下，是必要的"。而林彪则说"毛主席思想总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是受到很大的干扰"，事情才出了毛病，因此毛泽东没有错，错的是包括刘少奇在内的执行者。毛泽东对林彪的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倍加赞赏，而对刘少奇的比较事实求是的"维护"怀恨在心，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事情的严重性不在于林彪的无原则的吹捧，而在于毛泽东衷心地欣赏这种无原则的、虚假的吹捧。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品质可见一斑。

六、拙于权术

刘少奇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不擅于使用权术，不擅于搞阴谋诡计，特别是在共产党内部同志间的政治斗争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特出。

下面这个记述可以看出刘少奇在这方面的特色。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五日，刘少奇、邓小平率领我国党"政代表团飞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祝典礼，并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到机场迎接。

赫鲁晓夫陪同刘少奇乘一辆吉斯车前往下榻的列宁山苏共中央的别墅。当时，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公开化，并影响到国家关停。两党领导人见面已是："有礼貌，没热情"了。

按照这种高级会晤的惯例，双方不会马上接触关键性的实质性的问题，首先要在较低一级的接触中去辩论解决，叫做留有余地，以便最后能有所回旋。但是，互相大致摸个底，了解个基本态度还是必要的。这个摸底是正式谈判所依据制定政策的基础。

刘少奇穿着毛皮领大衣，戴一顶呢子制服帽，必要的寒喧之后，便仰靠椅背。从容自在地凝望窗外的街景。

赫鲁晓夫也是身穿大衣，头上戴一顶灰白羊羔皮的土耳其帽，寒喧之后便有些躁动不安地一个劲转动腕子上的手表。按照惯例，往下该说什么？总不能一路无话。对，该各自通报一下国内情况了。他不像刘少奇本来就话不多。

“你看到的这些楼房都是新建的职工住宅楼。”赫鲁晓夫打破沉默，报喜也报忧：“总的来说，我们的形势很好。只有农业收成不大好，我们这里主要是天气的原因。”

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是粮食出口国，赫鲁晓夫执政后，有些急功近利，农业政策失调，开发西伯利亚又遭受巨大损失，使草场大面积沙化，不得不以黄金储备去购买粮食，使苏联从粮食出口国变为进口国。

中国当时农业困难更严重，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中最困难的一年。这与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有直接关系的。赫鲁晓夫讲完苏联农业生产遇到的困难，便意味深长地瞄了一眼刘少奇。

“我们也是严重歉收，困难不少。”刘少奇声音不高，实实在在说：“我们也有天气的原因，但主要是政策，我们正调整政策，解决这些政策。”

翻译和卫士都发现，赫鲁晓夫怔怔地望了望刘少奇，有点吃惊，有点意外。赫鲁晓夫把困难推到“天灾”上，刘少奇敢把困难安在自己头上。勇气和力量并不在颜色厉，口气大，赫鲁晓夫还是懂得这个道理的。

“开于这次各国共产党会议，虽然经过了起草委员会的协商讨论，仍然遗留了一些问题，”赫鲁晓夫转入互相交叉摸底：“我们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相信中国同志能够理解我们的立场。”

“小平同志讲过了我们的意见。”刘少奇平平静静地说：“我们是带着团结友好的愿望来的，这个立场是坚定的。对尚存的几个原则问题，我们的立场也是明确的，我们坚持。”

话不在多，双方三言两语已经初步探明了对方的立场和态度。剩下的戏就要在底下唱了。西方一些苏联问题专家称赫鲁晓夫是“大策略家”。大策略家赫鲁晓夫是这样唱这出“戏”的：

他对米高扬和科兹洛夫讲："你们想得到一百，开价二百，而且要坚持到最后一刻，这是策略。"

第二天，驻苏大使刘晓汇报情况："赫鲁晓夫不但坚持原有意见，而且把原来起草委员会会议本已达成协议的某些东西也给推翻了。"

刘少奇微笑着说："赫鲁晓夫如果想开好会议，就要有诚意。你也可以利用机会亮亮我们的底，哪些问题可以让步，哪些问题不能让步，开诚布公告诉他们。兄弟党之间要光明正大，我们不玩心眼。"

刘晓同米高扬、科兹洛夫几次接触，其诚而严肃地把底告诉了他们。并郑重宣布："我们决不会在这个立场上再退后一步。"

米高扬和科兹洛夫及时将这个情况向赫鲤晓夫做了汇报。赫鲁晓夫听后一个劲摇头。他信心十足地说："这是策略，他们会退步的，我在日内瓦有经验。"

日内瓦会议是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会议上要确定（越南的）停火线。按照赫鲁晓夫所写回忆录，十七度线是"我们的最高要求"，甚至"我们并未指望得到这样的东西。"可是，具体谈判时，赫鲁晓夫并不是以"最高要求"的十七度线来开价，而是再向南移，提出以十五度线为停火线，以便讨价还价。这样坚持到最后，当以十七度线为达成停火协定后，赫鲁晓夫坦白地说："我们又惊又喜地喘了一口气。"而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十七度线协定也是"非常满意"。的活动也紧张频繁。

当会议必不可免地陷入僵局时，刘少奇指示刘晓大使："八十一国党的会议开成功了，也就是中苏关系改善的一个转折，因为有了共同基础。你要相机行事，向他们透露，我愿意直接同赫鲁晓夫谈关系和问题。"

刘晓很快便相机向米高扬、科兹洛夫透露了这个意思。米高扬、科兹洛夫又很快报告了赫鲁晓夫。

到了定价的时候了！赫鲁晓夫满怀信心地来会见刘少奇。

"你们不要在这次会议上谴责中共，不要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样后果不好。"刘少奇诚恳劝说。赫鲁晓夫用异常的眼光去看刘少

奇："并不是没有人攻击苏联共产党啊。"

确实，会议有些左派共产党也尖锐地批评了苏共，赫鲁晓夫坚信这是"受中共指使"，是刘少奇的策略。

"现在会议上有些过左的思想，也有一些过右的思想。"刘少奇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讲其话，"我们对于左派的合理意见是支持的，对于某些过左思想我们有我们的见解，我们要对他们做工作。但他们是处于一个特殊的斗争环境中，所以对他们的意见中苏双方都应予以谅解。会议中所出现的较右的思想，也不利于团结，这也是因为他们的斗争条件和传统思想所形成的，对他们也应谅解，多做工作……"。

赫鲁晓夫没兴趣听道理，也听不进去。他是大策略家，也是"讲究实惠"的政治家，直接了当问："八十一国共产党会议的文件应该一致签署，这样才能表示团结。你们不让步不好办。"

刘少奇说："要互谅互让。"

赫鲁晓夫说："文件里可以不谴责'派别活动'，我们二百让一百，甚至可以写上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这一句。你们呢？你们也得让步。"

刘少奇说："我们没有说二百，我们说一百就是一百。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我们已经作了让步，只可以照抄《莫斯科宣言》，不能再让步。"

赫鲁晓夫坚信，要一百的人肯定提价二百，商人是这样，政治家也无例外。他坚持说："《莫斯科宣言》对苏共'二十大'的意义肯定不够，八十一国会议要写上世界各国共产党一致赞成苏共'二十大'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分析，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系列新理论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

"你们不能强迫各兄弟党都接受你们一家的观点。原则问题上我们一步不会让。"刘少奇尖锐地反问："那么我们党的'六大'通过了什么决议，是不是也可以提要求让国际共运承认是路线呢？"

赫鲁晓夫被咬住了。怔有片刻，恼羞成怒："当年我们不愿为首，你们非要我们为首不可。我们为首了，你们又朝我们痰盂里啐唾沫！"

“为首不是作老子党，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一律平等。”刘少奇的平静同赫鲁晓夫的躁动形成鲜明对照。

没谈成，赫鲁晓夫仍然坚信刘少奇是“想得到一百，开价就得二百”，坚持要等待中共让步。

在这种形势下，刘少奇请朝鲜、越南、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共产党代表到中国大使馆来，向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态度，“苏共不放弃他们的要求，我们无法在文件上签字……”。

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纷纷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斡旋。特别是胡志明，非常焦虑，从会议一开始就不停地从中斡旋。听到刘少奇的明确表态，他忙转达给赫鲁晓夫，并且有警告地提醒他：“赫鲁晓夫同志，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你不能让我们的运动出现分裂，你必须使中国共产党同我们一起在宣言上签字。”赫鲁晓夫没有马上答应胡志明，但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了。难道刘少奇硬是没搞任何“策略”？

在这关键时刻，刘少奇在列宁山别墅接待了苏共领导人米高扬、苏斯洛夫。他保持着一贯的诚实和光明正大的态度说：“刚下飞机我就讲明了，我们是带团结友好的愿望来的。我们说一不二，我劝你们不要把事情做绝了。你们要不听我们劝告，一定坚持做绝，破坏了这次会议，是要担历史责任的，要受到历史的谴责。”刘少奇严重地加重语气：“再说一遍，不要把事情做绝了！”

米高扬、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从刘少奇身上强烈感受到一种认真、诚实、坚定的人格力量，回去向赫鲁晓夫做了汇报，经过全面研究讨论，终于判定刘少奇确实是光明正大，真诚相待。什么能让步，什么不能让步，说到哪里就是哪里，那种策略只能对付敌人，不能对付同志。

苏联共产党终于采取了协商和妥协的态度，对苏共“二十大”以及和平过渡等问题，同意照抄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

文件签署，会议成功。

刘少奇就是这样以他的真诚战胜了赫鲁晓夫的“策略”。㉕

一九六〇年，中、苏关系还未破裂，中共与苏共还是“兄弟党”，因此刘少奇与赫鲁晓夫之间还互称同志。按照刘少奇的政治理念，同志之间应当真诚相待，有问题要摆到桌面上来，而不应耍手腕，摘权术。于是便发生了上面的“刘少奇用真诚战胜了赫鲁晓夫的‘策略’”这一幕。

对兄弟党的同志尚且如此，对中共党内“自己家里”的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刘少奇的那分“真诚”，就可想而知了。

中共自一九二一年成立的那天起，党内的政治斗争便连绵不断，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你死我活的。在这些斗争中，刘少奇表现得过分的真诚、率直，过分的光明正大。对一个政治家而言，这是一大忌，也是一大愚。

事缘毛泽东为中共规定的党内斗争的一些原则，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思想从严，处理从宽”，以及“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等等，从五十年代以后，毛泽东便都不遵守这些原则，而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取而代之了。为了排斥异己，铲除政敌，巩固自己的权势地位，为了强行贯彻自己的错误路线，毛泽东将党内的不同意见与思想上的分歧，都视为“阶级斗争的反应”，施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且，为了达到目的，毛泽东不择手段，时常使用阴谋诡计，例如：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隔岸观火，设置陷阱，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放长线钓大鱼，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已经没有“真诚”、“团结”可言。

对此，作为一名政治家，作为中共的第二把手，刘少奇不会没有察觉。然而，对毛泽东的本性的阴险，手段的狠辣，刘少奇似乎就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也就缺乏应有的防范。正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在毛泽东已将斗争的性质改变的情况下，刘少奇没有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斗争策略和指导思

想，仍然以“真诚”、“团结”相待。一方待之以诚，一方施之以奸，悲剧便由此而生。

刘少奇的“愚”，与毛泽东的“奸”，集中地表现在一九六二年后，直至“文化大革命”，毛、刘最后斗争的岁月里。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受到重创。以后毛泽东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将会如何动作呢？刘少奇不知道，但也没有加以注意和防范，更没有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措施。因此，在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当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进行反击，刘少奇被打个措手不及，只好投降顺从。重提阶级斗争，是毛泽东十分阴险的一招，然而刘少奇仍未警觉。尽管八届十中全会上有“阶级斗争用少数人对付”，“要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决定，但毛泽东还是在次年发动全国性的“四清”运动，当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将绳索勒紧，提出“运动主要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因此而与刘少奇发生激烈争辩，毛泽东从此下决心打倒刘少奇时，刘少奇仍然相信与坚守党内斗争的那一套原则，竟然没有警觉与反应；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炮制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又肃整“彭罗陆杨”，抛出“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又直言“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的身边”，毛泽东矛头所指，昭然若揭。然而刘少奇还是没有警觉和作出防范。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抛出《我的一张大字报》，数落刘少奇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四清”运动的“形左实右”，咬牙切齿地说“何其毒也！”时，刘少奇才恍然大悟。至此大势已去，刘少奇由接班人变为阶下囚。在这一场斗争中，毛泽东所施用的阴谋诡计固然是高超绝伦，而刘少奇的迟钝迂腐、后知后觉，亦令人“叹为观止”。

刘少奇被罢官后，还天真地相信毛泽东会“治病救人”，因而提出“回延安或湖南种田”。然而毛泽东的宗旨却是“必置之于死地，永世不得翻身”，最后安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永远开除出党”，被严密囚禁。至此，刘少奇才对毛泽东失去最后的信心与希望，悲愤地喊出：“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在喊出这句话时，其内心不仅对毛泽东，而且也对中共党、政、军组织以及党章、宪法

表示了彻底的绝望，但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养育他的人民身上。

“刘少奇现象”，是中共党史也是世界现代史上十分悲壮的一幕。从这里，人们不难获得丰富的教训与启迪。

七、廉洁与清贫

刘少奇的廉洁与清贫，是中共领袖中最突出的一个。

先说廉洁奉公。

刘少奇经常外出巡视、检查工作，五、六十年代，每年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不在北京。

刘少奇规定外出时间有四不准：不搞迎送，不请客吃饭搞铺张浪费，不准收受礼物，参观时不搞前呼后拥。每次出发前，刘少奇一定要向随行人员说明，到任何地方都必须遵守这四条。刘少奇将这四条当作组织纪律，以身作则，模范地执行，尤其是第二、三条，已经到了“苛刻”“不可理喻”的地步。

刘少奇的“不吃宴请”，自二十年代初领导安源大罢工时已开始。安源大罢工胜利后，工人们的生活改善了一些，又都爱戴和感激刘少奇为工人办了件大好事，按照当地的风俗，都想请刘少奇吃顿饭表示尽意。

一天，工人李宝堂夫妇打酒买菜，来到俱乐部办公室请“刘主任”赴宴。刘少奇笑着谢绝道：“别的事我可以办，这个忙我可是不能帮”。刘少奇词婉意坚，李宝堂只好拉着刘少奇的通讯员张明生去了。

张明生赴宴回来后，问刘少奇：“刘主任，人家真心实意买了酒菜，你为什么不去呢？”

刘少奇说：“你想想，请客就得花钱，工人生活本来很困难，现在刚好一些，怎能加重他们的负担！再说安源有一万多工友，要是成天你请我送，那我们还有什么时间去工作呢？”

张明生恍然大悟，后悔自己不该去吃这顿饭。㉖

建国后，刘少奇在这方面更是严于律己。

一九六〇年，刘少奇与王光美去四川都江堰视察。中午，当地干部请刘少奇与王光美去吃四川的家乡菜——“活水豆花”。到了餐桌，刘少奇看到桌子上摆满酒菜，便立刻意识到这是用公款请客，违反了国家的财经制度。

饭吃到一半，刘少奇叫王光美当众宣布：“今天这顿饭的费用，全部由少奇同志付，算是请大家。”饭后，王光美立即如数付了饭钱。㉗

请客吃饭似乎是中国官场上的一项根深蒂固的陋习，尽管中共三令五申，却屡禁不止。对此刘少奇更多是用回绝来抗拒。

一九六四年七月，刘少奇到山东济南视察。中午吃第一顿饭，招待处办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当刘少奇被当地领导干部请到餐桌就座时，神情马上严肃起来，说道：“你们搞这一桌子，够家民吃几天呀！快退些去吧！以后不管哪一级来人有便饭就行了。”

结果招待处只好撤下酒席，换上便饭，刘少奇方愉快地进餐。饭后，刘少奇用自带的茶叶泡了茶，点了支自带的“大前门”香烟，又淡淡地说了句：“那些饮料，谁吃谁付钱。”㉘

一九六〇年四月下旬，刘少奇到四川成都视察，住在金牛坝招待所。一住下，刘少奇便吩咐王光美到厨房打招呼说，现在国家正值困难时期，广大人民的生活都困难，我们的膳食要越简单越好，每顿以蔬菜为主，饭里可掺些杂粮。

服务人员看到刘少奇的伙食太简单，担心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便和厨师商量，给加了一个“江团鱼”。谁知吃饭时刘少奇还没坐下便说：“怎么多一个菜，请把鱼端下去。”服务员当然不肯拿走。于是刘少奇对“江鱼团”始终未动一筷。饭后，服务员收拾桌子时，对着那盘被冷落了“江团鱼”，不禁感慨万千。㉙

一九六〇年四月，刘少奇在河南洛阳视察，住在友谊宾馆。吃饭时，刘少奇只吃了点豆芽、菠菜，对桌子上的鱼、鸡一点没动。刘少奇对服务员说：“这几个菜没动，请转告食堂大师傅，这几个菜不是不好吃，是吃不了，请大师傅不要生气，以后少端点菜，多了浪费”。第二顿开饭时，桌子上的菜不但没有减少，还多了一条黄河大

鲤鱼。刘少奇站在桌边，久久不肯坐下，说："我已经讲过了，菜多了是浪费，这顿又端来这么多！"一位干部忙解释："这里住的有外国专家，生活条件好些"。刘少奇说："外国人是外国人嘛，我们是中国人，老百姓吃的?!"这时有另一位干部进来说："市里的领导同志想请少奇同志吃一顿饭……"，话还未说完，刘少奇便回答："我党没有这个作风，那样不好嘛！"㉚

刘少奇不但不吃宴请，连招待的果品、烟茶也一点不动。

一九五八年九月，刘少奇到河南古城开封视察，会议桌上特意摆放了几盘开封农民刚刚培育出来的新鲜苹果，当地领导希望刘少奇能够亲自品尝一下。然而自始至终刘少奇一个也没有动。这时一名细心的服务员拿起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送给他，他却笑着说："放下吧!"

刘少奇所到各地，下榻的宾馆、招待所里都备有香烟、茶叶、香皂、牙膏和毛巾。但刘少奇统统不用，而用自己带的。刘少奇在视察时经常开座谈会，开会时，他也不拿公家的香烟招待与会者，而是用自己带的"大前门"。当地的领导人多是一方诸候，抽的都是如"大中华"等高级香烟。当他们看到刘少奇竟然只抽普通的"前门"烟，都不禁大表惊讶。刘少奇还拒收各地领导人送的各种礼物。有一次，刘少奇参观成都市轻工业展览，回到招待所后，有关部门派人送来几筒展出的新产品白芙蓉香烟，刘少奇立即吩咐工作人员把烟送回去。不久，当地一名干部又送来了两瓶茅台酒，刘少奇坚持不要，服务员感到两面为难，便把酒交给了刘少奇的秘书。刘少奇离去后，服务员打扫卫生时，发现那两瓶茅台酒原封不动地放在橱柜里。㉛

刘少奇严于律己，公私分明。

对国内各地领导人赠送的礼品，刘少奇一律拒收外，出国访问时收到的礼品，也一概上交归公。一九六三年九月，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出访朝鲜，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送给刘少奇一批礼物，除了工艺品，还有一些苹果。回到宾馆后，秘书向刘少奇请示：怎样处理这些礼品？刘少奇只有很简单的一句话："把礼品交公就是"。

回到北京，就礼品的处理问题，秘书又请示了王光美，王光美说：

"工艺美术品交公，苹果分一点给工作人员尝尝，其余送中南海托儿所吧"。而王光美自己家里，一个苹果也没有留下。刘少奇多次出国，并多次接见到访的外宾，收到的礼品无可计数。在礼品的处理问题上，秘书们与刘少奇的意见不一致，秘书们认为，某些东西交上去也只能当日用品，所以不必上交。而刘少奇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凡是礼品，都要统统交公。刘少奇说："我交公是我的事，人家怎么处理是他们的事，你们要相信人家会处理好"。㉜

在那不计其数的礼品中，除了一台望远镜和一支猎枪是刘少奇的卫士组以"工作需要"为借口留下外，其余全部上交归公。而那支猎枪，刘少奇还在一九五七年赠送给了北京地质学院的毕业生。

刘少奇出国访问不仅不留礼品，对公家按规定发给的外汇，也一个子不花，全数交给中国驻当地使馆。一九六〇年；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苏联，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祝典礼。公家发给刘少奇五千卢布作为零用钱。在苏联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刘少奇一个龙比也没有花，临回国前将那五千卢布全部交给中国驻苏使馆。

一九六一年六月，陆定一、康生、王力、胡绳在北京十八所写文章，纪念中共建立四十周年。一天，刘少奇来十八所审查文章，中午就在招待所里用了便饭。饭后刘少奇午休。这一天骄阳似火，酷热难当，招待所仓库里有温州凉席，负责人便吩咐服务员取一张凉席给刘少奇铺上。刘少奇起床后，只说了一句话："这凉席很好"。

刘少奇一向缄言寡语。话越少就越有份量。卫士把这句话告诉了管理科长，科长马上说："刘主席说好，你就拿回一张给他铺上，反正我们也是扔仓库，七、八张，没什么用"。晚上，卫士把凉席拿回中南海。第二天一早又送回来，"刘主席把我训了一顿，"卫士说，"你们快收回去吧"。

"一张凉席训什么?"

"刘主席说公私不分"。

"你这个笨蛋，我们反正也没用，既然刘主席说好，你就不会讲个

理由？”

“快别说了，刘主席说，我讲凉席很好是大实话，我请你公私不分也是大实话。你回去跟他们也要讲实话。”

在刘少奇的大实话面前，管理科长没话说了，只好收回那一张不值几个钱的凉席。

刘少奇克己奉公，生活自然清贫。

一九六三年王光美下乡搞四清后，刘少奇将一向由王光美掌管的刘家钱柜交给秘书刘振德掌管。那是一个陈旧的木盒子，里面有钱，有各种购物票证（布票、油票、肥皂票等等），但更多的是针头线脑，各种衣服钮扣，杂乱无章，充其量只是个杂物盒。刘振德清理了一下，里面只有二十三元八角人民币！

王光美还交下了一张家庭开支的帐单：

每月拿到工资后，请按下列数额分配：

一、给卫士组一百元，为少奇同志买烟、茶和其它日用品；

二、给都苗同志（厨师）一百五十元，全家人的伙食费；

三、给赵淑君同志（保育员）工资四十元；

四、给外婆（光美母亲）一百二十元，作为五个孩子的学杂费、服装费和其它零用钱。

五、少奇同志和我的党费每月交二十五元（当时少奇与王光美交的党费比规定的多几倍）。

六、每月的房租、水、电等费用四十多元。㉟

按这个帐单统计，刘少奇家的每月开支有四百多元，而刘少奇王光美两人的工资总共也只有五百元，所剩部分，刘少奇还经常用来帮助有困难的亲朋好友。刘少奇之清贫如洗，可见一斑。

据长年在中南海服务处工作，管理和照料中共首脑们生活的李维信说：“少奇同志生活特别俭朴，说他是中南海里生活最俭朴的一位领袖也不为过”。

在中共首脑中，经济上最富裕的是毛泽东。除了工资外，毛泽东有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庞大稿费收入，在五十年代，稿费就滚存到一百多万元。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超级富豪。因此毛泽东手头阔绰，吃得也就较好，尽管毛泽东生活简朴，但饭桌上还是有水鱼等这样的高档食品。毛泽东还花很多钱买书，买字画，他晚年看的大字线装书；便是用自己的钱来印制的。在中共首脑中，毛泽东的藏书也是最丰富的，达三、四万册，相当于一个小型图书馆。除了工资外，毛泽东自己每年要花用稿费中的一万多元，这在当时也是个不小的数目，毛泽东还用稿费接济亲朋好友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六十年代初，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多吃多占，毛泽东便掏钱退赔，共两万多元。从毛泽东那里挖得最多的，是江青。江青的生活奢侈豪华，吃好穿得也好，自己的工资根本不够花，经常由毛泽东接济，两人分居后，江青还不时向毛泽东要钱，仅一九七四年，一次便要去三万。

据李维信回忆，有名卫士从毛泽东那里调来刘少奇身边，一个月没有沾上油水，肚子很馋。原因说来也简单，毛泽东是有东西不吃。江青和毛泽东不在一起吃饭，她很会吃，所以灶上总还是找到油水。刘少奇和妻子王光美一道吃饭，他们子女多，又不像毛泽东有稿费，完全靠工资生活，所以，那生活不说清贫也完全可以说清淡，刘少奇性情淡泊，不讲究吃穿，每餐两菜一汤，平平淡淡，无论桌上灶上都没有什么油水，这就难怪卫士馋出鬼来了。

有那么一天中午，餐桌上突然出现了一盘红烧鸡块，一个月来，这是卫士头一次感到有油水。而且他看到了希望：王光美怎么也不吃，只是照顾着给刘少奇夹，一顿饭下来，两个人你谦我让，那鸡块还是剩半盘。刘少奇回办公室去了，王光美再没动那盘鸡块，只是将另一盘素菜打扫干净，接着就把那半盘鸡块用纱罩罩上了。

王光美前脚走，卫士后脚进去，把那半盘鸡块三下五除二打扫干净，吃得很舒服，只恨少了一点。晚饭时，王光美端着一盅酒进来，她没看见鸡块，便问炊事员郝苗，郝苗说没见剩鸡块。卫士很惊讶：毛泽东那里从不吃剩饭剩菜，在全党全国，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

第二号人物，还能吃剩鸡块？他老实承认："我吃了"。

王光美听后叹了口气说："唉，我本是留给少奇同志晚上吃的……"。她没有再说下去，把那盅酒又端了回去。㊲

那个卫士绝没有想到，在刘少奇这里，不但剩鸡块要留下一餐，就是普通的剩饭、剩菜，都要保留到下一餐吃。刘少奇夫妇每一天的第三顿饭，即在半夜吃的晚餐，便是王光美用上一顿剩饭剩菜烩制的，王光美由此得了一个"烩饭厨师"的雅号。

由于刘少奇家庭生活困难，"刘办"的工作人员便提出应发给刘少奇和王光美夜餐费，因为"刘办"的工作人员每人都有，刘少奇也不应例外。由于怕刘少奇反对，"刘办"党支部决定此事不向刘少奇汇报，经向中央警卫局负责人请示后，便决定给刘、王每人每天补助五角钱，每月共有三十元。这多少可以补贴一下刘少奇的家庭经济。

一九六二年夏，中央警卫局负责人向毛泽东反映，现在有的领导人生活比较困难，准备予以补助。毛泽东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总司令和少奇同志、陈云同志，靠他们生活的小孩多，应该补助，我就不需要嘛。"

补助的事后来被刘少奇发觉了。刘少奇坚持要退回。结果每个月都要倒扣三十元。这可愁坏了为刘少奇做饭的郝苗老师傅。

刘少奇结过五次婚，因此子女也较多。他与第二任妻子何葆贞生了二子一女，即刘允斌，刘允若，和刘爱琴，与第四任妻子王前生了一子一女，是为刘允真，刘涛，与王光美生了一子三女，即刘源，刘平平，刘亭亭，刘潇潇。五、六十年代，除允斌、爱琴已工作，允若在苏联学习，六〇年回国外，其余都在北京上学。

孩子多，负担重，经济自然不宽裕。

刘少奇的孩子上的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那是一所寄宿学校，吃住都在学校。那所小学，有干部子弟，也有平民百姓子女。在学校里，刘少奇的孩子生活之俭朴，是出了名的，穿的衣服鞋子常有补丁，不但干部子弟中绝无仅有，就是平民子弟中也属罕见。孩子们假期回家，也是到中南海的食堂与工作人员一同吃饭，住则与刘办工作人员在一

起。一九五九年八月，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教师来刘少奇家作家访，后来说："刚才我们去看了孩子们的住处，真没想到国家主席的孩子的居住环境竟是那么俭朴，简直和我们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

有一次，王光美让保姆阿姨领女儿去西单商场买外套，阿姨买了一件四十元的。刘少奇知道后吩咐拿去退回，换件便宜点的。一九六一年夏天，刘少奇到黑龙江省林区视察。正值暑假，便把两个孩子也带了去。当地的领导人发现，那两个孩子穿的都是旧衣服，而且短小，不合身，实在看不过去，便送了当地出产的一块亚麻布，交给秘书。刘少奇知道后，立即吩咐退回去。

王光美自己也不例外。在中南海那些夫人中，王光美是较为年轻的一个，然而也是最俭朴的一个。除了陪同刘少奇参加一些国务活动外，平时的王光美，粗衣简装，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外人很难看出这就是中国的第一夫人。

一九七九年，被关押了十二年的王光美出狱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把她安排入住一间招待所内。这一天，招待所的工作人员聚集在大厅前迎接王光美。一辆吉普车开来了，后门打开，首先看到的是一只伸出车门的穿着普通的布鞋的脚，接着，一个剪短头发、身穿蓝色衣服的身影钻出车门，她就是王光美。她一无所有，没有行李，没有箱子，没有提包，甚至没有一只牙具袋，身穿一套那个年代扫马路的工人在劳作时穿着的那种再生布劳动服，已经泛白。接待王光美的招待所负责人问陪同来的中央办公厅政治部干部："她的行李用具呢？"那位干部有些尴尬，说："她什么也没有"。招待所的负责人感到王光美什么都缺：生活用具，替换衣服……于是，向王光美说："您都需要些什么东西，我们一定帮忙解决"。谁知王光美毫不犹豫地脱口而说："请给我笔和纸，麻烦你尽快帮我借支笔，多拿些纸来"。

那一夜，王光美房间里的灯光久久未熄。㊳

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送来了刘少奇家的物品，那是经过大抄家，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劫难后刘家的仅有的财产：一包旧衣服、旧鞋、旧袜子……。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期间，刘少奇的家属、亲属都聚集到北京，住处除了安排在招待所外，吃饭就都在王光美家。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对王光美无疑是个很大的负担。老干部局的负责人考虑到王光美经济困难，主动向上级汇报，建议在粮油副食品等方面给予一些补助。上级同意了。当把东西送到王光美家中时，王光美坚决拒绝了。王光美对来人说："请拉回去，我绝对不能要，少奇同志生前是怎么做的，怎么要求的，你也不是不知道"。

来人说："可是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你家的那点定量不够维持……"。那时粮油副食品还都是定量供应。

王光美说："你不用操心，没吃的我可以上街买方便面！"

王光美始终不肯要公家的照顾、补助。中共中央要发给她抚恤金，她没有要，就是不肯收。

是的，刘少奇的生命是不能用金钱来计算的。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永远欠下了刘少奇家人一笔巨大而又沉重的债项，这是一笔永远也还不清的历史的债项。

八、起居饮食

一九四九年刚入中南海时，刘少奇被分配住在万字廊，那是一幢清代兴建的旧式房子，共三间，一间是办公室，一间是会客室，一间是卧室，均年久失修，十分破旧。后来，在中南海西面修建了一批楼房，统称西楼。其中有两幢小楼，甲楼较大，环境又较安静，刘少奇便提出朱德住甲楼，自己住乙楼。然而朱德亦提出甲楼有会议室，刘少奇的会议多，来人也多，需要大点的房子，应住甲楼。房子盖好了，两家相让不下，谁也没搬进去。后来，朱德说：如果刘少奇不搬入甲楼，他就不搬。总司令的话如此坚决，刘少奇只好让步，搬入了甲楼，而朱德也就搬入乙楼，互为邻里。

这两幢小楼，是建国初期设计、修建的。由于缺乏经验，设计得

不合理。刘少奇的办公室设在楼上，约二十平方米。西面的一堵墙，竟然有四扇门、四个窗。因此，这个房间上午南晒，下午西晒，夏天热的时候，刘少奇只穿背心裤衩办公，还热得满头大汗。有一年天特别热，实在熬不过，工作人员便在办公桌上放块大冰，四周置八盆冷水。而楼下则凉快得多，刘少奇说："好地方都让你们住上了，我要有时间非要来你们这儿避暑不可！"到了冬天，呼呼的西北风从西墙的门缝、窗缝里钻进来，把大窗帘吹得如同波浪一般飘动着。不管锅炉怎么烧，热气始终保不住，刘少奇冻得要穿棉鞋办公。刘少奇迁入这所新居后，毛泽东曾来过一次，他把每个房间都看了，当看到刘少奇办公室的西墙上有四扇门通向阳台，门上头还有四扇窗子，整个一面墙都成了门窗时，毛泽东问："设计这么多门窗干什么用？"刘少奇回答："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刘少奇的家里没有地毯。五十年代后，考虑到刘少奇年事已高，上下楼梯易滑倒，"刘办"便提出在楼梯及办公室全铺上地毯。刘少奇知道后坚决反对，说是铺张浪费。工作人员便以身体安全为理由，据理力争。最后刘少奇只允许在楼梯铺上橡胶垫，说如此又好又节约。至于办公室里，就始终没有铺上地毯。

刘少奇的办公室里的全部摆设是办公桌、书柜、文件柜、两个沙发、一只藤椅，此外没有一件装饰物品。紧挨着办公室的，是书房兼王光美的办公室，周围十多个书架上放满了书。东边是饭厅，里面除了一台供刘少奇吃饭时听广播新闻的收音机，再无别的摆设。饭厅的隔壁是会议室，中间一张长木桌，周围摆放了二十多把普通的软椅子，东墙上挂着一张世界大地图，西面墙上挂着一张中国大地图，此外再无别的东西。中共中央常委、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许多重要会议，就在这里召开。

在中共党内，对刘少奇的称呼，由始至终都是"少奇同志"。这是刘少奇规定的。

一九五四年，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大委员长后，秘书杨俊向他请示工作时，叫了一声"委员长"，刘少奇没有吭声，杨俊以为他没听

见，就又叫了一声。这时，刘少奇抬起头看了看杨俊，不高兴地反问："你怎么突然叫起这个来了，不感到别扭吗？"由于刘少奇很少批评工作人员，所以这两句责怪的话，令杨俊感到很突然，脸上一阵阵发烫。王光美见状出面解围，说："我们还是叫同志嘛"。刘少奇接着温和地说："以后不要这样了，叫同志多顺口啊！"从此以后，直到一九五九年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一直称呼"少奇同志"，而不是叫"刘主席"。刘少奇说："在中央领导人中，只有三个人可以称官衔，就是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我们大家称他们主席、总理、总司令已经习惯了，就不必改了。其他人，应该一律互相称同志。"

有一位新来的炊事员，见到刘少奇便称呼"刘主席"。刘少奇面露不悦，耐心地解释说："以后还是叫我少奇同志好，因为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做领导工作和从事炊事工作只是分工不同，互称同志比较合适"。

刘少奇的早餐，是西式的，而且由王光美来做。最先是一个鸡蛋。这个鸡蛋既不是荷包蛋，也不是带皮煮熟的整鸡蛋，而是把鸡蛋洗干净后，放在一个搪磁缸或碗内，用开水烫一会儿，倒掉水，再掺上开水焖一会儿。经过两次冲烫后的鸡蛋，蛋清半熟，蛋黄不熟，食用时，不加任何佐料，打个孔吸来吃。据说这样的鸡蛋营养没有破坏，对身体有益。

早餐的"主菜"是面包、黄油、果酱。这种西餐的口味，可能与王光美的影响有关。

湖南人口味偏辣，毛泽东最爱吃辣椒，餐餐不离辣椒，并扬言"吃辣椒革命性强"。然而刘少奇虽然同属湖南人，却一点辣椒也不敢沾，炒了辣椒菜的锅要刷好几遍才能用来给他做菜。

刘少奇吃菜怕辣，却不怕苦，一些带苦味的菜，如盖菜、油菜等，人们多用开水焯一下，除除苦味再炒吃。但刘少奇不让这样做，让炊事员把菜洗干净后直接下锅炒吃，他说被开水焯过的菜吃起来没有味，有点苦味吃了败火。刘少奇喜欢吃油渣烙饼，平时专门由西餐师傅负责制做。熬猪板油时，火不要大，油渣既不过火产生焦糊味，又不至

含油太多而失去酥脆。然后同各种调料一起拌匀包在饼中间，烙成油渣酥饼。有一次，炊事员做了三个油渣酥饼，刘少奇吃了两个，剩下一个留在晚餐吃。谁知卫士收拾桌子时，闻到香味，便三两口吃掉。晚餐前，刘少奇要吃油渣饼，卫士吓得跑到厨房求师傅帮忙，于是师傅又做了三个。

九、瑕疵："吃小亏占大便宜"

刘少奇自然不是没有瑕疵。有时为了强调或突出某一件事而表现出了偏激、片面，说过头话、办过头事，便是其一。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要刘少奇赴天津纠正在城市工作中的"左"倾的偏差。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中，出现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资本家现在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今天不是……剥削太多，而是太少了，工人农民的痛苦在于没有人剥削他们，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39]同时期，为了纠正农村中过早地限制富农经济的过"左"做法，刘少奇有"富农党员"的说法，说党员也可以发展为富农，也可以雇工剥削。这些过头话，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成了刘少奇的罪状。

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理论"以后，刘少奇不但附合与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而且将国内的阶级斗争看得比毛泽东还严重，过分地夸大"阶级敌人"的力量。刘少奇说："领导权掌握在敌人手里的，我看在全国最少有三分之二，"现在有的少数地区土改不彻底，华北有三分之一，西北几乎都是和平土改，地富统治并没有真正打倒。有些单位敌人打进来，拉出去；有些单位领导人，同地富资本家搞在一起，搞和平演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四清"运动过"左"，打击面扩大化；毛泽东提出要依靠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刘少奇则提出首先要依靠第一个百分之九十五，先发动群众，才能团结第二个百分之九十五。对干部没有区别对待，搞人人过关，经济退赔上主张彻底退赔，从严退赔。这些主张和做法，后来被毛泽东称为

“形‘左’实右”。

刘少奇向来肯定个人利益的存在，在“公”与“私”的问题上，主张有公有私，先公后私。而不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⑩刘少奇说：“个人利益一定要照顾，没有个人利益就没有整体利益”，“因此不是大公无私而是大公有私”出于这种思想认识，在对待革命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时，刘少奇提出了“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公式，并在著作与谈话中多次引用这个公式。对“公”、“私”关系作如此的表述，确实有许多值得商讨之处，亦最为人所党病。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小亏占大便宜”这句话“风靡一时”，成为暴露刘少奇“丑恶灵魂”的最有力的证据。

从中国革命的长河来看，与毛泽东相比，刘少奇还是比较客观、头脑比较冷静的一个，在制定中共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然而刘少奇在决策过程中也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处，有欠于“慎言”之处。这些瑕疵被政敌抓住，大作文章，造成了广泛的影响。然而，与毛泽东的错误、罪过相比，又是“微不足道”了。

---

①：见《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册，第五页。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刘少奇年谱》上卷五六页。

③：张平化《回忆少奇同志在湖南蹲点》。

④：杨波《民主作风的楷模》，见《缅怀刘少奇》三三〇页。

⑤：权延赤《生活中的领袖们》七五——七六页。

⑥⑦⑤：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

⑧：《刘少奇风范词典》，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三二〇页。

⑨：刘澜涛《共产党人的典范》。

⑩：刘澜涛《共产党人的典范》。

⑪：点点《非凡的年代》一七一页。

⑫：刘澜涛《共产党人的典范》。

⑬：刘少奇一九六三年对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讲话。

⑭：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⑮：刘少奇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

⑯⑰⑱㉒㉓：见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印《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

⑲：刘少奇：《论党》。

⑳：林彪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㉑：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的政治报告。

㉔：《刘少奇年谱》下卷六〇四——六〇五页。

㉕：权延赤《生活中的领袖们》。

㉖㉗㉘㉙㉚㉛㉜：《刘少奇风范词典》，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㉝：《刘少奇风范词典》，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㉞：权延赤《生活中的领袖们》。

㉟：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一八八页。

㊱：权延赤《生活中的领袖们》。

㊲：权延赤《生活中的领袖们》

㊳：权延赤《生活中的领袖们》。

㊴：刘少奇一九四九年在天津资本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㊵：刘少奇一九五九年对民建工商常委的指示。

第五篇

『旗手』惨殞落

第一章　打倒刘少奇毛泽东
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毛泽东的阴谋：批《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和批《海瑞罢官》，是中国现代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一桩公案。

一九五九年四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大讲海瑞，提倡“海瑞精神”，钓出了彭德怀这条大鱼，为毛泽东除去了一个心腹大患。而中国人民却由此而遭受了三年深重的灾难。本来，由海瑞所引起的这些风风雨雨，在彭德怀倒台后应当告一段落了。然而，自从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矛盾冲突后，海瑞便又成为一把杀人的利剑。

最先发现海瑞这把利剑的是江青。对这位自认是“毛主席的红哨兵”的邪恶女人，著名历史学家黎树曾有如下的评语：

“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而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①

黎树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江青的后台老板是毛泽东。建国以来文艺界的批判风潮，都是出于毛泽东的政治需要，江青只是毛泽东

的统治工具，既使没有江青，毛泽东也会找来另一个工具。而江青的野心、邪恶，恰恰适应了毛泽东的需要。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将中国搅得天翻地覆，坏事做绝，也完全是出自毛泽东的支持和纵容。现在，人们只骂江青，似乎只是责备伙计，而忘了打老板的屁股，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看完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后，说：“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它是一株大毒草！”江青曾找到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此剧，但被拒绝。于是，江青便去找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是借古喻今、含沙射影的大毒草。由于当时正是全国六亿人民饿饭的时候，不合时宜，毛泽东没有准予所奏。

不死心的江青又去找她的老搭档康生。

康生说：眼下时机不成熟，全国都在饿肚子，谁还有心思来关心什么罢官不罢官。再等等，经济形势好了后，政治问题自然要提到日程上来。

老谋深算的康生果然言中了。两年后的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刚刚好转，全国人民刚吃上几顿饱饭，毛泽东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发动的运动一浪接一浪。江青、康生认为时机成熟了，康生便亲自去求见毛泽东。

康生说：我考虑了三年，《海瑞罢官》这个戏跟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有关系，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把彭德怀说成是包青天，为民请命。

毛泽东神情变得严肃，沉吟不语。

对毛泽东的性格了如指掌的江青听后，高兴地说道：“我要找笔杆子写文章了！”

江青先去找北京的李希凡。那是由于一九五五年批判《红楼梦》，与“大人物”俞平伯抗了一下，被毛泽东赏识，从而闻名全国的人物。然而李希凡没有接受。

于是，江青于一九六五年二月到上海找“左王”柯庆施，经柯庆施引见，张春桥、姚文元便与江青勾搭上。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复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②

同年五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访华团时也说：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③

毛泽东与江青的秘谋，刘少奇不知道，周恩来、邓小平也不知道，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都被蒙在鼓里。这是货真价实的阴谋诡计，是地地道道的违反中共组织原则的反党行为。

毛泽东与江青图谋的，当然不是一个小小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否则也不必要如此鬼鬼祟祟、神神秘秘，瞒住中共中央。毛、江的矛头所向，是吴晗背后的彭真与中共北京市委，是中宣部和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北京两个独立王国之一的中央书记处。这些干部和组织，都

是刘少奇的权力基础。先扫清外围，后攻中心堡垒，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攻坚战的战术，在政治权术上，就叫做“清君侧”。

毛泽东与江青炮制的重型炮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登出，震动了整个中国政坛。“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了。

然而，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和中央书记处，严密地控制着北京的宣传机器，在十八天里，不予转载，毛泽东下令上海出小册子，北京也一本不订。

毛泽东说：“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通。”④ 十一月下旬，毛泽东下令周恩来干预此事，北京的报刊才都转载了。毛泽东抓到了彭真、陆定一以及北京市委、中宣部、中央书记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压制左派，包庇右派”的把柄，证实了他的“中央出修正主义”的看法。

与此同时，出于控制军队，为“文化大革命”作准备的需要，毛泽东伙同林彪肃整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罗瑞卿大将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在肃整罗瑞卿的上海会议上，林彪妻子叶群在会上作了十个小时的主题发言，诬陷罗瑞卿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向党伸手要权，反对林彪。她罗织罪名，危言耸听，许多是望风捉影、莫须有的罪名。

刘少奇对叶群的指控进行反驳，说：“不可想象，难以置信”。⑤

邓小平也说：“死无对证”。⑥

基于当时毛泽东主持的会议采取一种事先没有向常委通报、不让当事人辩护、听信一面之词的不正常状态，刘少奇提出两点意见：参加扩大会议的人员，常委之间要先通一通；罗瑞卿“反党篡权”材料不够实，不少是空谈。

邓小平也说：“同意少奇的两点意见。让罗瑞卿到会上发表看法。”

然而毛泽东一意孤行，最后通过了撤销罗瑞卿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与对罗瑞卿、杨尚昆的肃整，无疑地是对刘少奇的严重打击。加上工作上的劳累，刘少奇大病了一场。刘少奇在病中坚持工作，并不让向中共中央报告。是周恩来到福禄居向刘少奇汇报工作时，才发现他已病得奄奄一息。周恩来马上指示通知正在搞“四清”的王光美从农村回来，并吩咐王光美：“少奇同志不恢复健康，你不能离开他！”

这时，围绕《海瑞罢官》的斗争，正处于僵持阶段。在彭真的主持下，通过版面安排、学术讨论、发编者按等，将姚文元文章的杀伤力减低到最低的程度。站稳脚跟后，彭真便组织反攻。他以一九六四年成真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名义，制订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将《海瑞罢官》等纳入学术讨论范围，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不准革命’”。

《二月提纲》极力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横打棍子的做法进行限制，必然与毛泽东发生严重的对立。

刘少奇痊愈后，便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主持中央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二月提纲》，并委托彭真率领“五人小组”前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

彭真一行五人于二月八日到达武汉，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对提纲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彭真于是在武汉即代中央草拟了一个批语，电传北京，经在京常委同意后，于二月十二日将《提纲》批转全国，作为当前运动的一个指导性文件。

毛泽东与江青精心策划的姚文元文章，并没有攻破彭真在北京的堡垒。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利用所控制的党、政权力机构，与毛泽东进行抗衡。

北京方面的顽强抵抗，令毛泽东、江青等人气愤而震惊。张春桥说：我们“天天等北京消息，天天看，天天盼，北京就是不理睬”。

“令我们感到震惊”，“不知道会触动这么深”，“更不知道彭真会这样坚决反对”。江青气愤地说：“攻也攻不动阿”，“我的话更没有人听”。⑦

于是，毛泽东与江青再次策划请解放军这座“尊神”。那是毛泽东可以依靠和动用的唯一的力量——毛泽东的新政治盟友林彪正掌握着军队的大权。毛泽东指使江青去苏州找林彪，要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指示林彪务必给予全力支持。江青说：“于是想到解放军中请尊神，请‘无产阶级专政的专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⑧

部队文艺座谈会又是在瞒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下秘密进行的。最后写出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说建国后文艺战线是资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得知刘少奇病愈，可以按计划出国访问后，便开足机器，抓紧工作。毛泽东亲自上阵，指挥陈伯达、张春桥修改江青的《座谈纪要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亲自做了三次修改，重要的改动地方达十五处。并将题目由《江青同志召集……》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毛泽东不愧是个经验老到的政治家，将标题改成《林彪同志委托》这六个至关重要的文字，顿时令《纪要》的份量增加了许多，其意义也大不一样。⑨

在毛泽东亲自出马之下，《纪要》在刘少奇出国访问前夕定稿，等待刘少奇出国后即送上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批发全国。

毛泽东还部署了在刘少奇离开后发动一系列政治攻击。

二、乘虚而入毛泽东“清君侧”

刘少奇是在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离开北京，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

刘少奇的专机刚离开北京，即三月二十二日当日，林彪便将《纪要》批转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三月二十八至三十日，毛泽东在杭州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猛烈批判《二月提纲》和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

他说："《提纲》不分是非，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并说：陆定一是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我们面临着文化大革命，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必须进行这场大革命。⑩

彭真与陆定一被打倒了，他们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刘少奇的得力干部；而中宣部和北京市委也瘫痪了，它们也是刘少奇重要的权力基础。毛泽东利用刘少奇不在国内的机会，一举摧毁了刘少奇的两个重要据点。

毛泽东已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而现在，毛泽东却亲临第一线，对彭真等人进行打击。如此重大的问题，退居二线的毛泽东，是否应当等刘少奇回来才解决？毛泽东如此乘虚而入，先斩后奏，算不算是越权、擅权？毛泽东对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批评，并没有经过中共中央的批准，如此作法是否符合组织原则，这算不算是阴谋诡计？

对《二月提纲》，一个多月前在武汉毛泽东并没有表示什么反对意见。现在却严厉批评，大肆指责，正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而且《二月提纲》是中共中央集体通过的，现在毛泽东自己便一举否定掉。

毛泽东的新政治盟友林彪，曾在私底下如此评论毛泽东：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毛泽东"言行不一"、"爱搞权术"。

林彪的这些评语，都是一针见血。此时此地的毛泽东，其行为已像个"政治无赖"。

毛泽东正是利用阴谋诡计和权术，来击败刘少奇。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九日，刘少奇、陈毅一行在访问巴基斯坦等三

国后，由缅甸的仰光回到昆明。

刘少奇本想在云南作些考察，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也作了准备，但中共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于是，刘少奇的飞机直飞上海。由于来不及调车，只好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将他们送到杭州。

刘少奇刚住下，周恩来便匆匆赶来，向他介绍情况。原来，在刘少奇出国访问期间，国内的形势急转直下。

等到刘少奇出访回国，摆在他面前的既成事实是：彭真、陆定一已被打倒，中央文化五人小组被解散，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北京市委已瘫痪，而陈伯达、康生、江清等人迅速得势，中央文革小组已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已经定稿。

与此同时，在刘少奇回国之前，毛泽东还部署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正式通过“五·一六通知”，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组织处理。会议定于五月四日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不参加，由刘少奇主持，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在刘少奇出国访问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趁机决定和处理了这么多重大的事项，将刘少奇在第一线——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书记中的四名得力干将，以及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中央书记处这三个重要的组织打掉。等到刘少奇回国时，他在中共中央的依靠力量大为削弱，只剩下邓小平一人。

这无异是一场官庭政变。

刘少奇被毛泽东这一轮猛烈袭击打得晕头转向。王光美说：“在我们出访期间，党内发生了一些问题，有的事情他（指刘少奇）也接不上头。出访前他病了一场，没有看什么文件，我们出访刚回来就匆匆赶到杭州，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讲了许多很重要的问题……”。⑪

由刘少奇回国开始，毛、刘斗争的新阶段便开始了。

毛泽东在这一阶段使用的策略，一方面是继续让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包括主持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

时机还未成熟，毛泽东极力要稳住刘少奇，令其不生疑心，无所动作，而毛泽东则可以趁机加紧部署。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平津战役中，毛泽东曾成功地运用过这一策略。那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辽沈和淮海战役获得胜利，国民党的三大战略集团，被解放军消灭了两个，长江以北全部解放。剩下的傅作义集团，孤立在华北的北平、天津一带，是固守还是南撤，正举棋不定。而林彪领导的东北野战军刚打完辽沈战役，还未休整便匆匆入关，准备歼灭傅作义集团。由于兵力还未部署妥当，又担心傅作义集团从塘沽海路南逃，毛泽东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中，对林彪指示“为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诸敌南下”，“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个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下令淮海战役留下一点国民党兵残余，不急于消灭，留下一点尾巴，令蒋介石产生假象。毛泽东还说：“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完成最后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蒋介石与傅作义果然中计，尽堕彀中。

时至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又使出这一招，仍是灵验无比。刘少奇作梦都想不到毛泽东让他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都是旨在打倒自己的。

刘少奇的心情是复杂的。对毛泽东的作法，他既不理解，又不满意。他曾对人说：“你相信彭真的问题吗？”对打倒彭、罗、陆、杨表示了很大的保留。由于不知道毛泽东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刘少奇在大会上说：“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⑫

刘少奇的心情沉重，感到很大的压力。但他还天真地认为仍获毛泽东的信任，起码是毛泽东的态度没有改变。尽管如此，刘少奇从那咄咄逼人的形势中，仍然感到暴风雨将至。加上自己与彭罗陆杨有着

密切的工作关系，为了消除毛泽东的疑虑，刘少奇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即五月二十六日的大会上讲了话。他讲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自己的认识，主要精神是表示要跟上形势，保持晚节，革命到底。刘少奇的讲话谦逊平和，没有激烈的豪言壮语，也没有耸人听闻的警句。他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检讨了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缺点和错误。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在武汉同意解散工人纠察队，讲到一九四九年在天津讲话中的失言，及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一九六二年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及一九六五年不主张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这一大篇自我检讨，似是对毛泽东表态，表示自己的悔过及紧跟的真诚意愿——一个和平、谦逊、忠诚的信息。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今后怎样搞？毛泽东的意图是什么？刘少奇一片茫然。刘少奇是消极的、被动的，处于明处；而毛泽东是积极的、主动的，处于暗处。刘少奇的悲惨下场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三、设陷阱毛泽东隔岸观火

毛泽东在这一阶段使用的第二项计谋，是向刘少奇布下政治陷阱。

这时，毛泽东远离北京，住在杭州。往年，毛泽东多在三、四月便离开南方，返回北京，以避开南方那又热又湿的夏天。然而在一九六六年，时至六月，南方已是进入盛夏，但毛泽东还是在杭州、长沙间巡游，拒不返京。

刘少奇只好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毛泽东远在南方，但却时常绕开刘少奇，向他在北京的代理人康生、陈伯达等人发号施令，指使他们煽风点火，制造事端和混乱，以干扰刘少奇的工作。而毛泽东便在南方“隔岸观火”，专门留意和挑刘少奇的过失和错误，以便“罗织罪名”，彻底摧毁刘少奇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

进入六月以后，形势再次急转直下。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通栏大标题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

神》。社论号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那是陈伯达于五月三十一日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后炮制出来的，社论并没有经过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审阅。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一张炮轰校党委的大字报。周恩来闻讯后，派人到北大指示："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对聂元梓等作了委婉的批评。然而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派人要走了大字报底稿，康生立即把它密报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毛泽东还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说要广播。⑬

毛泽东的"十分必要"，是借此可以制造天下大乱。

毛泽东绕开了刘少奇等中央常委。刘少奇是在六月二日下午从报纸上看到大字报的，刘少奇与王光美以为是秘书们漏报了，王光美询问机要秘书刘振德："看到过中央关于审批广播那张大字报的传阅文件吗?"

"没有呀!"刘振德回答。

王光美说："这么大的事，少奇同志说他不知道，他说中央开会没有说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也感到非常意外，他询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个通知？周恩来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⑭

正如聂元梓后来所说，大字报一广播，"北京大学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国爆炸了!"

在没有与刘少奇打招呼的情况下，毛泽东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火一烧起来，便成燎原之势。毛泽东所企求的，正是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

毛泽东密切地注视着北京的动态。源源不断的情报，通过各种渠

道，流向毛泽东那里。

四、派工作组刘少奇中计

派工作组的决策过程是这样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开会决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当时周恩来还当场用电话向毛泽东请示，获得同意。为慎重起见，五月三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合致信毛泽东，书面请示向人民日报派工作组一事，信是刘少奇亲自起草的，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

陈伯远于五月三十日进驻人民日报社。而张承先的工作组是在六月一日晚十点多进驻北京大学。进驻北大的消息于六月三日由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其电讯稿是周恩来起草的，并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看了这条电讯稿并表示同意。⑮

事实上，刘少奇派工作组的作法并不存在什么错误：

一、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二、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集体决定，毛泽东也是同意的，完全符合中共的组织原则；

三、派工作组符合中共过去的经验。在过往中共曾多次以派工作组的方式领导各种政治运动，如土改等。一九六七年夏，“文化大革命”发展成“全面内战”，毛泽东便派出“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全国各地，这其实就是工作组，只是换个名称而已。

而毛泽东以此作为打倒刘少奇，纯属罗织罪名。

六月三日，刘少奇紧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运动出现的问题。

先由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代表新市委汇报。他在谈了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的情况之后，讲了准备向学校置“内外有别”等八条要求，他最后提出：“有的学校领导瘫痪了，领导不起

来，就派工作组进去领导。希望团中央、中组部组织人力帮助。”

经过一番讨论，会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的意见，向北京市一些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向各学校传达贯彻所拟的八条要求。刘少奇说：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的秩序，要把学生很快的组织起来，走上轨道。

见于毛泽东绕过中央常委广播大字报的不寻常举动，富于政治斗争经验的刘少奇便多次提出请毛泽回北京主持工作，但毛泽东没有同意。刘少奇又多次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运动的问题，但也“没曾得到明确的回复”。⑯

在这种情况之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经过商量，决定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并请示运动的指导方针。

六月九日，刘、周、邓三人乘坐一架专机飞抵杭州。

会议在毛泽东的住处刘庄宾馆开了两次。出席会议的，除了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陶铸之外，还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增加的陈伯达、汪东兴和六大区的中央局书记李雪峰（华北局）、宋任穷（东北局）、刘澜涛（西北局）、魏文伯（华东局）、王任重（中南局）、李大章（西南局），陪同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来杭州的康生也在座。会议是务虚性质的漫谈，话题广泛，从运动情况、教学改革、提拔年轻人、报纸版面、点名批判程序主作组、到农业生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

这正是毛泽东的特色。刘少奇这一行，是想要一个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如果说了，刘少奇回京照办，那么毛泽东就很难抓住刘少奇的辫子了。你想要的东西我偏不给你，让你摸不着底细，心中无数。如此一来，无论对方怎样行动，毛泽东都可以从鸡蛋中挑出骨头来：我当初没有讲过，你自作主张，当然就是犯了错误。因此，不明确表态，是毛泽东最厉害一招，在兵书上叫做“后发制人”。

于是，刘少奇抱着满腹的疑问而来，刚一提出，毛泽东便不着边际地漫谈起来，领着刘少奇等人游花园，只务虚，不务实，题目换了

一个又一个。

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态度模棱两可。

刘少奇再次提出请毛泽东回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又是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毛泽东的阴谋诡计与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刘少奇一行是在六月十二日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刘少奇、邓小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派工作组便在北京、全国铺开。

由于周恩来在六月十五日出访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因此后来毛泽东“覆手为雨”时，就没有涉及周恩来。后来所批判的是“刘邓反动路线”，而不是“刘邓周反动路线”。周恩来避过一劫。

北京城当时的形势，就像一个被引爆后的大火药库。各大专院校，甚至中学，大字报铺天盖地，各校的党委领导成了斗争的目标。乱批乱斗已出现，而且迅速漫延。许多教授、专家、学者也被揪出批斗示众。人身污辱、打人、抄家已成家常便饭。自杀和打死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更加严重的是，学生与工作组发生严重对立。学生们要的是无政府主义，无拘无束；而工作组的职责却是把运动纳入正常的轨道内。

六月十八日上午，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利用工作组集中开会之机，设立“斗鬼台”、“斩妖台”，擅自把四十多名“黑帮”、“反动学生”揪出批斗。学生们给这些人戴上纸做的高帽子，脸上涂上墨汁，对他们罚跪、扭打、揪头发、撕衣服，肆意污辱。工作组组长张承先闻讯后急忙赶来，严肃批评了这种作法。但聂元梓认为“六·一八”事件是革命行为。

六月十九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

有种种迹象表明，是中央文革支持这些少数学生反对工作组。更加严重的行动正在酝酿之中。

刘少奇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

六月二十一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一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布置对运动的领导。在汇报讨论之后，刘少奇对几个问题作了指示。他提出：要划一个界线，不要把什么人都说成黑帮，运动中要恢复党、团组织生活，党委烂掉的，工作组可以代行党委职权；不准随便提出夺权，不要打倒一切；运动的整个过程要抓生产、工作、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禁止打人、污辱人和变相的体罚。⑰

会议精神贯彻下去后，各地的工作组开始"反干扰"，对前阶段的"冒尖"学生给予反击，定为"反党干将"、"右派"或"反革命分子"。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清华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蒯大富及其同伙多次被半，其中一名被斗者自杀身亡。而蒯大富则被开除团籍，并被关押了十八天。

其他院校和地区，也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五十多天。

六月十六日，毛泽东从杭州移居长沙。于十七日住进"西方那个小洞"——韶山滴水洞，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住了十一天。

北京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认为，他已捉到了刘少奇的辫子。

六月二十八日、毛深东从长沙到武汉。

毛泽东自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到上海策划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一直在南方流连。毛泽东将刘少奇视为敌人，一方面千方百计寻找攻破刘少奇这座堡垒的突破口，另一方面又疑心刘少奇发动武装政变，将势孤力单的毛泽东、江青等一网打尽。于是自上年冬南来后，拒不返京，至今已八个多月，是建国以来毛泽东离京时间最长的一次。现在，找到了打倒刘少奇的突破口，毛泽东可以回北京了。

五、毛泽东的“理想社会”：“五·七指示”

夺回失去的权势仅是第一步，接着，毛泽东就要继续去实现那个“平均划一”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梦想。自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失败以后，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毛泽东又找到了实现这个理想社会的新道路与新形式。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是为着名的《五·七指示》：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毛泽东在信中，详尽地描述了这套新的形式：“一大二公三纯”，“亦工亦农亦文亦武”，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步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是自给自足、封闭式的社会。这是具有

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是他毕生向往和憧憬的理想社会。毛泽东将这个“五·七指示”作为建设“新世界”的纲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是“第二次革命”。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毛泽东心中涌现一股类似“三大战役”时的那种亢奋。他需要发泄一下，需要为这个“第二次革命”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发出一个轰轰烈烈的宣告。

毛泽东选择了浩浩荡荡的万里长江。

七月十六日，七十三岁高龄的毛泽东畅游长江，游程三十华里。这是毛泽东重返中国政治舞台的一次“亮相”，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游长江。

六、毛抓住刘的痛脚：“镇压学生”

毛泽东于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得知毛泽东已经回到家，刘少奇立即赶去丰泽园，想向他汇报一下工作。但门卫通报后传出来的话是“主席要休息”。可是刘少奇发现丰泽园的门前停放着好几辆访客的汽车。刘少奇感到一片茫然，只好快快地回去。

毛泽东的客人是康生、江青、陈伯达。他们带来了攻击工作组和中央第一线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的材料，汇报了“工作组镇压学生”的情况。毛泽东一方面收集打击刘少奇的材料，另一方面又与心腹们密谋召开中共十一中全会。

直到第七天，七月二十四日，刘少奇才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辟头便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的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⑱

刘少奇感到一阵愕然。

毛泽东还说：“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⑲

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并作出撤消工作组的决定。

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织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⑳

毛泽东给刘少奇定下了“镇压学生运动”，犯了“方向性错误”的性质，毛泽东认为时机成熟了，需要召开中央全会，来对刘少奇进行组织处理。于是，毛泽东在同一天（即二十四日）宣布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并让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

工作组派出时，谁也没有说过派工作组有什么不对。毛泽东没有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也没有反对，刘少奇于是派出了工作组。可是江青一伙在暗中煽动和支持学生与工作组对立，这便是刘少奇所说的“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刘少奇落入了毛泽东预先设置的政治陷阱中，“鸡蛋里挑骨头”，被罗织了“镇压学生”的错误，并被上纲上线为“方向性错误”。而毛泽东也再一次个人推翻中央政治局集体决定，再一次“覆手为雨”地提出撤销工作组。

毛泽东用阴谋诡计击败了刘少奇。自从“大跃进”以来，刘少奇第一次处于政治上不利的地位。毛泽东紧紧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要从组织上打倒刘少奇。

下一个回合，便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

①：转引自叶永烈《江青传》二九二页。

②：江青《为人民立新功》（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

③：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年代》六一一页。

④：引自叶永烈《江青传》二九五页。

⑤⑥：引自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二八八页。

⑦：引旧丛进《典折发展的年代》六一二页。

⑧：江青《为人民立新功》。

⑨：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时代》六二五页。

⑩：同上。

⑪：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二三七页。

⑫：刘少奇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黄玲《刘少奇一生》。

⑬⑭：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三〇页。

⑮：黄玲《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一三〇页。

⑯：同上，十五页。

⑰：黄玲《刘少奇一生》四二八页。

⑱⑲：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四六页。

⑳：同上，四八页。

第二章　毛泽东换“接班人”刘少奇失势

一、不寻常的“十一中全会”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召开。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中全会。

不寻常之一是，按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每年至少两次”。可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是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的，四年来，中共没有召开过任何的中央全会。

其原因，就在于毛泽东身上。

自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遭到惨败，中国蒙受了连续三年的“天灾人祸”，死了四千万人，国民经济损失一千二百亿元人民币。对造成如此巨大灾难的错误，作为最高司令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否应该召开中全会，对“大跃进”的错误给予检讨和总结，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历史作个交待呢?

然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并不想做这样的检讨和总结，因为“大跃进”的始作俑者就是毛泽东，他难辞其咎。

同时，自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刘少奇、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第一线的领导人，抵制毛泽东的反对和干扰，坚决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

发展。在这一正一反的铁的事实面前，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当中，毛泽东的威望急剧下降，而刘少奇的威望直线上升。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中央全会，只能是为刘少奇评功摆好，歌功颂德。毛泽东不愿意做这种损己利人的傻事。

这就是毛泽东不遵守党章，在四年之内没有召开中央全会的原因。

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才提出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

不寻常之二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在仓促的情况下决定的。毛泽东于七月十八日由外地回到北京，七月二十四日发出开会通知，七月二十七日便开始预备会议，八月一日全会便正式开幕了。

拖了四年不开，一旦要开时又如此急切，这正是毛泽东的玄机所在。

在这种情形下，于是就出现了第三种不寻常的情况：全会还没有召开，可是会议公报的初稿已经在陈伯达的主持下写好了。

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有三件事令他感到吃惊：

第一，公报初稿送审传阅的名单上没有刘少奇；

第二，送审传阅的名单上，毛主席后边即是林彪；

第三，初稿上，引述了刘少奇几天前发表的一段话。那是七月廿二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胡志明七月十七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公报初稿中引用了刘少奇声明中的几句话，在送审中被毛泽东勾掉了。①

这些不寻常的情况表明：十一中全会由头到尾都是由毛泽东密谋操纵的，大会的主题就是：打倒刘少奇。

八届十一中全会于八月一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首先由毛泽东宣布开会，然后作了简短的开场白：“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是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开五天。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到，中间开三天小组会，最后开一天大会，就行了。现在请小平同志宣布几件事情”。

邓小平宣布的是出席人员的情况和议程。

为什么隔了四年没有开中全会，为什么现在要开中全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什么，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什么也没有说。

接着是刘少奇代表中央的报告。报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讲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所做的工作。

第二部分讲文化革命以来的工作，并在工作组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

刘少奇讲话中，毛泽东频频插话，对刘少奇进行指责、诘难，会场上的气氛弓张弩拔。

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陈伯达同志正式写了一个不要工作组的书面提议，有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的意见还是要工作组。最后我也发言，说我是主张要工作组的，工作组这个方式比较方便，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毛泽东：“当时只有去的问题”。

刘少奇解释说：“那个时候已经是撤的问题，我说这个比较简单，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

毛泽东反驳道：“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

刘少奇又解释：“当时我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大部分组织已经瘫痪，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毛泽东：“怎么会中断呢？”

两位主席唇枪舌剑，会场上寂静无声。

刘少奇接着说：“当时我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消工作组……”

毛泽东再次打断刘少奇的讲话，厉声说道：“工作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完全是错误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坏作用。”②

在小组会上，陈伯达、康生、江青四处煽动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江青鼓动陶铸在会上发头炮，陶铸不答应，结果是谢富治（公安部长）发了头炮。

会上，很多老干部对批判刘、邓不可理解，许多人不是沉默不语，便是放放空炮，有的还表示了明显的赞扬和同情，对刘少奇的处境表示不平。有一次，刘少奇到一个小组去听取批评意见，中场休息时，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敬特意走到刘少奇身边，亲切地说道："少奇同志，有时间我要向您汇报女工工作问题！"

刘少奇听出这是正义之声，缓缓地站起来。环顾周围那些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幕的人淡淡笑了笑说道："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陈少敏强忍着的热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正是这位陈少敏，在一九六八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决江青等人炮制的刘少奇专案报告时拒不举手。会后她也被打倒。

会议进行得并不如毛泽东预计的那样顺利，会议拖延了。毛泽东于是加重进攻的火力，更加猛烈地批判刘少奇：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是路线错误"。

刘少奇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接着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当叶剑英在发言中讲到我们有强大的军队，不怕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③

这已经不是正常的、同志式的口吻了。

在毛泽东的咄咄逼人的高压之下，刘少奇一次又一次地作检讨。

然而毛泽东并不满意。因为毛泽东并不是想让刘少奇通过检讨而过关，而是想将他置于死地，而且永世不得翻身。

二、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刘少奇跌至第八

八月五日，毛泽东在六月二日的的《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

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章的左面，写下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当时尚没有标题，落款为“八月五日”。秘书徐业夫将它在另一张纸上誊清，毛泽东在稿上加了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又作了一些修改，之后交中央办公厅付印，准备印发与会者。

毛泽东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八月七日，大字报派发给与会代表。

形势急转直下。

八月五日下午，刘少奇照常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接见了赞比亚代表团。回到家后，周恩来打来电话，要刘少奇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这显然是毛泽东的意见。

刘少奇是在八月七日收到毛泽东大字报的打印件的。秘书们发现，自从那以后，刘少奇的生活习惯也有了变化。以前他除每天凌晨睡觉之前到院子里散步半个小时以外，其余时间是不出来散步的。而现在，他却经常到院子里或在他的办公室门口那条狭窄的走廊里，独自低头默默地走来走去，或靠在躺椅上闭目沉思。本来就寡言少语的他，现在话就更少了。④

多年生活习惯的改变，说明了刘少奇所受打击之强烈与严重。刘少奇至此才大梦初醒，原来毛泽东一直在算计他。

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

六条》）获全会通过。

八月十二日是全会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进行中央领导机构的改选。中央委员们在事先印好的名单上画圈。新选出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是：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从第二跌到第八。

毛泽东大获全胜。刘少奇从此走向灭顶之灾。

---

①：转引自叶永烈《陈伯达传》三七一页。

②：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③：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五二页。

④：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二四九页。

第三章　批判不断升级刘少奇陷灭顶之灾”

一、彻底打倒的讯号：批判资反路线

按常理说，经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已经失势，毛泽东也夺回了对党政军的最高控制权力，毛泽东应当收手，毛、刘斗争应当告一段落。

然而，毛泽东不是常人，因而也不能用常理去衡量他。

建国以后，对待党内斗争，毛泽东的方针再也不是“治病救人”，而是“除恶务尽”。其原因固然是那种阴险狠辣的特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达到了登峰造极；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建国后毛泽东执行农业社会主义路线，失去了真理，失去了人心，当党内斗争（实际上是对毛泽东错误路线的批评反对）发生后，毛泽东不但要将对手打倒、斗臭，还要将其置于死地，永世不得翻身，以确保自己的权力地位。毛泽东对彭德怀是这样，对刘少奇就更是这样。这正是心虚胆怯的表现。

刘少奇与彭德怀不可同日而语。刘少奇具有更加雄厚的政治资本，在全党、全军和全国的威望更高。对毛泽东来说，刘少奇是个更具威胁、更加危险的敌人。而且，在打倒刘少奇的理据上，毛泽东更加理亏和站不住脚，更加不得人心。对此，毛泽东是一清二楚的。因此，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亦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题，将刘少奇一棍子打死。刘少奇远非是死老虎。

毛泽东的忧虑很快得到证实。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从北京到各地，广大干部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及对刘少奇和工作组的批评，表示极大的不理解和不满，进行强烈的抵制。林彪在十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刚才说了中间有一些顶牛，这就是五月十六日中央《通知》上说的，‘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一直到这次会议以前，我看还是这样的情况。”①

“两头”是指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等一干人，以及红卫兵和造反派。无论是毛泽东这一头还是造反派这一头，在当时都是少数派，广大的群众，尤其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广大干部，则是“很不理解”的多数派，与毛泽东和造反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顶牛”，使得“文化大革命”不能顺利开展，肃清刘少奇的影响就更加谈不到。刘少奇背后有这么大的干部和群众力量的支持，毛泽东感到极大的不安与忧虑，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则极为恼火。

于是，毛泽东在十月一日提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开始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总攻击。

在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操纵下，十月六日，以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为“司令”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召集十万人，举行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与张春桥亲临讲话。

此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打倒刘少奇”的新阶段。

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的中央工作会议，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面对着全国广大干部的强烈抵制，毛泽东不得不采用软硬两手策略，一方面指使陈伯达、林彪唱红脸，在大会上作报告，点名攻击、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另一方面他自己唱白脸，发表一些安抚人心的讲话，“我不是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

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毛泽东还说：“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和烯泥……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②

于是，在当时和后来，人们都说：毛泽东并不想将刘少奇一棍子打死。其实这只是假象，是地地道道的策略。

二、刘少奇的第一次“自我检查”

刘少奇本来有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到临开会时，中央办公厅又打来紧急电话说“为了使少奇同志好好考虑问题，不要去参加会了”。③

自从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在中南海的住处福禄居比过去安静多了。打参加革命以来，一直紧张忙碌的刘少奇，一下子投闲置散起来。在读书看报之余，刘少奇便按照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中的意思，开始写书面检查。

九月十日，检查写完了。刘少奇让秘书把检查稿送呈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那边很快有了回音，那是一封短信：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主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妥一些，请酌定。④

刘少奇立即给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写信：

恩来同志：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主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八天之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

请称酌情安排。⑤

周恩来很快照办了。刘少奇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检查。

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分别宣读了他们的检查。刘少奇的检查如下：

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错误，许多 同志都进行检讨，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同我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北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我这一次犯严重的路线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例如：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旧政协会议开过后，我替中央写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将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对于当时时局的这种估计是错误的，有和平幻想。虽然，在这个指示上同时提出练兵、减租、生产三项中心工作，是不错的。此外，一九四六年初，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方针，我是有错误的，当时对林彪同志的支持是不够的。一九四七年夏，我主持的土地会议，没有系统地全面地解决当时分配地主土地问题，没有能够纠正当时土

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如杀人过多，侵犯一些中农的利益等。一九四九年春，我对天津城市工作说过许多话，纠正当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某些过份性急的情绪和作法，同时提出消灭城市的封建把头；但是，有一些讲话是有右倾错误的，没有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一年七月，我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件。一九五五年邓子恢同志砍掉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是在我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讲过的，没有遭到反驳，事实上就批准了他的计划，他就在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大加发挥，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在一九六二年我犯过右倾错误，在一九六四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和过去我所犯的这些错误有联系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用我的名义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书面报告，以后我又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发言。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都肯定一九五八年实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以来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也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我们所获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份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开始逐步好转。在这种对于当时形势的基本估计下，不论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对于当时的困难都讲得过多了，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暗淡，对于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更严重的错误，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由我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一九六二年的国家预算，发现了当年的预算有几十亿赤字，因而对于当时的财政经济的困难形势，就估计得更严重了。认为“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陈云同志在二月二十六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作了讲话。陈云同志的这个讲话，是根据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

发表的意见加以发挥的。中央在三月十八日批发了陈云同志的讲话给各省、市、区党委，要各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党员干部“认真讨论。在讨论中，应当鼓励大家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并且应当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在全国各地鼓励了各种歪风邪气的出笼，翻案风，单干风都出来了，还有些人就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就在许多地方把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大量削减基本建设投资，对于许多已经开工的工程项目大量下马，以至有些必须继续建设的工程项目，例如大三线建设的某些重大项目，也错误地下马了，而某些应该削减的投资，又没有削减。

由于我当时过份信任陈云同志，并且偏听他的意见，在思想上与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荐陈云同志作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毛主席此时不在北京，我和中央其他几位同志到毛主席那里汇报了北京讨论的一些情况，并把已经拟好的中央批发陈云同志的讲话的文件送请毛主席批发，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赞成我们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和某些作法的。

邓子恢同志在当年二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反驳，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以后，他就在好几处干部会议上鼓吹包产到户。另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还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拟出了三和一少的意见。这些都是由于对国内国际形势作了错误估计之后，而提出的直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我当时没有把他顶回去，这是很错误的。但是我已经感到紧张，感到形势严重，因而急于请求毛主席回北京来。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到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以前，我在这段时间内所犯的这些错误，是一种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从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就着手起草“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以后又起草“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毛主席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形势、矛盾、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进行

了讨论，九月又召开了十中全会，通过了上述两个决定，并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中全会公报。这样，才把我这一次犯的错误纠正过来，把当时的局势从根本上扭转过来。

我在一九六二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之后，在一九六四年又犯了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领导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个十条）之后，九月中央的某些同志又拟出了“第二个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于十一月十四日发出。这“第二个十条”是怎样拟出的，我不知道。最近才知道彭真在“第一个十条”出来后走了七个省，回来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第二个十条”是基本上根据彭真在这个报告中的思想拟出来的。一九六四年夏我觉得“第二个十条”中有些规定不利于放手发动群众，所以作了一些修改，在九月十八日发出修正草案。

一九六四年夏，我到河北、华东几个省市，中南各省和云南都讲过话，在北京也讲过话，在这些讲话中，我强调了要各级领导同志到农村去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本来是对的。但是强调得过份，有些绝对化，这就是错误的。此外，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在这时以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是搞得不深不透的，有的甚至是失败的。对当时各地方许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也估计过份，对干部中犯四不清错误的严重性也估计过份，因而对于当时工农业生产形势好转的原因的某些解释也是错误的。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应当在蹲点、发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模清情况，才能把情况调查清楚，认为照毛主席以前所说的开调查会的办法不够了，有的时候又说不完全适用了。这在事实上就否认了毛主席所说的开调查会的方法，这是十分错误的，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在这段时期中，我过份相信王光美同志在一个大队蹲点的经验，让她在几个地方作了介绍，并且向北京的同志推荐听听她的介绍，后来又把她的讲话记录批发到全国，这就给许多同志以极不好的印象。其实，桃园蹲点工作队的做法，在当时就是有一些错误的。

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时，我的上述错误并没有改正。我在这次会议上说过，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又说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正如二十三条上所说的，这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今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只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同毛主席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我正是在这种时候，忘记了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因而不能不走到邪路上去。这就是暴露了我一九六四年所犯的错误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我的这次错误，也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二十三条”之后，才纠正的。“二十三条”上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把打击对象缩小到少数人身上。

由于我在过去历史上犯过一些错误，特别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犯了右倾错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犯了更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又是从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由毛主席亲自纠正的。毛主席同中央其他同志讨论后，在七月二十四日决定撤退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工作组。随后，召集了有各地方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八月一日召开党中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公报，在全会后期，讨论了关于我的错误问题，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新的选择，全会一致决定：由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一些改变，是完全必要的，对全党全国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世界革命也将

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完全拥护党的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的变动。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党内其他许多同志也远比我高明。我对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一切决定，决心严格遵守，决心遵守一个党员所应当遵守的纪律，决不在任何人面前搞两面派。⑥

刘少奇虽然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但会议的一些情况还是隐隐约约听到。如毛泽东所说的“也不能全怪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刘少奇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等等传到福禄居后，“刘办”的秘书们由衷地感到高兴，大家议论纷纷，认为“听毛主席的口气，少奇同志没有路线问题了”，“对少奇同志的问题，毛主席可以一锤定音的”，大家坚信“少奇同志可以过关了”。

然而，我们天真的幻想，很快就被无情的事实撕得粉碎。发给我们的少奇同志的检查只字不提毛主席的批语，更没有传达毛主席的讲话。

这是为什么呵？困惑和疑虑重新笼罩在我的心头”。⑦

由于刘少奇仍是中央常委，自八月十八日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刘少奇都有参加。在八月十八日那一次，休息时刘少奇坐在靠边的一张藤椅上，默默地抽烟，一面拿起一张报纸随意翻着。这时，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走过来向刘少奇打招呼，攀谈了几句后，刘少奇指着报纸说：“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重大（毛泽东将聂元梓的大字报比做“巴黎公社宣言”——作者注）”。伍修权无法作答，笑了笑走开了。⑧

在十一月三日第六次接见那天，休息时刘少奇遇到了邓小平。

刘少奇问：“小平同志，你怎么样？”

邓小平笑了笑说：“横直没有事。”

刘少奇也笑了笑说：“没事，学习。”

自一九五三年邓小平由四川调到中央工作后，便与刘少奇共事。

“八大”以后，刘少奇负责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邓小平负责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两人的工作交往相当密切。“文化大革命”中两人又同时成为“天涯沦落人”。谁也想不到，这次短暂的面晤，竟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谈话。

三、“大批判”与刘少奇的第一次答辩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社会上、中南海里对刘少奇的批判有增无减。每天，刘少奇仔细地阅读孩子们从外面带回来的红卫兵小报、传单，上面满是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尤其是“中央文革首长”如江青、陈伯达、戚本禹等人的讲话，更是字字见血，句句着肉。

面对着江青、戚本禹一伙策划中南海的造反派对刘少奇的攻击和诬蔑，刘少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将信将疑。于是便决定召开党支部会议（刘少奇隶属“刘办”党支部），要求刘少奇解答工作人员的提问。

刘少奇也预料到工作人员开会的目的，于是在坐下后便说：“前一段因为忙，没有机会听你们的意见，现在我希望你们坦率的同志式的给我提意见。丢掉缺点错误不可惜，今后可以更好地工作”。刘少奇显得很平静。

“刘办”党支部书记刘振德首先发言，他说：

我们在你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看到你总是废寝忘食地工作，大家对你很敬佩。你现在犯了错误，我们感到很难过。外面传说很多，许多事情我们都不清楚，想请你解答一下。

“可以”少奇同志回答得很坚决。

问：“我们现在只知道你的错误是因为派工作组，派工作组怎么不请示毛主席？”

少奇同志点燃一支烟，答：“请示也会犯错误，我没想到派工作组会犯错误。同意派工作组的同志们也没想到会犯错误。这是对当时形

势的认识问题。”

问：“你们在杭州开会，谈过派工作组的事吗？”

答：“谈过。毛主席委托我和邓小平同志相机处理。毛主席说可以派也可以不派，看情况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因为我心中无数，感到很难领导运动，请求毛主席回来主持工作，毛主席说暂时还不准备回来。”

问：“你是中央副主席，在第一线工作，怎么说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个搞法？”

答：“这个问题在撤出工作组时，我就讲过了，不晓得就是不晓得，毛主席曾多次批评有人对文化大革命很不认识、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就是批评我的。正是因为不理解，才派了工作组嘛。”

有位同志说：“中央发表的社论说，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也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若坚持错误，矛盾就要起变化。我们希望你赶快改正错误，毛主席不是说改了就好吗？”

少奇同志沉思片刻，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改正错误，首先需要弄清错误的根源，需要研究，需要给我时间，现在还没有看到一篇说清楚为什么派工作组就是路线错误的文章，我将努力去认识。”

问：“毛主席在大字报中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不是包括毛主席批评过的包产到户问题？我记得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说他革了一辈子命，革来个包产到户。”

答：“一九六二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后，陈云同志提出了农村包产到户的建议。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我同意了陈云的建议。毛主席回来后批评我不顶住。”

问：“你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是不是就是对你犯错误的处理？”

答：“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常委作了变动，我没有意见，再变动我也没有意见。我是四平八稳，求稳怕乱，所以没有资格领导文化大革命。历史将证明，这次文化大革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这样，在沉闷的一问一答中，时间已过了一个多小时。这时，光美同志说：“少奇同志很疲劳，今天是不是就谈到这里。”

四、刘少奇的第二次答辩

时隔不久，对刘少奇的“批判”越来越升级，大字报铺天盖地，抄大字报便成了刘振德等工作人员的一个任务，大字报中捎带着对“刘办”工作人员的冷嘲热讽，还有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大家感到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

根据多年的政治经验，刘振德等人将中南海的这一切与毛泽东联系起来。正是“风起于斯，亦止于斯”。刘振德等人热切地盼望毛泽东的表态，因为只有毛泽东才能扭转和制止目前的局面。然而，等来等去都听不到毛泽东的声音。

在中南海造反派的压力下，“刘办”党支部召开了第二次“答辩会议”。下面是刘少奇的答辩：

问：“大字报上说你不尊重毛主席？”

少奇同志听后没有马上解答。他缓慢地抽着烟，会议出现了短暂的冷场。

我们理解他的心情，对这些被断章取义、肆意歪曲了的事实，他无法回答。但他也不愿意拒绝大家的提问。

少奇同志往烟缸里弹了烟灰，说：“我和毛主席一起共事几十年，不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遇过多次很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在这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由于大家都缺少经验，在一些事情形成决议之前，总会有不同的意见，甚至争论。这种不同意见和争论是正常现象，不能说成是谁反对谁，也不能叫不尊重。尽管我们有意见，但最后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去办事的。”

“大字报上说你在最近的中央会议上，顶撞毛主席，不让毛主席讲话。”一位同志追问道。

“我和毛主席共事几十年从没有争吵过，更没有不让人讲话的事。”少奇同志气愤中夹带着不耐烦。

问：“大字报上说，你当国家主席是夺了毛主席的权。报纸上登你照片是想同毛主席平起平坐，分庭抗礼，是贪天功为己有。”

少奇同志又沉默了一会儿，说：“从当委员长到当国家主席，我都推辞过多次，好让别人当。但最后中央已经定了，我只好服从。在商量国家主席人选问题时，毛主席说，当国家主席有点名气，但是个苦差事，外事活动多，送往迎来，不自由，干扰读书和研究问题，他不当了。为了让毛主席专心研究问题，抓大事，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就是事情的经过，怎么能说是夺权呢？”

他吸了一口烟，又说：“在报纸上登我的照片，当初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们是党领导一切，毛主席是党的主席，登他的照片就可以了。但有人提出这里面有个对外的问题，当时毛主席也说不登不好，一定要登。有人曾提议登我的照片时是否可以比毛主席的照片小一点，毛主席马上说，为什么要小一些，一样大，这事就这样定下了。当时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现在断章取义的作出来，不知道是何用意……”

问：“大字报上说，你一九四九年春天到天津去开会宣扬要发展资本主义，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和刚开过的七届二中全会唱对台戏，你去的时候，也没和毛主席打招呼。”

答：“当时我受中央的委托到天津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同许多干部、工人和工商界人士谈过话，我讲的就是二中全会的精神，绝不是唱对台戏。你们可以看看二中全会文件和我的讲话记录。因为这些话大部分是在一些小型座谈会上即席讲的，不可能逐句逐字去推敲，后来觉得有些话不那么准确，有些话也可以不那么说。”

“你说过‘剥削有功’吗？”有人问。

答：“我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说的。”

看到大家惊讶和不解的样子，光美同志说：“现在年轻人一听要发展资本主义，就说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但要了解到讲话时的历史背景，就不难理解了。那时，我们党还允许民族资本家存在，允许雇

工。我们的经济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少奇同志插话："这是毛主席提出的十六字方针"。）我还记得少奇同志对一些工商界的人士说，你们不仅要赶快恢复生产，还要发展生产。还鼓励他们多办工厂，办一个好，办两三个更好，如果说剥削有罪，他们一个工厂也不会开办了"。

少奇同志接着说："表达不够恰当的话，我早在一九五四年就作了自我批评，我在天津的讲话，在其它一些城市也传达了，并没有造成坏影响，也并没有因为我的讲话，使天津的形势变坏，而是好起来了。好在这些事情都不难弄清楚。"

在被问到光美同志在桃园搞四清的经验问题时少奇同志说："那天，中央几个领导同志在大会堂讨论四清问题时，有人提到光美搞四清的经验很好，毛主席说那就请王光美同志来讲讲嘛，（少奇同志的司机站起来说，是我从大会堂回来把光美同志接去的。）她到大会堂讲了以后，大家认为这个经验可以推广。毛主席说，就请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顾问吧。桃园经验在当时是比较好的，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

问："大字报上说林彪在东北期间，你不支持他，而支持彭真是不是这样？"

答："有支持不够的时候，不能说不支持。林彪同志在东北工作期间，不是同我个人关系。不论表扬，还是批评他，都是由中央书记处集体讨论决定的。对他有些批评，是正常的。总不能支持错误的东西吧。对他在东北期间工作的评价，中央清楚，毛主席也都知道。不晓得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意思？"

问："大字报上说你在延安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右倾投降主义？"

答："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停战协定。以后又召开了旧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决议。在一月十日我党的停战会上，就有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二月一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内部指示，说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我提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同

在此之前毛主席的提法是一致的，没有原则区别。后来只有高岗攻击过这个提法，毛主席批驳了他。”

问：“大字报上说，在重新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你只提出做马列的好学生，既不提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也没有提毛泽东思想。说你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这和毛主席在大字报中批评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有关吗？”

少奇同志回答说：“关于一九六二年发表那篇文章的一些过程，外面的人不知道。还是在一九六〇年毛主席就曾建议编辑出版我的选集。当时我不同意。我说除了编辑出版毛主席的著作外，不要再编个人的选集了。我建议可以编辑出版中共中央文集。这种文集可以包括除毛主席以外的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后来毛主席又多次提出要出版我的选集的事。为此，中央书记处还作了决定，又组织了编辑小组，我只好同意。”

他说到这里转过头来问我（即刘振德）：“这事你知道吧？”

我答：“知道”。

“我们在湖南蹲点时，编辑小组的同志还到长沙向少奇同志汇报了选目问题。”光美同志插了一句。

我补充说：“机要档案处的一个同志也去了，他是编辑小组的工作人员。”

光美同志又说：“当时少奇同志表示，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不能不把精力集中在研究和解决当前的问题上，没有时间去看自己的稿件。”

少奇同志说：“这件事一直拖到一九六二年。他们说可以先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篇，先是编辑小组的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也作了一些修改，中央书记处也同意了。”（我插话说：“是在北戴河修改的。”）

“这篇文章是我在一九三九年写成的。即使修改，也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去加一些当时还没有出现的事。”少奇同志继续说。

会后，我们把记录整理一下，起了个题目：刘少奇同志的答辩。然后写在几十张纸上贴了出去。但很快被撕了，并贴上了批驳我们的大字报，说我们被刘少奇利用了，是为刘少奇放毒。

因为有的造反派，已把少奇同志当作敌人了，所以在批斗会上不论少奇同志说什么，都不被接受，不是说他狡辩，就是说他放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次，造反派还念了毛主席的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会后，光美同志痛心地说："我们不能说话了，说谁不好，谁就成了好人，说谁好，反而害了人家。既然剥夺了我们的发言权，还质问我们干什么？"⑩

五、匿名信与宋庆龄赠书

在刘少奇被攻击、批判的同时，"刘办"不时收到社会上寄来的匿名信，表示对刘少奇的支持和同情，对"文化大革命"的强烈不满，说"毛主席被奸臣包围了"，"千古奇冤，民族大难"，"我们对您非常同情，您不理解，我们更不理解"。

有一次，从外面寄来了一卷红卫兵小报，外面是张"百丑图"，画的是以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为首的"走资派"抬轿子，吹喇叭，而轿子中坐着的是刘少奇。里面夹着一封信，信中支持刘少奇，痛骂林彪、江青之流外，还说："我们还年轻，将来为您翻案！"⑪

那张"百丑图"刘少奇看了后，在办公桌上放了好几天。

工作人员们抄来的大字报，以及孩子们从外面带回来的红卫兵小报、传单等，成了刘少奇唯一的消息来源，他看得十分仔细，有的还看了许多遍，极力想从字里行间捕捉到"旗帜"毛泽东的讯息。

当时，抄家已成风。刘少奇的家被抄已是早晚的事。于是刘振德向王光美建议，将收到的那些群众来信妥善处理，"写这些信的人是冒着很大风险的，要注意保护他们"。王光美于是将这些来信撕碎，扔在

马桶里冲掉。

不久，外面寄给刘少奇的信都被拆看，再也收不到那样的支持信了。

隔不几天，中南海的造反派在戚本禹的指使下来抄刘少奇的家。除了一些红头文件外，他们想要的材料一点也没有抄到。

时近一九六六年的岁末，天气越来越冷，对刘少奇的批判也越来越升级。正是乌云压顶、寒流滚滚，刘少奇已陷入危境，许多平时同刘少奇要好的人怕受牵连，都躲得远远的。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却派秘书给刘少奇和王光美送来刚出版的《宋庆龄选集》，还附有一信，信封上亲笔写着“敬爱的刘少奇主席、王光美同志收”，书的扉页上也赫然写着：“请刘主席、光美同志审阅指正。”同时，宋庆龄还给刘少奇的孩子送来了贺年卡、日记本和糖果等新年礼物。

正是“患难见真情”，宋庆龄既不怕国民党蒋介石，也不怕共产党毛泽东。王光美不禁为宋庆龄的这股真情和凛然正气感动得热泪滚滚。⑫

慑于毛泽东的淫威，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内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但却得到社会上和中共党外人士的同情与支持，正是公理自在人心中。这是刘少奇在最后的岁月里所得到的一点安慰。

六、“智擒王光美”与揪斗刘少奇

踏入一九六七年，刘少奇的处境更加险恶了。

一月一日，中南海的造反派在刘少奇的住处院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似是送给刘少奇的“新年礼物”。

一月三日，在戚本禹的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与此同时，北京建工学院的红卫兵与造反派要刘少奇去作公开检查。

一月五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说：“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岗山

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一月七日四时以前到该院作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作公开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⑬

第二天，毛泽东批示周恩来：“总理：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

周恩来于七日凌晨接见该院学生代表，制止他们逼迫刘少奇到该院作检查。

一月六日，发生了清华大学造反派揪斗王光美（红卫兵小报称之为“智擒王光美”）事件。王光美曾参加派往清华大学的工作组。

该日下午，刘少奇的卫士组接到一个自称是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人打来的电话：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被汽车轧断腿，需要马上截肢，家长必须到我们医院来签字，手术台都准备好了。

因为周恩来一再叮嘱刘少奇夫妇不要走出中南海，因此秘书们认为先让刘源源和刘亭亭到医院去看看，如确需动手术，他们也可代表家长签字。

源源和亭亭没有回来，也没有电话。这时，医院又打电话来催促，秘书们只好把事情告诉王光美，她听后惊呆了，连话也讲不出来，双眼含着泪水直瞪瞪地看着刘少奇。刘少奇立即决定：“马上要车，我到医院去”。

王光美说：“总理不让我们出中南海！”

刘少奇坚决要去医院，卫士组马上通知中央警卫局和北京市公安局，那两方面还以为刘少奇需要住医院。

卫士组陪同刘少奇和王光美一起到了医院。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造反派布下的骗局。他们抓住刘平平为人质，目的是抓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去批斗。刘源源和刘亭亭去后也被他们扣押。这些穿着白大褂、伪装成医生护士的人，万万想不到刘少奇也来了。当他们遇到刘少奇那愤怒的眼光，顿时惊慌失措。王光美明白了一切，便挺身而出，说道：“那好，除了我，你们都走！”

这时造反派中有人喊道：“把刘少奇也扣下！”

卫士们和公安人员立刻拥簇着刘少奇上汽车。

王光美愤怒地向造反派们说：“我抗议你们制造的这种骗局！”

造反派们回答：“抓你是江青的指示，办法是我们想的”。

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园批斗，后来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被释放。

一月十二日，戚本禹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集中央办公厅一些造反派开会，说：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

当晚，中南海的造反派“红色造反团”一百五十多人蜂拥到刘少奇的住处福禄居，要冲进来揪斗刘少奇。在大门口，哨兵挡住了他们，造反派便硬要往里冲。警卫刘少奇的解放军战士都出来了，双方撕打起来。刘少奇的秘书打电话报告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树槐，卫士组也报告了警卫局。然而他们得到的答复却是：把大门打开让他们进去！

刘少奇、王光美被拉到院子里批斗。刘少奇被迫弯腰，王光美则被迫站在一张三条腿的桌子上。

造反派们先高呼一阵口号，然后便逼问：

“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刘少奇回答：“我过去不反，现在不反，将来也不反。”

“你带毛主席语录没有？”

刘少奇从口袋里拿了出来。

“第一页是什么？”

刘少奇翻开认真地念了一遍。

“不要念，你给背。”造反派发难。

“要我背，背不出来。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一篇文章是什么内容，毛主席当时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毛主席的每篇文章我都看过多次。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领会它的精神实质，我不赞成背个别词句的学习方法。”

刘少奇的这番话，又招来了麻烦。造反派有人喊：“你口口声声说不反对毛主席，可是你明目张胆地反对背毛主席语录、明目张胆地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

刘少奇还是不急不躁地回答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毛主席是针对什么写的，在当时起到了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新的创见，这些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你现在没有资格给我们讲理论，不是你教训我们的时候了。背诵语录是林副主席提倡的。"

这时，又有人喊："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这群乌合之众乱哄哄闹了一阵就散去了。⑮

从此以后，福禄居就成了市场似的，谁都可以进来，进来了后又可以四处乱窜，可以随心所欲，包括贴大字报、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失去了人身自由。

七、毛刘最后一次会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深夜，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给刘办打来电话，说："主席叫我去接刘少奇同志来大会堂谈一谈。我坐华沙牌小车去，你们就不要给他要车了。告诉你们的哨兵，不要挡我。"

刘少奇的秘书将来电的内容告诉了刘少奇，但他没听明白，说道"再说二遍，我没听懂"。王光美将秘书的话重复了一遍，刘少奇才明白过来。⑯

使刘少奇感到困惑的，是这种安排的方式。此时此地，刘少奇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乃享有中共中央规定的各种生活待遇和保安措施，包括自己的座驾和司机。按正常的安排，毛泽东那边打电话通知，刘少奇这边便调车前往，既不需要徐业夫，也不需要"华沙"。

在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座驾，最高级的是斯大林当年赠送的"吉姆"牌轿车，有防弹设备，为数又少，只供毛泽东、刘少奇等几位最高领导人使用。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拥有自己的"吉姆"。物以稀为贵，"吉姆"便成为最高档次的座驾。次一等的是中国长春汽车制造厂自制的"红旗"牌轿车，是专为中共领导人特制的，一律是黑色，车

身较长，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再次一等的是从波兰进口的“华沙”牌轿车，那是中共三流人物和一般工作人员普遍的座驾。徐业夫与“华沙”，显然是毛泽东安排的。毛泽东本不需要派徐业夫来接，既使是要派自己的车来，也应该是派“吉姆”，而不是“华沙”。因此，在这次安排中，是多了一个“徐业夫”，而少了一个“吉姆”。

由于没有考虑的余地，刘少奇站起来便作准备。由于毛泽东当时的住所人民大会堂与中南海仅是咫尺之遥，徐业夫说到便到，向刘少奇说道：“主席请你到他那里谈一谈，跟我一起坐车去吧”。又向刘少奇的秘书解释：“少奇同志的车子目标大，不安全”。

刘少奇顺手拿起香烟和火柴就走出来，王光美跟在身后用手持刘少奇刚穿上的衣服，又把上衣抽一抽，看得出她是在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

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毛泽东一见到刘少奇，便说：“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回答：“没这回事，是个骗局”。

接着，刘少奇便主动地检讨自己的错误，之后，郑重地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不适宜担任领导职务。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子女去延安或者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听罢沉吟不语。过了好一会才说：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罗法写的《机械人》及中国的《淮南子》。

毛泽东起身为刘少奇送行，一直送到北京厅的门口。分手时毛泽东说：“回去后好好看书学习，保重身体”。⑰

这是毛泽东向刘少奇说的最后两句话，而这一次会见，也是两人自一九二二年结识以来的最后一次见面。

伪善的毛泽东，在此之前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已秘密成立了置刘少奇于死地的专案组。公安部部长，中央文革成员谢富治在宣布这一决定时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专案组的负责人是江青。同日，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秘密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授意他公开炮轰刘少奇、邓小平，“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根据张春桥的授意。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十二月二一十七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联合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参加者达十万人；

十二月三十日，中央文革小组代组长江青带着其成员王力、关锋、姚文元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表示“坚决支持”：

与此同时，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公开宣称：“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康生则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讲话中公称“刘少奇是赫鲁晓夫”。

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的那两条意见，既是“以退为守”，又是向毛泽东的试探。毛泽东拒绝了刘少奇的要求，拒绝给刘少奇放一条生路。

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政治家，和对毛泽东有深切了解的中共领导人，刘少奇似乎从这次召见中预知了自己的命运。从人民大会堂回来后，刘少奇显得平静，有意地向正在焦急等待着他的王光美及孩子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使那些缺乏世故的孩子们“悬在心中的石头一下子落了下来，心中暗想，情况也许会好起来。”

然而，刘少奇的秘书发现，第二天王光美神情诸然，完全没有那种“心中的石头落地”的喜悦。

---

①：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一①九一二〇页。

②：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一〇八——四〇页。

③：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二五一页。
④：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一六〇页。
⑤：引自黄峥《刘少奇一生》四四七页。
⑥：台湾出版《刘少奇资料汇编》六二一页。
⑦：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二五一页。
⑧：伍修权《往事沧桑》二七四页。
⑨：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二五二——二五五页。
⑩：同上二五九——二六五页。
⑪⑫：同上，二六六——二六九页。
⑬⑭：《刘少奇年谱》六五三页。
⑮：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二八页。
⑯：同上，二八二页。
⑰：刘平平《胜利的鲜花献给你》，见《缅怀刘少奇》四三九页。
⑱：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二八三页。

第四章　罗织罪名

一、毛泽东的政治需要

在刘少奇、王光美遭受批斗的同时，毛泽东正忙着指挥一场大战役，那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搞的“一月革命”：不但夺了上海《文汇报》的权，而且还夺了原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党、政大权。

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市的夺权，上海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毛泽东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子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①

毛泽东对于“文化大革命”怎么革法，事先并没有一套具体的计划和步骤，而是“走着瞧”。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不能依靠刘少奇控制下的党、政组织系统，只有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得全国各级党、政权力机构瘫痪了，无下开始大乱，生产出现停顿（上海便出现了停水、停电、停交通，造成巨大威胁，毛泽东才下令张、姚夺权）。毛泽东要坚持“文化大革命”，又不能长期地无政府、无领导，使全国生产停顿，于是只好破釜沉舟，全面向“走资派”夺权。这是毛泽东无奈之下的唯一的出路。在这种政治格局之下，刘少奇作为“走资派”的总代表，其彻底覆灭的命运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要坚持“文化大革命”，又必须打倒刘少奇。因此，打倒刘少奇，既出于毛泽东的需要，又出于“文化大革命”的需要。

于是，在一九六七年开始，刘少奇的命运急转直下。

就在毛泽东接见刘少奇的两天后，中南海的造反派又一次冲进福禄居批斗刘少奇、王光美。

一月十六日深夜，也就是毛泽东批准上海夺权的那一天，周恩来打电话给王光美，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

第二天，即一月十七日，中南海的造反派再次冲进来，要撤掉刘少奇的电话。刘少奇上前阻拦，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②

一月十八日，造反派们又气势汹汹地闯进来，二话不说便将刘少奇的电话线扯断，电话机也拿走了。从此刘少奇断绝了与外界的直接联系。

刘少奇久久地站在那里，像座雕像似的一动不动。刘少奇预感到，更险恶的日子来临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陷害，欲置之于死地，中共党内（包括上层领导）没有人敢为刘少奇鸣不平。倒是党外人士章士钊大义凛然，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初上书毛泽东。章士钊对女儿章含之说：“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这些家伙要把中国毁掉”。“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请他制止打倒刘少奇，毛刘分裂就会使国家分裂。”

章士钊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象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

章士钊一片正义、诚恳之心，跃然于纸上。

然而，章士钊太不了解毛泽东了。毛泽东于三月十日给章士钊回

了这样一封信：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同心。个别人情况复杂，一切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吉安。

毛泽东三月十日

三月间，毛泽东还派人把当时江青整理的有关刘少奇的材料送给章士钊阅读。章士钊看后，接连数日，情绪低落，对章含之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些'罪状'，纯系蓄意致他于死地！"。③

二、欲加之罪："招降纳叛"

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在党内党外、全国上下不得人心，引起了广泛的抗争与对立。那就是"三老"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和"四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与中央文革发生严重冲突的"二月逆流"事件。

毛泽东心中很清楚，光凭自己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那张《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的那几条，不但难以令广大党员、人民信服，而且在历史上也根本站不住脚跟。要打倒刘少奇并且要令其永远不得翻身，还得想出其他的办法。

秉承毛泽东的意旨，江青一伙在专案组中首先搞了个"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大特务"的假案。

接着，毛泽东伙同康生、江青又搞了第二桩假案——"六十一人案件"。

关于一九三六年刘少奇经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决定让国民党狱中的六十一名共产党员办理自首手续出狱的经过，本书上文已有所述。此事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与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的毛泽东商量、研究过后，才决定、批准的。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及当事人之一的薄一

波都有证明。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先是康生将此事翻出来，进行鼓噪和陷害。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康生写信给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一九三六年八、九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随信并附上一九三六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④

当时由于安子文、薄一波、杨献珍等人已被造反派揪出来，“六十一人自首出狱”事件早已传到社会上。然而，由于此事毛泽东当年有份参与决定批准，深知事情根本不是康生所说的那么回事，因此没有同意康生的说法，而批准了周恩来亲拟的中共中央十一月二十四日对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的批复，周恩来送审批复时给毛泽东的信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⑤

周恩来在批复中说：“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⑥

然而，时至一九六七年，毛泽东的思想变了。出于要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政治需要，毛泽东伙同康生、江青一伙重新捡起“六十一人事件”，作为诬陷刘少奇的弹药。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经毛泽东审阅批准，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批示中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刘少奇与张闻天作出了“叛卖的决定”。“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⑦

将薄一波、安子文等人打成“叛徒”，便可顺理成章地给刘少奇安上“招降纳叛”、“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

的罪状。问题在于，康生、江青等人这样做，人们不难理解，而当年亲自参与研究、决策，对此事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的毛泽东，竟颠倒是非、栽赃陷害，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丑恶的行为之一。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对访华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⑧

在"六十一人案件"上，康生派人对张闻天说："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张闻天坚决拒绝康生的说词，遭受迫害，被囚在小屋子中长达五百二十三天！⑨

康生还派人以"中央委员"的官位为诱饵，要安子文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安子文宁可坐牢也不写此假证明。⑩

康生等人还不许薄一波、刘澜涛等人如实写出毛泽东清楚知道他们一九三六年出狱之事，但他们还是写了。

三、刘少奇最后的答辩

刘少奇问题再次升级的标志，是一九六七年三月毛泽东下令批判刘少奇的代表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毛泽东说："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⑪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本书推崇备至，亲自将它列为整风运动的主要文件。当时，毛泽东正在争取登上中共中央第一把手的宝座，正在图谋建立由他控制的党内的一统江山。刘少奇在这本书中宣传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要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加强各个方面的自我修养等论点，正正符合毛泽东的政治需要，因此下令立即公开发表，并给予极高的评价。现在，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便又将这本书说成是"大毒草"，"蒋介石也可以接受"。正是"此一时，

彼一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指示戚本禹泡制了批判刘少奇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发表在一九六七年《红旗》杂志第五期上。文章宣称：“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并将“帝国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帝国主义买办”、“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等等罪名加到刘少奇的头上。

文章的末尾，还向刘少奇提出了八个“为什么”，并提出了答案：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个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三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答案只有一

个：你很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⑫

三月二十八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自己当时看这部电影的经过，驳斥张春桥的诬蔑，说明自己“根本没有《清官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种想法和看法”，也不可能说出《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类话，要求中共中央调查。⑬

可是，信寄出后如石沉大海。当戚本禹的长文刊登出来后，刘少奇极度愤怒，神情恍惚，茶饭不思。

在外界的压力下，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成立了中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戚本禹的长文发表后，工作人员要求刘少奇回答戚本禹提出的问题。这是刘少奇的第三次答辩。

一位同志说：“戚本禹在他的文章中，列了你八条罪状。”刚一说到这里，少奇同志立即就激动起来。他气愤地说：“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赃！”说着就把他茶几上放的那份《红旗》杂志摔到地板上，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过《清官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他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对我说过它是卖国主义的？我又甚么时候说过要当红色买办？他们要是光明正大，可以来和我辩论嘛，不是讲大辩论吗？戚本禹为什么不来同我辩论？谁罢了我的国家主席职务？为什么要剥夺我的发言权？宪法成了废纸，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如同火山爆发，他将心中的疑虑和愤慨都倒了出来，我看见他那双手的指头都有些颤抖。

光美同志也气愤地说：“用造谣、中伤、污蔑、栽脏的手段定人的罪，谁能接受呢？”

一位同志问：“有人说八大报告中有些话毛主席是不同意的。比如关于阶级斗争和国内矛盾问题的提法等。报告不是大会通过的吗，怎么毛主席不同意就通过啦？”

少奇同志顺手从茶几上拿起正在看的八大报告，语气比较平静的

说：“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是讲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决议中也说：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议通过后，第二天见报了。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对我讲那些提法不妥当，但已经来不及修改，所以至今未改。”

当问到“七大报告提出毛泽东思想，八大报告为什么没有提”时，少奇同志说：“八大报告中写不写毛主席思想，在议论时意见也不统一。不主张写的人占多数，他们认为毛主席曾多次从宣传文章中删去这个提法，看来毛主席并不主张到处使用。另外，七大是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那时我们还没有取得全国胜利，全国人民对毛泽东思想还不熟悉。七大至八大，形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不写进报告也不会影响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不是都在宣传嘛，只不过没有像现在这样宣传就是了。”

当问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怎么回事”时，少奇同志的声音虽然稍大了点但还是比较平静的，他说：“一九三一年前后，在北方工作的一批干部，由于国民党的搜捕和叛徒的出卖，被捕入狱，一直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我想，要设法营救他们，如果日本人占领了北平就不好办了，很有可能会把这批人给杀掉。九一八事变以后，在沈阳狱中的共产党员不是就被全部杀害了嘛。因此，我把这个情况写信报告了党中央，请中央决定。很快就得到中央的答复：同意这样办。”说到这里，他又激动起来了，并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去拉他办公桌的抽屉，嘴里说着：“这个事我已向毛主席写了申诉。”

这时，光美同志急忙去拉住少奇同志的胳膊，说：“你是写给毛主席的，在这里拿出来也没有用。”他才扭过身子，靠在抽屉那里。但怒气未消，“这批人出狱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早有定论，几十年来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现在说成是叛徒集团，简直岂有此理！”

“人家说毛主席不知道此事，当时是以中央名义答复的，还是以个人名义答复的？”有人又问。

少奇同志很不耐烦地大声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去问文革小组的人，去问戚本禹！"

光美同志忙解释："当时毛主席不是总书记，可能不知道。"

后来，少奇同志在书面答复中，说是张闻天同志签的字，还提到当时的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

少奇同志稳定了一下情绪说："这批人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难道这六十一位同志让国民党反动派都杀了我们就舒服了！现在把他们说成是叛徒集团，将来，我们党的历史怎么写？"这简直是血与泪的控诉啊！

过了几天，少奇同志写出书面答复，我们抄成大字报贴了出去。但很快就被人撕了，并骂我们"这样做是为刘少奇开脱罪责。"⑭

四月七日，刘少奇向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送上对八条问题的答辩。

然而，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答辩完全置之不理。刘少奇就像一只被扔进狼群的羊，孤立无助，求诉无门。

四、致刘少奇于死地的"叛徒、内奸、工贼"

为刘少奇制造了"招降纳叛"的罪状以后，江青一伙还觉得不够劲。要将刘少奇置于死地，还必须有更加厉害的武器。江青认为最好是给刘少奇本人也戴上一顶"叛徒"的帽子。于是，江青指示专案组仔细捉摸刘少奇的历史。专案组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刘少奇一九二五年曾在长沙及一九二九年曾在沈阳被捕。就这样，"叛徒"的帽子便"自然而然"地戴到刘少奇头上。为了取得"证据"，专案组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将与刘少奇一同被捕入狱的孟用潜"隔离审查"，在专案组一连七天的连续威迫审讯之下，孟用潜违心地讲了刘少奇被捕后叛变的话，但第二天就申诉推翻了。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孟用潜共写了二十次申诉，否定自己被迫而讲的话，但江青不予理会。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孟用潜写的申诉信中说："一九二九

年在沈阳被捕，我没有叛变，在隔离审查过程中，我确实也交待过刘少奇和我一九二九年被捕后的叛变罪行。但是这些交待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

除孟用潜外，当年在满州省委工作的干部及一些与刘少奇有关系的人（甚至保姆、炊事员）也受到株连，拘捕，受审，逼他们作伪证。被专案组直接关押的有六十四人，“至于因专案需要或稍有嫌疑而由有关部门、单位收审的，那就更多了”，“关押人用了逮捕、拘留、监护、隔离审查、办学习班等不同名义，但目的都是一个，就是要从这些人身上逼出能将刘少奇定罪的口供。他们将人抓来后，采取勒令交代、长期隔离、日夜审讯、轮番批斗、软硬兼施等手段，编造假情况，拼凑假证据。”⑮据王光美在上海文汇报记者一九八〇年五月采访的文章《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中披露，为了收集刘少奇的“罪证”，江青一伙“动员了四十万人，查阅了四百万卷敌伪档案”。⑯

江青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八个专案组会议”上说：“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爷请他喝烧酒！

经过如此二年的“苦斗”，江青（当然包括毛泽东）给刘少奇戴上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三顶帽子。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江青在《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上批示：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日上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厅在审问江青时，有如下记录：

审判员审问被告人江青：“你是不是控制指挥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江青答：“我是分工在这个专案组里。”

法庭宣读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六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报告上的批语：“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法庭两次播放了江青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接见中国京剧团等单位的讲话录音。其中有江青说：“我现在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大恶劣了……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剐，万刀割……”。

被告人江青听了播放的录音后说：“没有什么要说的。这是我对艺术家们谈别的问题，大概插了这么一段。”⑱

---

①：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②：引自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五五页。

③：详见章含之《我与父亲章士钊》，《文汇月刊》一九八八年第四期。

④：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二二四页。

⑤⑥⑦⑧：同上，二二六页。

⑨：刘英《身处逆境的岁月——张闻天》。

⑩：见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载安黎《须待历史证明的话》。

⑪：首都《史学革命》编辑部及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合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二五一页。

⑫：《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

⑬：引旧黄峥《刘少奇一生》四五七页。

⑭：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二九———二九四页。

⑮：引引黄峥《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一八四———八五页。

⑯：同上，第十———十二页。

⑰：以上引自叶永烈《江青传》。

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第五章　刘少奇最后的苦难岁月

一、人身迫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刘少奇获悉清华大学造反派第二天要召开三十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还有彭真、薄一波等三百人陪斗。刘少奇女儿们在《胜利的鲜花献给你》一文中说：

爸爸一听，立即震怒了。他推开饭碗，大声激昂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爸爸胸中的激愤终于像火山似地爆发了。

妈妈急切地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当然应该是我去向群众检查……

“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爸爸激动地说，“我绝没有反过党，没有反过毛主席。别人反对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江也反过，我一直是拥护主席的。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有，但没反过。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我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爸爸说到这里，把手中汤勺猛地往桌上一摔，手都微微颤抖了。“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

爸爸继续说："去年八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这么多干部都被打倒了，将来的工作谁去搞？生产谁来抓？"

我们凝神静听，感到爸爸的心胸是那样坦荡，那样光明磊落。爸爸神情严肃地望着我们，语气坚定地说："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不论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也永远不反毛主席，永远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爸爸停了一下，长出了一口气，似乎他的话已经说完了，激动的情绪也安静下来，恢复了以往的安详神态，亲切地望着我们，缓慢地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洲，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妈妈哭了。她泣不成声地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会把骨灰给你们的。"爸爸语气坚定地对我们说，"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嘛！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我们几个孩子眼泪早已流尽，瞪大着眼睛，仔细静听，生怕漏掉一字，默默记在心里。爸爸说完，站了起来，坚定而又响亮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说完，便回到他自己房间去了。

第二天清晨，王光美果然被清华大学造反派拉走，被揪到大操场批斗。造反派强迫她穿上旗袍，戴上一串乒乓球做的"项链"，还对她拳打脚踢，施以种种人格污辱。王光美在武力面前不屈服，坚持说理

斗争。她严词回答造反派说：“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你们要是不摆事实不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你们斗吧！”

王光美被斗回来后，向刘少奇倾诉了满腔的愤恨和冤屈：“他们打人骂人、侮辱人都干了，他们批斗我，为什么还要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老同志去陪斗，这哪里是政治斗争，分明是在侮辱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呵！”王光美决定给毛泽东写信。

刘少奇一直没有出声，他神情黯然，两眼发直。那天晚上，他一口饭也没有吃。从那以后，刘少奇的心情更加沉重，时常烦躁不安。有时厨师郝苗把饭摆好了，叫他去吃，他像没有听见似的，不说话，也不去吃。一次，郝苗给他煮了两个鸡蛋，他发脾气说是生的。郝苗耐心地剥开蛋壳，说：“跟平常一样，不生”。过了一会儿，刘少奇突然醒悟过来，”说道：“那我错了，向你道歉。”①

五月，江青指使中共中央警卫局将为刘少奇当了十八年厨师的郝苗抓走。罪名是“特务嫌疑”。郝苗在一九四六年国、共北平谈判时为中共军调部当厨师时，就与王光美认识（王光美时任军调部翻译），中共中央一九四九年进北平后，郝苗便为刘少奇服务。这个生长在北京郊区农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共产党员，在十多年的服务中，与刘少奇一家结下深厚的感情，就如一家人一样。“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孩子外出串连时，便是郝苗详加安排，给他们粮票和生活费。将郝苗抓走，是对刘少奇精神上的打击。

郝苗被抓走后，调来了一名厨师老冯。不久，这名厨师也被调走了。并且不再派来新的厨师。刘少奇被迫从中南海的大食堂打饭吃，有什么吃什么。由于刘少奇在革命年代患下严重的胃病，大食堂中的许多饭菜，刘少奇不能下咽。这是蓄意从肉体上对刘少奇的折磨。

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的刘少奇，明白对手们的伎俩和用心。他明白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他不能不为自己的儿女们担忧、他无法估计等待着孩子们的将是什么命运，但他确信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保护他的后代。他叮嘱眼前几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

去。最小的女儿小小只有六岁，平时活泼可爱，是刘少奇夫妇的掌上明珠。可现在，刘少奇预料自己已经无法保护和抚养她了。他决定把小小托付给保姆赵淑君。让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把小女儿带出去，带到群众中去。他交待妻子说："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从一九六七年六月开始，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造反派"八一战斗团"在中南海西门安营扎寨，设立"揪刘前线总指挥部"，扬言要把刘少奇揪到建工学院去批判斗争。接着北京上千个造反派组织和外地来京串连的造反派组织也蜂拥而来。一时间几万人（最多时达十几万人）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在中南海周围搭起帐蓬、席棚、木屋，各自插上自己的旗帜，用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内日夜叫喊。有些人还试图冲进中南海，但都被警卫部队挡住了。

七月四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刘少奇向北京建工学院造反派写检查。这时刘少奇已经被折磨得心力交瘁，他写了一半只好叫王光美代笔。结果被造反派臭骂，说是"假检查，真反扑"，并将它定为"大毒草"，在全国批判。

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回复刘少奇的"通告"，代表了那个疯狂的年代的那种疯狂的风格，是中外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读者诸公千万要细心欣赏：

刘少奇：

你交上来的是他妈的什么检查！又臭又长的五千余字，无处不在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无处不在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妄图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为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极，混蛋透顶！

你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妄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螳臂档车，自不量力！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刘少奇，你到白日作梦了！

你的所谓"检查"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鼓动大大小

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扑的动员令。我们要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审，我们决不收兵！

……刘少奇，我们要正告你：毛主席的红小兵不是好惹的，你这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像你这样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若乱说乱动，立即取缔！

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二十五日零点前交出你的第二份检查！

不得有误！

红代会北京建工学院

新八一战斗团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②

正在这种硝烟弥漫的时刻，毛泽东于七月中旬离开北京，到南方巡视。

毛泽东此举，似乎是将刘少奇扔给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一伙，任其宰割。因为毛泽东一离开北京，江青一伙便可为所欲为，而毛泽东也不必为这一切负责。

果然，毛泽东刚离开北京，江青就向中南海的造反派们说：“你们为什么还不揪斗刘少奇？一点造反精神也没有！怕什么？等什么？还看不出吗？斗！现在正是时候！”

于是，中南海的造反派们向中央办公厅上书，拟于七月十八日在国务院小礼堂召开“批判刘少奇假检查真反扑罪行大会”。戚本禹将报告中的“少奇”两字去掉，加上“邓、陶夫妇”四字，报请“伯达、江青、康生决定”。③

七月十八日晚，造反派将刘少奇揪到职工食堂，把王光美揪到中南海西楼大厅，分别批斗。福禄居中，只剩下一名秘书和一名卫士，其他的工作人员都分别跟随刘少奇和王光美到了批斗会场。

就在这时，造反派们冲进刘少奇的家，翻箱倒柜，大肆抄掠，将

刘少奇的笔记、手册、文件、通信，以及秘书们的工作日记等，装在大包里，统统拿走。

两个多小时后，刘少奇在卫士的搀扶下回到家里，只见室内物件狼藉，一片凌乱。当天晚上，造反派强行把刘少奇和王光美隔开，刘少奇在前院，王光美在后院，房门口加了一名持枪的哨兵，两人虽然只有咫尺之遥，但不能见面，不能互通消息，连子女也不能接近父母。工作人员进出也要接受监视和盘问。

这是对刘少奇精神、肉体上的进一步迫害。刘少奇从此失去人身自由。

王光美事后回忆说：对于这次突然袭击，他们事先已有思想准备，但绝没想到，这次竟是与刘少奇的永别。她说：事前，少奇同志一直很镇定，曾对她说过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刘少奇和她永别的话语。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历史不是由毛泽东写的！"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愤慨、绝望之情跃然纸上。

从此以后，刘少奇频频地被揪斗，刘少奇的秘书回忆说：

在我看来，少奇和光美同志既是夫妻，也是同志和战友。

光美同志在少奇同志身边做秘书工作近二十年，从工作、生活到家务，对少奇同志的帮助都是很大的。

就是在少奇同志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斗争和残酷迫害的情况下，光美同志也毫不动摇地站在少奇同志的一边，他们彼此理解，心心相印，他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他们共同经受着狂风恶浪的考验。有什么比这人世间真情升华的革命情操更珍贵呢？

少奇同志头几天不知道光美同志的下落。这对他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心急如焚，几天沉默不语，饭量大减。后来他从一个孩子那里得知光美同志就在后院时，精神状态才有了好转。

自从他们被隔离开后，每天只给少奇同志一份报纸和一份参考资料，光美同志则什么也没有。

有一天，少奇同志拿着他看过的报纸和参考请求一位卫士说："请

你把这些送给光美看看好吗？她看了以后再退给我。”卫士照办了，并告诉光美同志这是少奇同志给她的。

就这样在传看报纸和参考资料的过程中，少奇同志了解到光美同志还没有被抓走。虽然都失去了自由，也无法见面，但相互问却也能得到一点安慰。

后来看守们知道了光美同志看的东西是少奇同志传过去的，先是仔细进行检查，怕他们之间利用报纸和参考资料传递什么信息。然后向上报告了这件事。据说江青还追查是谁替他们在中间传送的，说这是帮助他们搞攻守同盟，还把那个卫士也调走了。

从此，门口的哨兵对进出的工作人员监视得就更加严格了。连大夫去送安眠药，也要跟进去看一看。少奇同志吃饭时也要派人站在饭桌旁监视着；有时给个水果，但却不给水果刀……

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精神折磨，使少奇同志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④

在这种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刘少奇的身体健康急剧恶化，一名卫士说：“首长骨瘦如柴，每次我帮他洗澡时，我都不忍心看着他，都忍不住掉眼泪”。

八月五日，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人民日报》刊登了大字报的全文，并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社论。这无异是为“揪斗刘少奇”火上加油。这一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三百万人的誓师大会。与此相呼应的，便是在中南海里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这是刘少奇第六次被批斗。

那天，酷热难当，刘少奇和王光美被几个彪形大汉架上批斗台，用暴力胁迫他们弯腰低头，双臂后伸，即所谓的“喷气式飞机”，达两小时之久。因为天气酷热，他的衣服全湿透了，他想擦擦汗，但刚掏出手绢就被人打掉了。只能任凭豆大的汗珠滚滚滴到地上。造反派还不断地按头，搞喷气式。他向念批判稿的人提出：“我耳朵背，听不清批判的是什么内容，让我将批判稿带回家看看，弄清楚提的什么意见，

以便今后改正错误。”但这个合情合理的要求也被造反派拒绝了，并说：“你是耍花招，是装聋卖哑”。

然后用一阵“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回答了他。刘少奇的答辩不仅被不停的口号声打断，而且还被造反派用语录本不断拍打。会场上频频响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一片杀气腾腾的景象。

以下是批斗时“造反派”们的记录：

问：你是否说过“三自一包”？

答：没有，那是记载文献里。

问：文献是谁写的？

……（没有答覆）

问：为何在“修养”中除掉了无产阶级？

答：那是错误的；

问：什么错误？

答：违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

问：为何违反？

答：因为认识不够。

问：为何在一九六二年再次出版“论修养”？

答：有人提议出版的。

问：谁提议的？

答：康生

问：有没有审查？

答：审查了。

问：你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答：不反对，只有一部份的事情内，在党的事业上做了一些不利的工作。

问：为何在“论修养”里除掉“马列”二字？

答：是某人删除的。

问：审时你未参加吗？

答：那时没有注意到。

问；在天津是否讲过“剥削有功”？

答：没有讲过。

问：是否反对毛泽东思想？

答：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问：二月提纲是否在你家里作成的！

答：不是的，只在我家里开过一次会。

问：谈了些什么？

答：我什么也没有谈。

问：有谁参加？

答：彭真、陆定一、吴冷西。

问：是谁主持会议的？

答：我呀！

问：谈些什么？

答：听了大家的意见，我……。

问：为何袒护彭真、陆定一及杨尚昆？

答；过去不了解他们。

问：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期间大捧蒋介石？

答：这是政策呀！

问：为何提出“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及两条道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

答：我的思想不大好。

问：思想不大好！是否反毛泽东思想？

答：我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

问：你反对什么？

答：我什么也没有反对。

问：为什么指“清官秘史”是爱国主义？

答：我当时（……错漏……），他不是向胡乔木说的吗？我不大明了。

问：你为什么不调查一下？

答：目前我是这种状态，怎么进行调查呢！

问：你为什么听信彭真的话？

答，他没有说过谎话。

问：你父亲是“官僚买办”布尔乔亚希表吗？

答：我父亲是民族布尔乔亚希爷，毛主席不是提议这样称呼吗？

问：你相信毛主席吗？

答：我当然相信毛主席，若不相信他，绝不会活到今天。⑤

刘少奇的女儿们被抓去陪斗，看到了下面惊心动魄的一幕：

爸爸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光穿着袜子。就这时，妈妈突然挣脱，一把紧紧抓住爸爸的手，爸爸不顾拳打脚踢，也紧紧扛着妈妈的手不放。他俩挣扎着身子，手拉手互相对视。这是爸爸跟妈妈最后握手道别……几个坏人狠狠地掰开了他们的手，妈妈又奋力挣脱，扑过去抓住爸爸的衣角，死死不放……。

会毕，刘少奇、王光美被押到会场一角，逼迫他们向两幅画上的红卫兵鞠躬。此时的刘少奇已是鼻青脸肿，他的腿被打伤，鞋被踩掉，只穿着袜子，一跛一跛地走路。当他被押回办公室时，怒气正盛，立即叫来机要秘书并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法律的严厉制裁的。”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刘少奇还写信给毛泽东，书面提出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并写道：“我已失去自由。”⑦

二、惨无人道的折磨

一九八〇年刘少奇获中共中央平反与恢复名誉以后，在审讯江青四人帮的日子里，刘少奇在一九六七年以后所受到的惨无人道的迫害与折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揭露，似乎是有一只巨手，有意地将事情压下来了。原因是：上述情况一旦被详尽揭露，不但有损中共的颜面，而且更有损于毛泽东，因为刘少奇专案小组的负责人，就是江青，而江青是直接向毛泽东负责。毛泽东与中共向来的政策是“优待俘虏”，然而中共中央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遭遇，还远不如一名国民党的俘虏兵。

刘少奇是单独关押的。他不知道，就在“揪刘斗争”如火如荼的九月十三日，他的孩子们被驱赶出中南海，妻子也被捕入狱了。他整日盼望着能看见被隔离开来的妻儿。他总是佝偻着身体，扶着窗台，拖着伤还未愈的右腿，一步一步往前挪，有时蹭到孩子们的住所，有时又蹭到他认为关押着王光美的后院墙根。然而，回答却是一片寂静。不久后的一天，在刘少奇的住处连夜筑起一堵高墙，把刘少奇去后院的路堵死了，也就是说，把他心底里仅有的一点儿希望扼杀了。从此，孤独的魔影终日伴随着他。不几天，有人奉命搜查刘少奇的居室，并要他把皮带解下来。刘少奇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却被来人强按在地上，不由分说地抽走皮带。刘少奇气得浑身打颤，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从此，刘少奇过去的警卫员被逼当了他的“看守”，并被命令对刘少奇要毫不留情。

刘少奇还被迫改变了以往夜间工作的生活习惯，加上他终于知道妻儿被逼离去，发给的安眠药量又不足，因此，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的觉，有时甚至彻夜不眠。他渐渐感到精神和体力都难以支持，以致终日神情恍惚。他那在革命战争中受过伤的手臂，因被扭打而活动更受限制，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二个小时。他那在批斗中被打伤的双腿，几乎迈不开步子。距他住处三十米的饭厅，他走一趟常常

要用五十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当他拖着沉重的双腿，艰难地迈着步子，全身晃晃悠悠难以保持平衡时，跟随他的“看守”因为早被打过招呼，谁也不敢上前扶他一把。最后，刘少奇根本不能走动了，只好由工作人员为他打饭。打饭的工作人员经常被别人骂为“保皇兵”，弄得他们也不愿意每餐为刘少奇打饭了，常常是打一次饭，吃好几顿，有时饭里还被人吐进唾沫。只剩下七颗牙，又患有胃病的刘少奇，既咀嚼不动饭菜，又经常吃变质的剩饭剩菜，故而时常腹泻，身体也因此一天天虚弱下去。他的手频频颤抖，吃饭时饭送不进嘴里，一吃饭就弄得满脸满身都是汤菜饭粒。

刘少奇生病，医生、护士也不敢对他太客气，都要先批斗一阵。做体检时，还要骂几声“中国的赫鲁晓夫”。个别大夫还丧尽天良地用听诊器敲打他，有的护士打针时则乱扎乱捅，还停用了他需要长年服用的维生素和治疗糖尿病的药物。种种折磨导致刘少奇身体状况日趋恶化，甚至时常神志不清，处于呆痴状态。即便如此，当时还有人说，“此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假装的可能……”。

一九六八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刘少奇突然发高烧，由于没有及时适当的治疗，转成肺炎、生命垂危。江青等人狠毒地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这就不得不派医护人员去抢救。然而，当医生提出刘少奇要住院治疗，却被拒绝了。为了减少对病人的精神刺激，医生提出摘除刘少奇居室里挂满了的大字报六标语，也被拒绝了。这一次，刘少奇的肺炎被治愈了，然而人却从此虚弱得无力起床活动。他面容憔悴，身体消瘦，头发、胡子又长又脏，常常是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当刘少奇处于这样一种毫无自理能力的悲惨状况时，监视他的人仍日夜守在床边，还说“为了防止他行凶或自杀，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监护工作。”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地绑在床上，不许松动。

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刘少奇突然两次悲愤交加，失声痛哭，或

许是他觉得生活对他太残酷了，太不公正了……

以后，由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和脑供血不足，脑软化的症状恶性发展，刘少奇失去了自主吞咽功能，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他时而紧搂着拳头，时而张开十指乱抓，而一旦抓住什么又死死不放。在他痛苦地在空中划动双手不止不休的时候，有人把两个硬塑料瓶子放在他手中，他紧紧捏着，于是稍稍安静一些，天长日久，他竟将两个塑料瓶捏成了“葫芦”形。⑧

三、十二中全会：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

打到了刘少奇，达到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目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取得重大胜利的中共“九大”可以召开了。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就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讲话。会议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时期的一系列指示都是正确的。两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成果就在于“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

全会还批准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审查报告说：“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

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全会批准了《审查报告》并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着《审查报告》说：“不要小看这么一本，里面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几乎每天都找她，搞出这一本审查报告，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刘少奇本人是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听到十二中全会决议的。江青一伙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那日是刘少奇七十岁寿辰。

听罢决议，刘少奇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频频呕吐，血压陡然升高到二六〇——三〇毫米水银柱，体温骤升至摄氏四十度。

从此，刘少奇完全明白了，任何辩驳都是徒劳的。他缄默了，什么话都不说，用无言表示抗议。然而，刘少奇的身体却从此更趋衰弱，周恩来千方百计动员了北京医院的两名护士去护理他，可惜，他们无法治疗刘少奇的精神创伤，对他的身体衰竭也就无能为力了。

四、发配开封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河南省古城开封，秋雨绵绵，天气阴沉而寒冷。晚上九时许，一架由北京来的飞机，轰隆隆地降落在开封军用机场的跑道上。舱门打开后，从飞机里抬出一副担架，担架上的人用棉被包里着，被迅速地送进了一辆黑绿色的救护车，几辆轿车拥着这辆救护车，绝尘而去。十多分钟后，车队驰进了市中心的北上街十路——原开封市人民政府大院。

担架上的人就是刘少奇。他是以“战备疏散”的名义，送到这里来的。

大院的东北角，有个三十多平方米的大井，形成一座独立的小院，小院的四周被三层高的楼房包围着，阴沉沉地，难得见到阳光。这里原是国民党“金城银行”的金库，是一九三〇年建造的。

小院里的每个屋门，都是用厚厚的钢板制成，窗户上装着密密的比拇指还粗的钢枝，屋里又阴暗又寒冷又潮湿。

患着重病的刘少奇，就被囚禁在这个堡垒似的小院南屋的一间套房里。室内只有一张小木板床，一张桌子和一张茶几。

小院西屋的二楼住着几名医护人员。小院外设有监视刘少奇的“特派员”办公室。

小院四周的屋顶上，架着四挺机关枪。

市政府大院早在刘少奇到来之前已全部搬迁，这时大院里驻守着两个排的解放军，大院的进口处架设了两道厚厚的铁丝网。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医护人员共五人，两名男护士，两名女护士，一名姓刘的男医生，全是从开封陆军一五五医院派来的。

从北京来的只有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与一名姓曹的女护士。

第二天———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李太和一早就来到刘少奇的房间，只见他安静地躺在床上，头下枕着从北京带来的一对海棉枕头。刘少奇微微睁开眼睛，环视着室内，他似乎想向李太和说什么，嘴张了几下，又合上。

上午八时，刘医生率领护士们来到刘少奇的房间，实行“监护。”

刘医生和护士们在刘少奇的床前排成一排，举起“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刘医生带头念：”‘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刘医生念一句，护士们跟着念一句。

刘少奇睁开了眼睛，木然地看着这一切，又闭上眼睛。

现场批判进行了十多分钟，刘医生才收起“红宝书”。

这时北京来的曹护士才怯怯地走上前，送上一叠北京带来的病历。曹护士又向刘医生介绍：“他原来患有糖尿病，长期服用维生素和D860，已经停用了。现在他还患有心脏病和大叶肺炎……。”刘医生戴上大口罩，正在替刘少奇检查，突然刘少奇睁开了眼睛，全身打了个哆嗦，随即全身痉挛起来，双手在被子上乱撕乱抓，喉咙里也“呜呜”

地喊着。刘医生正在发楞，刘少奇的双手抓住听诊器，用力地紧紧搂着。

刘医生急忙往外拉，边拉边对两名男护士喊道："快，快帮忙拿下来!"

曹护士和李太和急忙制止他们。李太和轻轻地拍打着刘少奇的手，刘少奇渐渐安静下来，曹护士趁机将听诊器拿开，从衣袋里拿出两个葫芦状的硬塑料瓶，塞到刘少奇的两只手里。

刘少奇的手便死死地抓住那两只塑料瓶。

当晚，刘医生在监护日记上写道：

"到今天我才算明白，原来是这么一个病人——一个过去最高层而今处于最低层的人物！他几乎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啦，他的病真多，除了器质性的病，更多的则是精神和心理的病症。他的植物神经已经紊乱，出现全身痉挛，手足抽搐。可是他有时又是清醒的。今天他刚开始睁眼睛的一刹那，我感觉到了他目光中射出的清醒神态和力量……。"

五、"旗手"惨死在古都

正当刘医生写监护日记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发高烧，并且剧烈地咳嗽。那是从北京来开封时，他被剥光衣服用棉被里着，一路上又照料不善，着了凉。

卫士长李太和把男护士找来，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才将体温表放在刘少奇的腋下。刘少奇体温烧到摄氏三十九度。

接着刘少奇又剧烈咳嗽，并呕吐起来，呕吐物中还有血块。

护士们将刘医生找来。刘医生来到后，先拿出《毛主席语录》"批判"了一阵，才为刘少奇检查。刘少奇那瘦瘦的胸脯像风箱似的起伏着，不停地咳嗽。

刘医生向前来的"特派员"说："该怎么办？"

特派员说："按规定治疗吧。"

特派员还向一名穿军装的人说：“去告诉张处长，立即给北京报告：一切均好，病情无明显变化。

此后，刘少奇一会清醒，一会昏迷。无论是清醒或昏迷时，他的双手都紧紧地搂住那两只塑料瓶。

第四天———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全天病情无异常。

第五天———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病人”大便干结，护士用手抠出。

第六天———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为“病人”翻身两次。

第七天———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咳嗽复发。刘军医提出为“病人”化验，透视拍片建议。

第八天———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上级答覆：可以进行一次化验，透视拍片不行。

第九天———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刘医生为刘少奇化验尿样和血样。他在“监护日记”上写道：“经过化验，总算搞清楚，他得的病本来不是什么难症，只是治疗不及时，才引起多种并发症。加之病人长期僵卧，造成双腿肌肉萎缩，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过多，也被扎烂，使全身血管局部坏死，引起心力衰竭……可是他的生命力还是那么的顽强。这从医学角度似乎是难以解释的。”

第十天，刘医生提出给病人勤翻身、擦洗，防止生褥疮。又准备向上级提透视拍片和会诊。

第十一天———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刘医生要用 D860，但上级不准用。

第十二天———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病人”大便干结，护士仍用手抠出。

第十三天———九六九十月二十日“病人”咳嗽复发。

刘医生提出拍片、会诊建议。

第十四天———九六九年十月三十日“病人”轻度发烧。开封药品告急，上级不准购买。

第十五天———九六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上午给“病人”翻身擦背。

下午上级通知："病人"不适宜透视、拍片、会诊。以后不要再提这样的问题

第十六天——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一日，刘医生在"监护日记"上写道：

"已经过去第二周了。这一周来，他的病情明显恶化。这不能不说与药物的减少有关。同时，他们又否决了我提出的透视、拍片、会诊的建议。我算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监护'，而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

这一天刘少奇体温升到四十度，全身不停地哆嗦。刘医生组织抢救。

第十七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日高烧不退，继续输液。

第十八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高烧不退。输液，打退烧针。

第十九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四日体温降至三十九摄氏度，继续输液。

第二十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体温降至三十八摄氏度。

第二十一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六日刘医生"监护日记"。

"好危险！像他这么大的年纪，身体又那么衰弱，高烧四十多度，已近生命的极限。可他的神志似乎还是那么清醒，还是那么主动积极地配合治疗……今天，他的高烧总算退了，体温维持在三十七点二摄氏度。他又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第二十二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七日。

从北京来的卫士长李太和和曹护士被送到刘少奇身边后，李太和俯下身，把嘴凑到刘少奇耳边，轻轻地告诉他们来了。

刘少奇脸上的表情木然了，两颗混浊的泪珠从他的眼内流出。

曹护士也将脸贴上刘少奇，轻声叮嘱："要活下去，活下去！"

第二十三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八日，刘少奇又开始发烧。

第二十四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九日，刘少奇的体温是三十九·七摄氏度。而退烧药已用完，上级不准买，北京带来的 D860 也被带走。

第二十五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日，刘少奇不能进药。

第二十六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深夜，刘少奇嘴唇发紫，浑身哆嗦，体温是四十·一摄氏度。两瞳反光消失。特派员走到刘少奇床前看了看，说道：“发烧对他来说不是家常便饭吗？注意观察，情况实在危险再写报告。”

第二十七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凌晨六点四十分发出病危通知，五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两分钟后，刘医生和护士才赶到。刘少奇是在没有得到抢救的情况下死亡的。

当日深夜两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刚回到北京的李太和。电话里是汪东兴的声音：“你必须立即赶回开封去。他今天早晨已经死了。记住带两套干净衣服，还坐飞机去”。

第二天上午，李太和又来到开封市政府大院，他一眼便看到了走廊上停放着一副担架，一张白床单严严实实地覆盖着，李太和揭开白床单，下面正是刘少奇！

只见刘少奇僵直地躺着，蓬乱的头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有一片瘀血……。

李太和掏出随身带来的刀剪，细心地为刘少奇修剪头发、胡子，而后替他换上带来的衣服、鞋子。

医院负责人和哨兵一直站在旁边监视。

李太和走进刘少奇的病房，他发现那两只硬塑料瓶掉在地上，少奇捏成了葫芦形。刘少奇带着多少的遗恨，离开这个世界。

北京来了命令：遗体就地火化。

深夜，下着寒冷的小雨。

特派员派人将刘少奇的遗体用白布严严密密地包里起来，抬上一辆北京“六九”型吉普车，车厢装不下刘少奇那硕长的身躯，小腿和双脚都露在外面。

开封火化场岗哨林立。

死亡登记表是这样填写的：

死因：烈性传染病。

骨灰编号：一二三。

申请寄存人姓名:刘原

现住址:八一七二部队

与亡人关系:父子

死亡人姓名:刘卫黄

年龄:七十一

性别:男

职业:无业。⑩

没有亲人,没有鲜花,没有哀乐,也没有悼词,有的只是凄风苦雨。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遗体就这样秘密地被推进了火化炉。

刘少奇不得好死,毛泽东也没有好活。毛泽东的胜利只是短暂的。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自己也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而且报应很快就出现了。

就在刘少奇魂断开封的时候,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之间的危机也在酝酿之中。越明年,在"国家主席"问题上,毛泽东便与他的"接班人"爆发了尖锐而严重的冲突,斗争是激烈的,你死我活的。再过一年,当毛泽东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准备拿掉林彪这位第二个"接班人"的时候,林彪政变未遂,仓皇外逃,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事件"。

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终结的丧钟敲响了。

刘少奇临终前说的"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也应验了,毛泽东死后还不到四年,中共中央就在一九八〇年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为刘少奇平反,并在五月十五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刘少奇没有下地狱,而毛泽东也没有上天堂。刘少奇"盖棺论定"了,但历史与人民对毛泽东的审判,则还没有结束——

---

①:因为,"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②: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二九六页。

③:黑雁男《十年动乱》二三四页。

④:同上,二三七页。

⑤: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三〇五页。

⑥:台湾出版:《刘少奇资料汇编》六三〇页。

⑦:《缅怀刘少奇》四四四页。

⑧: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七五页。

⑨:同上一七六——一七九页。

⑩:同上一八〇页。

以上引自陈舒平《共和国元首之死》。

参考书目

《毛泽东选集》，一一五卷，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传》，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
《刘少奇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
《怀念刘少奇》，湖南人民出版社。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刘少奇和他的事业》，中共党史出版社。
《毛泽东与他的秘书田家英》，逄先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横空出世》，胡长水、李缓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民族救星》，张树军等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立邦兴国》，庞松、林蕴晖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晚年岁月》，郑谦、韩钢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说不尽的毛泽东》，张素华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传》，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朱德传》，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周恩来的历程》，江明武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我眼中的刘少奇》，郭思敏，天羽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我为少奇当秘书》，刘振德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刘少奇风范词典》，中国工人出版社。

《凯歌行进的时期》，林蕴晖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走出韶山冲》，王以平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延安整风前后》，张志清等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刘少奇一生》，黄玲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刘少奇的最后岁月》，黄玲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刘少奇谋略》，严昌、阳雪梅著，红旗出版社。
《青年毛泽东》，高菊村等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刘少奇在白区》，陈绍畴著，中共党支出版社。
《刘少奇青少年时代》，黄祖琳编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伟人之初·刘少奇》，朱元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人民公社狂想曲》，林蕴晖、顾训中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大跃进狂澜》，谢春涛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滑轨与坛变》，庞松主东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许全兴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杨胜群、田松年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陈伯达传》，叶永烈著，作家出版社。
《江青传》，叶永烈著，作家出版社。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出版社。
《刘少奇论合作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生活中的领袖们》，权延赤著，云南人民出版社。
《十年动乱》，黑雁男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毛泽东的人际世界》，宋一季、杨梅叶编著，红旗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罗德里克·麦克法奇尔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农业社会主义批判》（论文），王小强著。